

2026 / 04

第42卷 第4期 (总第239期)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梅景辉

副 主 任 王 曦

委 员 (以姓氏笔划为序)

尹坚勤 冯保善 孙爱军

李洪天 张 莉 张 勤

姚苏平 黄光耀 蒋 波

路 明 潘 文

主 编 梅景辉

副 主 编 王 曦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系统观念探析

..... 刘 立 施天天(1)

数智时代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引领机制创新:生成动力与效能提升

..... 王遐见 岳 奎(7)

人工智能赋能新兴知识分子队伍建设:政治吸纳和组织管理

..... 孙运军(17)

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

..... 孔读云(26)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新时代大学生担当精神的基本内涵、培育问题及优化路径探析

..... 陈 璐(33)

智媒时代青年寻求“情绪价值”的表现样态、成因及因应之道

..... 郭佳楠(40)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生成逻辑与应对挑战

..... 沈丹丹 柴义江 张小光(4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专题】

《世说新语》基本文献问题管窥

..... 宁稼雨(55)

《西游记》“宝物”的精神意义与文学性表达

..... 丰 竞(64)

语文学科高阶思维的内涵、特征和教学实现

..... 管开兵 李 震(75)

名师共同体赋能中小学语文生态阅读的系统重构与创新实践
..... 朱家珑(84)

生成与写意

——AIGC 作为中国画教学创新工具的可行性及边界探赜 李楚洋(94)

从“缺位”到“归位”:教育家精神引领下学前融合教育教师内隐专业信念重塑的质性研究
..... 欧阳叶(101)

从物件到课程资源:幼儿园教育的物化与超越
..... 石建伟(110)

从迷茫区隔到协同共生:支持性中间系统赋能家园共育的路径探索
..... 方 芳(117)

Main Contents

Exploration of Xi Jinping' s Systematic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 LIU Li SHI Tiantian(1)

Innovation of Political Leadership Mechanism for Non-Party Intellectual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Era of Digital Intelligence; Generation Motivation and Performance Improvement

..... WANG Xiajian YUE Kui(7)

Building a New Generation of Intellectuals Empower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olitical Integration and Organizational Management

SUN Yunjun (17)

The Anti-Japanese National United Front and Comprehensive Awakening of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KONG Duyun(26)

Basic Connotation ,Challenges and Optimization Pathways of Cultivating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CHEN Lu(33)

Youth' s Pursuit of “Emotional Value” in the Smart Media Era; Patterns, Causes, and Solutions

..... GUO Jianan(40)

AI-Empowered Teaching Reform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Generative Logic and Coping Strategies

SHEN Dandan CHAI Yijiang ZHANG Xiaoguang(48)

A Brief Exploration of the Basic Literature Issues of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 NING Jiayu(55)

Spiritual Significance and Literary Expression of “Treasure” in *Journey to the West*

..... FENG Jing(64)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of High-Order Thinking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GUAN Kaibing LI Zhen(75)

Systematic Restructuring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of Ecological Reading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Empowered by a Community of Master Teachers

ZHU Jialong(84)

Generation and Xieyi——Feasibility and Limits of AIGC as an Innovative Tool for Teaching Chinese Painting

LI Chuyang(94)

From“Absence” to“Return”: A Qualitative Study on Reshaping Implicit Professional Beliefsamong Inclusive Preschool Education Teachers Guided by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OUYANG Ye(101)

From Objects to Curriculum Resources; Materialization and Transcendencein Kindergarten Education

..... SHI Jianwei (110)

From Isolation to Co-existence; Exploring Pathways for Supportive Mesosystem to Promote Home-School Partnerships

FANG Fang(117)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系统观念探析*

刘立 施天天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合肥 230026)

[摘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蕴含着精深的系统观念,既论述了生态系统的要素、生态系统的层次、生态系统的环境以及生态系统的发展等自然生态系统论的主要内容,又阐明了治理主体实现整体治理需要优化结构的生态环境治理系统工程论的基本观念。这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关键词]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系统观念; 生态环境治理

[中图分类号] D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4-0001-07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学习理解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必须掌握科学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系统观念”^{[1]20};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系统观念”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原则^{[2]5-6}。系统观念是一种基础性、整体性、战略性、有序性的观念,在推动各领域工作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的系统观念具有更加深刻的寓意,蕴含了自然生态系统论和生态环境治理系统工程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报告中提出,要持续深入推进“生态系统优化”^{[3]33}。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运用系统观念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方法论,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形

成了新时代生态文明系统观念,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发挥了重要的方法论指导。

一、自然生态系统论

系统、要素和环境是系统科学研究的三大重要因素,系统与要素、要素与要素以及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阐释了自然生态系统内外部的系统性,即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层次、存在的环境以及动态发展等方面都内蕴着鲜明的系统观念。

(一)生态系统要素论

系统是若干要素及其关系组成的整体。习近平总书记注重生态系统的组成要素分析,强调人、自然和社会等核心构成要素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自然环境为人类提供生存所需的土壤、水源、气候等资源是维持生态系统平衡、保障人类健康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必须始

*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专项一般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22JZDZ013)。

[收稿日期] 2026-04-18

[作者简介] 刘立,男,湖北宜昌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执行院长。

施天天,女,安徽桐城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

终坚持把生态环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素和内生动力。从“山水林田湖是生命共同体”^{[4]42}奠定了生态系统要素基本框架,到“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4]12}拓展了生态系统要素的维度,到“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5]71},再到“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4]198}进一步扩大了生态系统要素的包容范围,从而使生态系统这个“生命共同体”要素内涵不断丰富,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生态系统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认识日益深化,对自然生态系统全面性和整体性的高度重视。由复杂多样、各种各类的生态要素构成的生命共同体积蓄着人与自然的系统关联和生态关联,要求人们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中,不仅将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等自然要素纳入共同体中,而且将“天—地—人—物”等要素看作一个有机的大生命系统。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到“地球生命共同体”,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承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将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创新和丰富了当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思想。

(二) 生态系统层次论

按照现代系统科学的观点,系统是有层次的。钱学森把整个世界从小到大划分为渺观、微观、宏观、宇观和胀观五个层次^{[6]30}。系统层次论强调不同层次的系统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相互依赖和有序的关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从微观领域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进而在国家层面强调“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还扩展至全球视野“地球生命共同体”,从“要素—自然—地球”一体化视角,深刻揭示了生态系统的层次性,这“三个共同体”构成生态共同体理念。

从局部地段自然系统的构成要素来看,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生态系统并非孤立要素的简单叠加,而是由相互依存、紧密耦合的各环节构成的有机链条,任何一个要素的变化都会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林和草,这个生命共同体是人类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7]176}保持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动态性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要求,不能就山论山,就水论水,“要加强协同联动,强化山水林田湖草等各种生态要素的协同治理”^{[4]265}。“要从系统工程和全局角度寻求新的治理之道”“统筹兼顾、整体施策、多措并举,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文明建设”^{[7]176-177}。

从一国地区人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在系统论看来,人与自然所形成的生命共同体理念,不仅内蕴着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的本质关系,还体现着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系统性。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紧密的相互依存关系,体现了生命共同体的基本内涵,即生命与生命之间的相互关联和影响。任何构成特定社会生命共同体的主体的基本义务之一在于内化尊重、顺应与保护自然的伦理准则,并将这种伦理约束转化为实践中的行为边界。具体而言,维持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及其代际可持续性,应当成为一切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活动展开之前须先满足的先决条件。

从地球整体来看,地球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对人类实践活动的无限性与地球生态系统有限性之间矛盾的深刻认识。这是针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负效应,以及损害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行为所造成的弊端而提出的正面引导。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基础,人类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各方面都与自然生物密切相关,维护地球家园、促进人类可持续发展彰显了大党大国的责任担当,也是每个“地球人”的共同使命。

(三) 生态系统环境论

一定系统存在于环境之中。系统科学认为,任何系统都呈现出整体涌现性^[8],即系统的内在要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构成具有新功能的新整体。系统产生整体涌现性的首要前提就是系统构成要素之间形成耦合机制。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以及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变化是持续不断的,不同的要素

结构在相互联系的过程中发挥功能,因此必须不断优化要素间相互联系和作用的方式。生态环境系统从系统内要素的相互作用与调整来看,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共同构成了一个动态演化的整体,需要不断调整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实现系统的最优运行状态。从系统对外部环境的响应与适应来看,生态环境系统并非封闭的,而是与外部环境密切相关。生态环境系统是一个处于动态平衡中的复杂整体,其内部的生物、非生物环境以及人类活动等各要素相互影响和作用,在动态平衡中实现生态系统自我调节和适应环境变化。由于生态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紧密联系和相互依赖,环境的微小变化可能对整个系统产生显著影响。而面对环境变化,生态系统具有一定的自组织性和恢复力。通过调整系统内部的结构和功能,生态系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适应外界环境的变化,并恢复到相对稳定的状态。当然,这种适应性和恢复力是有限的,如果环境变化超过一定的阈值,生态系统就可能发生不可逆的破坏。

人类文明史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发展史。人与自然的在每个阶段的环境中具有不一样的条件,在每个特定阶段的环境中也有特定的要求。人与自然关系的转化对应着人类文明形态的变迁与确立,在工业社会人与自然的对立是明显的,人采取强制形式的征服力量给自然打上主观意志烙印,当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达到无法和解的地步,自然就会对人类的盲目自私行为加以报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提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9]559-560}。“自然界报复论”揭示了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有限性,警示人们盲目砍伐树木、破坏生态平衡的行为后果,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从近期功利转变为负效应,甚至变为恶性报复,危害族群的生存与发展。

社会生产关系与政治上层建筑是规制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制度成因和系统环境因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固有的资本无限增殖贪

婪与自然有限性之间的内在矛盾,是全球性生态危机的总根源。与之相对,以公有制为主体、以人民利益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制度,凭借其统筹规划与可持续发展的制度优越性,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提供了先进的制度环境保障。恩格斯指出,人与自然关系的协调“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施行完全的变革”^{[9]561},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变革是消除生态问题的根本途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将生态文明建设“内嵌”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实现的现代化,内蕴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取向。与西方以资本为中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传统现代化路径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强调在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为人们提供更多的优美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人与自然的现实可行的实践路径,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系统化、制度化推进构筑了坚实的体制机制保障。

(四) 生态系统发展论

系统是动态发展的。根据贝塔朗菲的一般系统论,系统的动态性就是“从时间维度来观察系统,系统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真正的静态系统是没有的”^{[6]32}。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文明演进的高度,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分析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作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等重要论断,揭示了绿色发展和高质量发展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态势。

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深刻革命和国家的重大战略。改革开放以来,资源环境约束日渐趋紧,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呈高发态势,生态系统退化严重……这些生态环境问题成为“国土之伤、民生之痛”。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发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坚持和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实践证明,“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有机统一体,尊重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是并行不悖

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关系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欲实现生态平衡和社会福祉的双赢局面必须以“绿水青山”为前提,守住发展的底线,坚决摒弃过去“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坚定走绿色发展新路。

高质量发展是绿色发展为根基的新形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是增进人民福祉的客观要求,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应有之义。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很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7]302}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推动高质量发展就是以绿色为底色,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手段,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为目标。

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人类只有依靠自然才能生存,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可持续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石,是人类文明永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在人类生存环境中,人与社会的关系依靠制度保障,人与自然的关系则依靠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是更高的民生需求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始终把握战略主动,将生态文明放在“国之大者”的战略位置。生态文明是协调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内容,绿色发展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美丽中国成为党在现阶段基本路线的重要奋斗目标,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二、生态环境治理系统工程论

习近平总书记从生态系统观出发指出,“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统筹考虑环境要素的复杂性、生态系统的完整性、自然地理单元的连续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10]他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报告中进一步强调,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健全生态环境治理体系”^{[2]39}。生态环境治理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系统工程,需要构建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体系,处理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

若干重大关系。

(一)治理主体论: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坚持党的领导和多方主体共治,注重“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4]285},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不断提高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第一,各级党委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决策和方向引领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美丽中国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目标,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7]292}我国始终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原则,加快立法、修法和废法步伐,完善生态考核体制机制,坚持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和“一岗双责”不动摇,健全科学合理的考核评价体系,发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利剑作用,发挥党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一块坚硬的钢铁”作用。

第二,各级政府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发挥着规划布局和宏观调控作用。政府是公共权力的代表,是社会治理和公共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在整合和调动各方面的资源、处理涉及公共利益的生态问题时发挥着特有的作用。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积极履行社会职能,平衡好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环境效益,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引导传统产业改革升级,统筹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

第三,企业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主体。按照“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企业应强化自身责任,把生态环境破坏的外部成本内部化,激励和倒逼企业自主推动结构优化、转型升级。在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我国企业需要进一步通过研发和应用低碳技术,强化绿色低碳技术科研攻关和创新应用,推进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优化,为社会提供优质的绿色产品和绿色服务。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企业应主动承担起资源科学开发利用、消除污染源、环境

综合治理等重要责任。

第四,社会组织在生态文明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社会组织是连接政府、企业和公众之间的重要桥梁,能够动员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宣传上,社会组织积极做好示范建设的咨询服务工作,鼓励环保工作者深入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并将研究成果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

第五,公众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础力量。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长期、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单一部门或个人的努力不足以解决复杂的生态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人都是生态环境的保护者、建设者、受益者,没有哪个人是旁观者、局外人、批评家,谁也不能只说不做、置身事外。”^{[7]176}我们必须坚持走生态文明建设群众路线,坚持绿色发展全民行动,加快形成绿色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此外,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还包括金融系统、军民结合等生态服务主体,各主体在动态互动中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共同实现美丽中国的发展目标。

(二)治理整体论:构建文化体系、经济体系、目标责任体系、制度体系、安全体系相融通的生态文明体系

整体性是系统的总标志,系统整体论是系统论最基本的观点。世界是一个包含多样性及各种关系形成的整体,必须将系统整体论应用于各个现实系统,重视整体与部分的关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解决历史交汇期的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4]14-15}这体现了生态系统治理整体论。

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观念实现了从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向生物平等的生命伦理观的转变,将人、自然、

社会有机融为一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抓生态文明建设,既要靠物质也要靠精神,“要倡导环保意识、生态意识,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让生态环保思想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要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绿色价值观念,让天蓝地绿水清深入人心,形成深刻的人文情怀。”^{[7]193}

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关键。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最终取决于经济结构是否合理、经济发展方式是否实现绿色转型,推动高质量发展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相辅相成的。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是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全面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理念的具体表现,实现产业系统、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将生态资源进行产业化经营,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抓手。我国“构建一体谋划、一体部署、一体推进、一体考核的制度机制”^{[5]89},制定并实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落实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坚持党政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以制度的刚性和权威保护生态环境。

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加快完善生态文明体制,建立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健全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绿色低碳发展机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当前生态文明体制机制尚不健全,“要以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突出问题为导向”“加快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落地见效”^{[4]19},推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底线。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构建生态安全体系是深刻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应有之义。日趋频繁的人类活动正在持续逼近自然生态的既有边界,这一边界既

表现为可见的物理空间边界,也体现为不可见的生态承载红线与系统恢复边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国土空间管制和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坚持“完善国土空间规划,落实好主体功能区战略,明确生态红线,加快形成自然保护区体系,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网络,在空间上对经济社会活动进行合理限定”^{[4]250},要求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凸显生态安全对环境整体稳定的至关重要性。

(三) 治理关系协调论:协调处理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系统观念,不仅关注系统本身,而且关注系统内部包含的重大关系即系统中的内在关系。在我国整个社会系统战略布局上,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坚持系统观念,处理好经济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效率与公平、活力和秩序、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关系”^{[2]6}。在我国具体生态系统建设策略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协调处理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等若干重大关系^[10]。

一是协调处理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关系,不断塑造生态发展的后劲和潜能。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保护并非相互掣肘、对立统一的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强调:“要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通过高水平保护,不断塑造发展的新动能、新优势,着力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有效降低发展的资源环境代价,持续增强发展的潜力和后劲”^{[7]279-280}。

二是协调处理重点攻坚和协同治理的关系,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我国始终坚持生态惠民、生态利民、生态为民,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牵住环境治理“牛鼻子”。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必须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特殊和一般的关系,“要强化目标协同、多污染物控制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政策协同,不断增强各项工作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7]280}。

三是协调处理自然恢复和人工修复的关系,构建从山顶到海洋的保护治理大格局。尊重客观规律是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前提。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4]225}。在实践中,我们应立足我国基本国情和生态系统的具体状况、受损程度和恢复潜力等,优先坚持自然恢复为主的保护方针,充分发挥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与修复能力。当生态系统受损程度超出其自我恢复阈值,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实施分区分类施策的差异化管控策略,提高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四是协调处理外部约束和内生动力的关系,打好法治、市场、科技、政策“组合拳”。生态文明建设的强制性规范和人民群众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驱动力是辩证统一的,常态化外部约束可以循序渐进转化为内生动力,内生动力则可以激发出遵守外部约束的主体自律,提升约束效果、减轻约束成本,取用有节、行止有度是保护生态环境的必要前提。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用最严格制度和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建立健全以绿色发展为导向的科学考核评价体系,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7]282},不断健全激励约束并重的源头预防、过程控制、损害赔偿、责任追究的全过程生态环境保护现代治理体系。

五是协调处理“双碳”承诺和自主行动的关系,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推进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的战略使命,“双碳”目标给全球能源领域带来深刻变革,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改变大国关系,重塑全球地缘政治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则应该而且必须由我们自己做主,决不受他人左右。”^{[7]282-283}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下转第32页)

数智时代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引领机制创新： 生成动力与效能提升*

王遇见¹ 岳奎²

(1.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2.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9)

[摘要] 数智时代, 高校统战、社科联及科产教融合等部门需要进一步加强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组织协调及激励保障。应以“数智+政治主导”提升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精准辨别是非的政治定力, 以“数智+科技安保”提升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应对风险挑战的综合素养, 以“数智+学科建设”引导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带头打造学科核心竞争力优势, 以“数智+铸魂育人”增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塑造高品格新质人才的使命责任, 以“数智+参政议政”提升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民主协商的建言资政能效, 以“数智+社会治理”提升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围绕中心大局的社会服务能力。力求在完善大统战工作体系格局中全面强化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引领效能。

[关键词] 数智时代;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 政治引领; 组织协调; 统战工作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4-0007-10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引领机制”^{[1]29}要求。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既是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重点争取对象, 也是统战活动的重点服务对象和主要依靠力量。“十五五”期间, 高校应组织有关部门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协调机制, “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资源统筹、评价联动, 促进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

动”^{[2]23}。面对数智技术引发的挑战及机遇, 需要根据党的统战理论和政策, 按照问题导向与数字治理相统一的原则, 深入探讨如何利用数智赋能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引领工作; 应打破理论界不少学者对统战政治引领研究的抽象高调、不着边际、人为想象的局限, 以数智与人文融合研究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引领机制创新; 根据事物因果链循环规律, 以高校统战、社科联、科产教融合等部门组织协调和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研究”(项目编号: 25VRC064), 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暨江苏省社科规划基金重点专项“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完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24ZXZA039), 江苏省社科联发展专项课题“数智时代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引领机制及组织协调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25GSB-006),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科研重点项目“数智与民族精神双重赋能高校高品格新质人才培养模式建构研究”(项目编号: 2025ZXSK0401002)。

[收稿日期] 2026-04-16

[作者简介] 王遇见, 男, 江苏阜宁人, 南京理工大学紫金学院特聘教授, 华中科技大学新时代文明实践研究院、中国统一战线理论研究会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理论江苏研究基地特聘研究员。
岳奎, 男, 河南南阳人, 华中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博士生导师, 院长。

规划布局为依托,全力打造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的“生成动力—效能提升”一体驱动模型,增强对其政治引领工作的针对性,凸显创新性、系统性、科学性、实效性及前瞻性等特征。

一、以“数智+政治引领”增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精准辨别是非的政治定力

数智与政治引领是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队伍建设的双重导向。政治引领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数智应用规定社会主义本质属性,数智技术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参政活动提供快捷高效手段。“十五五”时期,高校应以数智技术与政治主导的双向驱动,引领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增强精准辨别是非的政治定力。

第一,以数智技术赋能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科技报国能动性。2018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是第一要务,创新是第一动力,人才是第一资源。”^[3]党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使命需要充分发挥广大党外知识分子的作用。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是指具有本科学历和中级职称以上,与统战问题、统战活动、统战工作相关的,以创造、阐发、传播或者运用知识为核心工作的,在所在领域及所联系群众中具有代表性、有成就、有影响的共产党以外的知识分子^①。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高校党外知识分子都掌握先进的数智技术。数智的日益普及和深度发展,推动各行各业传统模式的快速变革,催动着社会制度的结构调整及高品格人才的开发利用。数智化概念通常涉及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物联网及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的融合,具有数据驱动、智能化决策、实时性、系统集成、用户中心、创新驱动及可持续发展等功能特征。数智网络会加速海量信息的挖掘、存储、识别、整理、调控及传播,作为知识精英的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所创造的精神文化产品及所反映的思想、观点和立场,会通过全媒体联动及社交活动对高校、社会、政府及广大受众产生深远的影响。

高校统战部应组织党外知识分子进行数智技能培训,引导他们进一步铸牢科技报国理念,提高数智素养。

第二,以马克思主义批判理性与数智工具理性增强党外知识分子政治判断力。马克思主义批判理性是用科学的批判思维和怀疑方法重新审视一切,注重用辩证否定观看待历史及现实中的各种现象,善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数智工具理性则注重技术工具对事物或现象加以智能识别、数据分析及图谱论证。马克思主义批判理性与数智工具理性相结合的过程,是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补充的全面看问题的范式。高校应利用“数智+形势政策”,组织知名专家开展线上线下政治理论政策专题研讨会,将科学数据和数字信息融入政治理论政策的诠释中,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对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认同,强化国家立场、共产党执政理念、中央战略部署及宪法原则的思想共识,增强“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以科学的“三观”引导党外知识分子提高审时度势的政治鉴别力和免疫力。

第三,以“数智+‘五史’教育”提高党外知识分子政治领悟力。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在共产党领导人民长期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艰苦奋斗进程中,积累了若干成功经验及挫折教训,成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获取政治策略和政治警示信息的重要渠道。利用“网络+‘五史’教育”数据库,通过学习中共党史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成功的奥秘,增强坚持共产党领导及长期执政话语体系的政治认同^[4];通过学习新中国史深刻理解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伟大跃升的发展规律及动力源泉,增强爱国热情和报国志向;通过学习改革开放史深刻理解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体制机制创新必然性与必要性,增强破旧立新的革新意识;通过学习社会主义发展史深刻理解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由理论到实践的发展规律,增强投身和服务社会主义

^① 此定义是基于以往知识分子界定,结合《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有关规定及我们的2024年度中央统战部委托重点课题结项成果“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理论建构与实践路径研究”(2024JSTZD008)。

大业的政治自觉;通过学习中华民族发展史深刻理解中华文明凝聚的根和魂,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主体自觉。同时,利用统一战线史数据库,深刻理解协调处理统战领域政党关系、新的社会阶层关系、公有制与民营经济关系、民族宗教关系、海内外侨胞关系等方略,增强融入大团结大联合统战主题活动的参政自觉。在数字统战平台设置教学、理论研讨网页,鼓励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代表人士宣传党及统战工作的相关理论和政策,丰富和更新网络数据库资源,提高统战理论政策理解力和阐释力。

第四,以“数智+民主监督”增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政治执行力。民主监督是党外知识分子作为统战成员的重要职责。不少高校监督机制不健全,未能充分发挥大数据云平台的廉政监督和技术监测功能,而统战数据库积累了丰富的民主监督经验资料。高校可利用数智和调研手段挖掘、统计党外知识分子民主参政的信息数据,制定针对性统战方案,对不同对象加以精准引导,提高遵章守纪的行为自觉,特别是更加积极主动地发挥党外知识分子对党政干部的民主监督职能,防范和抵制不作为、乱作为、滥用职权的干部腐败现象;调查社会重大问题、关注民生诉求,监督党政机构及干部对国家政策的执行落实状况,防止决策失误或误判误罚;鼓励和支持党外知识分子同各种不法分子和不良社会思潮作斗争,同广大党员干部一道,共同维护国家政权安全、意识形态安全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合力营造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

二、以“数智+科技安保”提升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应对风险挑战的综合素养

增强科技安保素质是发挥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科技创新作用的政治引领前提。“十五五”时期,面对国内外科技风险及社会风险不断加剧、数智快速发展带来的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局面,党委(党组)领导的统战主管部门应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原则,建立数智赋能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的科技安全引领机制,增强其抗风险韧性。

首先,以“数智+风险防范”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增强科技产权保护意识。科技创新与科技安全相结合是数智赋能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动力保障。近年来,科技赋能与科技风险交错并发。数智的日益普及造福社会,给人才培养及其价值发挥提供了发展机遇,同时也易引发日益增多的假冒伪造、科技滥用、信息泄露、学术腐败等侵占科技产权问题,扰乱社会秩序。针对数智时代大发展及引发的科技风险,高校社会主义学院及地方统战培训机构应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探讨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数智培育与数智安全相统一的科技产权保护意识的培育路径,构建科技创新与科技安保有机结合机制,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增强抵御科技风险的能力,掌握科技产权真伪识别和风险防范本领,推进科技安保现代化。

其次,以“数智+思政工作”提高党外知识分子网格化管理效能。主体自主与组织协调相结合是凝聚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力量的组织基础。新时代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既有内涵结构性变化的群体新特征,亦有不同个性及不同认知的差异化特点。高校统战部门应针对新形势下党外知识分子队伍构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既看到党外知识分子密集构成学校统战工作重要阵地的特点,又看到党外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知识、素质及能力结构的差异性及发展不平衡问题:有的文化水平高而道德素质差,有的思想品德高而数智素养差,有的个体能力强而团队合作意识差,有的业务能力强而参政能力差,有的经验丰富而政见扭曲等。因此,做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不仅要增强责任意识,配强工作力量,推进网格化管理,还要改进工作方法,学会同党外知识分子打交道的本领,做党外知识分子的挚友和诤友;应发挥统战制度规范和党内知识分子的示范作用,做好对党外知识分子的思想政治工作及协调工作,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引导其自律自省自觉,提高其对共产党全面领导的政治认同觉悟;鼓励其严守国家科技机密,维护国家信息安全,抵制科技非法使用或不正当交易行为。

再次,以“数智+爱国意识”增强党外知识分子抗风险韧性。数智素养与爱国意识相结合是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队伍建设的重要内涵。为应对国际敌对势力对国内人才的渗透以及国内公共危机频发的风险,高校应在推进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培训工作中,推进数智与爱国主义教育融合,加强爱国主义理念对数智赋能工作的政治引导,使数智技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人民大众利益服务;加强爱国主义素质培育工作,优化科技精神与人文精神相统一的素质内涵结构,引导党外知识分子为统战工作智慧化、数字化转型和数智技术爱国化赋能;推进爱国主义精神激励,引导党外知识分子自觉自愿投身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事业中;引导其严守国家机密,树立维护国家科技安全志向,坚持国格和人格的统一;逐步完善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数据安全应用标准体系,使党外知识分子科技创新行为符合国家安全部法规,自觉维护国家总体安全。

最后,以“数智+意识形态安全”构建以党内外知识分子为治学主体的党政教联动治校机制。党政教联动是提高高校党内外知识分子协同效应的制度保障。为应对社会多元文化对学生思想行为和价值观念的复杂影响,需利用数智网络将高校意识形态党委主体责任与教授治学主体责任相结合,构建以数智网络为基础、党政为领导、教授为主体、广大师生积极参与的高校意识形态大统战协同治理体系,推动党务、政务、教务高效协同配合,充分调动党内外知识分子协同治学的主体能动性,有效捍卫高校社会主义文化阵地。

三、以“数智+学科建设”引导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带头打造学科核心竞争力优势

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具有打造专业学科核心竞争力的牵引功能优势。利用数智手段实现学科内涵建设及质量提升,是做好校内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政治引领要务。不同类型的学校具有不同特色的办学定位。深谙学校办学事务的党外知识分子是教育教学学科建设与质量评估的关键要素和领军人才,高校

党委统战部门应在“十五五”时期“围绕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协同育人,优化高校布局、分类推进改革、统筹学科设置”^{[2]23},引导党外知识分子利用数智技术平台参与学校管理、专业设置、课程规划、人才培养,充分发挥其学科带头人及治学主体的作用。

其一,数智时代呼唤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促进新质教育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数智时代以创新驱动的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的先进生产力。在各行各业新质生产力深入发展,特别是科产教日益融合的背景下,广义的新质生产力主体已覆盖校内校外,不少高校党外知识分子作为成熟高端的劳动者直接参与校内外新质生产力的开发利用过程,已成为培育国家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力量^[5]。高校可组织党外知识分子及相关专家学者和技术人员协同利用数智通信等设备,深入探讨集聚先进教育要素、开发新质人才资源、增强学校科研成果产业化和学科核心竞争力优势,充分发挥科技人才、科技能力、科研成果及科学管理对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效能,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开发利用新质教育生产力,从而为社会新质生产力可持续发展奠定智力基础。

其二,鼓励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推进教育数字化。数字化是将非数据的知识、信息、技术等进行数字符号物化、转化、编程、加工、调控及重构。将数字化的虚拟经济融入实体经济,可形成数字产业化的数实经济;将数字化的虚拟教育融入办学布局,可形成教育数字化的智慧校园。为在“十五五”时期进一步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2]41}的要求,高校应积极推进科技赋能和数字化转型研究,引导和鼓励党外知识分子利用大数据、云平台、高端智库及多模态人工智能等手段推进教育资源数字化重构升级,根据学校特色、办学取向、科研及教育成效,完善办学资源数据库、建校历史档案馆和高端人才智库,为学校韧性治理、干部配备、人才使用、教学管理及规划布局等提供精准的数字信息和实证数据;将学生文

体活动、社团活动、志愿服务、学习能力、素质表现、成绩考核等数据情报加以储存、保护、建档,完善学生素质能力电子档案库,为校内外有关单位或部门及时提供就业推荐、人才供给、评优评奖等精准信息情报,在推进教育数字化与数字教育化有机融合中,加快教育事业现代化进程。

其三,尊重和维护高校党外知识分子首创精神。良好的激励保障措施是发挥党外知识分子创新价值的必要条件。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4月26日在知识分子、劳动模范、青年代表座谈会上号召:“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充分信任知识分子,努力为广大知识分子工作学习生活创造更好条件。”^[6]^[4]高校党委统战部门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尊重知识和尊重人才思想,坚持习近平有关党外知识分子重要地位的论断,充分尊重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在教育系统及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治国理政中的功能地位,在制度建设上,健全人才管理体制,加快形成有利于党外知识分子干事创业的体制机制,放手让广大党外知识分子把才华和能量充分释放出来;在工作环境上,遵循党外知识分子工作特点和规律,减少对党外知识分子创造性劳动的干扰,让他们把更多精力集中于专业研究工作;在生活上,加强同党外知识分子沟通、协商、谈心,多了解他们生活中的困难,多帮他们消除后顾之忧;在绩效考核方式上,以充分肯定统战理论政策研究及参政议政的特殊政治价值为导向,相应完善党外知识分子绩效评价制度体系;在科研与教学待遇落实上,应完善按社会科学要素贡献分配的激励保障体系^[7],给予党外知识分子专项合理待遇,利用数智手段简化科研经费报销手续,兑现项目经费处置权,增强其可持续创新积极性,从而推进知识创新—评估—分配—保障的价值链优化和良性循环。

四、以“数智+铸魂育人”增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塑造高品格新质人才的使命责任

满足国家战略和中国式现代化对优质人才的需要,是做好数智时代高校党外知识分子统战工作的核心要务。随着对外开放及网络

的畅通,国内外各种社会思潮通过网络浸入校园,动摇学生理想信念和价值判断;不少高校存在人才强国战略使命落实不到位、人才有效供给不足、人才政治素质不高等问题,难以满足社会现代化对多样性高规格新质人才的需求。具有杰出才华、德高望重的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是学校铸魂育人的主导力量。在“十五五”时期,高校应在党委统战部门协调下,为党外知识分子构建社科联、科产教融合部门、教务部门、科研部门的联动机制,从政治引领目标上激发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发挥业务特长的自觉性,引导其积极投入立德树人工程,主动承担培育新质人才使命,带领相关专业教师共同推进教学范式及育才模式转型创新,同心协力为高品格新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做贡献。

一是以“数智+励志鼓舞”培育经世致用型新质精进人才。党外知识分子通常是对历史文化与现代文化有着深厚学识功底的高端人才。高校应鼓励党外知识分子利用科技和信息技术,在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中形成新创意、新场景和新业态;利用大语言模型基于算法、模型、规则,输入先进文化元素,生成文本、图片、声音、视频、代码等内容,针对各类话题及词条进行深度分析,从多维度理性思考,在人机互动中理清思路,消解疑惑,对学习和工作做出更明智的决策安排;利用VR、AR技术以虚拟与真实交融变换的多样性情境及红色文化沉浸式生态氛围,进行生动形象的潜移默化引导,增强英模精神和壮观场景的励志功效;利用互联网对学生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利用“大思政”数据库引导学生辩证分析社会热点问题,消除思想误区,端正学习态度,在培育勤学苦练、勇于担当、为国分忧、为民谋福、学以致用、立志报国等精神中,造就经世致用型新质精进人才。

二是以“数智+心理调适”培育人格完善型新质生态人才。不少党外知识分子心理素质良好并掌握着尖端高新技术。学校可鼓励党外知识分子利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分类采集学生心理状况,对其心理情绪、心理压力、心理危机等问题进行识别、预警、调节和干预;

利用数智平台引导学生积极开展多样性科技创新活动,在营造智慧校园和良好教育生态环境中提高学生参与数字治理能力;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输入 ChatGPT 系统,用人机对话和师生对话引导学生把握人生“总开关”,树立远大理想,增强抗风险韧性;利用数智化通识选修课及课程思政,培育学生良好的兴趣爱好及个性特长,从而形塑出专才与通才兼备的健康完善的新质生态人格。

三是以“数智+民族复兴”培育堪当大任型新质中坚人才。很多党外知识分子颇具民族复兴、爱国敬业的大义正气。高校可鼓励党外知识分子利用民族复兴数据库及有关视频,引导学生反思和接受近代以来屈辱史教训;以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历史经验引导学生同仇敌忾、求同存异、广交朋友,聚力共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使命;以党的科教兴国战略、科技强国战略及人才强国战略鼓励学生立志成才、忠心报国,努力把自己培养成适应国家战略需要的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质中坚人才。

四是以“数智+振兴中华”培育复合应用型新质实用人才。许多党外知识分子具有坚定的振兴中华毅力和斗志。学校可鼓励党外知识分子利用数智手段带领学生深化民族精神标识研究,以此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激发为社会主义大厦添砖加瓦、铺天盖地热情。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国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理论和实践中形成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创造精神和伟大梦想精神,已通过各种文化积淀形成数万种精神标识。高校可鼓励党外知识分子依据办学特色推行“数智+民族精神”模块研究,提高具有数智素养、良好品性、灵活变通及善于创新的新质学习力以及高效实用的新质行动力。如,工商企业类专业师生可推行“数智+企业精神”,在探讨若干成功的上市公司核心价值观、企业文化及精益管理经验中,提炼文化精髓,揭示提高新质人力资源开发能力的特有精神奥秘;公共管理类专业师生可推行“数智+

公共事业精神”,在探讨典型的政府及公共事业单位利用数智技术提高新质公共事务协调力的经验中,揭示其值得弘扬的精神标识和社会价值;公益服务类专业师生可推行“数智+公益服务精神”,在文化、体育、卫生、金融、交通等公益部门中选择典型单位加以考察,总结其利用数智手段提高新质公益分配力的经验,揭示其公益服务精神标识的生成逻辑及时代价值;市政工程类专业师生可推行“数智+城市精神”,在探讨智慧城市提高新质市政规划力的文明创新经验中,揭示其现代文明城市建设精神标识及其韧性治理效能;旅游管理类专业师生可推行“数智+山水精神”,在探讨文化旅游管理部门及新业态通过“双创”提高新质文旅智慧服务力的经验中,揭示其对山水精神标识的物化效应及人文效应;师范教育类专业师生可推行“数智+学校精神”,在探讨不同类型学校建设智慧校园、提高教师新质言传身教力的经验中,揭示现代化的办学精神标识及示范引领效应。

五是以“数智+启智扬善”培育大智慧型新质拔尖人才。大智慧型新质拔尖人才是指那些拥有非凡聪明才智、深厚科学素养、卓越创新能力,并积极造福社会的出类拔萃人才。许多党外知识分子都是心地善良、乐于育人、灵活应变、智慧超群的教育家。在“十五五”时期,高校应进一步“强化科研机构、创新平台、企业、科技计划人才集聚培养功能,培育拔尖创新人才”^{[2][24]}。鼓励党外知识分子及广大教师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及历史唯物主义观引导学生端正思想观念,掌握辩证思维、系统思维与战略思维,将党中央的大政方略同世情、国情、行情相结合,增强历史使命感,把个人追求融入“国之大者”,致力于国家战略、民族复兴和人类文明的伟大事业,以求成为大视野宽胸怀新质人才;引导学生掌握网络思维、数字思维与创新思维,积极勤学苦练,增强才干,勇于挑战最前沿的课题,敢于承担最艰巨的任务,具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和奉献精神,以求成为具有深厚涵养和艰苦奋斗精神的大度量勇担当新质人才;坚持以人民

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引导学生重民心、守诚信、勤助人,具备高尚的品德和社会责任感,遵守科技伦理,追求社会公平和人类福祉,避免技术滥用,以求成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善为高品性新质人才;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的原则,引导学生用哲学思维、数智思维和立体思维既全面看问题,谋划协调整体战略布局和长期发展战略,又立足局部及近期工作重点,把握关键环节,兼顾个别利益,善于破危局、开新局、出奇招,机动灵活、从容应变、精谋良策,力求成为既善于顶层设计又精于求真务实的大格局善智谋新质人才;坚持“五爱”的社会主义道德教育,引导学生树爱心、重大义、讲和睦,全面提高情商智商,以求成为乐于大爱奉献的大情怀重操守新质人才。

五、以“数智+参政议政”提升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民主协商的建言资政能效

“共产党领导、多党派合作,共产党执政、多党派参政”的新型政党制度,是中国处理政党关系的新模式。“十五五”时期,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可“参照民主党派履行职能”^{[8]16},充分利用数智网络平台发挥建言资政作用。学校应加大数智统战平台建设的投入,引导支持党外知识分子线上线下参政议政,提升学术与政治关联度,力求从政治引领的服务手段上增强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明理增信的参政议政能效。

第一,以“数智+人文引导”对不同政见开放包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知识分子有思想、有主见、有责任,乐意发表思想见解。学校及地方政府党委及领导干部应坚持尊重特长优势与提高参政能力相统一的原则,善于就工作和决策中的有关问题主动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欢迎他们监督批评。只要其信息情报来源真实可靠,就要认真对待,择优采用,坚持在学术思想上“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有些党外知识分子基于自己的个性认知及民主党派立场,以及受网络流言蜚语负面影响,持有不同政见,对中央大政方针的真实意图和战略取向不一定把握得准,甚至有可能钻牛角尖,对此,应加强科学引导和规范

调控。在数智人文培训内容上,“要引导党外优秀人才自觉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觉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9],力求在“两个结合”中增强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创新信息应用功力及中华传统统战文化“双创”能力;推进数字化、智能化、网络化技术传授,加强网络议政及统战信息处理的实操能力训练,提高参政议政水平。在工作方式上,学校应按照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合作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基本方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遵守国家宪法法律的基础上,增强与党外知识分子的政治互信,在重大问题处理或重大决策制定之前,多征求党外知识分子的意见,多用有关规则加以引导,对其不当言行在法律允许范围内加以包容宽容,在求同存异中凝心聚力。在工作环境上,尊重和调动党外知识分子深入研讨统战理论政策的积极性与创新性,及时做好有关统战实践成效信息情报的发布与表彰工作,并鼓励支持政治原则性强的党外知识分子开讲坛和参加各种学术研讨会,深入探讨统一战线学科前沿问题及社会热门话题,推进学术信息创新与交流,营造民主协商共治的良好学术氛围。

第二,以“数智+民主议政”提升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参政效率。网络议政是发挥民主协商的重要渠道。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具有自主独立、层次高、影响大等特点,但各自为政、单打独斗又会使其提供的信息呈碎片化状态,在提出消解社会问题或学校问题的意见提案或决策主张时,缺少全面真实的数据资料支撑,系统性科学性不够,难以形成精准规范有效的决策参考论证,以致出现参政提案、意见精准度及实效性不高的反差。高校统战部门应配合政府统战机构共同为党外知识分子参与公共治理、数据监测、网络议政等提供便利条件,完善统战图书情报等网络数据库支持体系,鼓励其积极参与多种形式的民主协商、民主选举、民主参与决策、民主议政、民主监督等活动,发挥其“是中国共产党的好参谋、好帮手、好同事”^{[8]15-16}的功能。鼓励党外代表人

士利用自身特殊身份深入实际开展专项调研,了解有关重大事件或案情发生的原委经过,监督审核案情处理程序及社会反响,防止冤假错案伤害无辜,以致引发民愤和社会混乱;通过政协或网络等渠道反映代表真实民意诉求的可靠数据,建立建言资政质量检测评价体系,利用大数据、云平台、智能识别手段审核网络参政建议及政协提案的精准度和实效性,为化解民意诉求和社会难题、制定科学决策提供最佳可行适用的方案;相关部门可依托平台迅速响应和反馈处理,加速建言献策落地生根,形成双向良性互动效应。如在2026年3月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召开期间,许多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及社会民主人士通过网上网下渠道提出大量合理化建议。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自2026年3月4日开幕以来,来自34个界别的2000多名政协委员深入协商议政、广泛凝聚共识。截至3月5日20时,共收到提案5865件。经过数字化智能化识别处理及专业审查,立案5005件,并案451件,转为意见和建议409件。^[10]从而为党政机构及司法机关的科学决策报送了重要数据来源和真知灼见。

第三,以“数智+党政联席会议”助推高校党内外知识分子协商共治。党政联席会议是就有关单位或部门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事项,召开由党委或党支部、行政部门、员工代表组成的扩大会议,商讨重要对策。高校党委统战部门可依据“大党建”的内涵要求、历史使命及政治取向,支持各院系经常性召开党政联席会议,对重要问题、事项和决策共同协商处理,组织党内外知识分子共同参加党的理论政策及统战理论政策的学习、研究及主题活动,既保障党外知识分子自主创新活动和社交活动,又组织其参与校内外群体活动,协调其与有关部门或单位的合作交流关系,通过学校统战体制机制创新和效能建设管理,推进数智与思想政治引领双重赋能,为党外知识分子发挥参政议政才智提供必要的科技手段、信息服务、助手协作、经费配套及物质保障等条件。

六、用“数智+社会治理”提升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围绕中心大局的社会服务力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是统战工作的重要职责。高校应利用统战智力优势切实履行服务社会和引领社会的职能,从政治引领价值上凸显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才智社会化效应。针对许多高校党外知识分子自主创新多而与企业合作少,社交档次高而对基层社会问题关注少,学科专业影响大而对科产教联动少等局限,在“十五五”时期,高校科产教融合部门及社科联组织应坚持人才创新与服务社会相结合的原则,依据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党的中心工作任务及教育数字化的国家战略需求,积极与政府及地方有关企事业单位协调沟通,探讨发挥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对产学研深度融合和社会化服务的智力支持与协作创新策略。

其一,以“数智+统战体制改革”完善高校党内外知识分子大统战工作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形成工作合力。”^{[6]138}党中央明确提出各级党委要把统战工作摆在重要位置。高校应以线上线下综合议政为抓手,真正把聚智咨政的统战工作纳入党委重要议事日程、党政领导班子工作考核体系、党委统战部门宣传工作计划及学校发展规划中。高校党外知识分子智力超群、社会活动能力强,能够成为连接党内外领导机关及校内外人员关系的桥梁和纽带,可发挥其决策“智囊团”和协调社会关系的“粘合剂”功能。高校党委统战部门应在推进统战工作由传统系统内向系统内外联动的“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方针指引下,进一步深化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将数智技术与新发展理念嵌入大统战工作体系,推进统战高质量发展;既鼓励共产党员及干部在统战机构中兼职,推进智慧党建落实到基层统战领域,提高其政治凝聚力和引领力,又鼓励作为参政党代表人士的党外知识分子在校内外党政机构中兼职,开展大团结大联合的统战主题活动,积极配合党政机关干部共同做好统战工作、群

众工作、思政工作、社会协调与公共治理工作,增强经济社会韧性和活力。

其二,以“数智+社交活动”构建高校内外知识分子“组织起来”联谊交友机制。不少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同校内外、国内外的其他知识分子关系生疏,沟通交往不畅,联谊交友的活力和动力不足,未能充分调动其参与统战活动的积极性。因而学校统战部门应深入探讨如何将校内外、党内外、体制内外及海内外的知识分子“组织起来”,探索开展统战事务—学校事务—社会事务—资政事务一体推进的路径。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3月4日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二届五次会议的民进党、农工党、九三学社委员时指出:“要以识才的慧眼、爱才的诚意、用才的胆识、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广开进贤之路,把各方面知识分子凝聚起来,聚天下英才而用之。”^{[6]143}高校统战部门应吸收更多的党外知识分子加入“知联会”,开展有关组织活动,发挥“雁阵效应”;以高校党委统战部牵头成立并配置好组织协调机构,发挥网络统战社交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统战社交活动及多样性群体文艺活动;以“网络+校友会”开展海内外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交友活动及其他多样性统战文化活动,利用党外知识分子的海外关系和国际知名度,引进国外先进人才、先进技术和社会资本,服务我国地方现代化建设和合作办学。

其三,以“数智+科产教融合”发挥党外知识分子引领和服务社会的特长优势。包括党外知识分子在内的知识分子是“生产力的开拓者、文化的创造者、知识的传播者”^{[6]133},能够发挥人才的“第一推动力”功能。高校统战部门及政府主管部门应加强党外知识分子参与科产教深度融合的牵线协调服务,发挥高校及党外知识分子服务社会的职能,推进产学研政合作,助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协同打造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新赛道;应“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评价导向,深化项目评审、机构评估、人才评价、收入分配改革,畅通高校、科研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激发创新创造动力活力”^{[2]24};应为党外知

识分子提供必要的创新创业平台及更多的项目研究机会,鼓励党外知识分子发挥科技驱动发展功能,推进科技产权转化试点,打造创新创业新品牌,展示其对社会相关行业的示范引领效应;发动和支持党外知识分子带领团队开展国家和社会重大难题的合作攻关,为国家治理及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做出突出贡献;也鼓励其参与地方项目横向合作,用先进科技帮助地方单位或部门解决平台建设和发展瓶颈问题;鼓励他们通过在线协作平台、虚拟实验室和远程研究项目,突破地域、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实施多样性多层次的协作创新,充分发挥科研和人才引领社会、服务社会的辐射效应。

其四,以“数智+社会整合”提升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参与地方治安及现代化建设的效能。社会资源整合是任何执政党的重要任务。博学多才的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具有优化整合社会资源及教育资源的能力。受近年来疫情蔓延及经营模式转变影响,许多企业不景气,劳资矛盾加重;各种交通事故频发,火灾、水灾、旱灾交替出现,群体性斗殴等社会问题突出,社会治理难度明显加大。对此,高校需要探讨激励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带头优化配置国家及地方资源、推进先进生产要素向新质生产力集聚的路径,在科技与安全平衡、活力与秩序统一中增强新质生产力韧性;鼓励他们利用大数据平台、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手段,实时了解和追踪社会风险及公共危机的情报与态势,“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深入推动矛盾纠纷源头化解、多元化解、有序化解”^{[2]49-50},增强基层治理韧性;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与人才创新深度融合中培育发展新动能,充分发挥党外知识分子推进经济社会数实融合与可持续发展的实效长效价值。

总之,市场竞争乃至国际竞争的实质是居于核心竞争力关键地位的人才竞争。世间最宝贵的财富并非所有人,而是具有创造优质财富能力的人才资源。高校是高智力人才密集的地方,党外知识分子成为高校统战工作的重中之重,尽管许多高校已引起重视,但相较于

“十五五”时期面临的风险挑战、发展机遇及更高的统战使命而言,仍存在许多短板。高校具有教学、科研、服务社会和引领社会的四重职能,与之相应,作为高校治学主体的党外知识分子亦可承担多重重要职责,需要高校有关部门加强协调组织、政治引领和数智赋能。一是针对许多从事统战工作的单位或部门基础理论研究能力不足问题,高校可借助项目招标或课题委托等形式,进一步鼓励党外知识分子积极配合政府部门及企事业单位参与统战问题、理论、政策研究。推进统战工作经验理论化制度化跃迁,在深化统战理论政策及学科前沿问题的内涵逻辑与实效对策研究中,推进统战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和制度创新,完善统一战线学学科体系,充分发挥党外知识分子先进智力引领功能,推进统战体制机制及大统战工作体系格局的完善发展。二是针对许多统战部门及单位滞后于数智快速发展的进程、参政效率不高的问题,高校应进一步加大数智信息平台建设的投入。支持高校党外知识分子利用数智信息软件及网络议政调研数据或参政建议,进行数字转化和识别研判,提高参政精准度及决策信度和效度,同时推进数字普及和科学普及,充分发挥党外知识分子的科技驱动发展功能,加速推进学校及社会文明进步。三是针对社会新质生产力发展和国家人才战略对高校高品格新质人才的迫切需要,高校应进一步调动和发挥党外知识分子深化人才培养模式转型创新的积极性。鼓励其积极参与教学体制改革、现代化教学范式创新、教育数字化建设,充分发挥其铸魂育才专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塑造和提供更多的优质生力军。四是针对现实中产学研力量比较分散、科研转化率不高的问题,政府统战部门及高校等有关企事业单位应进一步加强协调牵引,以党外知识分子为社交网络节点,深度构建科产教融合及职教融合机制。鼓励学校党外知识分子发挥学科带头作用,积极承担政府部门或有关部门的纵向和横向项目研究,带

领团队对国家及社会重大重点难题进行协作攻关,并利用数智技术进行科学验证,为政府部门及有关单位提供精准可靠的问题数据和决策提案,推进科研成果社会化及知识产权转化,充分发挥党外知识分子的科研转化创新功能,有效推进国家治理及社会建设的现代化。

[参 考 文 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2] 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 [3]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考察[EB/OL].(2018-05-02)[2026-02-08]. https://www.gov.cn/xinwen/2018-05/02/content_5287554.htm#1
- [4] 王遐见,岳奎.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话语体系建构逻辑[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3):1-11.
- [5] 杨洋.新时代党外知识分子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现实境遇与实现路径[J].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1):89-96.
- [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政治建设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7] 王遐见.新时代激发人才创新动力的按社会科学要素贡献分配机制[J].社会科学家,2019(1):128-137.
- [8] 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M].北京:华文出版社,2021.
- [9] 2015年中央统战工作会议[EB/OL].(2015-05-18)[2026-02-16]. <https://baike.so.com/doc/25801711-26941677.html>.
- [10]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关于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EB/OL].(2026-03-11)[2026-03-18]. <http://www.cppcc.gov.cn/zxww/2026/03/11/ART11773230210484637.shtml>.

(责任编辑 师 语)

人工智能赋能新兴知识分子队伍建设： 政治吸纳和组织管理*

孙运军

(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政策教研部, 山东济南 250012)

[摘要] 当代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内涵结构、政治态度、政治参与意愿等发生了新变化,需要我们深刻认清人工智能革命背景下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复杂态势,系统梳理人工智能革命对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在思想政治和组织建设等方面的影响因素,提出推进有效政治吸纳和组织管理的对策,以期为进一步做好新兴知识分子统战工作发挥理论与实践指导价值。

[关键词] 人工智能革命; 新兴知识分子; 政治吸纳; 组织建设

[中图分类号] D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4-0017-09

一、问题分析和研究意义

在当今社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其对社会结构、经济模式乃至人类生活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全球范围内还深刻影响了政治格局与治理模式^[1]。这场变革不仅重塑了经济结构和社会生活,还催生了一系列新的社会群体与政治角色,其中最为显著的是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这一群体不仅在科技创新、经济发展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而且在政治参与、社会治理中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如何有效地将这批新兴知识分子纳入国家的政治体系,实现其政治吸纳和有效组织,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新兴知识分子”并非一个有着绝对统一、一成不变定义的概念,它的内涵随着历史和社会背景的变化而演变。在今天,与传统知识分子相比,AI时代的新兴知识分子具有突出特质:一是高度的跨界融合性。他们往往是“T型人才”,既在

某一垂直领域有深度,又广泛涉猎技术、人文、社科等多个领域。二是实践导向与工具性。他们的知识直接转化为生产力、创造力和解决方案,与经济社会活动的结合更为紧密。三是动态演进性。由于AI技术迭代极快,他们必须保持终身学习,其知识体系和技能需要不断更新。四是深刻的批判性与建设性并存。他们不仅是技术的使用者,更是其发展方向的思考者和批判者,肩负着为智能社会奠基的重任。我们可以将“新兴知识分子”理解为:在每一次重大技术——社会范式变革中,凭借其掌握的“新兴关键生产资料”(不限于物理资本,更侧重于知识、技能和数据),在思想、文化、科技和经济领域产生主导性影响的社会群体。这个定义的关键在于“新兴关键生产资料”。在农业时代是土地,在工业时代是资本和工厂,在信息时代是知识和信息,而在智能时代,则演变为数据、算法和算力。在此背景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专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5VRC064)。

[收稿日期] 2026-04-26

[作者简介] 孙运军,男,山东临沂人,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统战理论政策教研部副教授。

下,对知识分子的角色和使命提出了新的要求^[2]。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深入实施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全面推进,新兴知识分子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中的地位愈发凸显,他们不仅是科研创新的主体,也是科技成果转化推动者,更是科技伦理守护者。与传统知识分子不同的是,新兴知识分子更多地依赖于技术手段来实现社会影响,他们的政治参与方式、社会角色定位以及责任担当方式均呈现出新的特点。因此,如何引导和支持新兴知识分子在政治参与中发挥积极作用,直接关系到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推进。

在人工智能革命的背景下,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吸纳和组织管理问题显得尤为紧迫。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需要大量的高端人才支持,归国知识分子无疑是这一领域的中坚力量。然而,他们在政治态度、价值取向上与本土知识分子存在一定的差异,这为政治吸纳和组织建设带来了挑战。部分归国知识分子对政治无兴趣,他们更倾向于专注于科研工作,对政治活动缺乏热情;一些归国知识分子担心政治组织会影响科研工作,认为党内活动会占用大量时间,影响科研进度;部分归国知识分子对民主党派有情感认同,认为加入民主党派能够获得更自由的时间支配和更快的政治晋升^[3];还有一些党组织在归国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的工作不到位,缺乏有效的政治引领手段,导致归国知识分子对党的认同度不高。另一方面,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如就业结构的变化、社会不平等的加剧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政府与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而包括归国知识分子在内的新兴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将起到关键作用。因此,如何通过有效的政治吸纳和组织管理,将该群体纳入国家的政治体系,不仅关系到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的大局,也关系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从理论层面来看,研究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吸纳和组织管理问题,有助于深化对政治吸纳机制的理解。政治吸纳是指执政

党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将社会精英纳入政治体系的过程。在传统社会中,政治吸纳主要针对的是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等。然而,随着科技的发展,新兴知识分子群体逐渐成为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研究他们的政治吸纳问题,可以为现有的统一战线政策和理论提供新的视角,丰富和发展政治吸纳理论。

从实践层面来看,研究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吸纳和组织管理问题,对于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积极参与,不仅可以为国家的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提供智力支持,还可以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例如,通过政治吸纳,可以将这部分群体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国家的重大决策中,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同时,通过组织化的决策参与渠道,可以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专业特长。

研究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吸纳和组织管理问题,将有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改变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使得社会资源的分配更加多元化。然而,这一变化也带来了新的社会问题,如数字鸿沟、技术失业等。通过政治引领和组织协调,可以更好地平衡各方利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例如,通过制定合理的政策,引导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关注社会弱势群体,参与公益事业,共同推动社会的和谐发展。

二、人工智能革命背景下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构成及特征

新兴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思想观念和社会角色等核心特征,不再仅仅是“有知识的人”,而是“能够创造、驾驭并批判性地引导下一代核心生产力(AI)的人”。他们是一个多元、动态的群体,共同构成了塑造我们未来社会形态的中坚力量。界定他们的,不是文凭或职称,而是他们在AI生态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及其所掌握的“智能资本”。这一群体不仅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而且在社会文化变迁和政治生态重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 关于新兴知识分子功能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深入剖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尤其是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对立关系。在他们的理论框架中,劳动不仅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而且是社会关系变迁的根本动力。随着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崛起,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为我们理解新兴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中的政治角色和使命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技术进步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4]。在马克思时代,机器的使用使得劳动力实际隶属于机器,而智能化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力被替代的趋势,非物质劳动兴起,知识商品化新形式不断出现。尽管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取代了许多就业岗位,但也为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5]。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详细分析了机器大工业对劳动过程的影响,指出机器的引入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也导致了劳动者的异化和剥削的加剧。在人工智能时代,这一理论仍然适用^[6]。新兴技术的应用,如自动化、机器人和人工智能,虽然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但也可能导致大量劳动者失业,尤其是那些从事重复性、低技能工作的劳动者。新兴知识分子作为掌握新新技术和新知识的群体,应当承担起引导技术合理应用、减少技术对劳动者的负面影响的责任。

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了知识分子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新兴知识分子不仅应当关注技术的发展,更应关注技术对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的影响。他们应当积极参与对平台资本主义等当代特征的社会批判,揭露技术进步背后的资本逻辑,推动技术成果惠及更广泛的民众,而非仅仅服务于少数资本家的利益。这意味着新兴知识分子需要具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不仅要追求个人的职业发展,更要关注社会公平

正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特别强调了知识分子在教育和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呼吁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通过教育和宣传增强阶级意识,为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而奋斗。在人工智能时代,新兴知识分子应当利用新媒体和互联网平台,普及科学,提高公众的科技素养,同时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民众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和支持。这不仅有助于提升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也有利于构建更加和谐、公平的社会环境。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还为我们提供了理解新兴知识分子国际政治角色的视角。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指出资本的逐利本性导致了国际的不平等和冲突。在当前全球化背景下,新兴知识分子应当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推动技术的全球共享,促进各国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特别是在面对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时,新兴知识分子应当发挥桥梁作用,促进国际社会的团结与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

(二) 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构成特点及其背后的社会动因

从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教育背景来看,新兴知识分子群体主要由留学归国人员、高新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士以及跨学科研究者构成。他们在教育背景上的独特性不仅体现在专业知识的深度和广度上,还体现在国际化视野和多元文化背景上。

留学归国人员是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类人群通常拥有海外知名高校的教育背景,接受了先进的科研训练和国际化的教育理念。他们的回归不仅带回了前沿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还带来了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深刻理解,这部分人群的入党积极性相对较低。以中国科学院动物所为例,2013年以来,该所共吸引了13位留学归国高级知识分子入所工作,其中党员7位,党员占留学归国高级知识分子的比例为

54%。尽管这一比例较高,但进一步分析发现,这些党员中大多数是在归国前就已经入党,归国后入党的仅占一小部分^[3]。这表明,尽管他们在专业领域表现出色,但对国内政治组织的认同和参与仍需进一步加强。众所周知,留学归国高级知识分子中党员的比例远低于国内高级知识分子的党员比例,反映出留学经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国内政治组织的认同感和参与意愿。

高新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士在新兴知识分子群体中占据重要位置。这些人通常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创新能力,是推动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跨学科研究者的增多也为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增添了新的活力。这类人群通常具备多学科背景,能够在不同领域之间进行交叉融合,推动创新。然而,他们的多元背景也使得他们的政治认同需要更加开放包容的环境。

从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职业分布来看,新兴知识分子群体主要集中在数字经济、科技创新、现代服务业等领域。这些领域的发展与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密切相关,为新兴知识分子提供了广阔的职业发展空间。数字经济领域的职业分布尤为突出^[3]。数字经济是指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载体的经济活动^[7]。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8]。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一领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他们不仅掌握了先进的数字技术,还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例如,大数据分析师、人工智能工程师、区块链开发者等职业,都是新兴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典型代表。

各领域的职业分布也值得关注。他们不仅参与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还在成果转化和产业化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例如,生物技术研究员、新材料科学家、新能源工程师等职业,都是科技创新领域的核心岗位。这些职业不仅要求从业者具备深厚的专业背景,还需要他们具备跨学科的综合能力,能够在复杂的科研环境中开展创新工作。

现代服务业的职业分布也呈现出新的特点^[8]。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现代服务业逐渐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在这一领域中的职业选择也日益多样化。例如,金融分析师、市场策划师、品牌经理等职业,都是现代服务业中的热门岗位。这些职业不仅要求从业者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还需要他们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能够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企业创造价值。

当代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职业选择更加倾向于那些能够充分发挥其知识和技能优势的领域。例如,信息技术服务、文化创意、教育培训等职业,都是新兴知识分子群体中的热门选择。例如,促进了工作方式的个性化和定制化,在创意产业,智能设计工具能够根据设计师的创作风格和项目需求,生成初步的设计方案,大幅缩短了创作周期^[9]。显而易见,新兴知识分子特指那些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前沿科技领域拥有深厚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的知识精英,广泛分布在新经济、新技术领域中,包括但不限于归国学者、科技创业者、互联网精英等科研人员、工程师、IT从业者、金融分析师等。这些职业不仅能够满足他们对自由和创造力的追求,还能为社会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和产品。

从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倾向来看,这一群体在政治参与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个人主义倾向,这一思想倾向会影响到体制效能的整体发挥。

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个人主义倾向源于其高度的专业化和独立性。在人工智能时代,技术的更新换代速度极快,这要求知识分子具备高度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为了保持自身的竞争力,他们往往倾向于追求个人的职业发展和技术突破,而非集体行动。这种个人主义倾向使得他们在面对社会政治问题时,更愿意以个体的身份发声,而不是通过集体组织来表达意见。例如,许多技术专家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个人见解,但很少参与正式的政治组织或团体。

个人主义倾向体现在新兴群体对政治参

与方式的选择上^[10]。在传统政治体系中,政治参与通常需要通过政党、工会等组织进行。然而,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更倾向于通过网络平台和社交媒体等新型渠道参与政治讨论和活动。这种方式不仅降低了参与门槛,也使得个体能够更加自由地表达观点。然而,这种分散化的参与方式缺乏组织性和系统性,难以形成有效的政治影响力。例如,许多技术论坛和在线社区虽然活跃,但很难转化为实际的政治行动。

个人主义倾向还影响了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组织化水平。由于个人主义倾向,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在组织化过程中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他们往往缺乏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难以形成稳定的组织结构。另一方面,他们对组织的依赖性较低,更愿意以个体身份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这种低组织化水平使得他们在面对重大社会政治问题时,难以形成统一的声音和行动,从而影响了其整体的社会政治效能。

在政治参与方面,新兴知识分子群体面临一定的挑战。如对政治无兴趣、担心加入政治组织影响科研工作、对民主党派有情感认同,以及部分党组织在归国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工作不到位等。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更深层次的政治参与^[3]。因此,党组织在吸纳归国知识分子时,应当综合考虑这些因素,采取更加灵活和多样化的策略,以增强其对党组织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最终实现归国知识分子从爱国到爱党爱国的提升。

三、人工智能革命对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政治参与和组织活动的影响因素

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的应用为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机遇,但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政治参与变化虽然不能简单归因于技术工具(互联网、社交媒体),但当信息技术影响到制度适配、冲击文化传统、改变权力结构等社会因素的中介作用就会显现,这些会成为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政治参与和组织活动的影响因素。如何借助人工智能和信息技术发挥新兴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优势与作用,

并克服有关负面影响问题,将是促进这一群体队伍健康发展的重要课题。

(一)人工智能信息化下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政治参与的主要问题

主要是政治冷漠与参与障碍。政治冷漠与参与障碍是当前社会转型期,特别是在智能革命背景下,新兴知识分子群体面临的重要问题。这一群体的政治参与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利益,更关乎国家政治生态的健康发展^[11]。

政治冷漠并非单纯由个体性格或态度决定,而是由一系列复杂的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对于新兴知识分子而言,政治冷漠的根源之一在于对政治体系的信任缺失。部分归国知识分子对政治无兴趣,认为无论哪个政党都与其无关,这种态度反映了他们对现有政治体系的疏离感。此外,部分归国知识分子担心加入政治组织会影响科研工作,认为党内活动较多,需要占用大量时间,这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政治参与的抵触情绪^[3]。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参与被视为一种负担而非权利,导致政治冷漠现象的产生。

政治参与的障碍也很明显。一方面,现有的政治参与渠道不够畅通,尤其是对于新兴知识分子群体而言,他们往往更倾向于通过非传统的途径表达意见,如网络平台。然而,这些途径在实际操作中往往受到严格的监管,限制了他们的政治表达。另一方面,政治参与的制度设计未能充分考虑到新兴知识分子的需求和特点,如民主党派对党员的时间要求较为宽松,吸引了部分寻求更自由支配时间的知识分子。这表明,现有的政治参与机制需要更加灵活和包容,以适应不同群体的多样化需求。

(二)人工智能信息化给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政治参与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参与渠道,这一群体的政治吸纳和组织化问题与政府治理的关系更加凸显。互联网、社交媒体等数字平台的普及,使得这一群体能够更加容易地获取政治信息,表达政治观点,参与政治讨论^[12]。这些平

台不仅降低了政治参与的成本,提高了参与的效率,还增强了政治参与的互动性和即时性。例如,通过在线投票系统,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可以方便地参与各类选举活动,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和偏好,从而在政治决策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极大地推动了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型^[12]。大数据技术的引入使得政府能够基于海量数据进行科学决策,提高了政策制定的精准度和有效性。例如,通过大数据分析,政府可以更准确地把握民众需求,优化公共服务供给,提高政策响应速度^[13]。此外,大数据技术还促进了政务公开透明,增强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为公民参与政治决策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渠道。

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提高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认知和政治效能感。这一群体的政治吸纳和组织化问题与政治参与动力的关系更为密切。在信息时代,新兴知识分子群体能够通过网络获取丰富的政治信息,包括政策、新闻报道、专家评论等,这有助于他们形成更加全面和深入的政治认识。同时,网络平台上的政治讨论和交流也有助于他们更好地理解政治过程,提高对政治活动的参与意愿。此外,通过网络平台,新兴知识分子群体还可以直接与政治人物进行互动,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这种直接的沟通方式有助于增强他们的政治效能感,即相信自己的行动能够对政治决策产生影响。根据已有研究,人工智能不仅替代了低技能劳动,也开始逐步影响中高技能劳动者的工作^[14]。这种技术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虽然短期内可能增加结构性失业,但长远来看,也为劳动者提供了向更高层次职业发展的可能性。例如,通过教育和培训,失业劳动者可以转向新兴行业,从事更加复杂和创造性的劳动。这不仅有助于缓解失业问题,也为个人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会,从而增强了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参与政治的动力。

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的应用还促进了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政治参与的多元化。这一群体的政治吸纳和组织化问题与公民社会共识的形成紧密相关。除了传统的选举投票之外,新

兴知识分子群体还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参与各种形式的政治活动,如在线请愿、电子签名、网络抗议等。这些新的参与形式不仅丰富了政治参与的内容,也为新兴知识分子群体提供了更多的表达渠道。例如,在涉及公共利益的重大决策过程中,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可以通过网络平台发起在线请愿,收集公众意见,向政府施加压力,推动政策的调整和完善。他们不仅利用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等手段开展社会调查和项目评估,为政府提供独立的意见,促进政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还进行政策研究和分析,积极参与政策讨论和决策过程。例如,通过在线论坛、社交媒体等平台,新兴知识分子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与其他公民和政策制定者进行交流,形成多元化的意见市场,公民社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不断涌现。

(三) 新兴知识分子彰显民主政治建设参与者的优势与作用

在人工智能革命的背景下,新兴知识分子将继续发挥其作为民主政治建设参与者的优势与作用。

1. 新兴知识分子是社会监督的践行者。新兴知识分子在社会监督中的角色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社会信息的分析者与传播者。在信息爆炸的时代,海量的数据和信息充斥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其中不乏虚假、误导性信息。新兴知识分子凭借其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能够有效地筛选、分析和解读信息,帮助公众辨别真伪,提高信息的透明度和准确性。他们通过撰写评论、发表研究报告等形式,向公众传递有价值的信息,引导舆论走向,促进社会共识的形成。

二是社会问题的发现者与解决者。他们利用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深入探究社会现象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揭示社会问题的本质。例如,在教育、医疗、环境保护等领域,新兴知识分子通过数据分析,发现存在的不公平现象,提出解决方案,推动相关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他们的工作不仅有助于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也为政府决策提供了科学依

据,增强了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三是社会监督机制的构建者与参与者。在构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过程中,新兴知识分子发挥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参与社会监督机制的设计与完善,还通过实际行动支持和推动这些机制的有效运行。例如,在网络监督、媒体监督等方面,新兴知识分子利用自己的专业优势,积极参与到监督活动中,提高了监督的效果和影响力。同时,他们还致力于提升公民的监督意识和能力,培养更多的社会监督力量,共同构建一个开放、透明、公正的社会环境。

2.新兴知识分子是公共议题的倡议者。在公共议题的倡议方面,新兴知识分子凭借其专业知识和技术优势,能够在促进社会共识、推动政策制定及实施、引导公众舆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新兴知识分子通过科学研究和技术探索,为公共议题的提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技术支持。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成熟,诸如大数据分析、机器学习等先进工具的应用,使得新兴知识分子能够更加精准地识别社会问题,深入剖析问题根源,为公共议题的形成提供科学依据。例如,在社会不平等问题上,通过分析大量社会经济数据,新兴知识分子能够揭示收入分配不公的具体表现及其背后的社会经济机制,为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有力的数据支撑。

新兴知识分子在公共议题倡议中扮演着桥梁和纽带的角色,连接着学术界、政府决策部门与普通民众。他们不仅能够将复杂的理论转化为易于理解的语言,帮助公众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社会问题,还能够通过撰写报告、发表文章、参与公共讨论等方式,将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社会行动指南,促进社会各界对公共议题的关注和支持。

新兴知识分子在倡导公共议题时,还需注重跨学科合作与国际交流。面对全球化背景下的复杂社会问题,单一学科的知识往往难以全面解析问题的本质。因此,新兴知识分子应积极寻求与其他学科专家的合作,共同探讨解决方案。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跨国界

的知识共享和经验交流变得更加便捷,新兴知识分子应当充分利用这一优势,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本国国情,提出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的公共议题倡议方案。

3.新兴知识分子是法律公正的支持者。新兴知识分子应当成为法律公正的倡导者。在人工智能技术广泛应用的过程中,数据隐私、算法偏见、责任归属等问题日益凸显,这些问题不仅挑战着现有的法律体系,也对社会公平构成了潜在威胁。新兴知识分子应通过学术研究、公共讨论等方式,揭示人工智能技术可能带来的法律与伦理问题,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并积极参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确保技术发展不偏离法治轨道。

新兴知识分子还应扮演法律教育者的角色。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普通民众对于相关法律知识的需求日益增长。新兴知识分子应通过撰写科普文章、举办讲座等形式,普及法律知识,增强公众的法律意识,使人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身权益。同时,新兴知识分子还应关注青少年的法治教育,培养下一代具备良好的法治观念,为社会的长治久安奠定基础。

四、进一步完善新兴知识分子政治吸纳和组织安排的机制

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吸纳和组织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政治认同、组织管理、伦理责任等多个方面。只有通过多方面的努力,才能实现这一群体与社会的良性互动,为人工智能革命背景下的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一)实效化对策:构建创新激励与人才保障的体制机制

第一,探讨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吸纳过程中的动力机制。政治吸纳不仅仅是单方面的过程,而是需要双方的互动与配合。对于新兴知识分子而言,政治吸纳的动力可能来源于国家发展的责任感、对个人职业发展的期望、对社会地位的认同等多方面因素。应深入分析这些动力机制,特别是如何通过政策设计和制度创新,增强新兴知识分子对国家政治体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促进其积极参与国家政

治生活。

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组织问题涉及如何构建有效的沟通平台和合作机制。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成为必然趋势。这不仅要求技术专家与社会科学工作者之间的密切协作,也需要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参与。通过建立多主体参与的协同创新平台,可以促进知识的共享与交流,增强新兴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影响力。此外,组织化还意味着需要建立健全的内部治理结构,确保组织运行的透明度和民主性,防止技术精英主义倾向的出现。

第二,关注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组织化过程中的障碍与挑战。新兴知识分子群体在政治吸纳过程中面临着身份认同与角色定位的挑战。一方面,他们是技术创新的先锋,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另一方面,他们在参与公共事务时,需要面对来自传统政治体制的接纳与认可问题。这要求他们在保持专业独立性的同时,寻找与现有政治体系的有效对接路径。例如,通过参与政府咨询委员会、智库建设等方式,新兴知识分子可以为政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同时也能够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

第三,加大国家层面的支持与引导,构建开放包容的人才制度环境。尽管国家层面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旨在吸引和培养高层次人才,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不少障碍。研究应探讨这些障碍的具体表现及其背后的原因,提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如通过优化党组织活动的内容和形式,提高活动的吸引力,减轻科研人员的负担,增强其参与政治活动的积极性。政府下一步应当出台相关政策,鼓励和支持新兴知识分子参与国家重大战略规划和政策决策过程,为其提供必要的资源和平台。此外,研究还关注不同地区在吸引和组织高层次人才方面采取了不同的策略,这些策略的效果和适用性值得深入研究。通过国际比较,可以为我国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有益的借鉴,尤其是在如何平衡国家需求与个人发展、如何构建开放包容的人才制度环境等方面。

(二)系统化对策:营造政治引领与政策配套相结合的良好环境

应加强政治引领,为新兴知识分子政治吸纳和组织化提供方向指导。对于归国知识分子而言,虽然他们在海外接受了高水平的教育和科研训练,但对国内政治环境的理解可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应当加强党的理论教育和历史教育,通过举办专题培训班、研讨会等形式,增强他们对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理解和认同。同时,注重将党的理论与科技发展相结合,使他们认识到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坚强保障。此外,还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如在线学习平台,提供便捷的学习资源,方便科技人才随时随地学习。

应构建适应科学家工作特点的党建体系,推进新兴知识分子政治吸纳和组织化健康发展。通过总结山东大学等高校统战工作与党建融合的实践经验,建设一支熟悉科技工作特点的党建专业队伍至关重要。选派对科技领域有深入了解、具备较高政治素养和专业能力的党员干部,担任科研院所、高校的党委(党组)书记,确保他们能够与科技人才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关切,解决他们在科研工作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这支队伍还应具备较强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够动员和组织科技人才积极参与党的各项活动,增强他们的组织归属感。

应改进和完善科研院所、高校的党建工作方法,使之更加贴近科技人才的工作实际。摒弃形式主义,注重实效,通过开展丰富多彩、富有针对性的活动,增强党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例如,可以定期举办科技论坛、学术沙龙等活动,邀请知名专家学者分享最新研究成果,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热情。同时,建立健全服务机制,关注科技人才的生活需求,如住房、子女教育等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能够安心从事科研工作。特别是对于那些在科研领域取得显著成就的战略科学家,应给予重点关注和支持,通过建立专门的联络机制,定期交流思想,分享研究成果,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和信任。

应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保障新兴知识分子政治吸纳和组织化的实施。如在《科技进步法》中增设知识分子等科研人员的政治参与条款。政府应出台一系列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资金支持、项目资助等,鼓励和支持归国知识分子积极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发挥其专业特长。同时,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为归国知识分子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在政治吸纳方面,可以探索建立多元化的政治参与渠道,如设立专门的咨询委员会、邀请归国知识分子参与政策制定等,使其能够更直接地参与到国家决策过程中,增强其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

应营造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为新兴知识分子政治吸纳和组织化激发生机活力。应构建一个有利于科技人才成长和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倡导开放包容的文化理念,尊重差异,鼓励交流,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融合。这不仅需要提供充足的科研经费支持,还需要营造一个公平竞争、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文化氛围。对于突出的科技人才,应当给予相应的荣誉和奖励,树立典型,发挥榜样作用。同时,鼓励和支持科技人才参与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为他们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增强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应建立与海外科技人才有效联系渠道,扩大党的影响力。通过设立海外联络站、开展国际交流等方式,加强与海外科技人才的联系,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增进他们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对于有意归国发展的科技人才,应当提供全方位的支持和服务,包括职业发展规划、科研条件保障等方面,吸引他们回到祖国,为国家的科技进步贡献力量。通过举办国际学术会议、文化交流活动等方式,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增进国内外知识分子之间的联系,扩大国际影响力。同时,注重培养归国知识分子的国际视野和全球意识,使其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代表中国发声,提升国家软实力。

[参 考 文 献]

[1] 蒋南平.人工智能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政治经济学的映射及其政策价值[J].人文杂志,2019(2):20-25.

- [2] 陈毓.社会行动理论视角下人工智能参与社会实践的规则冲突——以人工智能辅助驾驶中的行动困境为例[J].学习与探索,2025(6):83-92.
- [3] 聂常虹,张志明,马丽.加强归国知识分子政治引领和政治吸纳问题的思考——基于对部分科研院所归国知识分子入党问题的调研[J].中国人才,2019(10):39-42.
- [4] 刘海军,王玉华.马克思恩格斯科技发展观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启示[J].理论学刊,2023(1):91-99.
- [5] 陈韦宏,罗志佳.人工智能时代下劳动者的困境与纾解——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J].经济学家,2025(2):26-34.
- [6] 薛峰,何云峰.科技进步、人工智能与劳动发展——第四届劳动人权马克思主义论坛关于科技与劳动发展关系的学术讨论综述[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0(1):208-212.
- [7] 黄庆平,张振华,吴轲威等.数字经济时代的职业演进与青年职业发展[J].中国青年研究,2022(9):114-119.
- [8] 戚聿东,丁述磊,刘翠花.数字经济时代新职业促进专业化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机理研究——基于社会分工视角[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58-69.
- [9] 聂文琪.人工智能技术冲击下的产业变革、就业影响及应对策略[J].湖北社会科学,2024(8):90-103.
- [10] 侯东德,薄萍萍.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政治吸纳研究[J].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7(4):85-90+147.
- [11] 聂骝,范广军.当代大学生政治参与选择性冷漠症探源与对策[J].学习论坛,2017(10):54-58.
- [12] 冉飞.大数据时代政府治理的机遇、挑战与对策[J].人民论坛,2016(17):65-67.
- [13] 王山.大数据时代中国政府治理能力建设与公共治理创新[J].求实,2017(1):51-57.
- [14] 张晋铭.以人工智能开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新视角[J].河南社会科学,2021(12):78-88.

(责任编辑 王遐见)

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

孔 读 云

(三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2)

[摘 要]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有着直接的关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觉醒的催化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通过发挥政治凝聚功能,构建了共同的“政治认同”;通过发挥文化整合功能,塑造了抗战时期共同的价值导向;通过实践锻造,强化了全民族命运共同体认知。中国共产党通过始终主动自觉的思想引领,促使中华民族在认知、情感和实践方面全面觉醒了共同体意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凝聚了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的精神动能,奠定了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基础,创新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形态,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纽带。

[关键词]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抗日战争; 中国共产党

[中图分类号] C95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4-0026-07

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在屈辱中觉醒,在抗争中奋起,最终形成强大的抵御外辱、救亡图存的民族自觉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百年抗争中,各族人民血流到了一起,心聚在了一起,共同体意识空前增强,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自在到自觉的伟大转变。”^[1]这个历程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孕育、发展和全面觉醒的过程。

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觉醒的关键因素。在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通过发挥其独特的政治凝聚、文化整合、实践锻造和思想引领功能,促使绝大多数中国人摒弃地域乡土、血缘世系、宗教信仰之别勇敢站出来,同仇敌忾,荣辱与共,精诚团结,共同抗日,铸就了近代以来从未有过的民族大团结、彼此共存亡的命运

共同体局面,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最为可靠的基石,最终“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2]364}。

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1年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中华民族十四年抗战的历史,也开启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萌芽到形成的历史进程。面对空前危机,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阶级矛盾下降成为次要方面。因此,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从中华民族大局出发,在九一八事变后第三天就发布宣言,号召国人起来抗战,并委派优秀党员前往东北组织抗战。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错误行径使得抗战力量被白白消耗。

随着东三省沦陷和“华北事变”的爆发,中华民族面临的政治形势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

[收稿日期] 2026-02-10

[作者简介] 孔读云,男,安徽舒城人,三江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2]143}。中国共产党对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清醒判断和政治立场都是非常明确且一贯的。1935年《八一宣言》中就明确提出“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3]265}的主张。在1935年底的瓦窑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是什么呢?不是别的,就是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2]152}。与此同时,面对整体性的民族危机,国民党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以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为代表的国民党爱国将领主动请缨出战。此外,全国各界爱国人士看到国土沦丧,生灵涂炭,无不义愤填膺,一二九运动更是掀起了全国性的抗日救亡高潮。1930年5月“蒙古会议”提出的“中华民族是整个的”重要命题在民族危机面前越来越成为民族共识并得以强化。

西安事变是国共两党抗日态度“从分歧到弥合”的历史转折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更是两大政治力量在民族危机面前的坚持与妥协,意味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第一次在最高政治层面获得了实质性共识,“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2]363}。这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创造了政治前提。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全面抗战从此开始。7月8日,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表了抗战宣言,呼吁“全中国人民、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的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2]344}再次提出国共两党亲密合作、共同御辱。随后,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了三项基本主张,做出了四项郑重承诺。面对抗战形势急剧恶化,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的庐山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国共两党可谓精诚合作,分别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给予敌人沉重

打击,粉碎了日本迅速灭亡中国的企图,展现了中华民族团结一心抗敌御辱的决心和力量。从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渐成为一个包容性的政治平台,吸引包括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海外华侨在内的各阶层越来越多的人民聚集到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凝聚起磅礴的抗日力量。

随着广州、武汉的失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帝国主义开始调整侵华政策,其诱降政策引发了国民党内部的阵营分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始面临严峻的考验。中国共产党坚持走全面抗战路线,不断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围,凝聚更多的抗日力量。针对国民党的妥协退让,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坚决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政治路线,尽显中流砥柱作用。在敌后根据地中,中国共产党实行“三三制”、减租减息等政策,凝聚最广泛的抗战力量,使得统一战线获得坚实的社会支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从国共合作发展为全民族、各阶层、各党派的广泛政治联盟,为持久战提供了政治保障。

经过14年艰苦抗战,1945年8月,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完全胜利。这是人民的胜利,更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抗战实践证明了统一战线是革命胜利的法宝,这为抗战胜利后应对新的政治局面提供了重要保障,成为构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基本遵循。

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的历史轨迹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觉醒经历了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也是民族觉醒的起点。遗憾的是,这种民族觉醒具有局部性和自发性,士大夫群体中只有屈指可数的林则徐、魏源等人,他们通过著书立说介绍西方,主张“师夷制夷”却反应寥寥,并未引起重视;普通百姓更是毫无察觉。从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就可以看出,知识分子还是站在“天朝上国”的立场去审视“西洋夷

狄”,他们的觉醒更多是对清政府落后的担忧,而非民族国家面临的挑战。继之而起的洋务运动是部分士大夫们将担忧转化为挽救清政府的实际行动,他们未能更不可能跳出“王朝国家”的范畴而上升到“中华民族”整体命运的认识。这一时期,普通百姓则是“保持平静,让皇帝的军队去同侵略者作战”^{[4]625},也不可能“民族危机”的集体意识。

1894年甲午战败对中国人的刺激是很大的。梁启超说“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5]249}。甲午战败使“中体西用”的幻想瞬间破灭,民族意识的觉醒阶层范围也迅速扩大,从少数士大夫群体扩大至绅士、知识分子。维新派开始提出“保国、保种、保教”,首次将“国家”和“民族”并列,蕴含“民族共同体”的雏形。孙中山则提出“驱除鞑虏 恢复中华”,在“反满”为核心的口号引领下,形成了模糊不清的“中华民族”整体认知。这一时期,尽管有义和团运动,但是其参加者主要是集中在华北地区的农民,全国范围的普通百姓仍然没有被卷入。因此,民族意识的觉醒范围虽有扩大,层次升级,“救亡图存”意识更加明显,但仍然主要局限在知识和精英阶层。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建立了崭新的共和政体,但中国仍然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苦苦挣扎。这一时期,随着革命思想的广泛宣传和革命行动的深入开展,救亡图存的主体进一步扩大,精英主导下的民族意识逐渐走向“国家建构”,士兵、学生更多地加入革命队伍中来。在认知上,也由“驱除鞑虏”发展为“五族共和”,民族意识由“汉族中心”转向“多民族共同体”,但普通民众对“五族共和”的理解还非常模糊,民族意识的觉醒仍然摆脱不了局部性和自发性的桎梏。

五四运动是中华民族从“自在”走向“自觉”的重要转折点,标志着中华民族觉醒的范围由精英阶层转向了城市普通民众,“中华民族”的概念也由模糊变得更加清晰。这次爱国运动,将捍卫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提升为全体中国人的共同目标,他们用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取代了王朝臣民的旧有意识,展现了中华

民族前所未有的思想超越和共同行动引发的巨大力量。五四运动在思想和实践层面让更多的国人拥有了“命运与共”的共同体认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奠定了重要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五四运动改变了以往只有觉悟的革命者而缺少觉醒的人民大众的斗争状况,实现了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全面觉醒。”^[6]

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图谋和行径将中华民族推向了最危险的时刻。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中华民族自觉完成了一次全国总动员,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团结起来,他们不分民族、地域、阶层、党派之别勇敢站出来,同仇敌忾,誓死抗敌,保卫中华。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近代以来的民族觉醒从一种越来越多的普遍认同的意识转变为一种越来越一致的共同行动。中国共产党倡导并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觉醒的催化剂。

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进行的一系列抗争,就是中华民族觉醒的历史进程,就是中华民族精神升华的历史进程。这种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7]这种高度就是从局部性和自发性的民族意识发展为全民族全员的共同意识和自觉行动。正是站在近代中国厚重的历史积淀基础上,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催化机制实现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觉醒从“局部”到“全面”的历史转折。

(一) 政治凝聚:统一战线的“包容性”构建共同政治认同

从1935年瓦窑堡会议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开始,统一战线充分发挥了其“包容性”的特殊优势,不仅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更使近代以来形成的阶级、地域的割裂与民族的隔阂统统被打破。

统一战线以民族生存为最高宗旨,跨越国内两党分歧,将中华民族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在“民族危亡”面前构建了共同的政治认同。

中国共产党主动由“反蒋抗日”调整为“联蒋抗日”,将“苏维埃政权”改为国民党统治下的“特区政府”,将部队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也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一贯政策,开始“联共抗日”,正式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在“民族大义”面前,共产党的努力争取和国民党的暂时妥协,最终铸就了国共两党共同抗日的政治认同,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阶级基础。

为了将这种政治认同转化为更多国人的具体行动,中国共产党在洛川会议上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标志着全面抗战路线的正式形成,成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的行动纲领。为了抗战胜利,全体中华儿女,不分党派、民族、地域、阶层、职业、身份,都紧密团结起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就是这样悄然凝聚。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实行“三三制原则”“减租减息”“普选”等政策更是将统一战线的动员力量落到了具体细节,使“中华民族共同体”可感可知,成为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纽带。

(二)文化整合:抗战叙事与共同价值的塑造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高度重视抗日文化建设。全国文艺界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号召下,以抗战为叙事题材,通过形式多样的文艺作品和紧扣主题的舆论宣传,起到了全国范围内的文化整合作用,成为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觉醒的关键路径。

通过那些通俗的文艺作品,让中华儿女从慷慨激昂的歌曲、发人深省的戏剧、荡气回肠的小说等作品中获得情感共鸣,如歌曲《黄河大合唱》的歌词“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无论是农民、学生还是士兵听了之后,都能从情感上获得一种“民族危亡”的共识并产生一种抗争的力量;以《新华日报》《中央日报》等为主要代表的舆论宣传阵地,紧扣“守土抗战”为核心主题,广泛呼吁“共赴国难”“抗日救国”,共同喊出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这样一种上下层广泛呼应、深得民心的文艺作品和宣传形式,正是在不经意间观照了多年以

来中华民族阶层、族群割裂的现实,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化整合,让上至义愤填膺的爱国精英,下至目不识丁的农民,都能深切地领悟到“救亡图存”是全体中国人的共同使命,“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和行动意识得到确认并越来越清晰,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提供了文化根基。

(三)实践锻造:全民族抗战的“共同经历”强化命运共同体认知

14年的浴血抗战同时催化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断壮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民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同胞乃至海外华侨都自觉团结到“中华民族”的旗帜下。抗战由最初的局部的、个体分散的抗战到全民族的共同行动,这样的实践过程锻造并强化了“命运共同体”的认知,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提供了实践基础。

少数民族同胞在日寇铁蹄之下,自发组建了多支抗日武装队伍,着力爱国宣传,以各种方式积极动员后方民众参加抗战工作,英勇投身抗日的战场。1938年“蒙藏回族慰劳抗战将士代表团”奔赴前线进行了大规模的慰劳活动,当时通过大量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掀起了中华民族大团结的热潮,甚至出现松潘地区少数民族部落武装请缨出战的壮举。“抗日”成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共同心声。

海外华侨支援抗战也是极尽慷慨,因为“中国人”的共同身份,唤起了无数爱国华侨内心的“民族意识”,他们捐款、捐物、组建抗战组织,“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成为凝聚海外华侨的精神纽带。

至此,面对外敌入侵,中国人再也不是“熟视而无所容心”的看客,在惨痛的民族灾难面前,全体中华儿女被彻底唤醒,在实践中强化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认知,并将这种认知在抗战后期胜利的“集体欢腾”中升华为全民族的情感本能。

(四)思想引领: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与实践推动

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初就是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具有高度理论自觉。抗日战争时期,这种理论自觉集中体现在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政策指引下的理论创新和实践策略方面。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中国共产党自觉将中国近代历史文化和抗战实践紧密结合,系统阐释并构建了“中华民族”命运与共的整体价值,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提供了极为关键的理论坐标和实践指南。

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揭示了抗日战争绝不是依靠军事手段就能取胜的,而是靠“民族精神的觉醒和凝聚”,明确提出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自求解放的战争形态”^{[2]474},只有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将社会各界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商人、小资产阶级、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和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等一切能团结的力量团结起来,汇聚强大的“民族共同体”力量,才能争取到最后的抗战胜利。这篇光辉著作,把近代以来此起彼伏碎片式的民族觉醒意识和革命行动升华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高度,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向全面和统一。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毛泽东首次阐述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史,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由多数民族结合而成的拥有广大人口的国家”^{[2]622}。从历史的角度打破了“汉族中心论”,揭示了中华民族不仅刻苦耐劳,同时又富有革命传统,“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2]623},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抗战时期,面对国民党内部的倒退、分裂甚至掀起的一次又一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着眼抗战大局,坚持“团结—斗争—团结”的正确策略,在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统一的前提下不断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确保统一战线在动态平衡中持续发挥凝聚共识的作用。1945年召开的党的七大明确提出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的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8]1027}的目标,将“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结合起来,使全国各族人民都意识到:抗战胜利不仅是“民族独立”,更是获得“自我解放”的重要契机,再次强化了“命运共同体”的共识。

中国共产党的理论自觉和实践推动,完成

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自发”到“全面自觉”的质变,彻底从思想意识层面结束了近代中国“一盘散沙”的状态,在抗日实践中让全国各族人民自觉投身到维护中华民族核心利益的统一战线上来。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最伟大的贡献,是将‘中华民族’从一个模糊的概念,变成了每个中国人的精神归属。这种思想引领,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提供了最根本的理论与实践保障。

四、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觉醒的标志与历史意义

(一)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觉醒的标志

1. 认知层面:“中华民族”成为超越畛域的普遍认同符号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的。近代中华民族意识的觉醒过程如前所述,其中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在惨痛的民族牺牲和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才形成抗日救亡的共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识才得以确认并强化。

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2]447}。这场战争彻底打破了近代以来由于地域、族群的不同而造成的认知局限,如抗战前“中华民族”常常被误解为“汉族”的代称,抗战中,这种认知逐渐统一到“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认知上,直至在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苦难岁月里逐渐升华到“我们都是中国人”的民族共识。所以才出现了“蒙藏回族慰劳抗战将士”“松潘地区的少数民族主动请战”、新疆民众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誓与祖国母亲患难与共的决心和中国人民必胜的坚强信念”^[9]。各民族都把保卫自己民族的利益和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紧密联系在一起,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时候,各地方形成了一个生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觉醒在认知上的重要标志。

2. 情感层面:“爱国—爱民族—爱国家”的三位一体融合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实施亡族灭种的残

暴政策,到处烧杀淫掠,推行“三光”政策,一系列丧心病狂、令人发指的侵略行径,彻底唤醒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家国情怀,铸就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最悲壮也最坚实的根基。抗战过程中的无数牺牲和惨重损失造成的集体创伤以及抗战胜利后的集体荣耀使得中华民族的每一个个体在两个情绪的极端顶点深刻地将个人与国家、小家与大家、民族与国家的命运荣辱融合在一起,使个体情感与民族命运、国家前途实现了深度共情,由此将四万万同胞深度绑定在一起,成为最终淹没日本帝国主义的“汪洋大海”,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完成了从认知共识向情感共情的跨越。

3. 实践层面:全民族“为共同体生存而战”的自觉行动

在民族危机面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先后在认知上实现了突破,在情感上实现了升华,在实践中就有了全民总动员的集体自觉行动。十四年的抗战中,尤其是全面抗战以后,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族不分汉满蒙回藏,全国各地各族各界各阶层的同胞共赴国难,以最坚决、最彻底、最广泛的行动,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和利益。抗日战争从最初的东北、华北的局部抗战到全国范围的全面抗战,从少数精英的呼号呐喊到工农商学兵,无论男女老幼都主动抗战的实践主体转换,从抗战前的分散行动、自发行动到构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面整合,从为“生存抗争”的救亡信念到最后“为民族未来而战”的发展愿景,全体中国人民在抗日的共同实践中凝聚成了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命运与共的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实践中得以全面觉醒。

(二)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觉醒的伟大历史意义

首先,凝聚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精神动能。抗日战争中我们付出了巨大牺牲。正是这样的牺牲唤醒了全体国人,凝聚了强大的民族共同体意识,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为抗战胜利提供了无穷的精神动能。

其次,奠定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基础。抗战中全面觉醒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以厚重历史为依托,以政治认同和情感认同为基础,是以“国家之名”的民族共同体,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全体中国人有了主心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有了核心,现代中国的民族国家认同更加紧密,五十六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无论内外环境如何变化,都能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无惧风雨,直面未来。

再次,创新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中国形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强调“民族平等与团结”,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同时,又将其与中国传统的“大一统”思想融为一体,形成了近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全面觉醒,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理论,为多民族国家的治理提供了中国智慧。

最后,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纽带。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旦全面觉醒,就将全国各族人民凝聚成了一种“众志成城”的力量,而且这是一种始终维护全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力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种力量成为恢复经济、建设社会主义的持久动力。无论是“抗美援朝”,还是“三线建设”;无论是支援建设边疆,还是“两弹一星”,无不延续着“中华民族血脉相连、命运与共”的共同认知和情感。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更是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纽带,全体中华儿女勠力同心,砥砺前行,紧密团结在一起,为实现共同目标不懈奋斗。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抗日战争锻造的伟大民族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我们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10]

总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中华民族生存大局出发,充分认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正确地位,以“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团结凝聚了各民族、各阶层人民,构建了一个以“中华民族”为最高政治共同体的认知框架;以“各民族文化整合”搭建集体记忆,通过多样文艺形式和舆论宣传,将“救亡图存”升华为全民族的精神共识;以“无处不在的实践参与”浇筑

命运共同体,在血与火的抗争中形成了“生死与共”的生存体验,使“中华民族”由模糊抽象变得清晰具体。政治整合、文化塑造和实践锻造形成的协同力量深刻印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从“局部自发”迈向“全面自觉”的历史生成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觉醒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自己的理论创造和实践策略实现了这样的质变。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9-28(1).
- [2]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3]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4]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M]//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 [6]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5-01(1).
- [7]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4-09-03(1).
- [8]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9] 赵海霞.全面的觉醒:抗战时期新疆各民族国家认同研究[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22(3):138-146+216.
- [10]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5年9月3日)[J].党的文献,2025(4):3-4.

(责任编辑 光 翟)

(上接第6页)

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统筹处理好发展和减排、整体和局部、当前和长远、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全球生态文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总之,新时代生态文明系统观念是由自然生态系统论和生态环境治理系统工程论组成。自然生态系统论揭示了生态系统的要素结构、层次关系、环境属性与发展逻辑,生态环境治理系统工程论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协同、政策体系的整体协同与若干重大关系的辩证统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蕴含的系统观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念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创造性运用与具体化发展,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的重要成果,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参 考 文 献]

-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 [2]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4.
- [3]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 [4] 习近平.论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5]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纲要[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6] 沈湘平.读懂坚持系统观念[M].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2021.
- [7] 习近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文选:第1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5.
- [8] 苗东升.论系统思维(六):重在把握系统的整体涌现性[J].系统科学学报,2006(1):1-5+81.
- [9]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0] 习近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处理好几个重大关系[J].求是,2023(22):4-7.

(责任编辑 王遐见)

新时代大学生担当精神的基本内涵、培育问题 及优化路径探析*

陈 璐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089)

[摘 要] 担当精神是大学生在新时代背景下应具备的基本品质,涵盖了担当认知、担当情感、担当意志和担当行为等内容。新时代大学生担当精神培育存在培育内容不完善、培育方式单一、培育合力不足以及大学生参与意愿不强等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主要由于大学生主体自觉性不足、缺乏科学的家庭教育理念和方式、学校教育模式不完善以及社会不良思潮广泛传播。新时代大学生担当精神培育是一项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只有通过个人、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有机融合与共同发力,构建起全方位的培育共同体,才能优化新时代大学生担当精神培育路径,实现最佳育人效果。

[关键词] 新时代; 大学生; 担当精神; 担当精神培育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4-0033-07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青年担当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激励广大青年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作为青年群体的中坚力量,新时代大学生更需要具备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其担当精神关乎国家前途命运和民族伟大复兴。为此,研究新时代大学生的担当精神及培育路径问题,既是深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理论命题,更是培养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实践课题,对于引导新时代大学生勇担历史使命、接续时代重任,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新时代大学生担当精神的基本内涵

大学生担当精神的基本内涵是具体的、历史的,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表述重点与时代特征。在新时代背景下,伴随国家发展与社会进步,大学生担当精神被赋予更为丰富、立体

而深刻的内涵。

(一)担当认知:明确自身责任使命

担当认知是指个体对自身应承担责任和使命的理性认识与理解。这一认知体系包含个体对自身角色在社会关系网络中的坐标识别以及对应承担的责任的正确理解等核心要素。哲学家布拉德雷明确指出,“某种相当的理智或感觉是责任的条件”^{[1]105}。他认为,只有当行为者具备足够的认知能力和理性判断力时,其行为才能被视为自主选择的结果,从而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正确的担当认知是大学生发挥担当精神的先决条件,大学生需要深刻认识到自身在社会进步、民族复兴和世界发展中应承担的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青年大学生要对自己、亲人、周围的人负责,还要对民族、祖国、社会、人类负责^{[2]306-307}。其一,实现自身发展的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中国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制度研究”(项目编号:20BKS143),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新时代弘扬教育家精神研究”(项目编号:25BKSJ02)。

[收稿日期] 2025-09-10

[作者简介] 陈 璐,女,山东潍坊人,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个人担当。新时代大学生要担当起提升自我、完善自我的个体职责,具体包括塑造良好道德、练就过硬本领、锤炼强健体魄,并对未来发展具有坚定的目标和清晰的规划,不断实现自我发展。其二,促进和谐发展的社会担当。新时代大学生应主动承担对他人、对社会的责任,主动了解社会、关注社会发展,为社会增添正能量,做负责任的社会成员。其三,实现民族复兴的国家担当。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新时代大学生应胸怀大局、敢于担当,以扎实的本领回应时代之问,将个人成长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青春之我、奋斗之我在推进强国建设中展现青春作为,立志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力量。其四,践行和衷共济的世界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全球青年有理想、有担当,人类就有希望,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就有源源不断的强大力量。”^{[3]7}新时代大学生应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了解国际社会,关注世界的需求,为人类和谐共处付出努力。

(二)担当情感:具有浓厚家国情怀

担当情感是指个体在承担责任、履行义务的过程中所体现出的内在情感态度。个体在担当认知的基础上形成积极正向的担当情感,实现从外在要求的“要我担当”向内在驱动的“我要担当”转变,为担当精神的践行提供内在动力。

新时代大学生担当情感,主要体现为一种持久稳定的家国情怀。“家国”二字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基因中,从“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从“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都是家国情怀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时代特征的表现。在新时代,家国情怀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和使命。其一,对国家的热爱与忠诚。新时代大学生要热爱祖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心国家各方面的发展,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确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并将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个人的成长奋斗中。其二,对家乡的眷

恋与反哺。家乡是大学生成长的摇篮,承载着他们的童年记忆和情感寄托。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受益于家乡的资源 and 关怀,因此应怀有感恩之心,关心家乡的发展和进步,积极为家乡的建设贡献力量。其三,对同胞的关爱与互助。大学生要关心同胞的福祉,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尊严,在他人遇到困难时伸出援手。这种关爱与互助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中,更体现在面对重大自然灾害、公共卫生事件等危机时的挺身而出和无私奉献。

(三)担当意志:树立远大理想信念

担当意志是指个体在面对责任担当时所展现的坚定决心和毅力,促使个体在面对挑战和遭遇挫折时不退缩、不气馁。担当精神的培养需要以强大的担当意志为内在动力,坚定的担当意志可以促使大学生的担当情感向积极方向转变,从而推动担当行为的落实。缺乏坚定的担当意志,遇到困难时容易自我否定、畏缩不前,担当行为也就难以实现。

担当意志是新时代大学生担当精神体系中的关键要素,集中体现为坚定远大的理想信念。理想信念是人的思想和行为的定向器,一旦确立就可以使人方向明确、精神振奋,担当意志需以崇高的理想信念为根基。人的理想信念反映的是对社会和人自身发展的期望,理想信念是人的精神之“钙”,缺乏理想信念就会得“软骨病”,便难以承担时代赋予的重任。其一,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新时代大学生只有树立崇高的理想信念,才能激发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而发愤学习的强烈责任感与使命感,掌握建设祖国、服务人民的本领。其二,坚定对自身成长发展的追求。大学生应基于自身兴趣与专业能力,紧密结合社会需求,确立清晰的职业规划与人生发展方向,通过持续学习与实践锻炼,不断提升自我,努力推动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之间的良性互动与价值统一。其三,坚定战胜困难的信念。在追求理想的过程中,大学生常会面临学业压力、就业竞争、创新创业中的挫折与瓶颈等问题,而坚定的担当意志能够帮助其树立积极心态、

增强抗压能力,在困境中依然坚持不懈、笃定前行,最终实现理想目标。

(四)担当行为:积极投身实践活动

担当行为是指个体将内在的担当认知、情感和意志转化为实际行动的过程。当个体面对应承担的责任时,若仅停留在认知、情感和意志层面,未付诸行动,难以真正推动担当精神的内化与巩固。因此,个体的担当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能直接反映其担当精神的强弱。

新时代大学生担当行为应将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紧密结合。其一,在学习上勤奋刻苦、积极进取,努力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项事业,都是靠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干出来。”^[4]新时代大学生想要成就一番事业,需要用丰富的知识武装头脑,提高综合素质和核心竞争力。在校期间,应刻苦钻研专业理论,夯实学术根基,更应主动参与科研训练、竞赛项目与社会实践,在实践中锤炼过硬本领、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5]167}。其二,在社会生活中,弘扬奉献精神,积极参与公益事业与志愿服务。大学生应主动关心社会现实,聚焦弱势群体如贫困学生、孤寡老人、残疾人群等,通过捐款捐物、乡村支教、社区服务、心理关怀等多种形式提供切实帮助,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递社会正能量与人文温度,在奉献中培育担当精神、实现自我价值。其三,在职业发展中,勇担使命、敢于突破,自觉将专业所学服务于国家需要。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青年是祖国和民族的希望,创新是社会进步的灵魂”^{[3]75}。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必须具备卓越的创新素质。新时代大学生应自觉培养创新意识、锻造创新思维、提升创新能力,努力在关键技术、前沿领域和基层一线中发挥专业作用,将个人才智注入国家创新发展体系,以实干与创新展现新时代青年的担当作为。

二、新时代大学生担当精神培育的现状分析

目前,新时代大学生担当精神培育已取得一些成效,但也面临诸多挑战和问题。

(一)新时代大学生担当精神培育取得的成效

新时代大学生担当精神的整体趋势是向好的,显示出担当进取、向上向善的良好态势。《中国大学生社会责任感现状调查报告(2022)》显示,2014年本专科生社会责任感总体得分为83.09,2022年本专科生社会责任感总体得分为86.03,连续8年调研显示,我国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持续上升。从多年测评结果来看,我国大学生对社会责任的认同与行动有显著提升,社会责任感总体保持在较高水平^[6]。根据《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2022》可知,在问卷结果中,对“奉献”“友爱”“互助”“进步”持有赞同态度的大学生占比分别为95.4%、95.7%、95.7%、95.4%^{[7]66}。结果表明,新时代大学生高度认同志愿服务精神,展现了新时代大学生较好的担当风貌。可见,大学生参与志愿活动的意愿较为强烈,积极投身于不同的志愿服务活动中践行担当精神,展现了新时代大学生勇于担当、崇德向善的精神风尚和青春风貌。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给予充分肯定:“在脱贫攻坚战场摸爬滚打,在科技攻关岗位奋力攀登,在抢险救灾前线冲锋陷阵,在疫情防控一线披甲出征,在奥运竞技赛场奋勇争先,在保卫祖国哨位威武守护。”^{[8]4}新时代大学生与国家发展同步同行,在脱贫攻坚的道路上,一批批大学生村官,朝气蓬勃、甘于吃苦,勇于奉献,在祖国大地上书写着青春的力量;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一大批大学生志愿者积极发挥自身的优势和特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采取多种方式参与疫情防控工作中。这些事例证明新时代大学生有着较为强烈的担当精神,积极响应党和人民的召唤,能够自觉将个人理想同国家发展进步紧密结合起来,在祖国和人民需要的地方贡献青春力量。因此,从总体上看,积极向上、担当有为是新时代大学生的主流群像。

(二)新时代大学生担当精神培育的现存问题

新时代大学生担当精神培育工作取得了

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培育内容不完善、培育方式途径单一、培育合力不足以及大学生参与意愿不强等问题。

其一,担当精神培育的内容不够完善。一方面,培育内容的时代性有待加强。担当精神具有鲜明的时代属性,然而部分高校的相关教育内容未能及时反映社会发展的新形势、新要求。担当精神培育内容较为滞后,缺乏与新时代大学生生活实际紧密关联的生动案例与实践载体,导致学生难以建立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也较难将抽象理念转化为具体行动。另一方面,培育内容的系统性有待提高。担当精神培育尚未形成清晰完整的内容框架,相关阐释多碎片化地分布于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不同章节,未能构建逻辑连贯、层次分明的内容体系,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担当精神培育的整体效果。为进一步提升担当精神培育实效,高校应着力加强顶层设计,推进跨学科协同,将担当精神有机融入各类课程教学之中,构建系统化、模块化、贯通式的担当精神培育课程体系。

其二,担当精神培育的方式较为单一。一方面,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主动性。不少高校仍以纯理论讲授和道德说教为主,缺乏情境设计、互动讨论与深度启发,导致学生多处于被动接受状态。这种缺乏情感共鸣与思维碰撞的培育模式,难以促使学生真正理解、认同并内化担当精神的价值内涵,从而制约其担当意识与行为能力的培养。另一方面,在担当精神培育过程中实践活动尚未得到足够重视。实践活动是促成担当精神内化与外化的重要载体,但目前部分高校尚未形成以担当精神培育为核心的稳定平台与长效机制。现有活动往往类型有限、内容重复,创新性和吸引力不足,难以有效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此外,部分学生对社会实践的育人功能认识不清、认同感不强,高校也未能通过有效引导机制提升其参与积极性,从而削弱了实践育人的实效。

其三,担当精神培育的合力不足。在大学生担当精神培育过程中,家庭、高校与社会尚未构建起有效贯通、协同联动的培育体系,从

而影响担当精神培育效果。首先,部分家庭和高校之间缺乏稳定、顺畅的沟通机制。双方在大学生担当精神培育方面的互动多处于临时性、问题导向状态,通常仅限于在大学生出现严重问题时才进行联系。这种片段化、应急型的沟通模式,难以实现对大学生成长过程的持续关注与动态引导,无法形成家校共育的持久合力。其次,部分高校与社会尚未形成培育合力。社会资源缺乏与高校的深度合作和协同机制,也未能与高校的教育目标和课程设置形成有效的衔接,使得学生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时,难以获得有针对性和指导性的教育体验,进而影响担当精神培育效果。最后,部分家庭与社会未能建立起有效的培育联动。部分家庭教育观念仍滞后于时代要求,过度保护孩子,不愿让其参与社会实践、接受艰苦锻炼,致使孩子缺乏真实社会情境中的磨炼与认知,也不利于其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的提高。

其四,大学生参与担当精神培育意愿不强。当前,高校对担当精神的培育仍主要依托思想政治理论课这一主渠道,部分学生出现参与意愿不强、学习态度被动等现象。具体表现为,在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的“抬头率”与“开口率”普遍偏低,多数大学生处于被动接收状态,缺乏主动提问、参与互动和深度研讨的积极性。部分大学生的学习行为呈现较强的功利导向,参与课堂活动往往是为了获取考试分数或完成作业等外在动机,而非源于对担当精神内涵的真正认同或自我成长的需求。这种工具性与被动性并存的学习状态,导致大学生对担当精神的理解停留于表面,难以实现深层次的价值内化与持久的行为转化。此外,由于部分学生对担当精神的时代内涵、价值意蕴及实践要求的认知存在一定局限甚至偏差,未能全面把握其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及个人成长之间的深刻关联,因此在面对集体责任与社会使命时,往往缺乏主动担当的自觉意识和行为动力。

(三)新时代大学生担当精神培育问题产生的原因

目前,大学生担当精神培育存在一些不

足,只有精准地识别和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才能提出具有针对性、切实性的策略,从而有效地提升大学生担当精神。

其一,大学生缺乏担当精神的主体自觉。一方面,担当认知水平较低。从现实状况看,新时代大学生的个性特点突出表现为“自我价值凸显,注重个人利益”^[9]。一些大学生认为担当精神只体现在对自身和对家庭层面上,对社会责任与国家担当缺乏足够的认知。另一方面,践行担当的自觉性不足。在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时,部分大学生逐渐呈现“佛系”心态,表现为对竞争与挑战的主动回避,倾向于选择“躺平”甚至“摆烂”,在学业、社会实践与个人发展中缺乏进取意识和拼搏动力。这种消极的心理状态不仅削弱其主动追求目标的意愿,更在深层上侵蚀担当精神的形成。他们往往不愿承担责任、回避矛盾与困难,缺乏迎难而上、主动作为的内在驱动力,最终导致在个人成长与社会参与中行动力不足,难以真正践行新时代青年应有的使命与担当。

其二,家庭教育理念与教育方式存在问题。一方面,部分家庭的教育理念存在问题。家长过于关注孩子的学业成绩和智力发展,而忽视了对孩子道德品质、情感需求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在面临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矛盾时,部分家长更注重子女的自身利益,这种教育理念可能导致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形成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观,缺乏对他人和社会的关心与责任感。另一方面,部分家庭的教育方式存在问题。有的家长在教育过程中采取“独裁型”教育方式,不注重启发孩子的独立思考和自主判断。有的家长在教育过程中运用“溺爱型”教育方式,对孩子的行为和需求缺乏合理的限制和规则。成长于溺爱型教育方式下的孩子,往往缺乏责任感和自我调节能力。

其三,学校教育模式和评价机制尚不完善。一方面,受传统教育模式的制约较为明显。现阶段我国高校教育模式普遍以教师主导的单极化课堂教学为主,这种模式过于强调教师的主导地位,拉大了师生之间的距离。尤

其对于担当精神这类重在价值认同和行为践行的素养培育,仅依靠脱离现实生活与社会情境的课堂理论讲授,难以使学生产生深切共鸣和价值内化。另一方面,教学评价机制存在明显局限。部分高校简单套用基于学分制的量化评价体系来衡量担当精神的培育成效,过度侧重结果性评价而忽视过程性与发展性评价。这种“唯分数化”倾向不仅难以真实反映学生价值观与行为素养的成长,反而可能强化功利学习动机,限制学生自主发展与深层参与,最终对担当精神的培育产生不利影响。

其四,社会不良思潮广泛传播。当前,全球范围内的思想潮流不断交流、融合和碰撞,多元化价值观的冲击也对大学生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一些西方国家凭借其在互联网技术和文化娱乐产业中的优势,向世界各国传播自由主义等资产阶级价值观念,妄图使他国人民尤其是青少年群体认同其价值观念。此类文化渗透往往具有隐蔽性和长期性,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受众的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辨析复杂信息和抵制错误思潮的能力尚显薄弱,容易受到这些极端思想的蛊惑,功利化倾向明显,而在一定程度上淡忘了对集体、社会和国家应负的责任与使命,其所承载的担当意识与奉献精神也可能随之弱化。

三、新时代大学生担当精神培育的优化路径

新时代大学生担当精神培育是一项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只有通过个人、家庭、学校以及社会等多方面的有机融合与共同发力,构建全方位的培育共同体,才能优化新时代大学生担当精神培育路径,实现最佳育人效果。

(一)提高个人对大学生担当精神培育的主体性作用

在担当精神的培育过程中,大学生自身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其主体能动性的发挥直接影响培育成效。因此,大学生应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理论学习和实践锻炼不断提升自我,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

斗的新时代好青年。一方面,强化知识学习,增强担当本领。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表示:“要勤于学习、敏于求知,注重把所学知识内化于心。”^[4] 当今时代,知识更新不断加快,各种新知识、新事物层出不穷,大学生须主动学习前沿科学文化知识,不断拓展认知边界、优化知识结构,应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和舍我其谁的使命感,全面提升综合素质与专业能力,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筑牢根基。另一方面,立足实践活动,践行担当行为。培育大学生的担当精神,归根结底是为了将这种内在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实现从认知到行动、从理念到实践的转化。脱离了实践活动,担当精神就是空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知行合一、真抓实干,做实干家。”^{[10]521} 大学生不仅要从理论层面深入探究担当精神的内涵与价值,更需要将这种理论认知付诸实际行动,将担当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真正实现知行合一。具体而言,在校园中,大学生要积极融入班集体,参加社团活动和志愿服务,提高自身的组织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和责任感;在家庭中,应以体贴关怀和实际行动回报父母,营造和谐温暖的家庭氛围;在社会中,主动参与各类社会公益志愿服务活动,在实践中锤炼意志品质、提高担当精神和奉献意识。

(二) 强化家庭对大学生担当精神培育的基础性作用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也是个体价值观念和行为习惯形成的起点,在大学生担当精神培育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一方面,家长应转变传统教育观念。当前,我国家庭教育中仍普遍存在“唯分数论”“重智轻德”的倾向,学业成绩往往被当作评价孩子的首要甚至唯一标准,这种片面认知极易忽视包括担当精神在内的综合素质培养。家长应从孩子全面发展和长远成长的需要出发,将担当精神的培育纳入家庭教育中。具体而言,应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与发展自主性,在适当范围内赋予其选择与决策的权利。例如,在孩子面临关键抉择时,家长可提供多元选项并引导其分析利弊,最终支持孩子自主做出决定,以此

锻炼其判断力和责任意识。同时,应在日常共同生活中强调家庭责任共担,鼓励孩子积极参与家务劳动、关怀体贴长辈与其他家庭成员,从真实、细微的家庭互动中培育担当精神。另一方面,家长应积极发挥担当榜样示范作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11] 家长的言谈举止、价值选择和道德素养,对孩子具有深远持久的影响。家长应以身作则,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充分发挥言传身教的作用,通过生活中的细微小事引导孩子树立责任意识,强化担当精神。例如,在家庭中敬老爱幼,相互尊重帮助;在工作中尽职尽责,恪守职业道德;在社会中遵纪守法,履行责任义务。这种持续而稳定的正面示范,能够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孩子的担当精神。

(三) 夯实高校对大学生担当精神培育的主导性作用

高校是大学生成长成才的主要场所,也是大学生担当精神培育的主阵地。一方面,丰富担当精神培育的方式途径。其一,推进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强化课程育人功能。思政课教师应根据每门课程的特点,将担当精神培育融入教学设计各环节,增强教学的针对性和感染力。专业课教师应从学科特色出发,深入挖掘寻找担当精神元素,让学生在专业学习的同时又能够接受担当精神培育。其二,拓展担当精神培育的实践载体。高校应整合校内外实践资源,组织学生赴革命纪念馆、历史博物馆、红色遗址等教育基地进行实地研学,强化历史教育与精神传承。同时,应充分发挥第二课堂育人功能,通过主题教育活动、社团实践、项目学习等多种形式,营造崇尚担当的校园文化氛围,促进学生深刻理解并自觉践行担当精神。另一方面,完善担当精神培育的顶层设计。其一,发挥高校党委的核心领导作用。高校党委应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切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制定大学生担当精神培育的实施细则,确保正确政治方向和育人导向。其二,加强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教师的言行举止

和道德风范,会对大学生担当精神的形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锻造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新时代教师队伍。其三,强化高校后勤管理服务的育人功能。后勤部门是高校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充分挖掘高校后勤工作中蕴含的育人元素,将担当精神培育融入日常服务与管理。例如,通过开展“光盘行动”引导大学生节约粮食、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在宿舍园区组织志愿服务、文明创建等活动,增强大学生对社区环境的责任意识和归属感。

(四)发挥社会对大学生担当精神培育的保障性作用

人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存在,大学生担当精神的培育也必然深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社会各界应协同配合、多措并举,共同为大学生担当精神培育营造健康向上的环境氛围。一方面,加强网络空间法治化管理,营造清朗网络环境。网络空间的虚拟性、开放性和匿名性特征,使得各类信息良莠不齐,极易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形成冲击。必须依法加强网络治理,构筑有利于大学生健康成长的网络生态。其一,国家应加快完善网络媒体运营与信息传播相关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严厉打击各类网络违法违规行为。其二,政府应强化对大学生网络行为的监管与规范,依法处置违法行为,引导学生养成依法上网、文明用网的良好习惯,自觉规范网络言行、恪守网络道德。其三,政府要强化网络实名制的管理措施,增强大学生的网络主体责任意识,帮助其提高信息辨别能力,自觉抵制谣言和不实信息,理性参与网络交流。另一方面,充分依托社会传播媒介,广泛弘扬担当精神。在当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新媒体平台已成为培育大学生担当精神的重要载体。利用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介广泛传播担当事迹与榜样模范,有效扩大担当精神的传播覆盖面与社会感召力。各类官方媒体和教育平台应主动设置相关议题,定期推送反映担当精神的典型事例

和动人故事,以生动叙事强化价值引领,增强担当精神的培育感染力。此外,还可以积极建设面向大学生群体的主题网络社区,如开设“担当精神”论坛、专题讨论区等互动平台,鼓励大学生围绕相关话题展开交流、分享与实践反思。这类开放式的参与机制不仅有助于同龄人之间的思想碰撞与经验借鉴,也可实现自我教育与共同体教育的良性互动,从而提升担当精神培育的实效性和持久性。

[参考文献]

- [1] 万俊人.现代西方伦理学史:上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 [2] 习近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6.
-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
- [4]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5-03(2).
- [5]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 [6] 连续8年调研显示,我国大学生社会责任感持续上升[EB/OL].(2022-12-27)[2025-04-27]. https://edu.gmw.cn/2022-12/27/content_36261611.html.
- [7] 沈壮海,刘晓亮,司文超,等.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2022[R].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 [8] 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9] 万美容,胡咚,曾兰.论影响90后大学生思想行为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基于湖北省90后大学生思想行为特点实证研究结果的分析[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3(24): 20-24.
- [10]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1]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8-08-11(1).

(责任编辑 光 翟)

智媒时代青年寻求“情绪价值”的表现 样态、成因及因应之道*

郭佳楠^{1,2}

(1. 亚洲理工学院发展与可持续性学院, 泰国巴吞塔尼 12120;
2.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2)

[摘要] 在智媒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 青年群体日益倾向于在数字媒介中寻求“情绪价值”, 这一现象已成为网络文化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社会心理趋势。“情绪价值”的走红, 主要受到青年个体在“我者”视域中的内在心理诉求与“他者”层面的媒介价值塑形与算法推演机制等因素的影响, 并由此带来了诸如“搭子文化”“表格式婚恋”“数字狂欢”的表现样态。为此, 应当以理性审视流量时代, 针对流量至上进行“祛魅”; 以真诚树立处世准则, 提高人际交往的深厚度; 以价值引领算法逻辑, 夯实主流意识形态阵地, 构建系统性的回应路径, 实现青年网络心理健康发展与数字公共空间的良性运行, 力图为智媒环境下青年群体健康成长与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借鉴。

[关键词] 智媒时代; 情绪价值; 青年群体; 算法机制; 主流意识形态

[中图分类号] D66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4-0040-08

近年来, “情绪价值”作为一个现象级词语迅速走红, 成功激发了青年群体的共鸣并促使其成为热议焦点。在《咬文嚼字》杂志公布的2025“年度十大流行语”榜单中, “情绪价值”位列其中, 彰显了其作为时代情绪认知与社会心态变迁代表性符号的重要地位。在“智媒”迅猛演进的时代语境中, 以大数据、算法推送、情感计算与人机交互为特征的新型传播生态日益塑造着青年一代的情感表达与心理需求模式。相较于传统媒介以信息传递与认知导向为核心的功能逻辑, 智媒平台更倾向

于满足用户的个体化心理诉求与情绪体验, 形成“注意力—情绪—参与”的媒介互动闭环^[1]。在这一过程中, 青年群体日益表现对“情绪价值”的高度依赖, 他们通过弹幕文化、共鸣短视频、虚拟陪伴主播、AI互动角色等方式, 积极寻求情感理解、身份认同与心理慰藉, 折射出其在数字化社会中日渐突出的情感倚赖与精神寄托诉求。然而, 情绪价值的泛化满足虽为青年提供了即时性“情绪滋养”, 却也可能诱发心理韧性弱化、人际交往疏离、情感茧房形成等深层隐忧。情绪表达与回应的高

*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高校思政课研究专项“法治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流程优化研究”(项目编号: 21VSZ031), 郑州工商学院科研创新项目“基于ChatGPT类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红色文化传播现状与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2023-KYZD-01), 2023年度郑州工商学院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重点项目“中国特色工匠精神视域下民办高校大学生创新能力培养策略研究”(项目编号: GSJG2023003)。

[收稿日期] 2025-09-05

[作者简介] 郭佳楠, 男, 河北邢台人, 亚洲理工学院发展与可持续性学院博士研究生, 中国人民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学生研究员。

度可视化与算法逻辑化,在提升用户沉浸感与归属感的同时,也嵌入了平台利益驱动、情绪操控与社交过滤等风险因素,逐渐重塑着青年的情感结构与价值判断模式。

当前,关于“情绪价值”在青年媒介使用行为中的作用机制,已引发新闻传播学、社会心理学、青少年研究等领域的广泛关注。相关研究主要围绕“智媒平台如何承载与重构情绪价值”“青年个体如何在数字交往中建构情感认同”以及“情绪价值的正负效应”三个维度展开,体现研究路径的多元化与问题意识的逐渐深化。在研究主题方面,学界普遍将“情绪价值”视为青年使用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智媒工具的核心驱动之一。如晏昱凌指出,青年在算法环境中形成了“情绪参与—内容偏好—社交反馈”的互动链条,而情绪价值成为其媒介黏性的关键支点^[2]。许亨洪则将其置于“算法情绪政治”的框架中,认为青年在智媒空间中的情绪表达与共鸣行为,实质上被平台逻辑所牵引,表现为高度的结构化与情绪模板化^[3]。在理论视角方面,已有研究主要运用情绪社会学、媒介使用与满足理论、数字身体观与沉浸理论等视角解释青年情绪价值的来源与作用。例如,从情绪社会建构论出发,廉思认为数字平台放大了青年情绪的公共性,使得“可被看见的情绪”成为新的社会资本^[4]。在研究范式方面,已有文献多采用质性访谈、平台内容分析、问卷调查与数字民族志等方法,重点呈现青年如何通过弹幕互动、点赞评论、算法推荐等途径建构微型情绪共同体。如潘佳欣通过对B站UP主“树洞类视频”的分析发现,青年往往在平台互动中获得“被理解的感觉”,进而形成高度的心理认同^[5]。值得关注的是,当前研究虽在现象观察与初步理论构建方面取得一定成果,但仍存在若干不足:其一,部分研究过于聚焦于媒介技术的“赋能”面向,忽视了平台算法对情绪价值获取过程中的异化机制;其二,缺乏对青年群体内部差异(如性别、阶层、城乡)的分层研究,导致青年主体被笼统概括;其三,尚未形成关于“情绪价值寻求”风险干预路径的系统性

框架,政策导向性与实践指导力不足。综上,智媒时代青年寻求情绪价值的研究已从感性描述迈向机制剖析与风险反思的阶段。作为一个主观性强、难以量化的概念,关于“情绪价值”的解释是因人而异的。然而,一些理解误区的出现,却让这个词走了样、变了味。如何避免陷入迷信“情绪价值”的泥沼,掌握“情绪价值”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鉴于此,深入剖析“情绪价值”的症候、成因,继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引导策略,为青年构建积极向上的精神生活模式,不仅关乎个体福祉,也对促进社会物质丰富和精神富有具有长远意义。

一、智媒时代青年寻求“情绪价值”的表现样态

在智媒技术高度发展的当下,青年群体的情绪表达与价值获取方式正经历深刻变革。特别是在以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和智能推送算法为代表的“智媒生态”中,青年越来越倾向于通过即时互动、情绪共鸣与虚拟陪伴来构建心理认同与社会联系,“情绪价值”逐步成为其媒介使用的核心诉求之一。这种现象不仅反映数字时代下青年内在心理需求的嬗变,也揭示媒介技术深度嵌入青年日常生活所带来的文化意义与社会影响。厘清其具体表现样态,是深入理解“智媒—青年—情绪价值”这一复杂互动机制的关键路径,有助于建构更具引导性和回应性的青年社会化支持体系。

(一)“搭子文化”——“工具属性”引发社交降级

在智媒时代语境中,“搭子文化”作为一种快速兴起的青年亚文化现象,表现出青年群体在追求“情绪价值”过程中对社交关系的工具性重构。所谓“搭子”,原意为临时的结伴者,泛指在特定情境中因共同目标而短暂结盟的社交对象,如“饭搭子”“运动搭子”“通勤搭子”“旅游搭子”等。与传统基于情感深度、人格契合建立的人际关系不同,搭子关系往往以明确需求为前提,缺乏情感积淀与责任承诺,更多呈现“即用即走”“伴随即弃”的弱关系特征。这种社交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青年

的情绪陪伴、社交慰藉与交互认同需求,但也反映青年在复杂社会环境中对低成本、低风险交往模式的倾向性选择。

搭子文化的盛行首先源于青年面对现实社交压力时的心理逃避机制。在快节奏、高竞争的社会语境中,青年常常面临情绪压抑与精神孤岛的问题,而“深交焦虑”“关系成本高”成为阻碍其建立稳固人际关系的重要障碍。搭子关系恰恰在“浅交维度”中构建了某种可控而舒适的交往边界,既无须承担亲密关系中的情感劳动,也能部分填补孤独感与社交缺失。例如在小红书、微博等平台上,“找饭搭子”“看展搭子”等需求帖频繁出现,青年通过算法撮合或兴趣社群迅速完成匹配,既减少了传统交友的试错成本,也获得了短时段内的“陪伴感”。然而这种社交结构的便捷性也带来深层问题:当关系更多由功利目标驱动,“情绪价值”便转向即时消费,关系难以沉淀,导致社交降级、关系疏离等后果。

更进一步,搭子文化的扩展性与平台算法逻辑密切相关。当前各类社交平台通过个性化推荐与兴趣标签系统,为青年用户不断生成可能的“搭子”选项,从而促进用户黏性与流量留存。这一过程强化了青年将他人视为满足某种特定功能的“工具人”的倾向,淡化了人与人之间应有的伦理联系与情感责任。尤其在平台“关系可替代性”算法推动下,搭子之间的情绪联结逐渐商品化与表演化,情感共鸣变为算法“兴趣匹配”结果,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交往逐步被算法引导下的“结构性亲近”所替代^{[6]55-61}。例如,一位“旅行搭子”可能只是为了分摊住宿费用而非真正的友谊建立者,青年在短暂“组队”与“解散”的循环中逐步形成关系退化的心理习惯,久而久之更难进入稳定、深度的情感关系圈层。

(二)“表格式婚恋”——数字化的“门当户对”

在智媒时代的婚恋场域中,“表格式婚恋”作为一种典型的青年情绪价值寻求路径,逐渐显现日益程式化与工具理性的特征。所谓“表格式婚恋”,是指青年群体在婚恋过程

中,借助各类婚恋平台、社交软件或相亲活动,将择偶条件以表格化、指标化的方式进行列举、评估和匹配。这种“数字化的门当户对”,不再完全依赖于线下情感交往与主观判断,而是转向数据驱动与算法排序,强调学历、收入、房产、户籍、颜值等“硬性指标”的匹配程度。其底层逻辑是将情感交往对象“格式化”为一种可以被量化、比对、过滤的“择偶资源”,以期在最短时间内实现最优“性价比”的关系配对。这种做法虽然表面上提高了婚恋效率,降低了情感试错成本,却也深刻反映了青年在情绪不确定性加剧背景下对“情感稳定性”和“情绪确定性”的急切追求。

同时,“表格式婚恋”的兴起是技术媒介逻辑介入私人生活的重要体现,也是青年情绪价值结构变化的集中表现。在传统的婚恋逻辑中,情感体验、交往过程与心理契合往往是选择伴侣的重要因素,但在“表格式婚恋”中,这些非结构化的“软指标”被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清晰量化的“硬条件”。这与当前社交平台、婚恋软件采用算法推荐的机制高度一致。大数据精准推送之下,用户越来越依赖于平台的标签化筛选与系统画像,如“学历 985 以上”“年薪 30 万起”“北京有房无贷款”等设定被视为情感关系的“起点门槛”,而不是交往中逐渐了解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模式看似减少了情感波动带来的不确定性,实际上却削弱了婚恋关系中“深层沟通”“共同成长”“心理支持”等传统的情绪价值获取路径,使情感关系更趋向工具理性化。

本质上,“表格式婚恋”所反映的情绪价值诉求,其实质是对安全感、确定性和社会认同的集体追索。一方面,当前就业压力大、经济焦虑普遍、代际贫富差距拉大,使得青年在构建亲密关系时更加看重经济基础与社会资源的匹配度;另一方面,社交平台构建的“信息茧房”与“比较视角”,加剧了青年之间的心理攀比与择偶焦虑。在这一背景下,以“表格化标准”界定恋爱与婚姻对象,成为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它将原本复杂多变的人际互动简化为冷静可控的逻辑判断,试图用数字背书来减

少情感风险,从而获得相对稳定的心理预期。但这也容易导致择偶过程异化为“情绪价值的资本化交易”,将关系的本真与情感的温度消解于层层条件之间。

(三)“数字狂欢”——社会原子化的信息茧房

在智媒技术与社交平台高度融合的当代,青年群体的情绪表达与价值诉求日益倾向于“数字狂欢”式的集体共鸣与个体释放。这种现象,是“社会原子化”在数字媒介条件下的显性延伸。个体在现实人际网络中因社交隔阂、心理负荷等因素趋向内卷与封闭,通过短视频平台、弹幕文化、虚拟社区等形成某种“去身份化”的即时联结机制,满足其情绪投射、归属感与表达欲望。“数字狂欢”表面上是热闹的参与行为,实则是一种信息“茧房”中的孤独共振。

一方面,“数字狂欢”强化了青年在情绪表达上的即时性与符号化倾向。在短视频、直播、社交媒体的场域中,青年以“点赞—转发—评论”等低门槛方式表达自身情绪,使用“热梗”“表情包”“无语文学”等轻量化手段获取认同感。这种高度符号化的交流形式,使个体能够在碎片化信息中迅速找到“情绪同温层”,但也容易流于情绪化表达的肤浅与重复,难以形成深层共鸣与建设性互动^[7]。例如,一条关于“打工人”生活压力的视频引发千万次转发,并配以“太真实了”“心疼自己”等评论,展现青年将苦闷情绪转化为群体共鸣的能力,但这种共鸣往往是短暂和功利化的。

另一方面,“数字狂欢”助推了信息接收的单向性与偏向性,使青年愈发沉浸在算法推送所构建的“情绪茧房”中。平台依据用户点击、停留时长等行为画像,推荐同质化内容,从而形成一个强化既有情绪、过滤异质观点的信息环境。青年在这一环境中更易受到感性叙事、情绪煽动、极端表态的影响,逐渐形成自我封闭的认知空间^[8]。譬如某些平台推送关于“职场内卷”或“社会不公”的内容时,通过剪辑、滤镜、背景音乐等形式将悲观情绪放大,使青年逐渐将“情绪代入”误认为现实判断,在

虚拟狂欢中形成非理性情绪共振。

二、智媒时代青年寻求“情绪价值”的成因分析

在智媒时代,青年群体对“情绪价值”的强烈渴求,已成为其社交选择、生活方式乃至身份建构中的显著特征。情绪价值的“数字化消费”,既是青年自我疗愈的一种路径选择,也反映其在数智空间中寻求“意义的再生产”和“关系的再连接”的心理动因。因此,厘清其背后的成因逻辑,既是回应青年内在精神诉求的关键环节,也是重构青年成长支持体系、完善智媒时代社会情绪治理机制的重要前提。

(一)我者:青年寻求“情绪价值”的内在逻辑

在智媒时代,青年个体“我者意识”的强化,使其在面对社会复杂性、交往异质化与价值多元化时,愈发倾向于通过对“情绪价值”的主动捕捉来确认自身存在与情感安全。所谓“我者”,是指青年个体在数字语境中对“自我”与“意义”的重构,它并非传统意义上稳定的身份认同,而是一种不断流变、充满互动性的自我生成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青年对“情绪价值”的渴求,逐渐成为其心理驱动力、社交选择与生活实践的重要基础。

首先,青年个体对情绪价值的需求源于现实语境中情感资源的相对贫乏与社会支持系统的断裂。当下青年处于“高压力、高竞争、低连接”的社会结构中,情感表达空间有限,心理慰藉机制滞后,促使他们更依赖于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和兴趣社区等智媒渠道来完成自我情绪的确认与释放。据《中国青年研究》2023年发布的一项针对18—35岁青年的情绪价值需求调研显示,超过76.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经常通过网络获取情绪共鸣”,其中53.7%的人认为“日常生活中难以获得理解和回应”^{[9]56}。这一现象表明,当传统人际关系无法为个体提供充分的情绪滋养时,智媒空间便成为其“替代性亲密”的情感栖息地。在数字媒介中,他们可以通过匿名性与即时性建立临时关系,获得同理、认同与陪伴,从而在虚拟

共情中重建“我”的存在感与价值感。

其次,“情绪价值”成为青年个体建立自我叙事与自我认同的关键节点。在一个不断数字化的社会中,“身份”不再由物理现实中单一的社会角色决定,而是通过多平台、多维度的数字轨迹进行“再建构”。在B站、微博、小红书等平台上,“emo日记”“情绪vlog”“压力发泄式剪辑”等内容屡见不鲜,构成一种“我者叙述”的新型表达范式。2024年《社交情绪表达蓝皮书》数据显示,约65%的Z世代用户在社交平台上发布过“仅展示给特定人群”的情绪内容,而这些内容平均互动率比普通内容高出23.6%^[10]。这表明青年个体通过“发布—互动—反馈”的机制,在数字空间中完成情绪的公开化与个体意义的确认。“我情绪、故我在”,情绪价值不仅被消费,更被生产为自我存在的象征与证明。

最后,青年对“情绪价值”的寻求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对“现实压抑”的反动,是其在现代性焦虑中的自我修复机制。现代社会的制度密度与绩效导向强化了外在评判标准对个体的规训,导致青年群体普遍陷入“努力—否定—自责”的情绪漩涡。2023年清华大学心理系发布的《青年心理安全指数报告》指出,有接近62%的青年曾在近三个月内感到“孤独且无意义”,其中42%的人坦言“希望能在网络中被无条件理解一次”^[11]。这一现象不仅是情绪缺口的体现,更是青年“我者”渴望获得尊重与价值的深层表达。在这种语境中,情绪价值不仅是一种短时的慰藉,更是一种“意义的回收机制”,它让青年在被体制、市场与社会结构异化的过程中,依旧能够在微小的互动与理解中寻找自我重塑的锚点。

(二)他者:“情绪价值”流行的价值基础和媒介环境

他者指的是那些不同于自我或不属于自我认同群体的人或事物。这个概念不仅仅是字面上指代除我之外的任何个体,更重要的是,它涉及社会构建的身份差异、文化差异、权力结构以及如何通过这些差异来定义和理解自我。他者在“情绪价值”流行的过程中,既

是价值的共同创造者,也是接受者,通过社交互动和媒介环境的催化,形成了情感共鸣的社会网络。在智媒时代背景下,青年群体对“情绪价值”的诉求并非孤立生成,而是在特定社会文化价值取向与媒介环境共同建构中愈发凸显。“他者”因素,既包括以社会集体共识、文化价值观为代表的宏观结构,也涵盖以媒介平台算法、信息机制为支撑的传播生态系统。青年之所以广泛追逐“情绪价值”,既有外部文化导向的潜移默化影响,更受制于技术驱动下的内容呈现逻辑与沉浸体验机制。探究这一现象,必须跳脱个体心理视角,转而审视更深层的社会价值趋向与媒体逻辑。

首先,社会价值导向的情感审美化转向为“情绪价值”流行提供了文化土壤。近年来,中国社会在快速发展中伴生出一定程度的焦虑、压抑与身份困惑,尤其在青年群体中呈现较强的共鸣需求与归属焦灼。在主流语境中,“正能量”“治愈系”“松弛感”等概念频繁涌现,代表着当代社会对温情、理解、陪伴等情绪资源的高度需求。从短视频平台“人民日报”推出的“人民热评”,到B站用户自发制作的“早安治愈视频合集”,再到微信视频号中的“陪伴型内容”日益火爆,情感被“审美化”地包装、消费,并逐渐构成一种新的价值表达方式。据《2024青年内容消费报告》显示,近67.3%的年轻用户更偏好观看“能够共情”的内容,而非仅具信息量或知识性的视频^[12],这一数据直接反映青年价值偏好的结构性演变。

其次,平台机制推动“情绪价值”内容的流量集中与情绪放大。以算法为驱动的内容推荐机制本质上偏好高互动、高停留率的内容,而“情绪价值”类文本往往具备较强的感染力、代入感与共鸣度,因此成为平台重点推送对象。在抖音平台上,以“听你说话真舒服”“和你在一起好安心”等标题命名的短视频点赞数通常超10万;小红书上“自我治愈”“孤独自洽”相关笔记平均互动数为平台平均值的3.8倍,形成典型的“情绪引爆—算法放大—用户沉浸”循环链条^[13]。这种平台驱动的内容推送并非中立客观,而是强化了以“感

受为本”的内容生产逻辑,使情绪导向内容成为传播主流。“情绪价值”的受追捧,不仅是用户需求的映射,更是平台生态选择的结果。

最后,媒介技术的虚拟现实化特征塑造“沉浸式情绪体验”的新场域,为青年感知“情绪价值”提供了极大便利。随着AI合成技术、虚拟偶像、元宇宙空间等逐步商业化与平台化,青年可以在数字世界中重构社交关系与情绪对象。例如“陪伴类AI”如Replika、Glow、夸夸机器人等,借助自然语言处理与情绪识别技术,为用户提供情绪回应、情感模拟甚至角色扮演式对话,这些技术本质上将“情绪价值”标准化、量化并算法化地推向用户。在2025年《青年数字陪伴指数报告》中,63%的受访青年表示“愿意将AI情感陪伴作为减压方式”,并有42%表示“曾对虚拟人产生情感依赖”^[14]。技术介入与媒介呈现深度融合,正在形成一种“拟态情绪满足”的新型文化消费结构,从而将“情绪价值”外化为一种可消费、可量产的社交产品。

三、智媒时代青年寻求“情绪价值”的因应之道

在智媒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下,如何有效回应青年情绪诉求,缓解由情绪孤立和社交碎片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已成为社会治理、教育引导与技术创新的紧迫课题。因此,深入探讨智媒时代青年寻求“情绪价值”的因应之道,既是回应青年精神诉求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数字社会和谐发展的关键举措。

(一)以理性审视流量时代,针对流量至上进行“祛魅”

在当下流量经济主导的数字媒介环境中,青年群体的情绪表达和价值追求常被平台的算法推荐和内容生产机制所裹挟,形成了以“流量至上”为核心的内容生态。这种生态虽满足了青年快速获取情绪共鸣的需求,但也助长了情绪的极端化、碎片化和同质化,导致青年沉浸于情绪泡沫和信息茧房,阻碍了理性思考和深度交流。针对这种现象,必须以理性的态度审视流量时代的特征,通过“祛魅”流量逻辑,帮助青年认清背后的商业驱动与内容制

造机制,促使其建立更加健康和批判性的内容消费观。

提升青年媒介素养是理性“祛魅”的关键环节。教育系统和社会机构应广泛开展针对流量算法原理、内容生产逻辑和传播影响的教育普及,帮助青年理解流量背后的商业目的和情绪操控技巧。通过案例分析和互动讨论,让青年识别和反思那些故意放大负面情绪、制造焦虑与极端观点的内容,从而避免被短暂的情绪刺激所左右。营造理性表达与多样化价值传播的舆论环境,鼓励青年主动筛选多元且高质量的信息资源,提升其在数字空间中的自我调节能力和心理免疫力。与此同时,媒介素养教育应贯穿于家庭、学校和社区,形成全社会支持的理性消费氛围。

同时,平台治理在“祛魅”流量至上的过程中承担重要责任。平台需构建和完善内容审核机制,不仅依赖算法自动过滤,还应结合人工干预,精准识别和遏制极端情绪煽动、低俗炒作和虚假信息。加强对情绪导向内容的风评估,对可能引发用户极端情绪反映的内容实行降权和限流,有效降低其流量曝光率。同时,推动算法透明化,向社会公开推荐逻辑与规则,接受外部监督,防止“流量陷阱”对青年情绪造成过度操控^[15]。平台还应积极扶持多样化、积极向上的情绪表达内容,促进社区生态多元健康发展,为青年提供更丰富的情感滋养选项,避免情绪生态的单一化和固化。

(二)以真诚树立处世准则,提高人际交往的深厚度

在智媒时代的互动逻辑中,交往日益趋于即时、轻盈与碎片化,青年群体在追求“情绪价值”满足的过程中,也逐渐显露人际交往表层化、工具化、功利化的趋势。情绪的表达和回应被算法塑造成流量工具,而情感的传递与回馈则在层层“点赞”与“评论”中日渐稀释。要缓解这种表层互动所带来的内耗感与虚无感,亟须回归“真诚”作为人际交往的核心准则,从而提升关系的情感厚度和交往质量,使青年在社会化过程中建立起稳定、温暖且有意义的情感联结。

要在实践中实现真诚交往,应当围绕“构建真实表达空间、增强情感投入、培养共情能力”三个维度推动路径优化。构建真实表达空间,意味着青年要跳脱出“完美人设”的社交陷阱,敢于表达真实自我、展示脆弱情绪。在社交平台上,当前已兴起一类“去滤镜运动”,用户主动分享生活中未修饰的瞬间,传递生活原貌的情绪温度。例如,小红书中“真诚博主”标签的兴起,使得用户更愿意关注那些真实、有情绪波动、有成长烦恼的人,而非千篇一律的“精致生活模板”。增强情感投入,则是指在交往中投入时间与心理能量,如在朋友生日时送上走心手写卡片、在关系中愿意倾听与理解彼此的情绪脉动。这种“高质量陪伴”比频繁点赞更能稳固情感纽带。培养共情能力,强调青年在交流过程中理解他人的情感需要、察觉对方的非言语情绪表达,并进行回应式互动,以形成深层的心理联结。这种能力的培养既可通过阅读文学作品、观看真实纪实类节目,也可通过参与志愿活动、社区合作等实践场域获得滋养。

推动真诚成为主流交往范式,还需社会系统形成引导机制。高校可通过开设“情绪素养”类通识课程,帮助青年理解情绪背后的心理机制与表达路径,并在课堂互动中培养真诚交流的氛围;媒体平台应当减少煽情性、戾气式内容的推荐权重,强化真实、温暖、具有人情味的叙事内容分发机制,引导青年认同真诚交流的价值;家庭与社区也要创造鼓励青年表达真实情感的包容环境,使他们从小便形成“真诚不是脆弱,而是一种力量”的情感认知。总而言之,真诚不仅是青年个体修养的体现,更是构筑社会信任与情绪联结的基石。在智媒时代的信息洪流中,唯有真诚才能穿透表象、抵达心灵,赋予人际交往以深度与温度,真正回应青年对“情绪价值”的内在渴求。

(三)以主流价值驾驭算法,夯实主流意识形态阵地

在智媒时代,算法技术已深度嵌入青年的信息获取与价值构建过程,成为情绪表达、社交互动与身份认同的隐形推手。面对复杂的

信息生态与情绪消费浪潮,亟须以主流价值观引导算法技术的应用与发展,建立有温度、有深度、有厚度的意识形态传播机制,从而重塑情绪价值的健康供给,筑牢青年思想根基,夯实主流意识形态阵地。

具体言之,应强化价值引领与算法优化的协同机制。一方面,需推动内容平台在推荐算法设计中嵌入价值优先机制,将社会责任导向与算法逻辑深度耦合,强化“正能量优先”“主旋律推荐”的排序原则。例如,哔哩哔哩推出的“青少年模式”便通过限制部分娱乐化内容与强化知识型内容推荐,有效提升了内容生态的育人属性。另一方面,要加强主流媒体与平台算法团队的协同治理,通过设立“价值导向编辑席”与“算法伦理评审机制”,实现价值筛选、传播策略与技术流程的深度融合,推动算法成为主流价值传播的“加速器”而非“稀释剂”。

同时,还应打造多元表达与青年共创的主流内容生态。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夯实不仅是理念输出,更是情感共鸣与话语互动的重构工程。面对青年多元化、圈层化、情绪化的表达诉求,应打破传统单向灌输式传播模式,打造多元共创、共鸣共情的内容场景。一方面,可推动主流媒体与高校青年社群、网络KOL协作,通过话题联动、内容共创等方式,培育“可参与”“可模仿”的正向传播事件,如央视推出的“青年说”系列短视频,以真实故事、直白语言引发青年自我表达与身份认同共鸣,在情绪维度撬动认知结构^[16];另一方面,需鼓励青年成为主流价值的“第二发布者”,通过搭建“青年主理人”计划、“高校思想领航者”项目等,让他们以主播、剪辑师、写手等角色参与主流内容生产,将价值理念转化为青年易于接受的叙事形态和传播形式,从而在生成内容中建立情感连接,在平台生态中激发正向循环。

在此基础上,构建制度保障与技术治理的双重支撑体系。主流意识形态能否在数字空间稳固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治理体系的法治化、专业化与系统化水平。一方面,应健全算法监管制度,推动《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

管理规定》等政策的落地执行,明确算法推荐中的价值责任边界,强化“黑箱算法”的透明性与可干预性。可探索设立“算法公共责任评估机制”,对主要平台在价值引导方面的成效进行定期评估与通报。另一方面,要推动“技术—制度—人”的系统协同,组建由传播学者、算法工程师、青年代表构成的算法伦理委员会,对涉及主流意识形态内容的分发逻辑进行审核与优化,从源头减少情绪化、极端化内容的算法放大效应。同时,在高校、社区中建设“数字素养教育”基地,通过开展“算法识读课”“价值表达工坊”等活动,提升青年识别、驾驭算法的能力,真正实现“以我为主”而非“被动被塑”,夯实思想防线。

总之,智媒时代“情绪价值”的流行既是青年应对复杂社会现实的一种适应性反应,也蕴含着深层的文化诉求与社会结构信号。唯有在媒介素养、文化认同、制度规制等多维力量的协同作用下,方能引导青年将情绪表达转化为情感共鸣、价值认同与公共参与的积极力量,实现从“情绪消费”到“情感成长”的深层跃迁,真正构建起数字社会语境中健全而充实的青年精神世界。

[参 考 文 献]

- [1] 陈振中.“情感体制”视角下大学生消费行为探析[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46-55.
- [2] 晏昱凌.JELLYCAT,当代年轻人离不开的“情绪搭子”[J].中国眼镜科技杂志,2024(9):46-47.
- [3] 许亨洪,伍玥.青年社交“搭子”的样态、成因及其引导路径[J].思想理论教育,2024(10):92-98.

- [4] 廉思.“搭子社交”:青年社交模式的新表征[J].人民论坛,2024(9):96-100.
- [5] 潘佳欣,朱琳.基于网络自嘲现象的青年精神生活审视[J].高校辅导员学刊,2024(4):45-50.
- [6] 戈夫曼.日常生活的自我呈现[M].冯钢,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 [7] 蒋建国.从“断亲”到“搭子”:青年网民的社交转向与情感纠葛[J].南京社会科学,2024(5):91-100.
- [8] 李强.政府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2025-03-13(1).
- [9] 哈尔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M].董璐,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
- [10] QuestMobile. QuestMobile2022Z 世代洞察报告[EB/OL].(2022-08-16)[2025-03-03].<https://m.tmtpost.com/6221458.html>.
- [11] 白彦泽.个性化品牌感知:探索 TikTok 病毒式迷因营销[J].国际品牌观察,2023(增刊2):116-118.
- [12] 林爱珺,何艳明.数字媒介依赖的新表征与伦理反思[J].学术研究,2022(5):54-60.
- [13] 曾一果.弹幕背后青年群体的情感需要与价值诉求[J].人民论坛,2021(10):34-37.
- [14] 聂立清,聂冠楠.迈向数字时代的青年圈层崇拜:生成机理、发展镜像与价值重构[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4):89-94.
- [15] 豆小红.“空巢青年”社会心理问题与应对[J].中国青年研究,2018(2):89-95.
- [16] 陆杰华,程子航,陈炫齐.人口高质量发展进程中青年发展型社会的理论探究[J].青年探索,2024(3):5-14.

(责任编辑 光 翟)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 生成逻辑与应对挑战^{*}

沈丹丹 柴义江 张小光

(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1168)

[摘 要]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的生成逻辑在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是第一推动力、高校思政课“供给侧改革”是重要内在驱动、落实高校思政课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是最终归宿。同时,也要看到当前面临着技术至上倾向削弱教师的主导作用、泛娱乐化思潮冲击思政课的主流价值和智能万能主义消解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挑战。为此,宜采取抓好人工智能培育、强化教师的价值导向作用、完善主流价值体系、提升思政课的思想引领力以及培养主体思辨意识、激发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等措施,确保人工智能在推动高校思政课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发挥着正能量效应。

[关键词] 人工智能; 高校思政课; 技术赋能; 立德树人

[中图分类号] G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4-0048-07

2019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贺信中指出:“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1]165}。伴随互联网技术革命的深入推进,促进人工智能与课堂教学的深度融合已成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的热点议题。2024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上,思政课建设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有新气象新作为”^[2]。这充分表明加强学校思政课课程的建设已成为新时代实现教育强国战略和完成立德树人使命的关键环节。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在各行业的深度渗

透,已催生出智能制造、智慧医疗、智能家居、智慧教育等新业态。作为兼具模拟人类思维与促进社会转型双重特性的技术驱动力,人工智能正成为推动各领域快速发展的核心动力,同时也为高校思政课的创新发展提供了全新思路与实践参考。在此背景下,将人工智能技术融入高校思政课有助于促进课堂教学模式转型,有效推动思政课的高质量发展,切实发挥其对培育时代新人的重要作用。

一、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的生成逻辑

当前高校思政课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需要借助人工智能的赋能,而人工智能与高校思

^{*} **[基金项目]** 2022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专项“人工智能视域下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研究”(项目编号:2022SJSZ0304),2022 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专项“党史教育融入高职院校思政课的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22SJSZ0307)。

[收稿日期] 2026-04-06

[作者简介] 沈丹丹,女,安徽池州人,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讲师,博士,上海师范大学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柴义江,男,安徽肥东人,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张小光,男,河南洛宁人,江苏经贸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政课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关系。

(一)人工智能的发展成为当前高校思政课建设的第一推动力

“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3]648}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的核心驱动力,其发展历程本质上是对人类认知能力与实践方式的延伸与重构。从其应用而言,教育领域已经受到了人工智能的深刻影响,在不同层面都做出了积极的应对。

其一,由于人工智能的发展使得大数据与知识图谱技术的突破,这就让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得以从传统的文本载体向多模态知识网络转化,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重要内容进行结构化处理与语义关联分析,构建起动态更新的知识图谱,既解决了传统教学中知识点碎片化的问题,又为个性化学习路径的生成提供了数据基础,从而不仅有助于大学生更好地学习相关的内容,还能进一步理解其背后的内涵。

其二,由于技术的不断更新发展推动了智能教学系统的升级,使得传统的课堂教学模式从早期的规则式问答系统发展为基于大语言模型的生成式交互平台,这就能够实时捕捉学生在课堂讨论和线上学习中的语言特征与认知偏差,通过情感计算与意图识别技术精准把握学生的思想动态,为教师提供学情分析报告与教学策略建议,实现了由经验驱动到数据驱动的教学范式转型。思政课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情况适时调整教学内容,真正解决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困惑,进一步强化教学效果。

其三,人工智能的发展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提高了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覆盖面。一方面,教师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搭建高校思政课云课堂,利用虚拟网络构建与教学内容相关的学习平台,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利用网络教学平台学习思政课。另一方面,随着虚拟现实以及增强现实等智能感知技术的不断融合应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高校思政课的虚实结

合,通过构建与教育内容相关的虚拟教学场景,使学生在具身认知中深化对理论的理解,这种由技术赋能带来的让学生身临其境的场景,使他们能够达到更深刻的认知。

(二)人工智能是高校思政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驱力

高校思政课“供给侧改革”作为重要内在驱动,其核心在于解决自身发展矛盾与需求的主动调适,通过对教育供给端的结构性优化,形成对人工智能的内在召唤与适配动力,构成人工智能赋能思政课生成逻辑中需求牵引的关键环节。从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情况来看,高校思政课跟其他专业课有着明显的区别,不仅要提供相应的知识内容,还要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而高校思政课面临的深层矛盾则体现在传统供给模式与新时代大学生需求之间的不匹配,这种矛盾的解决需要通过供给侧改革激活内生动力,人工智能则有望成为破解这一矛盾的关键工具。

具体而言,传统高校思政课内容多依托教材体系的静态化呈现,这样虽然可以保证教学内容的权威性和系统性,但同时也会陷入理论与实践断裂的困境。一方面,思政课内容必须紧跟时代的发展,而教材却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另一方面,学生对抽象的理论阐述感到难以理解,对现实问题的回应不够及时。这种供给与学生需求之间的错位阻碍了思政课的高质量发展。人工智能可以在此方面发挥积极作用,通过分析学生社交媒体和课堂讨论,识别他们的思想困惑和价值关注点,并利用知识图谱技术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时政热点、生活案例相结合,使教学内容更贴近学生需求,从教材逻辑转向问题逻辑,实现动态适配和精准供给,增强学生对思政课的认同感。

此外,传统高校思政课“认为教师是教育内容的传授者,因而只注重理论灌输,不注重教育方式”^[4]。但目前这样已经难以迎合现今“05后”大学生对互动性与沉浸式学习的期望,导致思政课堂的参与度和知识吸收效果不如人意。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有助于推动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场景重构。通过智能语音交

互系统,师生可实现即时问答和观点交流,而情感计算技术则能捕捉学生的细微表情和语音语调变化,从而调整教学节奏,实现课堂的双向互动。学生不仅能够深入参与思政课堂的学习与讨论,还能获得丰富的体验,从而实现从标准化输出到个性化体验的转变,推动思政课程的持续改革与创新。

(三)人工智能促进高校思政课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落实

早在2019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指出,“大力推进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提升思政课教师信息化能力素养,推动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思政课教学中应用,建设一批国家级虚拟仿真思政课体验教学中心。”^[5]这为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的发展提供了机遇。从本质上看,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既是技术革命对教育形态的重塑,更是教育回归“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6]28}这一根本问题的时代应答。唯有始终以立德树人为价值锚点,将技术创新与高校思政课教学的规律深度融合,才能让人工智能真正成为增强思政课理论性和亲和力的“助推器”,培养出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推动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要不断增强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7]382}

人工智能背景下可以构建师生与智能系统协同互动的教学机制,精准捕捉当代青年学生的思想特征与发展诉求,帮助教师有效提炼时代变革中的教育素材;同时还可以突破传统教学场所的物理限制,拓展教育实施空间维度,实现实体课堂与虚拟平台的有机衔接,推动教学模式的创新升级。

人工智能可以依托大数据分析技术以及智能学习平台,根据不同的学生知识掌握程度来推送与课程内容相关的分层任务,使得学生都能运用相应的理论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这种技术赋能不仅提升了知识传授的效率,更通过问题导向的探究式学习,培养学生运用马

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使立德树人从价值目标转化为可操作以及可评估的实践过程。同时,人工智能通过利用掌握的数据以及相关算法的协同,将立德树人的抽象目标转化为可感知、可测量的育人指标。如情感计算技术不仅能识别学生的认知难点,更能捕捉其价值困惑点,为教师提供相关的参考依据,而智能推荐系统则根据学生的专业背景与成长阶段,推送与之相契合的案例资源,使技术应用从单纯的信息推送向价值引导转变。此外,人工智能可以建立多维的评价系统,能够更精准地反映学生价值观的动态发展轨迹,使得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完成具有明确指向,最终实现了从技术驱动到价值升华的闭环,使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的实践完成了从技术应用到育人本质的跨越。

二、高校思政课面临人工智能的挑战

随着新兴技术的发展越来越成熟,人工智能将会全面影响整个人类社会。将人工智能运用于高校思政课是大势所趋。对于如何有效发挥人工智能促进高校思政课高质量发展,将是教育界需要深入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技术至上倾向削弱教师的主导性作用

人工智能是“以对人类智能的模拟、延伸和超越为目标的高新科学技术”^[8],以其高效率、快速响应和智能化特性,在当前高校思政课教学中受到广泛关注。它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处理大量数据并提供定制化的学习建议,甚至能够模仿人的行为与情感。但这也使得部分思政教师过度依赖技术手段,忽略了他们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导地位。而高校思政课程具有特殊性,它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师生通过思想交流以及情感互动来达到价值引导的精神互动过程,其中人工智能扮演的是辅助角色。然而如果过度依赖技术,极有可能陷入技术至上误区,将原本以立德树人为目标的思政教学简化为数据的流转和算法的执行,会导致思政课教师从教学的主导者转变为技术的执行者,进而损害高校思政课程的人文精神和价值特质。

一方面,技术至上倾向表现为侵蚀高校思政课教师的专业自主权。利用人工智能打造的智能教学平台收集学生数据分析资料,能够洞察学情,有助于教师在备课时选择学生最感兴趣的素材以及案例进行教学,从而根据学情动态调整教学重点。这种由数据驱动的教学模式表面上提升了效率,实则将复杂的高校思政课的教学过程降维为可量化的技术流程,忽视了教师基于教育经验对学生思想动态的敏锐捕捉与价值判断。当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过度依赖人工智能而忽视发挥自身主观能动性时,他们的教育智慧与实践反思能力将逐渐被技术系统边缘化,这使得思政课教师的主导作用不断被削弱,从而会产生一种思政课谁都可以上的错觉。

另一方面,技术至上倾向会削弱教师作为价值引领者的人格示范作用。高校思政课若要具有感染力,对教师的要求非常高。一方面,需要教师的知识面很广阔;另一方面,还要源于教师以自身的理论素养、人生阅历和情感投入所营造的“在场感”,主要表现为课堂上的眼神交流、对学生困惑的即时回应、对社会热点的深度解读等“不可编码”的教育细节。然而,技术至上驱动下不在同一时空的教学场景,会将师生关系简化为人机对话的工具性关系,思政课教师的人格魅力与情感温度被冰冷的数据流所遮蔽。如当大学生因“躺平主义”“内卷”等现象产生困惑时,若仅依靠人工智能提供相应的算法推荐模型来进行教育,虽然有助于提高教育的精准度,但无法像教师那样结合自身的成长经历和学术积淀进行有温度的引导,更难以通过肢体语言、情感共鸣来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解读。这种情感互动的缺失,使得高校思政课变成了信息灌输的过程,使得教师的引导功能不断受到阻滞。

(二)泛娱乐化思潮冲击思政课的主流价值

人工智能技术为高校思政课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其应用过程中若把握不当,极易引发教学内容的过度娱乐化倾向。智能算法的核心功能在于通过数据分析实现精准推送,这种

技术特性在高校思政课的教学过程中可能会产生负面效应。当系统持续向用户投喂符合其偏好的信息时,不仅会导致学习内容偏离教材范围,更会削弱学生对信息的自主筛选能力。教学形式与内容之间的失衡,往往成为技术反噬教育的开端。这种失衡使人工智能的便利性被异化,最终导致课堂陷入泛娱乐化思潮的恶性循环。在此情境下,师生的注意力会过度集中于技术操作层面,而忽视课程的核心价值内涵。这种本末倒置的现象,为教学内容的浅表化发展创造了条件,严重影响了高校思政课的实际成效。

在内容生产层面,人工智能驱动的“流量至上”逻辑会诱导高校思政课的教育内容向“娱乐化适配”方向异化。智能教学平台的算法为提升用户黏性、获得流量,往往会倾向于推送轻松化和趣味化的内容。如党史学习教育可能会利用技术合成的简化“红色段子”或以“二次元动漫”等碎片化形式进行解读。这种带有娱乐化的改造表面上降低了理论学习的门槛,实则将思政课的思想深度与历史厚重感消解为快餐式的娱乐符号。更值得警惕的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技术的滥用可能使得部分平台利用技术自动生成调侃英雄先烈、解构主流叙事的内容,却以技术中立为借口规避审查,从而在潜移默化中侵蚀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根基。当思政课的教学内容完全服从于算法的流量计算,其作为立德树人载体的本质属性将被异化为娱乐工业的附庸。

在价值传播层面,人工智能构建的“娱乐化沉浸场景”,可能弱化学生对主流价值的理性认知与深刻认同。当前有高校利用VR等技术营造虚拟思政课堂,似乎提升了学生的参与感,但过度强调感官刺激与即时快感,容易使学生将严肃的历史记忆与价值思考降维为娱乐体验,却未能理解事件背后的革命精神与历史逻辑。这种娱乐化沉浸在本质上是将思政教育的价值引导转化为娱乐消费。当学生习惯在娱乐化场景中接触有关思政课的教学内容时,便难以形成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认知与理性信仰,导致主流价值的传播停留在

感官刺激层面而无法触及精神内核,使得思政课的教学形式大于内容。

(三)智能万能主义消解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人工智能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全面渗透,可能会导致学生的过度依赖,从而消弭自身的主动性和参与感。一方面,人工智能基座模型的知识整合与推荐能力可高度匹配用户需求,以结构化、智能化的形态完整呈现答案,易引发用户惰性,导致学生的知识轻信而弱化其深入探究的动力;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富有逻辑性的高拟人化对话方式易引发情感信任,以持续对话的方式占有学生对特定议题的全部认知。长此以往,与之相伴的人可能错把“智能”当成“智慧”,逐渐放弃主动求证、思考探索的好奇心。

智能万能主义会以算法替代思考机制来削弱学生的深度思辨与理论建构能力。相对于传统的学习过程,人工智能具有强指令性的功能,可以为学生提供所需要的答案。他们不再需要大费周折地进行查阅资料以及整理内容,而是可以直接通过 AI 工具生成结构化答案。这种简单的过程会导致学生形成算法依赖型学习模式,而不再主动发挥主观能动性。一旦学生长期依赖外部技术,“引发主体认知降维,以及批判性思维出现结构性萎缩”^[9],则逐渐丧失独立构建理论框架的能力。当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内容沦为学生学习的被动接受对象,学生便很难真正去理解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更无法形成运用理论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

智能万能主义以数据确定性来动摇学生的主体性价值立场与批判创新精神。算法推荐基于历史数据预测学生的学习需求,这种“确定性导向”的技术逻辑,与高校思政课所需的“批判性思维”存在巨大反差。智能万能主义的旨意是技术终将解决一切问题,诱导学生接受现成的数据结论,并且无条件服从,不能产生任何质疑。由于智能万能主义的影响,学生可能会放弃对“为人民服务”“社会贡献”等社会价值目标的追求,甚至可能使得学生将

个人价值实现寄托于技术工具的赋能。如当前不少学生都想借助自媒体成为“网红”,逐渐丧失对“劳动才能创造财富以及实现个人价值”等这些问题的独立思考,最终沦为技术逻辑的附庸而非驾驭者,丧失了人的主观能动性特长。

三、高校思政课提升人工智能效能的策略

当前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虽面临着一定的挑战,但不能因此就忽视其具有的优势,需要积极谋划对策,确保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的过程始终保持着正确的方向,推动高校思政课不断提升效能。

(一)抓好人工智能培育:强化教师的价值导向作用

高校思政课运用人工智能进行教学是不可避免的趋势,但必须将其作为辅助工具加以适当使用,不能取代教师的主导地位。思政课教师应认识到人工智能本身具有缺乏情感交流以及道德判断等局限性,要积极提升自身对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能力,确保人工智能辅助教学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思政课教学的规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10]186}教师作为价值引领的核心主体,其人工智能素养的培育质量直接决定技术赋能的育人成效。抓好人工智能培育并非单纯提升教师的技术操作能力,而是将技术能力、伦理认知以及教育智慧三者相结合,使得思政课教师在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教学的过程中充分发挥主导性作用,实现从技术适应者到技术驾驭者的角色转变,真正做到既能运用人工智能创新教学形态,又能始终掌控思政教育的价值方向,筑牢立德树人的“主心骨”。

高校思政课教师需要适应知识获取渠道的多元化,不再仅仅作为知识的传播者,而更要成为知识的引导者和启发者。学生通过人工智能可获取丰富的知识资源,教师应利用这些手段拓展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效果,并保持对知识更新的敏感性。要加强高校思政课教师的道德模范作用,通过思政课教师的自身行

为示范,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要提升教师的人工智能素养,以适应技术在高校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此外,思政课教师还可以参与培训和研究,“通过制定常规性培训、开展主题性研修、鼓励专技型竞赛,多渠道构建教师驾驭智能技术的意识与素养,不断提升自身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理解和应用能力”^[11],以适应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要求。同时还可以开展人工智能与高校思政课融合的教学研究,将技术应用中的价值引领问题转化为科研课题,通过学术探索深化对技术赋能高校思政课规律的把握。这种学科交叉不仅能提升教师的技术应用水平,更能帮助其从理论高度理解教师的价值导向作用,避免陷入重视技术的工具理性而忽视教师价值导向的认知误区。

(二) 完善主流价值体系:提升思政课的思想引领力

在人工智能重塑信息传递格局的大环境下,完善主流价值体系、提升思政课思想引领力,本质上是通过价值内容的时代化创新,持续巩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这一转变要求打破以往高校思政课单一输出的模式,把人工智能的技术特点转化为价值引导的实际效能,打造全新的主流价值传播架构,保证高校思政课始终扮演着引导青年学子思想方向的“导航仪”。

一方面,通过以主流价值体系的时代化创新提升思政课的思想引领力。新兴技术的发展带来了诸多新的社会现象和理论探讨话题。高校思政课能够将这些话题融合进教学内容中,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视角来解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新挑战。如运用人工智能的大数据分析手段整理出青年学子们关心的人工智能伦理问题,并把这些争议点转变为思政课堂中的生动案例,运用唯物史观深入剖析技术革新与社会制度间的辩证联系。此外,借助先进的智能语言处理技术,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进行深入的文本分析,打造一个连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人工智能时代的知识图谱,让学生们能够洞察数字劳动背景下的剩余价值理论新

演绎,以及算法管理下人的异化现象的现代形式。这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学模式,既维护了主流价值观的理论深度,又能有效关照技术时代的现实问题,防止价值观教育走向空洞和僵化。

另一方面,通过智能化的价值引领反馈与调适机制完善主体价值体系。传统的高校思政课价值传播效果评估多依赖课后问卷与考试成绩,会出现反馈滞后、数据片面等问题。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实现教学成效的即时、全面以及深入监控。如通过课堂内的智能设备搜集学生的笔记关键词、参与互动的频率和注意力集中的状况等细节信息,并采用机器智能算法绘制出学生对于相关内容掌握情况的变化曲线,从而精确找出学生在不同内容的理解短板。此外,借助社交媒体的情绪分析工具,跟踪学生在网络空间中的言论走向,“还要利用智能算法、数据筛查来识别和剔除场景中的不良信息,如带有浓厚西方价值色彩、抹黑中国的各种观点言论等”^[12],及时捕捉主流价值体系传播过程中的正向扩散与潜在阻力。基于这些数据,教师可以根据需要动态调整教学内容,使得主流价值体系能够持续回应学生的思想动态。

(三) 培养主体思辨意识:激发学生的自主思考能力

首先,要以“问题链”驱动深度思考激发学生自主探究的能力。借助人工智能技术,高校思政课程能够有效地整合海量信息,为构建贴近现实的“问题链”提供有力支持。思政课教师运用大数据分析工具,深入挖掘学生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并将其转化为贯穿教学始终的“问题链”。这一链条从对技术现象的描述开始,逐步深入到理论的根源剖析,最终聚焦于解决方案的构建。如在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教学时,以“数字劳动的价值创造”为主题,教师可以设计一系列问题:“算法如何控制外卖骑手的劳动时间?”“平台经济是否改变了剩余价值的剥削本质?”“如何通过制度设计来保障数字劳动者的权益?”在这个过程中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设立专门的实

时讨论板块^[13],能够形成双向或多向的交流。同时,还可以通过智能问答系统提供案例数据,并利用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功能来展示理论之间的关联。但问题的分析框架与价值判断仍由学生自主建构。这种问题驱动和技术辅助模式使学生的思考始终锚定真实议题,避免陷入空洞的理论推演。

其次,要通过强化虚实交互的实践体验深化学生自主思考的能力。借助人工智能技术构筑的虚拟实践场景,学生得以将抽象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具体的实践思考,同时需警惕过度虚拟对现实体验的冲击。为此,在课堂教学环节,可以策划虚实结合的实践性教学活动,将虚拟环境中的思维成果转化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策略。这种虚拟与现实的交互式教学流程,确保学生的思考既基于理论根基又面向实际应用。尤其在评估实践成果时,采用人工智能系统辅助教师教学评估,系统负责检验方案的逻辑严密性和数据支撑力度,而教师则重点考察其价值取向和创新品质,从而引导学生在技术理性和价值理性的互动平衡中实现认知深化与能力提升。

最后,通过完善过程性的评价体系保障学生思辨能力的持续发展。在以标准化答案为核心的传统评价模式中,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常受到压制。为此,可借助人工智能的动态评价技术构建一种新的评价机制。通过运用学习分析工具来跟踪学生的思考轨迹,并记录他们在讨论区对机器生成观点的反驳等行为数据,从而绘制出学生的批判性思维推演图谱。这种评价导向鼓励学生勇于独立思考,敢于提出不同意见,防止他们为了迎合人工智能系统的预设标准答案而导致思维模式的单一化。

[参 考 文 献]

- [1]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北京:中央文

献出版社,2021.

- [2] 习近平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J].思想政治工作研究,2024(6):4.
-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燕连福,秦浦峰.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问题与对策[J].广西社会科学,2023(9):201-206.
- [5]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Z].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19(9):2-7.
- [6]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 [7]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 [8] 孙伟平.人工智能与人的“新异化”[J].中国社会科学,2020(12):119-137.
- [9] 闫瑞峰.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风险与化解路径——基于教育对象主体性视角的考察[J].思想教育研究,2025(6):34-42.
- [10] 习近平.论党的青年工作[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2.
- [11] 王雅坤,申小蓉.DeepSeek 类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思政课教学:价值、隐忧与纾解[J].西南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3):20-28.
- [12] 程琼,刘宏达.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思想政治教育场景构建及其风险防范[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4(8):87-95.
- [13] 郝娜,桂泽堃.人工智能赋能高校“精准思政”的技术模式、现实症候与实践进路[J].黑龙江高教研究,2025(7):1-10.

(责任编辑 王遐见)

《世说新语》基本文献问题管窥*

宁稼雨

(南开大学文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学界往往把关注重点放在了解作品内容与文风的“善”与“美”两个方面,而对体现作品“真”的方面的基本文献问题关注不够,因而导致对作品难以从深层深刻角度准确理解把握。以《世说新语》研究和阅读为例,从成书时间、书名辨析、卷数、门类数量演变过程以及评点与批注等几个方面,为从基本文献层面探索分析作品提供参考与借鉴。

[关键词] 《世说新语》; 基本文献; 版本

[中图分类号] I207.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4-0055-09

对一部作品(尤其是名著)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不是直接关注其内容所写与文风展示,而是在此之前扫清与内容及文风相关的文献障碍。这既是“知人论世”传统文学理论思想的延续使用,也是大数据时代系统掌握知识体系的需要。如果把一部作品解读分为“真善美”三个层面的话,研究作品的内容构成和文风展示解决的是“善”和“美”的问题。但如果没有从文献层面解决“真”的问题,“善”与“美”的问题即便解决也就势必成为空中楼阁,难以科学成立。

《世说新语》号称“中古文化的百科全书”,是全面反映魏晋文化的重要典籍。但该书从问世以来,很多文献问题虽然受到学界与读者关注,但因各种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奢谈该书内容与文风者大大超过关注该书文献者),很多与该书基本文献问题相关的文献问题未能得到解决,这也势必会影响到对该书内容与文风问题的准确正确理解和认知。本文

不揣浅陋,将学界对《世说新语》几个基本文献问题的关注研究情况进行梳理述评,并提出一孔之见。希望借以引起学界与读书界对此事的关注,推动和提高《世说新语》其书的研究水平和阅读质量。

一、关于成书时间

准确判断一部作品的成书时间,有助于书中内容及其相应表达文风的正确把握理解。

因为史籍刘义庆本传和早期相关材料均未明示《世说新语》成书时间,所以该书成书时间一直为学界猜测论证的重要话题之一。尽管成书时间的年度断限范围比较有限,但对于刘义庆生平活动确认及其文献考证议定都具有连锁反应效应。

《世说》成书的讨论,大约始自 20 世纪八十年代。刘兆云依据刘义庆生卒年代,推测该书成书“最迟不超过元嘉二十一年(444 年)”^[1];郑学弢依据《世说新语》书中所收刘宋人物傅亮和谢灵运的生卒活动情况推断,其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全汉魏晋南北朝小说辑校笺证”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ZDA2017251)。

[收稿日期] 2026-03-02

[作者简介] 宁稼雨,男,辽宁大连人,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成书当在元嘉三年(426年)以降、十年以前^[2];萧艾则从思想学术背景的角度,认为“《世说》的著书年代一定是在元嘉十五年(438年)前后,即儒、玄、史、文四馆开设之际”,盖元嘉九年(432年)至十六年到羲度任荆州刺史期间^{[3]11};杨勇以为当在义庆任江州刺史时,即元嘉十六年(439)^①;范子烨根据《世说新语》不录在世人士体例,检索其书所收人物卒年最晚于元嘉十三年(436)至十八年(441),故当成书于元嘉十六年(439年)四月至十七年十月间。^②孙猛认为:“元嘉十六年,义庆选江州刺史,十七年,转南兖州刺史。《宋史》本传曰:‘太尉袁淑,文冠当时。义庆在江州,请为衡军咨议参军;其余吴郡陆展、东海何长瑜、鲍照等,并为辞章之美,引为佐史国臣。’《世说》编纂,有诸门客预焉,成书于此间,似较为稳妥。”^{[4]1230}综合各家说法,把该书成书的开始时间定在元嘉十六年(439)刘义庆出刺江州后,至元嘉十七年(440)刘义庆转南兖州刺史两年之间,比较稳妥可信。

二、关于书名

书名是一部作品的标志和识别符号,是认知一部作品的第一程序。弄清一部书书名变化始末状况,有利于正确把握认识该书内容及文风情况。

《世说新语》一书曾有过《世说》《世说新书》和《世说新语》三个名字。其书名演变情况如下:

该书在南朝时有《世说》和《世说新书》两个名字。现存日本藏宋代董弅刻本《世说新语》所附敬胤注及刘孝标注涉及该书皆称为《世说》,汪藻《叙录》在“世说新书”条目下列举该书名版本有注:“李氏本《世说新书》,上、中、下三卷,三十六篇。顾野王撰颜氏本跋云:‘诸卷中或曰《世说新书》,凡号《世说新书》者,第十卷皆分门。’”^{[5]613}学界一般认为此十卷本为刘孝标注的版本。

隋唐时大致还是延续南朝旧例,保持此前

两种书名说法。不过也出现一点例外情况。《南史》刘义庆本传,《隋书·经籍志》、两《唐志》均作《世说》。比较例外的情况是刘知几《史通》:“近者宋临川王义庆著《世说新书》,上叙两汉、三国及晋中朝江左事。刘峻注释,摘其瑕疵,伪迹昭然,理难文饰。而皇家撰晋史多取此书,遂采康王之妄言,违孝标之正说。以此书事,奚其厚颜!”^{[6]482}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近览《世说新书》云,王敦初尚公主,如厕,见漆箱盛干枣,本以塞鼻,王谓厕上下果,食至尽。既还,婢擎金漆盘贮水琉璃碗,进藻豆,因倒著水中,既欲之,群婢莫不掩口。”^{[7]239}日本现存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署名为“《世说新书》”,另外,日本平安时代源顺《和名频聚抄》引作“世说”。而略晚于源顺的菅原道真所著《菅家文草》卷二:“相府文亭,始读《世说新书》”可知隋唐时期还是以“《世说新书》”之名流传,没有出现“《世说新语》”书名。

宋代在继续保留“《世说》”“《世说新书》”两个老名字的同时,开始出现“《世说新语》”书名。据潘建国教授考证,宋代郑瑤编纂《景定严州续志》卷四收有八十种严州刻本,其中有《世说》一书^③。不过,这个“《世说》”是原名还是“《世说新书》(或《世说新语》)”的省称,尚难断定。还有借助袁褱嘉趣堂本流传下来的陆游《〈世说新语〉跋》称:

郡中旧有《南史》《刘宾客集》版,皆废于火,《世说》亦不复在。游到官,始重刻之,以存故事。《世说》最后成,因并识于卷末。淳熙戊申重五日,新定郡守笠泽陆游书^{[8]118}。

这里出现两次“《世说》”书名,前者指郡中毁于火灾的《世说》旧本,后者指陆游主持刻印的版本。因为今传《世说新语》嘉趣堂本是陆游刻本的翻刻本,所以后者确认“《世说》”为“《世说新语》”书名的省称。但前者“《世

① 参见杨勇《〈世说新语〉书名、卷帙、板本考》,《杨勇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

② 参见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第二章《〈世说新语〉成书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③ 参见潘建国《日本尊经阁藏宋本〈世说新语〉考辨》,载《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一期。

说》”书名是确指“《世说》”,还是“《世说新书》”,还是“《世说新语》”,还不能完全肯定。

黄伯思《东观余论》谓:“《世说》之名肇刘向,六十七篇中,已有此目,其书今亡。宋临川孝王因录汉末至江左名士佳语,亦谓之《世说》。……本题为《世说新书》,段成式引王敦说藻豆事,以证陆暘事为虚,亦云近览《世说新书》。而此本谓之《新语》,不知孰更名之,盖近世所传。”^{[9]76}汪藻《叙录》云:“晁文元、钱文僖、晏元献、王仲至、黄鲁直家本皆作《世说新语》。”^{[5]613}另据日本古田敬一《〈世说新语〉校勘表附佚文》,《太平广记》引《世说新语》51条,其中题《世说》者38处,题《世说新书》者七处,题《世说新语》者六处。

这些书名孰前孰后,诸家众说纷纭,以“《世说》”是否为原名为焦点分为两派:一派主张该书原名为《世说》。清代沈涛根据《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唐代类书所引,认为《世说》当为原名,“《新书》《新语》皆后起之名。”^{[10]382-384}今人刘兆云、萧艾则把文献材料前推,从今本所附南朝宋齐间敬胤和刘孝标注所引该书书名来断定“《世说》”为原书书名。理由是敬胤和刘孝标注所引该书均称之为“《世说》”,没有增加“新书”“新语”字样^①。台湾尤雅姿也基本附和刘、萧二氏观点^②。

否定“《世说》”为原书名,主张原名为“《世说新书》”者始自四库馆臣:“黄伯思《东观余论》谓《世说》之名,肇于刘向,其书已亡。故义庆所集,名《世说新书》。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王敦澡豆事,尚作《世说新书》可证。不知何人改为《新语》,盖近世所传,然相沿已久,不能复正矣。”^{[11]1182}嗣后,余嘉锡又补充馆臣之说:“刘向《世说》雕亡,疑其体例亦如《新序》《说苑》,上述春秋,下纪秦汉。义庆即用其体,托始汉初,以与向书相续,故即用向之例,名曰《世说新书》,以别于向之《世说》。其《隋志》以下但题《世说》者,省文耳。犹之《孙

卿新书》,《汉志》但题《孙卿子》;《贾谊新书》,《汉志》但题《贾谊》,《隋志》但题《贾子》也。”^{[12]859}

四库馆臣(包括余嘉锡支持说法)基本是从“《世说》”“《世说新书》”两个书名的逻辑关系上来推理的:既然“世说”之名来自刘向,而刘向原书已经亡佚,为了区别于刘向原书,所以刘义庆将其所集之书取名“《世说新书》”。其文献支持者为唐代段成式《酉阳杂俎》引作“《世说新书》”。从文献时间来看,敬胤和刘孝标的时间都早于段成式。没有特殊原因,其支持说服力当不及敬胤和刘孝标。

宁稼雨按:前人研究研讨《世说新语》书名所据文献材料主要就是史志书目和现存版本。但往往忽略现存宋董弅刻本所附宋代汪藻《叙录》所含各种信息。《叙录》除了记录所知《世说新语》版本外,还详细列出所见所藏诸多《世说新语》版本的书名卷帙信息。通过对这些卷帙信息的梳理分析,不但有助于厘定三种《世说新语》书名的前后关系,而且还能发现汪藻本人表述中的一些瑕疵。

汪藻《叙录》中收录以“世说新书”为书名的两种版本,一种为三卷三十六篇的李氏本,另一种为十卷的颜氏本。台湾杨勇先生认为这个李氏本《世说新书》当为“世说新书”一名定名的依据。理由是,因此前史志将刘义庆《世说》与刘孝标注分别著录,说明原书和刘注二者曾分别结集。此顾野王撰本将刘孝标注分别散附至刘义庆原文中,将此新编本命名为“世说新书”。今传日本收藏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正是刘义庆原文与孝标注二者合编而成^③。但汪藻《叙录》所收的李氏本《世说》为三卷,而今存日本的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则为十卷本,那么它也就不应该是顾野王所编的李氏本。而汪藻《叙录》一书中所收书名《世说新书》的另一版本,即颜氏本则恰为十卷。那么合理的逻辑顺序就应该是这样:刘

① 参见刘兆云《〈世说〉探原》(《新疆大学学报》1979年第一期),萧艾《〈世说〉探幽》上篇第二节《〈世说〉作者,著书年代及其他》,湖南出版社1992年版。

② 参见尤雅姿《〈世说新语〉书名异称辨疑》,台湾《中兴大学人文学报》第三十二期(2002.6)。

③ 参见杨勇《世说新语书名、卷帙、板本考》,《杨勇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孝标注的文字被分散汇入到刘义庆原书中,以《世说新书》为名的版本当时有三卷本(李氏本)和十卷本(颜氏本)两种版本。故汪藻引李氏本言“凡称《世说新书》者,皆合卷为三”这个说法,恐怕难以成立^①。

除了以上书名,还有《世说》与《说苑》两个书名之间关系问题。

《汉书》刘向本传载其著述有《疾谗》等八篇,《汉书·艺文志》子部儒家类“刘向所序六十七篇”,均未及《世说》与《说苑》。至颜师古试图明示其六十七篇所涉书名:“《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13]1728}按照颜师古说法,《说苑》与《世说》为并列二书。宋代王应麟继承颜师古的表述,认为“刘向所序”系指《新序》,与《世说》《说苑》并为三书^②。但颜、王二说受到近人向宗鲁质疑反对。向氏一方面列举唐宋类书将《世说》《说苑》二书混用的情况,如《初学记》卷十七所引刘义庆《说苑》的“曹操于酪器题字”事见于今本《世说新语·捷悟》,而同书卷十九引刘义庆同书“郑玄家奴皆读书”事则见于今本《世说新语·文学》。《逸寰宇记》卷一一八亦引刘义庆《说苑》羊祜领荆州事(清人王仁俊将诸书所引刘义庆《说苑》另辑入《玉函山房辑佚书补编》中^③。此外,诸书所引刘义庆《世说》若干文字实出刘向《说苑》。故向宗鲁认为:“予谓《世说》即《说苑》,原注《说苑》二字,浅人加之。考《御览》三十五引《世说》,不见义庆书而见《说苑·君道》篇。《书抄》百四十一引《世本》,其文与《世本》不类;‘《世本》’乃‘《世说》’之讹,今见《说苑·立节》篇。此所引皆中垒《世说》。《初学记》十七引刘义庆《说苑》,今见《世说·捷悟》篇;又卷十九引刘义庆《说苑》,今见《世说·文学》篇。黎刊《太平寰宇记》一百十八引刘义庆《说苑》,今略见《世说·排调》篇。此所引皆临川《说苑》也。是则临川之《说苑》即《世

说》,而中垒之《世说》即《说苑》审矣。”^[14]按向氏的说法,《世说》和《说苑》是同一个书名,但真正的书名是《世说》,《说苑》是后人妄加的。台湾学者尤雅姿同意《世说》与《说苑》为同一本书的说法,但她认为妄加的书名不是《说苑》,而是《世说》。其理由有三:一者可以解释何以“世说”书名是唯一不见刘向著述名称之列;二者可知唐以后类书何以将《世说》《说苑》二书混淆引用,造成混乱;三者又可以此为推演至书名“《新书》”何以产生在“《世说》”“《说苑》”书名发生混乱之后^④。

鉴于以上信息,我们基本认为,该书三个书名的正确先后顺序应该是:《世说》——《世说新书》——《世说新语》;刘向名下不存在《世说》一书,刘义庆名下不存在《说苑》一书。因此也不存在《世说新语》书名源于刘向《世说》的说法。

除了以上三个书名之外,《世说新语》还有几个可能与其书造成混淆情况的书名:一为《世语》。《世语》为西晋郭颁所撰,又名《魏晋世语》,不仅书名与“《世说》”近似,而且也是《世说新语》采集编纂的蓝本之一。唐宋类书等后人文献征引时往往与“《世说》”相混。如《北堂书钞》卷三四引《世语》“何晏为吏部郎”条,《太平御览》卷六一七引作《世说》,见今本《世说新语·文学》。二为《幽明录》,《幽明录》为志怪小说,同为刘义庆所撰,故后人称引往往混为一名。叶德辉云:“疑临川著书时,颇涉神怪,久而析出,别为一书。诸书称引,犹题‘《世说》’者,盖从其朔也。”^{[15]542}如《太平御览》卷五七九引“《世说》”之“会稽贺思令善弹琴(《广陵散》)”条,《太平广记》卷三二四引作“《幽明录》”又《太平御览》卷八三〇引《世说》“爰综为新安太守”条,文后注:“《幽明录》同。”但今本《幽明录》却失载,等等。三为《俗说》,《俗说》为南朝沈约编纂,与《世说新语》同为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品

① 参见拙文《日本尊经阁藏宋本《世说新语》版本文献价值》,《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12期。

② 参见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子部儒家类,中华书局1998年印刷版。

③ 按范子烨《世说新语研究》认为《逸寰宇记》所引刘义庆《说苑》文字原为刘孝标注,为宋人所删。见该书第一章第二节。

④ 参见尤雅姿《〈世说新语〉书名异称辨疑》,台湾《中兴大学人文学报》第三十二期(2002.6)。

藻》“宋祗为王大将军妾”条,《事类赋》卷十一引作《世说》,但《艺文类聚》卷一八引作《俗说》。刘盼遂认为乃为避唐太宗“世”字讳而为。^①

综上可见《世说新语》书名前后涉及文献十分复杂,须一一甄别区分,方可避免或减少失误。

三、关于卷数

卷帙是中国古籍重要编纂形式,也是一部古代文献区别于其他文献的重要结构系统标志。

涉及《世说新语》卷数的材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史志目录,二是现存原书,三是早期记录其书卷数情况的文献文本。三方面文献综合交汇使用,或能梳理出卷数问题大致始末关联。

从史志著录情况看,《隋书·经籍志》子部小说家类著录《世说》二种,一种题“《世说》八卷,宋临川王刘义庆撰,”一种题“《世说》十卷,梁刘孝标注。”但《南史》刘义庆本传的记录则是他“所著《世说》十卷”。由此可知本书的最早版本应该八卷本和十卷本,而这两种版本均已亡佚,所以二者之间的真实关系还难以判定,只能根据现存材料进行推测。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唐写本《世说新语》残卷,系日本明治十年(1877年)发现于京都东寺,后割裂为五,分藏五人。罗振玉设法使分者复合,并于民国五年(1916年)影印之。该残卷起于“规箴第十”,终于“豪爽第十三”。其中,“规箴”24则,“捷悟”7则,“夙惠”7则,“豪爽”13则,共51则。该本后有罗氏书神田醇跋、杨守敬跋及罗振玉跋。宋代晁公武称:“《世说新语》十卷,《重编世说》十卷。右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唐艺文志》云:‘刘义庆《世说》八卷,刘孝标《续》十卷。’而《崇文总目》止载十卷。当是孝标续义庆元本八卷,通成十卷耳。”^{[16]544}从《隋书·经籍志》所示话语来看,应该如晁公武所说,八卷本大概是刘孝标加注以前的原本。至于十卷本,唐代写本的

《世说新书》残卷保存了该书从“规箴”第十到“豪爽”第十三共四个门类。它的卷末则标明“《世说新书》卷第六”。这个版本包括了刘孝标的注释,而从现存写本卷六正处于第十至第十三门类的位置这个情况来看,它有可能是《隋志》所录十卷本的传本。至于其全貌则仍不得而知。

北宋时期的晏殊曾经对十卷本《世说新语》做过整理,删去与前九卷重复的第十卷中的九篇,但晏殊此本今也失传(参见董弅《世说新语跋》)。南宋绍兴八年(1138),董弅在晏殊本的基础上又重新做过一次加工,即为今天所见宋绍兴刻本,日本尊经阁丛刊影印。此后国内文学古籍刊行社和中华书局又分别于1955年和1962年影印出版过此本。这个版本分三卷,书后有汪藻所撰《叙录》两卷,包括《考异》和《人名谱》各一卷。另外,南宋淳熙十五年(1188),著名诗人陆游也曾刻印过《世说新语》,不过已经亡佚。明代袁褰在嘉靖年间所刻嘉趣堂本,底本就是陆游刻本。该本将原本三卷每卷又分上下。到清代道光年间周心如纷欣阁本又重雕嘉趣堂本,对袁本做过一些订补稍有刊正。光绪年间王先谦思贤讲舍本又据纷欣阁本传刻,在原本基础上又加上王先谦本人编著《校勘小识》和叶德辉所编的《世说新语注引用书目》,此外还有从唐宋人类书中辑录出来的《世说新语佚文》。另外,清代徐学乾传是楼所藏宋淳熙十六年(1189)湘中刻本,与董弅刻本有些相近,但与嘉趣堂本区别很大。蒋篁亭、沈宝砚有校记,见涵芬楼影印嘉趣堂本后。

20世纪五十年代后,除了影印出版过宋代绍兴八年(1138)董弅刻本外,1982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还影印出版过思贤讲舍本,该本后面附有绍兴本后的汪藻《叙录》和罗振玉的影印《唐写本世说新书残卷》。1983年,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由中华书局出版,此本系以思贤讲舍本为底本,以宋本、明本对校。其笺疏工作的重心不在训解文字,而主要放在史实

^① 参见刘盼遂《世说新语校笺·总论校笺凡例》,《文学同盟》第11/13期,1928年。

考辨方面。余氏对《世说新语》原书内容和刘孝标注所列出的人物事迹,逐一寻检史籍,追根溯源,考核异同;原书不备者则略为增补,以广异闻;原书事乖情理者则加以评鹭,以明是非。与此同时,余氏还对《晋书》失实之处多有驳正,因而颇获学界好评。中华书局于1984年又出版徐震堃《世说新语校笺》,此本系以嘉趣堂本为底本,校以唐、宋、明、清诸本等。其校笺则注重于训诂疏解文字,并以史籍与本书内容对照考核异同。故此本与余嘉锡本堪称《世说新语》现代整理本“双璧”。

汪藻《叙录》对于宋代以前《世说新语》的卷帙梳理廓清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因为晁公武、陈振孙、尤袤等宋代几位重要目录学家的著作问世于汪藻生后,所以当年汪藻只能见到唐人和北宋人所编《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这几部官修正史目录中所著录的《世说新语》版本信息。而这三种官修史志所著录的《世说新语》版本只有八卷本和十卷本。汪藻《叙录》不仅摸清了隋唐书目中所著录的八卷本和十卷本两种版本的基本情况,而且还依据个人学识所见,增补了前人书中未曾记载的几种卷帙版本。

对传统八卷本,汪藻只是引录了《隋志》《唐志》的著录情况,未列版本,说明到宋代时,不含刘孝标注的刘义庆原文八卷本已经停止流传了。而对十卷本,却在引述《南史》刘义庆本传所言其“所著《世说》十卷”的同时,列举四种他寓目收藏的十卷本,并说明这些十卷本的版本特征:“钱、晏、黄、王本并十卷而篇第不同。”说明到宋代,十卷本已经取代八卷本,成为《世说新语》的主流版本。所谓“篇第不同”应该是指这几种十卷本与以往十卷旧本不同:

按:王仲至《世说手跋》云:“第十卷无门类,事又多重出,注称敬胤,审非义庆所为,当自它书附此。《世说》其止于九篇乎?《隋书·志》称八卷似是,然则九篇者,或以文繁分之耳。以余考之,隋、唐《志》皆云《世说》八卷,刘孝标《注》《续》

皆十卷,而《义庆传》称十卷,则《世说》本书卷第今莫得而考。于孝标注中,时有称《刘义庆世说》云云者,则今十卷,或二书合而为一,非义庆本书然也。世传第十卷重出者,或存或否。刘本载‘祖士少道右军’‘大将军初尚主’两节跋云:王原叔家藏第十卷,但重出前九卷所载,共四十五事耳。敬胤注纠缪,右二章小异,故出焉。赵氏本亦以为余始得宋人陈扶本,继得梁激东卿本,参校第十卷,事类虽同,而次叙异,又互有所无者。”仲至之言是也。则此卷为后人附益无疑,今姑存之,以为《考异》,载之《叙录》,而定以九卷为正。用钱文僖本,分为十卷^{[5]614-615}。

从汪藻引述王仲至手跋及后文《叙录》内容看,他们所见的十卷本,前九卷为包含今本三十六个门类的全部内容,第十卷则为与前九卷内容重复的四十九事。与此结构内容相符的是钱文僖和晁元献本。有点疑窦的是,这个所谓十卷本是隋唐史志所录的十卷本《世说》原书,还是另外又有一个“9+1”的十卷本,尚无直接证据。笔者认为,宋代之前未见任何九卷本的记载,在没有直接证据之前,还是将其视为十卷本原书为妥。不过在此十卷本之外,《叙录》还收录了一种十一卷本:“十一卷。颜氏、张氏本三十六篇外,更收第十卷,无名,只标为第十卷。”^{[5]614}对照上文,此十一卷本与上文十卷本的关系有些令人费解:从卷数和内容门类关系上看,该本的前十卷包含该书三十六个门类的全部内容。第十一卷标明为“第十卷”,但没有说明这部分内容与前十卷内容的异同关系。上文十卷本的情况与此本相同,前九卷等于该本前十卷,第十卷等于该本第十一卷。相比之下,此十一卷本的前十卷,倒是有些接近唐宋史志著录的十卷本。此十一卷本与上文十卷本关系,还有待深入考证。

除了传统旧本八卷、十卷本,汪藻《叙录》还梳理了几种有别于传统版本卷数的新版本。其中有章氏二卷本:“章氏本跋云:‘癸巳岁,借舅氏本,自《德行》至《仇隙》三十六门,离为上、下两篇。’”^{[5]613}据此可知该本包括今本三

十六个门类全部内容,但却分为上下两卷。另外比较重要的是汪藻收录的晏氏三卷本:“晁氏本以《德行》至《文学》为上卷,《方正》至《豪爽》中卷,《容止》至《仇隙》为下卷。”^{[5]613}这个版本卷数,三卷内门类的划分方式与今存日本尊经阁藏董弅刻本完全相同。董弅在该本书后《跋》中称:“后得晏元献公手自校本,尽去重复,其注亦小加剪截。”^{[17]933}据此可以推测,董弅使用的晏殊校本,应该就是汪藻《叙录》所收的晏氏三卷本。

宋代以后,《世说新语》的卷数开始出现多元化局面。一方面,以嘉趣堂本为代表的主流三卷本还在继续传承演化(见上文),同时又出现一些新的非主流卷数版本。先是元代刘应登刻印了八卷本《世说新语》。关于这个八卷本的底本来源学界尚有不同意见。潘建国教授认为它来自宋代湘中刻本^①,笔者则认为它来自元代尚存世的隋唐史志著录的八卷本原书^②。刘应登元刊本对《世说新语》内容做了较大调整更动。一方面大量删削了原书的刘孝标注和敬胤注,另一方面又增加了刘辰翁评点和刘应登批语,是《世说新语》版本史上最早的评点本。嗣后到明代版本就更加异彩纷呈,分别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六卷本、十卷本和二十卷本。

六卷本始自明代万历年间吴勉学在嘉趣堂三卷本基础上分解而成,实际上就是把原三卷本各卷所分上下两部分分解为两卷而成,文字上也略有校勘调整。与吴勉学本并行的六卷本还有凌濛初刻印的墨版和套色版。凌本有三个特点:一是从《世说新语补》中恢复被王世贞删除的《世说新语》原文和刘孝标注;二是汇集了此前《世说新语》嘉趣堂本、刘应登本、王世贞本三个重要版本文字中的合理部分,形成一个新的版本系统;三是参照流行通俗读物版式,采用上下两栏的版式方案。将原包括原刘应登本栏外的刘辰翁评语等十二位鼓吹家评语汇集在上栏,入栏后的评语与正文文字分列两栏中。成为古代小说评点史上一

大壮举。其后还有依据嘉趣堂本稍加校勘的邓原岳刻六卷本。六卷本影响较大,流行较广的是光绪三年(1877)湖北书局刊本(简称鄂本)。其版本来源不明,文字也较粗率,是晚清民国以来流行最广的普及本。

明代的八卷本比较多,有三种编纂体例。一种是与元代刘应登本相同的正德年间赵俊刻本,基本保留每个门类的完整和门类排列顺序;第二种为万历间余碧泉刊王世懋伪托王世贞批点、凌濛初校订本、凌濛初刻王世懋批点本(套色板同)、凌濛初刻王世贞批点本等。这几个版本基本是王世懋第二次批点本及其后来凌濛初、凌濛初的翻刻本。它们以“金”“石”“丝”“竹”“匏”“土”“革”“木”八字分别指代各卷名称,并对三十六个门类中部分门类采用切分人类的方式。第三种为吴瑞徵本。吴本与第二类版本相同之处是都采用切分门类入卷的方式,不同之处是没有采用“金石丝竹”等八类命名卷帙名称方式。另外,凌濛初的八卷本也采用了六卷本的套色版。

在三卷、六卷、八卷这三种版本之外,还有作为《世说新语》增补删减本的其他几种卷帙版本。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王世贞的二十卷本《世说新语补》,该本的编纂特点是采集何良俊的《何氏语林》和刘义庆《世说新语》汇为一炉,重新编排。其中《世说新语》占原书十分之八,《何氏语林》占原书十分之二。该本问世后虽然影响巨大,但因为该本所收《世说新语》和《何氏语林》均非原书全帙,故招来非议,以至有人欲救其偏。上文所述凌濛初本便是此类。

四、关于门类

按内容分类是部分中国古籍的编纂方式,是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书体形式。《世说新语》的分类形式是这类文献的重要代表。

《世说新语》以类相从的体例源自刘向《说苑》,现存的版本都是分成三十六个门类。这是删改后的面貌,历史上《世说新语》有过

① 参见潘建国《〈世说新语〉元刻本考》,载《古代小说版本探考》,商务印书馆2020年。

② 参见宁稼雨《关于〈世说新语〉元刊本的几个问题》,《学术研究》2023年第四期。

若干种分类方式。

因为隋唐史志著录只记录书名、版本和作者情况,所以史志未能反映出《世说新语》分类情况。现在能看到较早与《世说新语》分门情况有关材料有宋代董弅刻本的董弅《跋语》:“古《世说》三十六篇。世所传厘为十卷,或作四十五篇。”^{[17]933}这里提到的三十六篇指今传董弅刻本《世说新语》的门类数,原书三卷。因而下一句一般容易理解为另一种十卷传本分为四十五个门类^①。但经过仔细与其他文献核对考察,发现董弅所说的“四十五篇”不是指门类数量,而是指汪藻《叙录》提到的一种十卷本。该本前九卷与今传本相同,第十卷为与前九卷内容重复的故事,共四十五条^②。因而也就不存在“四十五”个门类之说。

其后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提供新的门类信息:“右宋刘义庆撰,梁刘孝标注。记东汉以后事,分三十八门。《唐艺文志》曰:‘刘义庆《世说》八卷,《刘孝标续》十卷。’而《崇文总目》止载十卷,当是孝标续义庆元本八卷,通成十卷耳。家本有二:一极详,一殊略。略有称改正,未知谁氏所定,然其目则同。”^{[16]544}晁公武的表述又提供一种新的分类形式(三十八门)。并且进一步明确交代,晁氏家藏的两种版本,尽管详略不同,但分类目录是一样的(即均为三十八门)。四库馆臣承袭了晁公武的说法:“所记分三十八门,上起后汉,下迄东晋,皆轶事琐语,足为谈助。”^{[11]1182}这样也就有了三十六、三十八个门类两种说法。

1929年日本尊经阁藏宋代董弅刻本传回东土之后,同时在该本中还附载了汪藻《叙录》,让大陆学人重新看到这部重要的《世说新语》研究著作。汪藻《叙录》又提供了关于《世说新语》门类更多的情况信息。《叙录》根据收藏和寓目的十二种《世说新语》版本,以

现身说法方式,一一比对确认十二种版本中的四种分门方式:

采用三十六门分类方式有钱文僖本和晁文元本。这两种版本均为十卷三十六篇(门)。自“《容止》”至“宠数(礼)”为第七卷,自“《任诞》”至“《轻诋》”为第八卷,自“《假譎》”至“《仇隙》”为第九卷,另将前九卷中重出的四十九事为钱、晁二本所不取者,列为第十卷^③。

采用三十八个门类的版本有邵本(其人未详)和黄(庭坚)本。该本在三十六个门类之外,增添“直谏”“奸佞”两门,分别为三十七卷和三十八卷^④。

三十九个门类版本有颜氏本和张氏本。这两个版本实际上是在三十八门所增“直谏”“奸佞”两门的基础上,又增加了“邪谄”一门,凑成三十九门。其中颜本只载全文保留《直谏》一门,其余二门有目无文。张本又将《邪谄》一门位置调整在《奸佞》之上^⑤。汪藻认为,多出这三门皆为正史中事,不仅缺注,而且文字“舛误不可读”,所以全部删去,保留三十六门。不过今传宋代孔平仲《续世说》共三十八门,其中三十五个门类承袭《世说新语》原书,放弃原书《豪爽》一门,而其余三门名称则取自被汪藻删除的“直谏”“奸佞”“邪谄”三个门类名称。从门类名称看似是三十九门版本再现。但检其书内容,所收皆为宋齐梁陈隋唐间事,说明其并非《世说新语》旧本。但既然孔平仲见过并吸收使用,则至少可以证明,被汪藻删除三门的原三十九卷本,宋代仍然还在社会上传播^⑥。

五、关于评点与批注

评点、批注是中国文艺批评的重要形式,它既是研究者交流研究心得体会的园地,也是读者获取阅读理解作品的重要渠道。《世说新语》的注释和评点是这项工作中具有领衔

① 参见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第三章《世说新语》第一节《成书和作者》,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② 见汪藻《叙录》,思贤讲舍本《世说新语》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③ 参见汪藻《叙录》,思贤讲舍本《世说新语》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⑥ 参见宁稼雨《中国志人小说史》第六章第四节,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和代表性意义的重要文献。

最早为《世说新语》作注的人是南朝齐人敬胤,他的注本已经亡佚,今仅存五十一条,其中十三条无注,见汪藻《考异》。流传至今而最负盛名的旧注本,是南朝梁人刘孝标的注本。刘孝标博综群书,所引史书、地志、家传、谱牒等书籍达四百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这些古籍十之八九已经亡佚,所以刘孝标的注除了注文本身具有赅洽、详密的特点外,其引书的宏富向来为辑佚家视为珍宝。目前所见《世说新语》的重要版本都是刘注本,因此刘孝标的注与《世说新语》原书已经水乳交融,密不可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有部分注释本,主要是面向社会大众的普及本。比较通行的有张万起、刘尚慈的《世说新语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还有李毓芙的《世说新语新注》(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等。

从宋代开始,就出现了《世说新语》的评点本。最早对《世说新语》批点的是南宋刘辰翁。他和刘应登、王世懋等人的批点,见明代凌濛初刻印的套色印本,八卷。此外还有明代王世贞的批点本,八卷,万历十四年(1586)余碧泉刻印。李卓吾批点本,二十卷,明代万历十四年太仓王氏刻本。这些评点本后来都没有重印过,一般读者查找使用这些材料非常不便^①。值得欣慰的是,前南开大学图书馆研究员朱铸禹先生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将各家注本评本汇集校勘,完成了《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为人们接触使用前人有关《世说新语》的评注材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嗣后,年轻学人刘强教授也整理编成《世说新语会评》(江苏凤凰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在朱铸禹先生工作基础上又有所订补,可谓长江后浪推前浪。近年以来,这项工作又有新成果不断问世,把这项工作继续向前推进。继周兴陆《世说新语汇校汇评汇注》(凤凰出版社2017年版)登场之后,又有羊列荣《世说新语评注辑存》(文物出版社2021年)陆续出版。尤其可喜的是,浙江古籍出版社的“批校经籍丛刊”中于2025年影印出版了国家图书馆藏明代袁褰嘉趣堂刻本,该本含

有冯舒批校,何煌校并过录陈景云、蒋杲等人校语,为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重要的《世说新语》批校版本,从而为《世说新语》批注评点文献向社会大众普及做出了重要贡献。

[参考文献]

- [1]刘兆云.《世说》探原[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Z1):6-13.
- [2]郑学弢.《世说新语》的思想倾向与成书年代[J].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4):27-31.
- [3]萧艾.《世说》探幽[M].长沙:湖南出版社,1992.
- [4]孙猛.日本国见在书目录详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 [5]汪藻.叙录[M]//影印思贤讲舍本《世说新语》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6]刘知几.浦起龙释《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7]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 [8]陆游.世说新语跋[M]//明袁褰嘉趣堂刻本《世说新语》,涵芬楼《四部丛刊》影印,1922.
- [9]黄伯思.跋世说新语后[M]//《东观余论》卷下,丛书集成初编第360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
- [10]沈涛.世说新语[M]//铜熨斗斋随笔卷七,丛书集成初编第79册.北京:中华书局,2010.
- [11]永瑢.世说新语提要[M]//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
- [12]余嘉锡.世说新语辩证[M]//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1980.
- [13]颜师古.汉书艺文志注[M]//班固.汉书艺文志附.北京:中华书局,1997.
- [14]向宗鲁.说苑校证·叙例[M].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5]叶德辉.《世说新语》佚文序[M]//影印思贤讲舍本《世说新语》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 [16]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 [17]刘义庆撰,余嘉锡笺疏.世说新语笺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3.

(责任编辑 南山)

^① 详见笔者《世说新语版本考论》,凤凰出版社即将出版。

《西游记》“宝物”的精神意义与文学性表达

丰 竞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江苏南京 211200)

[摘要] 明清通俗小说皆擅写“宝物”,表现出强烈的“宝物崇拜”意识。“宝物崇拜”是人类幻想挣脱来自物质与精神的束缚的一种普遍的心理需求,是小农经济的必然产物。宝物与魔法是两位一体的关系,是以《西游记》为代表的神魔小说中不可或缺的幻想元素。在《西游记》中,不论是作战类宝物,还是非作战类宝物,它们的身上都深深镌刻着民间信仰与神话色彩的痕迹,更呈现出作者对于宝物的文学性与个性化的创造,宝物不再是财富的象征和欲望的具化物,而是正义战胜邪恶、生命获得自由的精神载体。

[关键词] 《西游记》; 宝物崇拜; 兵器; 作战; 魔幻

[中图分类号] I207.4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4-0064-11

自念所获,必璠宝也。由此目最明,凡有珠宝之处,黄泉下皆可见;即素所不知之物,亦随口而知其名。于寝室中,掘得藏镪数百,用度颇充。后有货故宅者,生视其中有藏镪无算,遂以重金购居之。由此与王公埒富矣^{[1]368}。

原始思维中“万物皆有灵”和“万物皆备于我”中的“万物”,也包括身体以及为人类使用的动物和器物,它们因为通灵且具有神奇的功能而成为宝物。宝物在幻想文学中无处不在,《聊斋志异》中这个能帮主人发现宝物而让他成为巨富的璠宝,是宝物中的宝物。宝物是珍贵的,其“珍贵”表现在宝物不仅能给人们带来物质财富,还能让人们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和精神上的享受,甚至是实现理想或愿望的工具。与现实世界中的宝物不同,幻想世界中“宝物”的实质是能以便捷的方式获得较大利益的“虚妄”之物。神仙是拥有宝物的特权阶级,妖魔的宝物大多来自神仙,且拥有宝物的妖魔往往缺乏智慧;即便凡人拥有了宝物,宝

物也是用来检测他们德行的工具,且不能长期据为己有。取经团队的宝物只有袈裟、钵盂等象征物,以及棍杖、钉耙等纯粹用于作战的兵器,与妖魔们的高阶宝物形成鲜明的对比,由此衍生出孙悟空和妖魔们偷宝、骗宝、失宝、斗宝、夺宝、毁宝、归宝等一系列有趣的故事。《西游记》中的宝物主要包括作战类宝物与非作战类宝物。

一、《西游记》中的作战类宝物

作战类宝物主要指兵器。我国古代兵器的发展,主要经历了原始社会石质与竹木兵器(同时也是劳动工具)时期,夏、商、周、春秋、战国的青铜兵器时期,战国至西汉的铁制兵器时期(仍以青铜兵器为主,至西汉逐渐被铁制兵器取代),以及唐宋元明的火器时期(清代火器制造停滞不前,远远落后于西方)。

中国古代战场上常用的兵器分为冷兵器和原始的热兵器。冷兵器主要包括枪、矛、戈、戟、刀、剑、斧、钺、锤、鞭、铜、弓、弩等攻击性兵

[收稿日期] 2026-01-15

[作者简介] 丰 竞,女,内蒙古包头人,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

器,以及甲冑、盾牌等防护性兵器。其中,攻击性兵器又可分为长兵器和短兵器、硬兵器和软兵器。兵器是战士和英雄们的标配,是他们身份的象征。无论赤手空拳的实力如何,倘若没有兵器,都会在战斗中处于劣势。《西游记》中的混世魔王在与孙悟空交手前,首先关心的就是孙悟空“怎生打扮,有甚器械”:

(1)那魔王伸手架住道:“你这般矮矮,我这般高大,你要使拳,我要使刀,使刀就杀了你,也吃人笑,待我放下刀,与你使路拳看。”^{[2]18}

混世魔王虽身为妖魔,但他讲公平,重脸面,颇有江湖义气。他见孙悟空没有兵器,便提议放下自己的大刀,与孙悟空空手较量。这

次事件让孙悟空认识到兵器的重要性,他盗取了敖来国的兵器库,将自己队伍中的竹木兵器换成了先进的金属兵器,一时名声大噪。但是,“凡兵不堪用”,孙悟空并不满足这些普通兵器,在老猴子的提议下,去东海龙宫强占了敖广的定海神铁,从此凭借这条神铁横扫天下。除了这件《西游记》中最为神奇的兵器外,神仙与妖魔的兵器也各有千秋。《西游记》因故事多发生在山野陆地,受环境影响,兵器以步战类为主,几无水战类,也无正规统一的骑战类,这些都与历史题材作品中的兵器有很大不同。《西游记》中的兵器按形制和功能可分为以下几类:

表 1 《西游记》中的短兵器

兵器	功能	来源及使用者	回数
砍妖刀	砍杀	太乙真人赠送哪吒	4
天罡刀	变化;缚敌	李天王赠送观音菩萨	42
钢刀	砍杀	辟暑大王	91
钢刀	砍杀	银角大王	32
钢刀	砍杀	黄袍怪	28
钢刀	砍杀	青狮怪	75
赤铜刀	砍杀	虎先锋	20
斩妖剑	刺杀	哪吒	4
青锋宝剑	刺杀	乌鸡国太子	37
青锋宝剑	刺杀	铁扇公主	59
宝剑	刺杀	虎力大王	45
宝剑	刺杀	蜈蚣精	73
七星剑	打斗	属太上老君,被金银角偷盗	32
双股剑	打斗	金鼻白毛鼠	81
斧	砍杀	巨灵神	4
斧	砍杀	辟寒大王	91
宣花斧	砍杀	金毛犼 赛太岁	71
钺	打斗	伏狸狮精	90
九瓣铜锤	锤击	金鱼精运炼观音未开菡萏	49
铜锤	锤击	白泽狮精	90
降妖杵	击打	哪吒	4
降妖杵	击打	木叉	42
铁杵	击打	豹子精	86

兵器	功能	来源及使用者	回数
捣药杵	击打	属太阴星君,被玉兔精偷盗	95
蟠龙拐	击打	白鹿精变化南极寿星的拐杖	79
三棱筒	抽打、击打	西海龙王太子摩昂	43
三楞筒	抽打、击打	雪狮精	90
短软狼牙棒	抽打、击打	黄眉怪变化佛祖的磬槌	65
铁蒺藜	击打	猱狮精	90
如意钩	打斗、钩人致倒	如意真仙	53
新月弓	射击	二郎神	6
雷掇	击打	雷公	52
金刚琢	击打、套物	属太上老君,被兕大王偷窃	52
绣球儿	投掷	哪吒	4
绣花针	破多目怪的金光	毗蓝菩萨	73

《西游记》中的短兵器主要有刀、剑、斧、钺、锤、杵、拐等,也包括弓、琢、球等远程掷射类兵器,既可用于攻击,亦可用于防护。历来长短兵器在尺寸上并无严格区分,如刀、剑,随用途不同而长短有别。短兵器携带方便,适合近距离使用,杀伤力不可小觑,如明清盛行的腰刀等。《西游记》的短兵器中,刀剑使用最为普遍,不分贵贱,仙妖皆喜用。“剑”作为作战武器,在汉后逐渐被刀取代,其功能为佩带,成为舆服制度的组成部分,或作为宗教法器,具有祛邪镇魔的作用,是一种古老的兵器。神仙的刀剑自然是用来对付妖魔的,所以常冠以“砍(斩)妖”的名头。

伏狸狮精和犀牛精使用的“钺”出现于早商,形制似斧,是一种古老的礼兵器;摩昂与雪狮精使用的“筒”应为“铜”,是一种无刃、有柄,三棱或四棱的重量型兵器,西海太子摩昂用铜助孙悟空擒拿三只犀牛精,又以铜击败表弟鼍龙怪,其威武形象光耀了西海门面,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2)混战多时波浪滚,摩昂太子赛金刚。喝声金筒当头重,拿住妖鼍作怪王。这太子将三棱筒闪了一个破绽,那妖精不知是诈,钻将进来,被他使个解数,把妖精右臂,只一筒,打了个躐踵;赶上前,又一拍脚,跌倒在地^{[2]398}。

猱狮精使用的铁蒺藜,锤头加有锐利的尖

刺,是锤的改良型,或长柄版的狼牙棒,与作为障碍类、俗称“扎马钉”的铁蒺藜不是同一种兵器。

“‘绣球儿’来源较早,宋洪迈《夷坚志》即记当时道士以‘哪吒火球咒’发火球灭妖,后演化为绣球,内藏各种被哪吒降伏的精怪,施法时可以放出来助战。”^{[3]60}绣球内藏精怪的用法在《西游记》中并未出现,哪吒的绣球儿属投掷类兵器。《西游记》中另一个重要的投掷类兵器就是金钢琢,太上老君用其击中孙悟空,使之被俘,后该金钢琢又被金角、银角偷走,带至凡间做恶。老君称金钢琢善变化,又善套物,应是马上民族的古老兵器,“当年过函关,化胡为佛,甚是亏他。早晚最可防身”,(第六回)金钢琢类似《封神演义》中哪吒的乾坤圈,哪吒曾用乾坤圈打死龙王太子敖丙和劲敌。圈琢类兵器戴于腕,可防身,可远掷,出手快,有快速割人脖颈的杀伤力。第七十三回中,毗蓝菩萨的绣花针是在其小儿昴日星君眼中炼就的,非钢非铁非金,可抛可收,曾破蜈蚣精的金光,让其现形,应该是作品中体型最小的兵器了。“针”是具有女性色彩的兵器,如《封神演义》第八十七回中写高兰英用太阳神针射中邓禅玉的双眼,趁机挥之马下,足见“针”作为暗器邪术的险恶。

表 2 《西游记》中的长兵器

兵器	功能	来源及使用者	回数
金箍棒	打斗,可变化,	孙悟空强占东海龙王	3
九齿钉耙	打斗	猪八戒	19
铁棍	打斗	木叉	6
藤棍	打斗	辟尘大王	91
混铁棍	打斗	牛魔王	60
闷棍	打斗	狻猊狮精	90
三尖两刃枪	砍杀	二郎神	6
黑缨枪	打斗	熊黑怪	17
楮白枪	打斗	小张太子	66
火尖枪	刺杀,烧杀	红孩儿	42
点钢枪	打斗	青牛精(兕大王)	50
钢枪	打斗	抟象狮精	90
枪	打斗	白象怪	76
软柄枪	打斗	蟒蛇精的蛇信子	67
方天画戟	打斗	狐阿七大王	35
方天戟	打斗	雕鹏怪	76
九齿钉耙	击打	猪八戒	8
降妖宝杖	击打	沙僧	8
飞龙宝杖	捉拿	灵吉菩萨	21
月牙铲	打斗	九头虫	63
四明铲	打斗	黄狮精	89
三股钢叉	打斗	黄风怪	21
三股钢叉	打斗	蝎子精	55

长兵器主要用于搏击,相较于短兵器的使用需要较大的施展空间。《西游记》中的长兵器主要有枪、戟、耙、棍、棒、铲、杖、杆、叉等,在品种和使用数量上比短兵器略少。枪与矛相似,枪头更短更锋利,逐渐取代矛,是用于刺杀的主要兵器,也是《西游记》中妖魔们使用最多的一种长兵器;戟是戈与矛的合成,有钩、啄、刺、割多种用途。狐阿七与大鹏怪使用的方天戟,是于枪尖两侧带有对称的月牙形锋刃的长兵器,只有一个月牙锋刃的称青龙戟,三国名将吕布因其“辕门射戟”为刘备解围而平添英名。《西游记》中的狐阿七大王也许正是因为武功平平,才需要使用如此多功能的兵器

来自卫,且他的戟是杆上带有彩绘装饰的画戟,他领的兵是两百多名女怪,最后被猪八戒一耙打死,作者为他设计的兵器与他有失阳刚的气质非常契合。与狐阿七大王对比的是作为顶级妖魔的雕鹏怪,当他拿着方天戟向孙悟空打来时,孙悟空不敢怠慢:

(3)那大圣正当悚惧,只听得耳后风响,急回头观看,原来是三魔双手举一柄画杆方天戟,往大圣头上打来。大圣急翻身爬起,使金箍棒劈面相迎^{[2]696}。

作为如来的外甥,雕鹏怪手持方天画戟,双翅舒展,携疾风从天而至,俨然一位“持戟之神”。至唐代,戟逐渐失去打斗的实战性,

成为象征文武官员等级的礼兵器,可见戟也是一种古老的兵器。《西游记》中随处可见各种兵器的表演,非常具有即视感:

(4)那猱狮精轮一根铁蒺藜,雪狮精使一条三楞简,径来奔打。八戒发一声喊道:“来得好!”你看他横冲直抵,斗在一处。这壁厢,沙和尚急掣降妖杖,近前相助,又见那猱猊精、白泽精与抟象、伏狸二精,一拥齐上。这里孙

大圣使金箍棒架住群精,猱猊使闷棍,白泽使铜锤,抟象使钢枪,伏狸使钺斧。那七个狮子精,这三个狼和尚……^{[2]808}

读者似乎可见长短兵器交错时的凛凛寒光,可闻兵器撞击时的铮铮作响,这是《西游记》中妖魔在战斗力上明显超过孙悟空兄弟三人的一场恶斗。

表 3 《西游记》中的软兵器

兵器	功能	来源及使用者	回数
七星鞭	抽打	镇元子	25
金鞭	抽打	灵官	7
钢鞭	抽打	鼍龙	43
蜘蛛网	绑缚	蜘蛛精	72
缚妖索	绑缚	哪吒	4
幌金绳	绑缚	太上老君所有,金角、银角偷走,让九尾狐狸保管。	34
纳锦背心	绑缚	青牛精(兕大王)	50
珍珠汗衫	绑缚	黎山老母	23
箍	致痛	如来、观音菩萨、唐僧	8

“鞭”最初为农具和刑具,《史记·伍子胥列传第六》记载了春秋时期伍子胥“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的典故,“鞭”后逐渐用于战场,至唐宋时成为主要兵器。“七星”即北斗七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吉祥和秩序的寓意,镇元大仙的七星鞭与太上老君的七星剑一样,显示了他们在道教体系中尊贵的身份和地位。在《封神演义》中,“混天绦”是哪吒的核心法宝之一,可自动改变长度、修复和捆绑敌人,《西游记》中的“缚妖索”为“混天绦”的前身,缚妖索捆过老鼠精和牛魔王,当与混天绦的功能相似,文中除“缚妖索子如飞蟒”(第四回)一句外,并无具体描写,远不如《封神演义》中对于混天绦的描写精彩。第三

十四回中,孙悟空抢劫了九尾狐狸的幌金绳,用它来绑缚银角大王,却因物随主便,又不知咒语,反被幌金绳绑缚,显得滑稽可笑。青牛精的背心和黎山老母的汗衫,是最具迷惑性的束缚工具,所以轻而易举地让贪财又贪色的猪八戒自投罗网。如来送给观音菩萨的三个“箍”只束缚身体最重要的部位——头,在咒语的加持下可不断收紧,让被束者头痛欲裂。紧箍儿束缚了孙悟空,禁箍儿束缚了熊黑怪,金箍儿竟然变成五个箍,束缚住了红孩儿的头和四肢,可见,红孩儿是性子最烈的一个妖魔。鞭和绳现实感较强,衣物和箍是最具魔幻色彩的软兵器,蛛网用于战斗则具有童话色彩了。

表 4 《西游记》中的防护类兵器

兵器	功能	来源及使用者	回数
乌金盔、乌铁甲	护身	混世魔王	2
铁盔、乌金甲	护身	熊黑怪	17
黄金锁子甲	护身	西海龙王赠送孙悟空	3
锁子甲	护身	狐阿七大王	35

实战中,盔甲与盾一样都属防护类兵器,文学作品在描写武士和将领时,惯以盔甲的材质与色彩暗示主人的等级尊卑。《西游记》中穿甲戴盔的妖魔很多,猪八戒、沙僧第一次出场时,都是金盔系腮,毕竟他们皆从天界而来;作为一只来自灵山的黄毛貂鼠,黄风怪修行得道,具有一定的慧根,自然也是金盔金甲;给唐太宗把门的尉迟恭、秦琼,也是金盔介甲。这些“高贵”的盔甲与土生土长的混世魔王、熊黑怪的铁盔乌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锁子甲”,又名环锁甲,由金属丝(套)环环相扣,弓箭不可射入,是防护功能最为强大的铠甲。狐阿七大王能力不强,锁子甲既符合

他的身份,也符合他的需求;孙悟空的黄金锁子甲是西海龙王敖闰所赠,应该是作品中最为贵重的铠甲,也是他作为作品主角的身份象征。

有趣的是,银角大王戴的盔是“凤盔欺腊雪”,形凤色白,有“银妆素裹”的美感;孙悟空有冠无盔,其冠为南海龙王敖钦所赠的凤翅紫金冠。“凤冠霞帔”本为古代贵族女性专属的礼服和装饰,银角大王与孙悟空的盔、冠都有“凤”的元素,为他们的形象增添了些许阴柔之美,这与二人思维的缜密与体态的灵动相符合,可见作者在设计人物服饰与兵器上的匠心独运。

表 5 《西游记》中的热兵器

兵器	功能	来源及使用者	回数
风火轮	飞行工具,烧杀	哪吒	4
紫金铃	熏、烧、吹	赛太岁偷窃观音菩萨	70
五行车	烧杀	红孩儿	41
火枪、火刀、火弓、火箭、火龙、火马、火鸦、火鼠、火车儿、火葫芦、火旗、火棒	烧杀	火德星君	51
火尖枪、三昧真火	烧杀	红孩儿	41

不论古代还是现代,火器一定比冷兵器高级,不到万不得已不会使用。《西游记》中的火器带有古老的神话色彩,其“火”为神火,而非凡火、天火(自然之火),亦与火药的使用无关,而与五行学说相关。作为火神,《西游记》中的火德星君是作品中使用火器最多的人物,他的职责本是“禳火灾”,但在作品中却是个放火的神仙:

(5) 经云“南方者火之精也。”虽星星之火,能烧万顷之田;乃三炷之威,能变百端之火。今有火枪、火刀、火弓、火箭,各部神祇,所用不一,但见那半空中,火鸦飞噪;满山头,火马奔腾。双双赤鼠,对对火龙。双双赤鼠喷烈焰,万里通红;对对火龙吐浓烟,千方共黑。火车儿推出,火葫芦撒开。火旗摇动一天霞,火棒搅行盈地燎。说甚么宁威鞭牛,胜强似周郎赤壁。这个是天火非凡真利害,焯焯火风红^{[2]469}!

火德星君的火器中,火兽最为神奇,其中

的火鼠在汉代东方朔的《神异经》中就有记载:“南荒之外有火山,昼夜火燃。火中有鼠重百斤,毛长二尺馀,细如丝,可以作布。”^{[4]212}火鼠在火中毫发无损,至于火是否为火鼠所生,以及火鼠为何身在火中,并未说明。火德星君用于火攻的神兽们不仅可以在火中生存,而且可以直接带火冲入敌阵,烧死对方。红孩儿的三昧真火也不是凡火,是经过三百年的修炼而成的,即使龙王的雨也不能泼灭,他的“三昧真火”与黄风怪的“三昧神风”一样富有宗教色彩,其中的“三昧”指“使心神平静,杂念止息,是佛教的重要修行方法之一”^{[5]1123},但妖魔们使用的火和风,似与佛教教义相悖。

哪吒的风火轮“见于《南游记》,本是华光的法宝,是从风火二桃化作的风火判官手里收缴来的”^{[3]60}。

(6) 妖王道:“那里有多少人马?”行者道:“我也唬昏了,又吃他打怕了,那里曾查他人马数目!只见那里森森兵器摆列着:弓箭刀枪

甲与衣,干戈剑戟并纓旗。剽枪月铲兜鍪铠,大斧团牌铁蒺藜。长闷棍,短窝槌,钢叉钺钹及头盔。打扮得靴鞋护顶并胖袄,简鞭袖弹与铜锤。”那王听了笑道:“不打紧!不打紧!似这般兵器,一火皆空。”^{[2]636}

孙悟空假扮成小妖有来有去,向金毛犼报告说,朱紫国军民排列了各种兵器,准备迎战。但是他编织的这套谎话并未吓倒金毛犼。金毛犼认为自己的三个会放火、放沙的金铃铛可以把所有的兵器全部烧毁,足见火器之厉害。该例中出现的“铁蒺藜”,与元代所造的陶蒺藜不同,后者内装火药,爆炸后杀伤力极大,属火器,而孙悟空口中的铁蒺藜是短式冷兵器。

取经前,孙悟空盗抢了傲来国的兵器库,这是获取金箍棒的一个前奏,其情节远不如黄狮精偷盗孙悟空三兄弟的兵器来得精彩。在第八十九回中,黄狮精让小妖们购买猪羊果品,大张旗鼓地庆祝“钉钯会”,其目的是一是炫耀财富,二是鉴赏兵器。这是一个只关乎兵器,而与唐僧肉无关的一个故事。狮精们与那些追求长生不老的妖魔们截然不同,他们更多表现的是雄性对于兵器喜爱的生物本能与尚武的精神需求。庆祝会以平时最受嘲笑的猪八戒的钉钯来命名,足见狮精深谙兵器之道,也为情节增添了喜剧色彩。

《西游记》中还有一些以自然物质作为攻击物的特殊“兵器”,除了红孩儿和金毛犼的火和烟,还有黄风怪的三昧神风、铃铛放的风和沙、罗汉用于陷人于死地的金丹砂等,这些自然物质因其强大的能量和破坏力而参与战斗。

二、《西游记》中的非作战类宝物

《西游记》中的非作战类宝物种类繁多。

第一类是护身养生类宝物,如唐僧的锦襕袈裟和九环锡杖,不仅有蔽体御寒、助力行走的实用功能,还有保护主人免遭毒害、免堕轮回的神力。《大唐西域记》卷九记载,佛陀将姨母所献金色袈裟传于迦叶,可见如来的锦襕袈裟也是传授法统的代表,转赠给唐僧后,象征了唐僧的身份与荣誉。宝物如此珍贵也会招致灾祸,锦襕袈裟就引发了金池长老的贪欲

之心,又被熊罴怪盗走;紫金钵盂为唐王所赠,本身就是佛家法器,唐僧用它化斋,得以生存,最后更是在灵山换取了真经;紫阳真人赠送给金圣宫娘娘的新霞裳,有防止妖魔近身、保护其贞洁的功能。

仙桃与人参果已是家喻户晓;红枣、交梨也非常珍稀,只有神仙才可享用。有趣的是,人间普普通通的“南瓜”却从俗物中脱颖而出,成为最具喜感和最有故事性的一种宝物,既是凡夫俗子的所爱,也是冥府阎王们的所爱,成为游走于阴阳两界的美味“使者”。作者围绕“南瓜”,用近三千字的篇幅,扩展了“刘全进瓜”的传说,衍生出刘妻还魂的故事,既是对于“死亡”的调侃,又是对于生命达观态度的一种幽默式表达。古籍中所载的奇草异木珍果,或形异、或味异、或功异、或秋冬不枯,可用于饰物、医病驱邪、惹思忘忧,但食之可长生不老者,只在神话等幻想文学中出现。

第二类是可变化,又可助力取经或参与打斗的宝物,如观音菩萨能发出指令的杨柳枝和能变成救命毫毛的杨柳叶、孙悟空能变成替身和各物的毫毛、沙僧能变成宝船的骷髅链等。与之相比,虽然老鼠精的花鞋显得低贱,但它能变成主人的替身,让主人及时脱身,也是妖精的宝物。

观音菩萨的净瓶与甘露、杨柳枝构成了“净瓶系统”。净瓶有投掷、容纳的功能,甘露是生命的本源,可使枯树(如人参果树)起死回生,杨柳枝则是播撒生命的工具。净瓶系统是菩萨慈悲为怀、普度众生的象征。所以,净瓶也是“德瓶”。李天王的手托之塔,全名“玲珑剔透舍利子如意黄金宝塔”(第八十三回),是如来所赐的佛家宝物。此塔源于哪吒与其父母“割肉还母,剔骨还父”的恩怨。如来以和为尚,同时也以塔中之佛所象征的权威震慑哪吒,使之不敢伤害天王。《西游记》中多次写到塔,尤以第六十二回唐僧在祭赛国金光寺扫塔的事迹为著。塔在佛教中有驱邪、佑安的寓意,唐僧“遇塔扫塔”,实则在扫除内心的杂尘,是重要的修为表现。

表 6 非作战类宝物

类	宝物	功能	来源及使用者	回数
护生养生类	锦斓袈裟	象征身份、免堕轮回	如来所有,唐太宗转赠唐僧	8
	织金袈裟	象征身份、荣誉	唐太宗送唐僧	11
	凤翅紫金冠	象征高贵的身份	南海龙王送孙悟空	3
	新霞裳	护身	紫阳真人赠送金圣宫	71
	九环锡杖	助行、不遭毒害	如来所有,唐太宗转赠唐僧	8
	紫金钵盂	佛宝、化斋	唐太宗赠送唐僧	12
	白玉盂	可盛黄河之水	水伯	51
	黄金宝塔	镇邪护身	李天王	83
	骷髅项链	组装法船	沙僧	22
	定风丹	定风、防风	如来赐予灵吉菩萨	59
	定风桩	定风、防风	黄风怪	20
	辟水珠	防水护颜	井龙王	38
	定颜珠	保存尸身	龙王	38
	白玉圭	礼器、凭证	乌鸡国国王	37
	舍利子	佛宝	九头虫偷窃金光寺	62
	九叶灵芝草	涵养舍利子	万圣公主	62
	九转金丹	长生	太上老君,孙悟空偷窃	5
	黍米之丹	救活禽兽	福禄寿三星	26
	九转太乙还丹	治世间生灵	帝君	26
	玲珑内丹	医病	黄袍怪	31
	九转还魂丹	救活乌鸡国国王	太上老君送给孙悟空	39
	七返火丹	长睡	太上老君,青牛精偷窃	52
	红丸子	解毒救命	毗蓝婆	73
	三花九子膏	治眼病	护教伽蓝	21
	仙桃	长生不老	王母娘娘;众仙	5
	人参果	长生不老	镇元子	24
	红枣、交梨	延生	赤脚大仙、南极寿星	7、79
	南瓜	答谢	唐太宗	11
	杨柳枝	指令	观音菩萨	26
	杨柳叶	变化	观音菩萨	15
	毫毛	变化替身、各物	孙悟空自有、观音赠送	2、15
	花鞋	变化替身	老鼠精	81
	照妖镜	现形	李天王	6
	照妖镜	现形	文殊菩萨	39
	宝珠净瓶	盛水、灭火	观音菩萨	42
助战类	羊脂玉净瓶	吸人将其化为脓水	太上老君所有,金角银角偷拿	33
	阴阳二气瓶	吸人将其化为脓水	大鹏金翅雕	74
	红葫芦	组装法船	观音菩萨	22
	紫金葫芦	吸人将其化为脓水	太上老君、银角大王	33
	袍袖	笼物、囚藏	镇元子	25
	人种袋	囚禁	弥勒佛、黄眉怪	66
	如意皮袋	囚禁	红孩儿	41
	紫金铃	放火、放烟、放沙	观音坐骑金毛犼项上的金铃	70
	金铙	囚敌	黄眉怪弥勒佛	65
	芭蕉扇	生成火、风、雨	铁扇公主	59
	芭蕉扇	炼丹助火、生成火	太上老君所有,金角银角偷拿	34

“镜子”在人类历史上经过了石镜、铜镜和玻璃镜的发展阶段。玻璃镜在明朝由欧洲传教士引入中国,并在清中后期逐渐取代了铜镜,《西游记》中的照妖镜应该都是铜镜。镜子最初、最主要和最永久的功能,就是人类可以在镜中凝视自己的外貌。镜子在幻想文学中的基本功能是“现形”,强调的不是镜子的映现功能,而是镜子的透视功能,通过透视,映现出他人的本相。因此,幻想文学中“镜”的使用非常普遍,如《西游记》中李天王的照妖镜,能在芸芸众生中精准锁住妖魔,在《封神演义》中,杨戬的照妖镜称为“照妖鉴”,强调了其“甄别”的功能。有趣的是,“镜”的“甄别”和“现形”功能还引申出“预徵”的功能,在《聊斋志异·凤仙》篇中,狐女凤仙送给书生一面镜子,书生若志衰废学,镜中凤仙则容戚,书生若研读不辍,镜中凤仙则容笑。书生“如此二年,一举而捷”,镜子成为激励书生实现“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宝物;在《红楼梦》第十二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中,道士送给贾瑞一面“风月宝鉴”,镜子正面里王熙凤的影像让贾瑞命丧黄泉,镜子背面里的骷髅成了他死亡的预徵。这两面镜子,不仅能保存影像、变换影像,还能决定人的贵贱与生死,映照出人心与归宿,将镜子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是“镜子崇拜”的终极思维。

非战斗类宝物中特别需要说明的是瓶、铃、铙、葫芦、袍袖、囊袋等宝物,它们都有一个主要和共同的特点——中空。一方面,这类宝物可藏储、防御,给人以很强的安全感;同时“葫芦崇拜”所代表的人类对于中空或包裹类宝物的崇拜,与原始的“洞穴情结”密切相关。洞穴给人以安全感和神秘感,而洞穴情结又源自人类生命的孕育地和出生地——子宫,因而也是一种生殖崇拜,表现了生命回归与重生的潜意识,“孙悟空被吸进银角的葫芦中,这与他居住于岩洞,被压制在岩石缝、被压在大山下相同,都是屡屡回归母胎,反复运动的一环”^{[6]484}。在《西游记》与《封神演义》中,“葫芦崇拜”却被极大魔幻化、邪恶化了,突出了

这类宝物因其空间的限制,而具有的囚禁甚至消解化无的功能,给人以生存的危机感。“葫芦”由象征安全空间、生存空间到象征禁锢空间、博弈空间的转变,反映了人类自由意识的觉醒,也是生与死循环往复的运动体现。

“人种袋”是佛家宝物,出身不凡。早在南宋周密的《鸡肋编》中就有相关记载:“昔四明(即明州,今浙江宁波一带)有异僧,身矮而蟠腹(大腹),负一布囊,中置百物,于稠人时倾泻于地,曰:‘看看!’人皆目为布袋和尚。临终作偈曰:‘弥勒真弥勒,分身千万亿。时时识世人,时人总不识。’于是隐囊而化。”^{[4]37-38}此布袋可使其中之物“倍售而获利多也”,同时又可消解其物,布袋和尚最终在自己的布袋中圆寂,象征功德圆满,诸恶寂灭。此布袋即《西游记》中人种袋的前身,在第六十五回中,黄眉怪窃取弥勒佛的“人种袋”,囚禁了孙悟空和普天神将,令他们“骨软筋麻,皮肤窠皱”,丧失了战斗力。布袋和尚的布袋“虚空无挂碍,展开遍十方,入时观自在”,在《西游记》中却被弱化甚至摒弃了所象征的佛教教义——容纳与忍辱,强化了宝物毁灭生命的杀伐功能。总之,中空之物内涵丰富,值得探讨。

三、《西游记》中宝物的特点

第一,具有浓厚的神话色彩

《西游记》中的一些宝物来自神话传说,如金箍棒是“大禹治水之时,定江海浅深的一个定子”,(第三回)重一万三千五百斤,其神奇之处表现为“如意”,即随心所欲地“变化”;太上老君的紫金红葫芦,是混沌初分之时,于昆仑山下的一根仙藤所结,铁扇公主的扇子“本是昆仑山后,自混沌开辟以来,天地产成的一个灵宝,乃太阴之精叶,故能灭火气”,二者都和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的神话相关;(第三十五回)玉兔精自称其捣药杵来自广寒宫,“混沌开时吾已得,洪蒙判处我当先”,(第九十五回)与“嫦娥奔月”的神话相关。神话传说从时间的维度增加了宝物文化的厚重感。

第二,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法器”,指“和尚、道士等举行宗教仪式时所用的器物,如钟、鼓、铙、钹、木鱼和瓶、钵、

杖等”^{[5]355}。汉化佛教法器除钟磬铃等鸣器类外,还有用于寺院内部装饰的庄严具,如幢、幡等;佛像前的种种供奉用具,如香炉、烛台、花瓶等;僧人修行和生活的用具,如数珠、钵、禅杖等^{[7]9}。《西游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法器是钟、鼓、磬、木鱼等鸣器,主要用于报时、课诵、讲经等。道教的许多法器与佛教法器相同,如太上老君和观音菩萨都有净瓶,但功能有所区别;金翅雕鹏的阴阳二气瓶则融合了佛道两教的色彩,来自灵山的金翅雕鹏是佛母大孔雀明王菩萨的兄弟,如来的舅舅,属于佛教体系,同时,雕鹏又融入了庄子鲲鹏的形象元素,他的宝瓶“乃阴阳二气之宝,内有七宝八卦、二十四气,要三十六人,按天罡之数,才抬得动”,(第七十五回)又具有浓厚的道教色彩。

《西游记》中的宝物之所以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主要在于这些宝物的主人分属佛、道两系,前者如莲花宝座是观音的坐台,李天王的玲珑宝塔和唐僧的紧箍,其原主人都是如来。金丹砂是十八罗汉的,金鱼精的九瓣铜锤是由观音菩萨未开的菡萏变化来的;后者如青牛精的金钢琢原主人是太上老君,白鹿精的蟠龙拐杖原主人是南极老人星,玉兔精的捣药杵原主人是太阴星君等。佛、道两教的宝物都有镇魔驱邪的作用,但佛教的宝物更强调修行与净化的功能,如舍利子;道教的宝物更强调修炼和长生的功能,如“丹”类宝物。

《西游记》中最具佛教色彩的宝物就是如来让观音菩萨转送给唐僧的锦斓袈裟和九环锡杖了:

(1) 菩萨道:“着了袈裟,不入沉沦,不堕地狱,不遭恶毒之难,不遇虎狼之穴,便是好处;若贪淫乐祸的愚僧,不斋不戒的和尚,毁谤佛的凡夫,难见我袈裟之面,这便是不好处。”^{[2]100}

(2) 菩萨道:“我这锡杖,是那:摩呵五祖游天阙,罗卜寻娘破地关。不染红尘些子秽,喜伴神僧上玉山”^{[2]100}。

这两件宝物体现了佛教的基本教义:破除世俗欲望,断除无明烦恼,不入六道,脱离

轮回。

《西游记》中最具道教色彩的宝物是太上老君的五件宝物:

(3) 葫芦是我盛丹的,净瓶是我盛水的,宝剑是我炼魔的,扇子是我煽火的,绳子是我一根勒袍的带^{[2]320}。

太上老君是拥有宝物最多的一位神仙,他的宝物都是用于长生不老,可惜被金角、银角偷走,去做了阻碍普度众生的勾当。在宝物的使用上,佛、道两系的界线并不十分分明,如为了降服红孩儿,李天王把天罡刀借给了观音菩萨,天罡刀配合莲花幻影收服了红孩儿,这是继孙悟空被伏后,佛道联手共同治妖的又一典范。当然,佛道两教也会合力诱妖生恶,如太上老君把八卦炉里炼就的紫金铃送给了观音菩萨,观音的坐骑金毛犼又偷盗了紫金铃去凡间滋事。宝物也可以反映佛道神仙的深层关系。

第三,具有浓厚的魔幻色彩

并非所有的宝物都被魔法化了,只有那些出身不凡的宝物才具有魔力,如铁扇公主的扇子能扇出风、雨、火,还与孙悟空的金箍棒一样,能变大变小;灵吉菩萨的飞龙宝杖可变化成八爪金龙,抓住黄风怪;如来的箍、太上老君的绳,在咒语的加持下,都可松可紧;黄眉怪的金铙可严丝合缝地将人囚禁,无需咒语加持便可随人形的改变而改变,是最为神奇的一件如意宝物。另外,葫芦、瓶、袋等吸入性宝物,铃、扇等发散性宝物,也都体现了宝物的“如意”性。第七十六回中,青狮怪能吞十万天兵的大嘴,白象怪能卷人致命的鼻子,蜘蛛精能射出蛛丝的肚脐,这些自产自生的宝物,显示出主人不需借助外力、外物的超人特质。“善变”和“如意”是宝物体现其神秘性与魔幻性的两个重要元素。

“如意”思维实质体现的是“应变”思维。“如意”思维不只存在于魔法世界,文学艺术创作中的移步换景、随物赋形,以及人生中的随遇而安、与时俱进等等,体现的都是“应变”的思维。“应变”首先要应自然而变,其次是应心意而变,这样的“应变”才可如意。“应

变”是人生的如意之宝,是人类智慧的体现。

第四,具有浓厚的个人色彩

《西游记》中人物众多,他们所处的空间、地位,所拥有的身份、能力各不相同,其使用的兵器和宝物成为他们展示个性的重要手段。作为“地仙之祖”的镇元大仙,无需用于格斗的兵器,其可揽乾坤的袍袖和用于惩罚对手的七星鞭,足以显示他的无边法力和至高地位。如果神仙们一定要使用兵器,通常也是远距离的投掷类兵器,如瓶、琢、球、针等,避免危险近身,其中不乏将非作战类宝物临时转变为兵器的用法;作者为李天王、辟暑大王、银角大王、黄袍怪、青狮怪、虎先锋等设计的兵器是刀,而为巨灵神、辟寒大王、金毛犼、狮精设计的却是斧、钺、锤,前者可衬托使用者的灵活,后者可以衬托使用者的凶猛;“枪”和“剑”轻便,通常为孩童或女性使用,尤其剑术变化多样,更适合女性,读者可从铁扇公主、老鼠精与孙悟空的打斗中,想见她们挥舞宝剑时身如飞凤的灵动与飘逸。女性也适合使用暗器,如蜘蛛精脐中射出的蛛网、毗蓝菩萨衣领里的绣花针等;作者给虎力大仙设计的兵器也是剑,剑在道教中有驱邪降魔的作用,非常符合虎力伪装的道士身份。

另外,有些宝物是依据主人或其他事物的形象而设计的,如第九十回中,猱狮是七个狮精中,毛发最多且蓬乱的一位,铁蒺藜就符合他的这一形象;金鱼精的九瓣铜锤来自观音菩萨池中菡萏的形象;如意真仙用钩子钩孙悟空的脚,让孙悟空两次跌倒,有一次还让他来了个嘴啃泥,这个钩子的使用既符合如意真仙阴险的性格,也适合塑造孙悟空滑稽的人物形象。非作战类宝物自然有明显的个性,而《西游记》中的打斗行为多属个人行为,因此,作战类宝物——兵器也颇具个性,即使集体作战中展示的兵器,形制也不统一,如天兵天将的兵器、八只狮子的兵器,皆异彩纷呈,令人眼花缭乱。

第五,具有浓厚的世俗色彩

《西游记》中的一些宝物在具有浓厚的神

话色彩、宗教色彩和魔幻色彩的同时,又具有浓厚的世俗色彩,这是非常难得的,也是作品的魅力所在。一些宝物外表平平,与现实生活中的用品无大差别,如葫芦、镜子、绳子、袍袖、口袋等,使用起来却十分魔幻,第六十五回中黄眉怪的人种袋,看上去就是一个“旧白布搭包”;一些出身不凡的宝物遭嘲笑和贬低,如孙悟空的金箍棒在唐僧、猪八戒、青狮怪的口中竟成了哭丧棒,沙僧的由吴刚、鲁班共造的降妖宝杖,被金鱼精嘲笑为磨坊里的擀面杖,猪八戒的九齿钉耙,又名“上宝沁金耙”,却被孙悟空、沙僧和金鱼精调侃为筑地种菜的农具,金鱼精的九瓣铜锤被猪八戒调侃为银匠铺里的打银锤。所以,宝物和凡物之间才能以假乱真,以真乱假。作者对于宝物世俗性的挖掘和表现,使宝物具有了娱乐功能,让它们在杀伐的同时,呈现出可亲可爱的一面。

中国小说历来有“重史尚实”的传统。但是,《西游记》“因文生事”而创造出的浪漫与“虚妄”,同样充实和丰富着我们的精神世界,这就是浪漫与虚妄的意义所在。

[参考文献]

- [1] 蒲松龄.聊斋志异·八大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2] 吴承恩.西游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3] 李天飞校注.西游记[M].北京:中华书局,2024.
- [4] 栾保群.中国神怪大辞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6] 中野美代子.西游记的秘密[M].王秀文,等译.北京:中华书局,2002.
- [7] 白化文.汉化佛教法器与服饰[M].北京:中华书局,2015.

(责任编辑 南山)

语文学科高阶思维的内涵、特征和教学实现

管开兵 李震

(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 江苏连云港 222006)

[摘要] 语文学科高阶思维成为当下语文教育界研究的高频词,它具有复杂的系统结构,既包含多种认知结构、情感要素,还包含认知结构与情感要素之间的交互关系。“结构”“要素”“关系”在相互影响中共同发挥作用,锤炼并提升学习者的语文学科思维品质。语文学科高阶思维主要体现在语言文字表达上,它具有六大特征:思维的情境场域性,思维操作机能的迁移性、判断性与创造性,思维呈现样态的形象性与审美性。其教学实现的核心路径包括建构真实情境,形成问题思辨,破解思维密码,生成语言创新,达成价值创生。

[关键词] 语文学科; 高阶思维; 内涵和特征; 教学实现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4-0075-09

近年来,“语文学科高阶思维”成为当下语文教育界研究的高频词,这是对高阶思维的研究向学科高阶思维研究的必然延伸。语文学科高阶思维的内涵是什么? 具有哪些基本特征? 如何在教学中使语文学科高阶思维培育落地生根? 本文试就这些方面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语文学科高阶思维的内涵

语文学科高阶思维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把“思维发展与提升”作为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之一,提出要发展学生的“直觉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创造思维”的目标。因此,语文教育界对语文学科高阶思维的培育越来越重视,高阶思维从思维发展的连续谱系中得以凸显,成为一个需要专门对待和特别研究的领域。谷爽姿、杨李娜认

为,“基于高中语文教学的特点,高中生的语文高阶思维能力可包括分析思维能力、评价思维能力和创造的思维能力”^[1]。而这种语文高阶思维能力又是一种内在的、不可可视化的能力,需要运用一定的手段或者某种有效的方法让其“看得见”。张管凤认为,在语文学科阅读教学中的高阶思维认知活动主要分为以下三类:“评价与反思、整合与比较、转换与迁移。”^[2]这三者通常同时作用于高效学习,有时也交替进行。潘庆玉认为:“就语文学科而言,高阶思维主要指学生通过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等语文学习活动,在语言建构与运用、审美鉴赏与创造、文化传承与理解等方面表现出来的高水平思维品质以及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这些思维能力包含直觉思维、形象思维、逻辑思维、辩证思维和创造思维等形式。”^[3]这个界定把语文课程标准中

[收稿日期] 2026-02-24

[作者简介] 管开兵,男,江苏灌云人,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语文研究中心主任,正高级教师。

李震,男,江苏赣榆人,江苏省新海高级中学百年中国语文研究院院长,中学语文特级教师,正高三级。

规定的学科核心素养融进来,极富时代感;但把与“思维发展与提升”并列的其他三项核心素养都纳入“高阶思维”,又有“包罗万象”之嫌。孙宏志等人认为:“语文学科高阶思维是在一定的学习环境中,以语文学科知识与技能为载体,综合使用批判性思维能力与创造性思维能力背后的思维方法(如分析、比较、推理、综合、质疑、想象、判断、反思等),在内部与外部情感动机因素的激发、维持与促进下,在自我监控、反思、评价与修正的共同作用下发生的高级认知活动。”^[4]对“语文学科高阶思维”内涵的界定,首先应以“认知活动”作为其属概念,“认知活动”包括“思维”和“高阶思维”,这体现了“性质”;又把提供了“环境”“载体”“方法”等语文学科高阶思维所产生的“条件”作为种差,形成了包括内涵和外延的多维界定。语文学科高阶思维是在学生学习语文过程中产生的,具有过程性和抽象性。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结构,既包含多种认知结构,又包含情感要素,还包含认知结构与情感要素之间的交互关系;“结构”“要素”“关系”在相互影响中共同发挥作用,在动态发展中锤炼并提升学习者的语文学科思维品质。对语文学科高阶思维进行界定,提取其发生与发展的具体表现,归纳其行为表征和动态特征,有利于把握语文学科思维特点,认识语文学科思维发展规律,让语文学科核心素养落地生根。

在对既有研究进行审视与扬弃的基础上,语文学科高阶思维是指在语言实践活动中,为应对复杂情境与解决实际问题所调动的、以批判性与创造性为核心特征的综合性认知能力。它并非低阶认知的简单延伸,而是思维品质的结构性跃升。其内涵可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阐释:

首先,从属性上看,它是一种高级认知活动。它超越了以记忆、理解为代表的低阶思维,强调在语文学科特定的“学习环境”中,以“语文学科知识与技能为载体”,综合运用分析、比较、推理、综合、评价、质疑、创造等一系列思维方法。

其次,从过程上看,它具有动态系统性。它并非静态的知识储存,而是在“自我监控、反思、评价与修正的共同作用下”不断发展的思维过程。这一过程兼具“过程性和抽象性”,是一个由多种认知结构、情感要素及其复杂交互关系构成的动态系统,在“结构—要素—关系”的协同作用下锤炼思维品质。

最后,从功能与表现上看,它指向深度的语言运用与问题解决。它紧密依托“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等语文学习活动”,最终外化为高水平的思维品质及解决复杂语言文化问题的能力。它尤其体现在“评价与反思、整合与比较、转换与迁移”等认知活动上,是分析、评价、创造等关键能力的综合体现,其核心在于思维的情境场域性,思维的操作机能的迁移性、判断性与创造性,思维的呈现样态的形象性与审美性。

二、语文学科高阶思维的特征

语文学科高阶思维在直觉、形象、逻辑、辩证与创造等思维形式的综合运作中生成,其本质特征深深植根于以语言文字运用为媒介的学科实践。除具备高阶思维的一般共性外,其在发生条件、核心运作与成果呈现上展现出独特的学科品性,可以将其归纳为三大层面:作为生成基础的情境场域性,作为心智过程核心的迁移性、判断性(批判性)与创造性,以及作为外显成果突出标志的形象性与审美性。此六者共同构成了语文学科高阶思维的特征谱系。

(一)根基性特征:思维的情境场域性

语文学科高阶思维并非在真空中运行,而是在特定的“场域”中发生与发展。“场域”作为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理论的重要范畴,在语文学习中表现为一种时空统合、物理与意义交织的关系性空间。该场域性体现为以下维度:

其一,场域是思维发生的依存条件。任何语言文字的表达与思维活动都离不开具体情境。从屈原辞赋的楚地风华,到司马迁《史记》的史官传统,再到欧阳修滁州山水间的“太守之乐”,其独特的思维成果均深受特定自然、社会与文化场域的浸润与塑造。课堂本

身也是一个由师生互动、对话构成的关系场域与精神场域,其中充满了力量的博弈与精神的投射,直接形塑着学生的认知结构与表达方式。

其二,场域是思维互动的实践平台。语文学习场域的本质是互动。师生、生生在“身体共在”的互动中,围绕共同焦点进行理解与解释,形成共享的情感体验,这是磨砺思维品质的重要形式。同时,场域具有时间维度,如戴望舒《雨巷》中其情感意蕴的展开便暗含着一从“希望”到“邂逅”再到“失落”的幽微心理时间线,这也是一条暗置的生命时间线,构建了解读诗歌意义的关键场域。作家在文本中营造的时间场域,是引导学生进行深度解读的思维路径。

其三,场域是思维发展的技术赋能空间。随着元宇宙概念的出现,一种融合物理、数字与精神世界的新型学习场域得以建构。其沉浸性、跨时空与泛在互联的特性,为高阶思维培育提供了临场感更强、资源更丰富、评价更个性化的三维空间。

(二)过程性特征:思维操作的迁移性、判断性与创造性

在特定的场域中,语文学科高阶思维展现出其核心的心智操作机能,主要体现在迁移、判断与创造三个方面。

迁移性:实现知识经验的跨情境运用。迁移性是高阶思维发展的关键指标。语文学科的迁移,并非简单的知识复制,而是“高通路迁移”,即学习者能有意识地从具体情境中抽象出基本原理、策略或图式,并将其应用于新的复杂情境。它要求超越布鲁姆认知目标中的记忆、理解,深入分析、评价与应用环节,通过整合知识点,构建结构化知识图谱,解决文本世界、生活经验与真实社会相阻隔的问题。这种迁移往往是多阶段的序列化过程,学生通过比较、类比等方法,将静态的学科知识结构转化为可灵活调用的动态认知结构。尽管语文作为人文学科,其迁移具有模糊性、情境性等特点,但正是这种对概念、方法和情感的深度迁移,标志着思维品质的真正提升。

判断性(批判性):进行理性的审视与抉择。判断性,即批判性思维,是高阶思维的核心品质。它体现在语言文字表达这一有目的、需自我监控的过程中。具体而言,它要求主体能清晰界定问题,分析其背景与成因,基于证据与逻辑进行推理,保持开放心态,并做出有前瞻性的判断。这是一个集立场、探究、整合、推导、结论于一体的理性过程。例如,诸葛亮“舌战群儒”时“对答如流”,正是其基于全面信息、敏锐观察和缜密分析,对社会规范、人物能力进行精准评判的高阶思维呈现^[5]。这种判断力是形成独立见解、应对复杂信息环境的基础。

创造性:生成新颖独特的观念与表达。创造性是人类思维的最高形式,在洪堡特看来,“语言本身则是智能创造力的产品”^{[6]21}。语文学科高阶思维的创造性,体现在能运用已知信息,产生新颖、独特、有价值的言语产品。它不仅是思维的第一性,通过言语得以存在与表达,更是对现实的某种超越。从《荷塘月色》的独特意象创造,到经典文本的永恒魅力,无不源于作者的高阶思维活动。语文教学引导学生创造性地运用语言文字,以灵动、形象、深刻、新颖的表达取代机械的知识复现,正是培育其高阶思维的根本路径。判断性与创造性常为一体两面,批判性思维为创造性提供审视基础与发展方向,创造性思维则是批判性思维的升华与成果。

(三)表现性特征:思维呈现的形象性与审美性

语文学科高阶思维的运作成果,在呈现样态上具有鲜明的形象性与审美性,这是其区别于其他学科思维的显著标志。

形象性:思维运作的具象载体。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具有为思维赋形的功能。语文学科高阶思维绝非纯粹的抽象推理,而是与形象思维紧密结合。莱辛主张诗应“化美为媚”,追求一种“动态中的美”^{[7]132},这正揭示了高阶思维在语言表达上的形象性追求。朱自清在《荷塘月色》中,通过比喻、通感等手法将荷叶、荷花、清香转化为“舞女的裙”“明珠”

“星星”“歌声”等一系列生动意象,构建出极具画面感的意境。这种形象的呈现,是作者驾驭语言、释放其形象功能的高阶思维成果,能深度诱发读者的生活经验与想象,达成心灵的共鸣与思维的共振。

审美性:思维活动的价值追求。马克思指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8]53}。语文学科高阶思维活动及其成果,内在蕴含着对美的规律的遵循。无论是老子、庄子的“心斋”“坐忘”以悟道,还是文学创作中对意境的营造,都是一个超越一般性认知与情感表达,进入审美创造的高阶思维过程。此时的言语符号,已从单纯的认知或情感载体,转化为“具有认知语言符号与情感语言符号的双重性质”^[9]的审美符号。对语言文字节奏、韵律、意境、风格的品味与评判,其本身就是一种复杂的审美思维活动。因此,审美性不仅是思维成果的附加属性,更是贯穿于语文学科高阶思维运作全过程的价值导向与内在尺度。

语文学科高阶思维以场域性为生成土壤,以迁移性、判断性、创造性为核心运作机制,最终外化为具有形象性与审美性的言语成果。这六大特征相互关联,共同勾勒出语文学科高阶思维独特而丰富的内涵。

三、语文高阶思维的教学实现

语文学科高阶思维的培养需通过系统化教学策略实现。其核心路径包括:建构真实情境,将抽象知识转化为可感知的经验场域;形成问题思辨,通过层次性提问激发批判性思考;破解思维密码,揭示文本内在的逻辑与文化基因;生成语言创新,在言语实践中提升表达品质;达成价值创生,实现思维与价值的同步升华。

(一) 建构真实情境:搭建高阶思维发展的立体场域

真实情境的建构是激活高阶思维的基础。语文学习中的情境不仅是知识应用的背景,更是思维发展的“关系场域”“精神场域”和“互动场域”。通过多维情境的创设,能够将抽象的语文知识转化为可感知的经验,促使学生在真实或拟真的语言实践中发展分析、评价与创

造能力。

情境作为认知桥梁,将抽象概念具象化,是思维从低阶向高阶跃迁的关键支点。首先,融合学科情境与生活情境。教师应挖掘课文中的学科知识与社会生活的连接点,比如在教学《劝学》时,可以创设“当代学习困境探讨”情境,引导学生对比荀子的学习观与当今终身学习理念,分析“青出于蓝”的现代教育意义。其次,设计角色代入式情境。角色代入式情境通过身份转换打破思维定式,能够实现认知视角的创造性转换。比如教学《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时,教师可以让学生扮演林冲的心理分析师,绘制其情绪变化曲线,并结合“逼上梁山”的社会背景撰写人物命运分析报告。这种角色沉浸能深度触发共情与批判思维。时空场域的构建打破了线性思维的局限,在历史与现实的对话中拓展思维的纵深度。再次,利用时空场域激发思维张力。教师在教学《沁园春·长沙》时,可以引导学生对比1925年的革命背景与当今新时代语境,组织“青年与时代责任”跨时空对话论坛,使学生在时空维度中拓展思维的深度与广度。最后,探索元宇宙技术赋能的新型场域。元宇宙通过虚实融合打破物理空间限制,为高阶思维培育提供沉浸式环境。例如,教师可以利用虚拟场景重现《鸿门宴》中“项庄舞剑”的紧张局势与权力博弈,使学生直观感受司马迁笔下的历史张力与人物抉择的复杂性;或通过跨时空互联资源支持比较阅读,如对比不同影视剧改编对《红楼梦》中林黛玉形象的诠释差异,激发学生对人物形象塑造、文化解读与艺术再创造的批判性思考。技术赋能的新型场域重构了学习空间,为思维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

真实情境的建构本质上是为高阶思维发展搭建多维立体的支撑系统。学科与生活的融合奠定了思维的现实基础,角色代入创造了深度体验的情感场域,时空对话拓展了思维的历史维度,而技术赋能则开辟了思维发展的新境界。这四种情境相互补充、彼此强化,共同构建了一个能够有效激活、支持和提升学生高阶思维的完整生态系统,使思维训练从抽象走

向具体,从单一走向多元,从表层走向深层。

(二) 形成问题思辨:推动思维纵向深化的核心引擎

问题思辨是锤炼高阶思维的关键路径,其本质在于通过系统性的提问设计,打破学生的认知平衡,引导他们超越表层的记忆与理解,迈向深度的分析、评价与创造。优质的问题如同思维发展的“导航仪”,能够精准锚定思辨焦点,追溯深层动因,并最终导向价值的重构与实践的转化,使学生的思维品质在持续的质疑、辨析与整合中获得实质性跃迁。

首先,问题设计必须具有清晰的层次性。层次性是确保思维得以循序渐进、由表及里深入发展的结构性保障。单一、扁平的问题难以支撑复杂的思维活动,而依据 SOLO 分类理论或“起点问题—延伸问题—提炼问题”的问题链框架,构建从“单点结构”到“抽象拓展结构”的递进序列,则能为学生搭建思维的阶梯。以《劝学》教学为例,教师可以设计如下层次化的问题链:起点问题(事实性层面),如,“荀子提出了哪些比喻来说明学习的重要性?”以此问题引导学生梳理文本基本信息,如“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木受绳则直”等,完成信息的识别与记忆。延伸问题(解释性层面):如,“这些比喻背后共同揭示了学习具有怎样的价值?荀子为何选择用这些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来类比?”以此问题促使学生分析比喻之间的内在关联,探究作者的说理策略,理解“积善成德”的积累价值。提炼问题(创造性/评价性层面):如,“在信息爆炸的今天,荀子强调的‘积累’与‘专一’对我们应对碎片化学习有何启示?请结合现实案例阐述”。以此问题引导学生将古典智慧与当代情境相连接,进行价值判断与创造性应用。这种层次分明的问题设计,能够有效引导学生从对文本局部的理解,走向对整体逻辑的把握,最终实现超越文本的迁移与创新,使教学呈现出清晰的递进效果,避免了思维的凌空蹈虚或停滞不前。

其次,问题设计必须蕴含恰当的挑战性。挑战性是激发和维持高阶思维活动的内在动

力。缺乏挑战性的问题无法引发认知冲突,而挑战性过强的问题则可能使学生望而却步。真正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通常介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它并非直接灌输答案,而是指向文本的核心矛盾或认知的盲点,要求学生整合多种信息、调动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才能应对。教师在教学《师说》时,可以设置表面性问题,如“韩愈批判了当时怎样的社会现象”;还有挑战性问题,如“韩愈为何将‘士大夫之族’的‘耻学于师’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不耻相师’进行对比?这种对比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看来是否可能被视为一种‘冒犯’?这反映了韩愈怎样的身份立场和论说勇气”等。前者仅需进行信息提取,后者则要求学生深入历史语境,分析作者的修辞策略、社会身份与论辩意图,触及了士族观念、社会阶层与知识权力等深层议题,思维强度与深度显著增加。这种挑战性问题迫使学生在“情理之中”与“意料之外”的张力中进行探究,能有效培养其思维的深刻性、敏捷性和独创性。

更为核心的是,无论是层次性还是挑战性,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深刻的思辨性。思辨是问题设计的灵魂,是驱动思维引擎的核心。它能够为学生思维过程带来关键的“疑”“辨”“融”“通”。以《拿来主义》的教学为例,所谓“疑”,即通过问题引发认知冲突,打破思维定式。教师可以提问:“鲁迅为何既反对‘闭关主义’,也批判‘送去主义’?‘送来’的东西又存在什么问题?”这个问题旨在激起学生对常见文化态度(如全盘接受或盲目排斥)的重新审视,产生“为何要‘拿来’”的真疑问。所谓“辨”,即在质疑后展开多角度、有依据的分析与论证。教师可引导学生辨析“鱼翅”“鸦片”“烟枪和烟灯”“姨太太”等比喻分别指代外来文化中的哪些成分,讨论“占有”“挑选”“创新”的具体内涵。在此过程中,学生需厘清概念,比较不同处理方式的利弊,思维从混沌走向清晰。所谓“融”,指在辨析基础上实现认知的整合与升华。教师可进一步追问:“在全球化与数字时代,我们应如何

运用‘拿来主义’的智慧对待外来文化和网络信息?”这促使学生将鲁迅的原则与当前复杂文化语境相融合,形成更具包容性和适应性的新理解。所谓“通”,则是将整合后的认知迁移应用于新的情境,实现思维的贯通。例如,让学生为校园网络文化节设计一份“当代拿来主义行动指南”,说明如何辨别、选择、创造性地利用外来文化元素。至此,学生的思维完成了从产生疑问、明晰概念、整合观点到实践应用的全过程,实现了对知识的意义建构和能力的有效迁移。

综上所述,问题思辨的设计艺术在于以层次性为思维搭建攀升的阶梯,以挑战性为思维注入不竭的动力,最终以思辨性为核心,引领思维经历从“生疑”到“辨析”再到“融通”的完整循环。唯有如此,问题才能真正成为点燃高阶思维的火种,而非简单的是非问询,从而切实推动学生思维品质向纵深发展。

(三) 破解思维密码:语文高阶思维培养的核心环节

破解思维密码是语文学科高阶思维培养的核心环节,旨在引导学生超越表层的文字理解,深入解构文本的深层逻辑、文化编码与言语策略。这一过程需要从文本结构、文化语境、言语组织三个维度协同推进,通过分析、综合与评价等认知活动,促使学生完成从低阶信息接收向高阶意义建构的思维跃迁。

1. 解析文本内在逻辑:构建思维的系统性

文本内在逻辑是作者思维结构的直接外化,包括论点推进、证据组织、层次衔接等要素。解析文本逻辑能帮助学生形成系统化思维模式,提升其对复杂信息的整合与推理能力。高中生的思维正从经验型向理论型过渡,通过梳理文本的逻辑链条,可训练其归纳与演绎、比较与分类等高阶认知技能。

以《谏太宗十思疏》为例,教师可引导学生绘制魏征的论证图谱:(1)比喻推理奠基(“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必浚其泉源”)→(2)历史规律佐证(“载舟覆舟”的治国警示)→(3)具体策略展开(“十思”的逐条阐述)。

这一过程要求学生分析比喻与论点之间

的类比关系,辨析“固本”与“积德义”之间的逻辑关联,进而理解“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完整论证框架。例如,从“木”与“流”的自然现象推导出“治国需积德义”的普遍规律,体现了从具体到抽象的归纳思维;而“十思”的提出,则展现了从原则到实践的策略性思维。通过此类训练,学生能掌握批判性阅读的核心方法,即在纷繁的文本信息中捕捉主线、评估论证的严密性,从而提升思维的条理性与深刻性。

2. 挖掘文化思维基因:激活思维的批判性与跨文化理解力

文化思维基因是文本中蕴含的特定文化心理、价值观念与行为模式。解读文化基因能帮助学生突破个体经验局限,在更宏大的历史与社会语境中审视问题,培养其跨文化理解力与批判性反思能力。高中阶段是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期,通过分析文本中的文化冲突与融合,可引导学生在对比中建构自身的文化立场。

《鸿门宴》的教学可聚焦于项羽与刘邦的决策差异背后的文化心理。项羽秉持“贵族精神”,其放走刘邦的行为,折射出传统礼义观念中对“光明正大”对决的推崇,而非权谋算计。刘邦坚持“实用理性”,通过拉拢项伯、谦辞示弱等策略,体现儒家“权变”思想与法家功利主义的结合。

教师可设计对比表格,引导学生分析两人在“宴席座次”“言语交锋”“行动选择”等方面的差异,并追问:“项羽的‘不忍’是道德优势还是战略失误?刘邦的‘隐忍’是智慧还是权术?”此类问题促使学生跳出非黑即白的道德判断,认识到文化基因对历史人物行为的深层影响。例如,从“项庄舞剑”的隐喻中,可引申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势”与“术”的博弈哲学,让学生理解权力运作的隐性规则。这一过程不仅训练了学生的辩证思维,更使其在古今对话中形成对文化复杂性的敬畏与洞察。

3. 解构言语组织规律:提升思维的精准性与创造性

言语组织规律是作者通过句式、修辞、篇

章结构等语言手段传达思维的工具。解构这些规律能强化学生对语言形式与思维内容关联性的敏感度,使其在表达时更注重逻辑严谨与审美效果的统一。高中生写作常面临“意不称物”的困境,而分析经典文本的言语策略,可为其提供可迁移的表达范式。

以《师说》为例,其言语组织的智慧体现在:断论式开篇(“古之学者必有师”)——以不容置疑的判断奠定议论基调,展现思维的权威性;对比修辞网络(“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句读之不知”与“惑之不解”)——通过两极对照凸显矛盾,强化论证张力;情感介入的节奏控制(“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在理性论述中注入感叹,形成情理交融的劝说艺术。

教学时,教师可让学生仿写这些句式,并分析韩愈如何通过虚词(如“其”“乎”)的运用调节论证语气,如何通过排比句群积累说服力(如“三人行,则必有我师……”)。通过仿写训练使学生意识到高阶思维的表达需兼顾概念准确、情感共鸣与结构美感。例如,《师说》中“弟子不必不如师”的颠覆性观点,借助严谨的因果链(“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得以合理解释,这正是逻辑思维与语言创新结合的典范。

文本逻辑、文化基因与言语规律三者构成破解思维密码的有机整体。逻辑分析培养思维的条理性,使学生能穿透表象抓住本质;文化解读赋予思维历史纵深感,使其在多元视角中形成批判力;言语解构提升思维的表达效能,让内在认知转化为外显的创造力量。在教学中,教师需以典型文本为载体,通过图谱绘制、对比分析、仿写实践等活动,引导学生在“解构”与“重构”的循环中,最终实现语文学科高阶思维的自主建构与迁移应用。

(四)生成语言创新:在言语实践中提升表达品质

语言创新是高阶思维发展的核心外显与关键路径,其本质在于通过创造性的言语实践,将内在的复杂思维转化为精准、灵动且富有原创性的表达。这一过程不仅要求突破惯

性的语言模式,更强调在个性化表达、跨文体实践与言语重构的循环中,实现思维品质的跃升。

1.个性化表达:思维独特性的语言外衣

高阶思维与个性化表达之间存在共生共荣的关系。思维的深度与独特性必然催生语言的个性,而个性化语言的锤炼过程,反过来又会促进思维的进一步明晰与深化。它使思维摆脱抽象与内隐的状态,通过具身化、有温度的个人语言得以确证和展现。其发展通常经历三个台阶:首先,立足真实表达是基石。教师要引导学生从自身的真实体验和情感出发,避免套话与空话。例如,在学习《故都的秋》后,模仿郁达夫的感官描写手法创作“校园的秋”时,重点不在于辞藻的堆砌,而在于能否像郁达夫那样,将个人对特定时空的生命感受(如开学的新奇、毕业的怅惘)融入景物的刻画中,实现“我手写我心”。积极语用教育观强调,输出性语用是输入性语用的目的,而“表达第一”的语言哲学决定了真实表达的基础地位。

其次,打磨独特视角是关键跃升。在真实表达基础上,引导学生开拓审视文本和世界的独特角度。比如,在探讨《祝福》时,除了批判封建礼教,可以鼓励学生从“祥林嫂的‘抗辩’(‘我真傻,真的’)为何无效”这一视角切入,分析话语权与个体命运的关系,这需要比较、分析与综合的思维活动,最终形成个性化的论述。

最后,融入思想深度是终极升华。个性化表达的最高层次是将理性思辨与生命感悟融为一体,使语言承载思想的力量。例如,在完成《反对党八股》的学习后,引导学生撰写“新时代优良文风公约”,不仅需要理解毛泽东批判的八大罪状,更需结合当代信息传播特点(如碎片化、标题党),提出具有现实针对性的文风原则,这本身就是一次对语言伦理与表达责任的深度思考,是将他人观点内化为自身思想的过程。

2.跨文体实践:思维灵活性的熔炉

跨文体实践通过打破文体壁垒,迫使学生

在不同话语系统间进行转换,是训练思维适应性与创造性的高效路径。其主要形式与效果如下:

形式一:文学性文本向实用型文体的转换。例如,将《装在套子里的人》改编为剧本,或为《烛之武退秦师》撰写外交辞令分析报告。改编剧本需将小说的叙事化语言转化为戏剧的动作性台词和舞台指示,这一过程需要学生深入剖析人物性格、矛盾冲突与情节节奏(分析、综合);撰写分析报告则需从纪事文本中提炼出外交策略、说服技巧及其背后的逻辑(评价、创造)。这类实践能深入锻炼学生的逻辑思维与系统思维。正如戏剧排演能促进深度阅读,在塑造角色、编排情节的过程中体会并演绎角色的心灵旅程。

形式二:不同文学体裁或媒介间的互译。例如,将《红楼梦》中的某个场景转化为分镜头脚本,或为《荷塘月色》创作一首现代诗。这种转换要求学生捕捉原作的神韵而非简单复述情节,需要高度的抽象、想象与再创造能力。其效果在于极大激发学生的形象思维与创造性思维,使其理解不同艺术形式的表现边界与可能性。AI工具可以帮助学生将生动的文字转化为镜头语言或生成视觉画面,在此过程中,学生需要精准地选择词汇和调整指令,这本身就是对语言创造力的锻炼。

跨文体实践的核心在于让学生意识到内容与形式不可分割,思维的精进必然要求表达形式的创新,而形式的探索又会反哺思维的深化。

3. 言语重构:思维创新性的生成场域

言语重构是语言创新的核心环节,指在原有语言材料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组合、提炼与升华,以生成新的意义。它与高阶思维的形成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首先,言语重构是分析、评价等思维活动的直接结果。教师在引导学生学习《师说》后,可以用如袁隆平、张桂梅的事迹重构“师道”的内涵。这需要学生先分析韩愈的论点与论据(分析),再评估其在当代的有效性(评价),最后选择恰当事例进行重新论证(创

造)。

其次,高阶思维的流畅性、灵活性和独创性需要通过言语重构来体现和固化。当学生尝试用一组新颖的比喻来描绘《赤壁赋》中的水月哲理,或用一组排比句来升华《沁园春·长沙》中的青春抱负时,他们不仅在锻炼语言技巧,更是在进行思想的精加工,寻找最贴切的语言形式来固化瞬息万变的思维火花。如果语言过于简化,则可能限制心智与认知的边界,导致模糊和表层化的思考。而言语重构正是对抗语言简化、促进思维深化的关键。

最后,言语重构训练能培养学生对语言的敏感度和审美意识,使其在“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层面运用语言,从而提升表达品质。例如,通过对比不同译本对同一外国诗歌的翻译,学生能更深刻地体会汉语的节奏、韵律和意境营造特点,这种比较分析本身就是高阶思维活动,其成果会直接提升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

生成语言创新是语文学科高阶思维培养的落脚点。个性化表达使思维获得独特的身份标识,跨文体实践为思维提供了多元的演练场,言语重构则推动思维不断突破自身局限实现创造。三者环环相扣,共同致力于将内在的、抽象的思维活动,转化为外在的、可感知、可交流、可批判的创造性语言成果,从而实现语言能力与思维品质的同步升华。

(五)达成价值创生:实现思维质变升华的最高形态

价值创生是高阶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强调通过意义建构使思维成果转化为个人思想或审美表达。这需要将想象力、批判性反思与价值体验深度融合。

首先,依托想象力拓展价值空间。在教学《百合花》时,教师可以设计“假如我是小通讯员”的叙事重构活动,引导学生从不同视角解读“百合花”的象征意义,探讨青春、牺牲与记忆的价值关联。其次,通过批判性反思实现价值甄别。例如学习《氓》后,组织“古代女性命运与现代爱情观”对话会,对比“诗经”中的婚姻悲剧与当代情感伦理,在批判中建构健康的

婚恋价值观。最后,在价值体验中完成精神升华。《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教学可结合“幸福观”讨论,让学生撰写“生命价值坐标”随笔,从焦裕禄的精神品质中汲取养分,形成个人价值取向。这种创生过程使思维训练最终指向人格的完善与精神的丰盈。

价值创生作为语文学科高阶思维发展的最高形态,其意义在于将分析、评价、创造等思维活动升华为个人价值体系的自主建构,实现从“文本解读”到“意义生成”的质的飞跃。这一过程不仅锤炼学生的思维深度与广度,更通过想象力拓展、批判性反思和价值体验,引导其在文学与生活的对话中审视生命意义、定位自我价值。例如,《百合花》的叙事重构培育了共情与牺牲精神,《氓》的古今对话塑造了理性的婚恋观,《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价值坐标书写则内化了奉献与担当意识。这种融合了情感共鸣、理性判断与精神追求的价值创生,使语文学习成为人格完善与价值观形成的内在动力,最终培养出兼具思维深度、人文温度与价值高度的时代新人。

“语言的发展与思维的发展、审美与文化的传承和学习相互依存、相辅相成,也就是‘一带三’。‘一’是‘语言运用’,‘三’是‘思维能力’‘审美创造’和‘文化自信’。语文教学必须以语言运用为本,这是出发点和落脚点,通过语言运用的教学,把其他三个方面(还可能其他方面)‘带’进来,彼此融为一体,在不断地语言实践中得到综合提升。”^[10]温儒敏教授的这一论述,精准地揭示了语言运用在语文素养结构中的核心枢纽地位。它深刻地阐明,高阶思维的培育绝非孤立、抽象的思维训练,而必须深深植根于具体、生动的语言运用实践之中。学生的分析、评价、创造等思维品质,正是在对语言文字进行品味、解析、重构和创生的复杂过程中得以锤炼和提升的。

因此,我们此前所探讨的情境建构、问题思辨、密码破解、语言创新与价值创生这五条路径,本质上正是以“语言运用”为基本操练场,来综合带动思维能力等素养发展的具体实践方案。正是通过这五者的协同运作,语文学科高阶思维培养才能从理念走向实践,真正实现“语言与思维同构、素养与人格共升”的育人目标。

[参考文献]

- [1]谷爽姿,杨李娜.以表现性评价培养高中学生的语文高阶思维能力[J].教育测量与评价,2017(4):34-39.
- [2]张管凤.促进高阶思维发展的高中阅读教学实践初探[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9.
- [3]潘庆玉.论语文学科高阶思维的培养[J].语文建设,2021(23):4-9.
- [4]孙宏志,解月光,姜玉莲,等.课堂教学情境下学科高阶思维的结构与发展规律——以语文学科为例[J].电化教育研究,2020(6):91-97+104.
- [5]杨明.“舌战群儒”的判断性评价意义分析[J].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9(7):107-110.
- [6]威廉·冯·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姚小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7]莱辛.拉奥孔[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
- [9]杨春时.审美语言符号的现象性[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24-30.
- [10]温儒敏.我的语文教育著述与主张[J].课程·教材·教法,2025(10):4-13+111.

(责任编辑 陈晓姿)

名师共同体赋能中小学语文生态阅读的系统 重构与创新实践*

朱家珑

(南京凤凰母语教育科学研究所, 江苏南京 210009)

[摘要] 在“新质生产力”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双重驱动下,阅读已从单一的技能习得跃升为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元能力”。以“名师共同体赋能”为核心视角,构建“双核四维”生态阅读系统理论模型,深入剖析当前存在的理念认知割裂、共同体协作空心化、评价体系滞后等现实困境,并提出机制创新、课程重构、评价破壁“三位一体”的实践路径。研究表明,通过名师共同体的专业引领与协同创新,能够有效激活阅读教育生态,实现从“单向灌输”到“共生共荣”的范式转型,为构建开放、共生、智慧的语文阅读新生态,为培育时代新人和推动语文阅读教学现代化,为新时代语文阅读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与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式。

[关键词] 名师共同体; 生态阅读系统; “双核四维”; 素养生成; 协同赋能

[中图分类号] G633.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4-0084-10

随着《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5年版)》对“整本书阅读”“跨学科学习”等理念的深化,传统碎片化阅读教学模式难以满足学生核心素养发展需求。当前中小学语文阅读存在理念先进与实践滞后的割裂、资源丰富与校际壁垒的冲突、技术赋能与评价滞后的矛盾等问题。“阅读不能太功利化,关键是让教师享受阅读的过程,把阅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1]生态阅读作为回应现实挑战的重要路径,强调阅读活动与个体、环境、文化的动态共生。然而,其理念落地常受阻于教师专业能力不足与协作机制缺位。名师共同体以其专业引领力与组织动员力,成为破解此困局的关键引擎。“强化教师阅读指导力的提高与发挥,是建构学生语文阅读指导

支持系统的核心力量。”^[2]本文尝试探索名师共同体如何系统性赋能中小学语文生态阅读,解析生态阅读系统的内涵价值,剖析其动力难题,并提出创新路径,实现从“亮点工程”到“常态生态”的转换,为构建高质量语文教育新生态提供理论框架与实践样本。

一、名师共同体赋能生态阅读的本质内涵与时代价值

首先从系统论与教育哲学视角,阐释名师共同体赋能生态阅读的本质内涵与时代价值。通过厘清“系统本质观—共同体引擎论—素养生成说”的逻辑链条,解析“双核四维”生态阅读系统的要素结构与功能关系,进而阐明其在立德树人、学以成人与智能融合中的战略意义,为后续实践奠定理论基石。

*[基金项目] 江苏省中小学教学研究第十五期立项课题“名师共同体发展学生语文素养的生态阅读系统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023JY15-GX-L29)。

[收稿日期] 2026-01-21

[作者简介] 朱家珑,男,江苏扬州人,国标本苏教版小学语文教材主编,南京凤凰母语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一）本质内涵：迈向“共生共荣”的 阅读教学新范式

理解生态阅读的变革本质，需超越传统教学观和工具视角，转向关系思维，确立系统性、主体性与生成性的三维认知框架。以下从系统本质、共同体引擎与素养生成三个维度，阐释其从“知识传递”到“意义协商”的范式转型，为解析其内在运行机理提供理论前提。

1. 从单向灌输走向互动共生的系统本质观

生态阅读系统本质上是生命体间的意义对话网络，强调学生、教师、文本、环境等多要素的持续互动与共生发展。依据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阅读不是孤立的认知活动，而是社会文化情境中的意义协商。该系统通过微观系统（课堂互动）、中间系统（家校合作）等层次联动，构建支持性阅读环境^{[3]209}。正如杜威在《经验与教育》中指出：“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组与改造。”^{[4]256-257}生态阅读注重真实情境中的经验互动，使阅读过程成为生命体验的重构过程。系统本质观强调生态阅读从传统单向知识灌输转变为多元互动的共生系统，是一个开放、动态、自组织的复杂系统，师生、文本、技术、环境等要素在持续互动中形成能量流动与信息循环，打破了“教师中心”的线性模式，实现了教学生态的整体优化。

2. 名师关键主体与协作机制的共同体引擎论

名师共同体作为生态阅读系统的引擎，通过专业权威与集体智慧，激发系统内生活力。其核心在于通过名师教学智慧的转化与辐射，引领教师群体实现专业突破，从而带动整个阅读系统的质变。共同体引擎论指名师作为关键主体，通过协作机制引领生态阅读发展，强调名师的示范（如阅读策略建模、文本解读示范）、共享和赋能作用，推动教师共同体的专业成长。分布式领导理论认为，领导力应分布于组织成员之中^{[5]3-15}。名师作为“关键行动者”，通过示范课、工作坊等形式落地先进理念，降低实践门槛。依据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

理论，名师共同体引擎论凸显名师在资源整合、经验传播中的核心地位。名师协作可以破解“认知—行为断层”，通过每月不少于1次的教研，采用名师示范课和跨校集体备课的方式，带动多所联盟校教师参与，实现专业引领、资源共享与情感联结，形成具有“知识领导力”的核心引擎，从而有效激活一线教师的专业自觉，使驱动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促进知识众筹和智慧流动。

3. 在意义协商中实现素养内生的素养生成说

素养生成是学生在真实情境中，通过师生、生生间的持续对话与意义协商，逐步建构与内化的结果，而非外部灌输形成。根植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素养生成说强调学习者在社会互动中构建意义，主张通过阅读中的意义协商、批判反思和情感体验，内化语文素养，将阅读内容转化为个人知识结构，实现从知识接受到素养形成的转变。意义协商能深化文化理解与思维发展，符合素养进阶模型。在学理上反映了“生成—实现—超越”的规律性生长，促进语言运用、审美创造等核心素养的内生。维果茨基的社会文化理论指出，高级心理机能源于社会互动^{[6]106}。“最近发展区”内的协作对话是素养生成的关键。在此过程中，教师通过提供“脚手架”支持，引导学生跨越认知障碍，实现从“现有水平”到“潜在水平”的提升，最终实现文化传承与精神成长的内在统一。

（二）核心架构：“双核四维”生态系统的要素解析

在明确本质内涵基础上，需厘清系统内部的结构要素及其相互关系。“双核四维”模型以素养与共同体为双核，课程、场域、技术、评价四维为支撑，形成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立体化架构，为系统运作提供清晰的要素图谱。

1. 双核驱动：坚持素养发展与共同体赋能协同运行

双核驱动以学生素养发展和共同体协同为核心，强调素养目标与协作机制互为条件、相互促进、协同发展，构成了系统演进的根本

动力,实现了个人成长与集体智慧的融合。阿玛蒂亚·森的能力理论主张,发展应聚焦于拓展人的“可行能力”^{[7]3}。在生态阅读系统中,“素养发展”指向学生阅读能力的提升,“共同体赋能”则关乎教师专业能力的拓展。二者共同指向“人的发展”这一终极价值^[8],形成“育人”与“育师”双向赋能的良性循环。基于协同理论(Haken, 1977),双核驱动整合个体素养发展与群体协同效能。双核驱动能优化资源配置,提升阅读质量,体现了系统论的整体性原则,素养发展是目标,共同体协同是手段,二者互动形成生态阅读系统的持续动力^[8]。如某区域推行的“双导师制”,名师指导青年教师设计生态阅读课程,为教学赋能;青年教师带领学生实施项目并反馈效果,直接促进发展。双方在实践中共同成长,实现“双核”同频共振。

2. 四维支撑:课程、场域、技术与评价的立体融合

四维支撑是生态阅读系统的操作层面,课程提供内容载体,场域创设物理空间,技术赋能过程效率,评价导引发展方向,四者有机耦合、相互渗透、协同作用,形成完整的实践闭环,共同构建生态阅读系统的整体框架,增强系统稳定性,为“双核”目标的实现提供全方位支持。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将个体发展置于多重环境系统中。在生态阅读系统中,四个维度对应布朗芬布伦纳生态系统中的不同层次:“课程”为内容系统,“场域”为微观系统(如学校、家庭),“技术”为外层系统(如信息平台),“评价”为宏观系统(如政策导向),四个维度立体融合,形成动态平衡,尤其是借鉴了“输入—过程—输出”模型,确保生态阅读的系统性和适应性,促进阅读的可持续发展。四维联动融合,营造了浓厚的阅读生态,确保学生在多层次支持下实现素养提升。

3. 生态位构建:明确各要素在系统中的功能与关系

生态位构建是系统要素的功能定位与关系协调过程,旨在避免同质竞争,促进优势互

补,形成各要素在系统中既分工又协作的良性关系,提升整体效能。借鉴生态学中的“生态位”概念,系统内各要素需通过差异化定位实现资源优化。生态位理论强调物种在生态系统中的功能角色^{[9]235}。在生态阅读系统中,名师是“知识枢纽”与“创新源”,普通教师是“实践转化者”,学生是“主动建构者”,家长是“环境支持者”。各主体在自身生态位上发挥最大效能,避免角色重叠与资源浪费。系统内不同主体(如,名师、教师、学生、家长)与资源占据特定“生态位”,承担差异化功能,通过互补与协作维持系统稳定与进化。明确生态位能,减少资源冲突,提升系统效率,各要素通过角色分工和能量流动,实现系统整体优化。

(三) 时代价值:培育时代新人生态阅读的战略支点

生态阅读系统在当代语文教育中具有战略地位,其价值不仅体现在阅读能力的提升,更关乎文化认同与终身发展。以下从三个方面阐释其如何成为培育时代新人的关键支点。

1. 立德树人过程中母语文化根基与家国情怀培育

生态阅读通过母语文化浸润,将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到实处,在语言习得过程中自然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培养文化自信和民族认同。基于德育一体化理论,立德树人是语文教育的根本任务,母语文化是立德树人的核心载体。新课标中关于“文化传承与理解”的素养要求,通过经典阅读和价值体验内化家国情怀。维果茨基强调语言是思维与文化传承的载体,生态阅读将母语视为“文化基因”,通过文本选择与对话设计强化文化认同,阅读中的文化体验正是社会价值观传递的过程,文化价值观通过阅读内容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发展。

2. 学以成人中促进终身阅读与完整生命发展

生态阅读超越工具性目标,关注阅读与生命成长的契合,通过激发学生的内在动机与培

养习惯,为终身学习奠基,使阅读成为个体生命完整发展的持久动力。其核心不仅在于知识习得,更在于通过持续的、浸润式的阅读实践,促进个体在认知、情感与精神层面的整体成长。生态阅读强调在自然、自主的阅读情境中,尊重个体的兴趣节奏与情感体验,引导读者在文本对话中深化对自我、他人及世界的理解,逐步建构生命的意义网络。这种阅读模式将阅读习惯的养成与生命完整性发展相融合,使阅读从一项孤立的学习技能,转化为贯穿生命全程的自我实现途径。如开展“21天亲子生态阅读挑战”项目,家长可与孩子进行每日10分钟的情境化共读,或分角色朗读,或就情节展开生活化讨论,或将故事与日常体验联结。结果显示,部分的儿童不仅短期阅读频率显著提升,部分儿童在项目结束后三个月内仍保持自主阅读习惯,且阅读动机从外部奖励转向内在愉悦。

3. 智能融合中应对数字时代挑战与现实机遇

智能融合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核心数字技术赋能生态阅读,既是破解信息时代碎片化阅读蔓延、浅层化理解固化、优质阅读资源甄别低效等突出挑战的关键抓手,亦是抢抓数字技术迭代机遇、重塑阅读育人生态、提升阅读效能与认知质量的核心路径。其本质内涵在于以技术赋能拓宽生态阅读的时空场域,打破纸质阅读的场景约束与资源壁垒,同时坚守深度思考的阅读本真与人文共情的阅读温度,规避技术工具的功利化单向应用,实现技术工具理性与阅读价值理性的辩证统一、协同发展,推动标准化同质化阅读向个性化精准化学习转型。如,有学校在落地“AI阅读助手+教师导读”混合育人模式过程中成效凸显,以AI阅读助手承接文本梳理、信息筛选等基础事务性工作,释放教师教学精力,聚焦文本深度解读、思维进阶引导、价值观念引领等核心环节;学生在文本思辨、内涵挖掘、情感共鸣等维度表现突出,阅读深度实现明显跃升,这为新时代生态阅读育人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范式。

二、现实审视:名师共同体赋能生态阅读的动力困境与关键瓶颈

当前,生态阅读的实践推进仍面临多重阻滞。通过深入剖析理念与行为割裂、共同体协作空心化及评价资源失衡等核心矛盾,揭示其背后的理念落差、机制缺位与支持乏力等深层原因,以期为后续创新路径的设计提供精准的问题靶向。

(一) 核心矛盾:理念认知与实践行为的割裂

理想与现实存在显著落差,知行断层、功利挤压与路径依赖构成主要矛盾,亟待机制突破。以下结合实证数据与典型案例,分析这些矛盾的具体表现与影响机制。

1. 理念认同与转化实践的显性落差

生态阅读作为语文教育改革核心理念之一,在教师群体中获得了广泛的理论认同,大多教师认可其育人价值,却难以将其转化为常态化教学行为。这一“理念高调、实践保守”的普遍现象,深刻揭示了教育变革中“知”与“行”的深度割裂。其本质在于,教师虽在认知层面接受了先进理念,却因缺乏具体、可操作的转化路径与支持系统,难以突破传统教学范式的束缚,最终导致理念悬浮于实践之上。这一现象精准印证了行为科学中的“意图—行为差距”理论。正如许多教师虽理解“跨学科整合”对生态阅读至关重要,但受限于固化课表、单一教材与应试压力,难以统筹规划与实施。教学实践中,“整合”常被简化为在语文课上播放一段科普视频,或穿插零散的自然科学知识点。这种碎片化的链接,缺乏对学科间逻辑关联的深度挖掘与问题驱动的项目化设计,未能促成知识在真实情境中的融合运用与意义建构。

2. 应试导向与素养目标的现实冲突

在当下教育生态中,短期应试成绩与长期素养发展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这一冲突直接导致生态阅读等素养导向的教学实践被边缘化或形式化。其本质在于,升学压力下的功利化评价体系,迫使教师不得不将有限的教学时间与精力向应试训练倾斜,使得旨在培养学

生综合素养的生态阅读难以获得实质性空间。这种“分数至上”的现实逻辑与素养教育的理想追求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当学校评价、家长期待、学生升学等多重压力汇聚时,教师只能将更具生成性、开放性的生态阅读活动让位于更具“效率”的应试训练。这种“功利导向”对“素养目标”的挤压,不仅压缩了生态阅读的实施空间,更在深层次上异化了教育的本质功能,使教育沦为分数生产的工具,而非人的全面发展。

3.传统惯性与生态创新的疏离畏变

在生态阅读的实践中,教师长期形成的“讲授—练习”教学惯习,成为理念转化的主要障碍。这种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使教师对新型生态阅读产生本能的陌生感与畏惧心理,缺乏主动尝试的勇气与持续探索的信心。教学惯习作为一种内化的实践图式,具有强大的稳定性和再生产性,当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创新实践时,教师往往不自觉地退回到熟悉的教學地带,形成“想变而不敢变”的实践困境。如,一位资深语文教师,在理论学习中完全认同项目式学习的理念价值,但在实际教学时,面对“整本书阅读项目化”的挑战,内心充满焦虑,担心学生讨论偏离主题,担心无法完成教学进度,担心课堂秩序混乱,等等。最终,教师放弃了精心设计的项目方案,重新回归熟悉的“教师串讲+学生做题”模式。这种因强大的惯习而导致创新实践缺失,使得教师很难突破心理舒适区,生态阅读的实践探索常常止步于“心动”而难以“行动”。

(二)关键瓶颈:共同体协作“空心化”与机制缺位

名师共同体若缺乏有效的协作机制与共享文化,极易沦为形式主义的“空壳”,需从联动、资源与激励三方面诊断其“空心化”问题,进行机制革新。

1.联动虚化,共同体活动流于形式缺乏深度

当前教研共同体活动普遍存在“量少质弱”的问题。从活动频率看,许多共同体每学期仅组织1—2次活动,难以形成持续性的专

业发展支持。从活动内容看,多数停留在“听评课”等常规形式,缺乏针对生态阅读、大单元教学等前沿主题的深度研讨与联合攻关。教研活动往往流于表面经验交流,未能就课程设计、评价工具、教学策略等核心问题进行实质性合作,使得教师专业成长受限。如果教研共同体活动交流仅停留于表面经验分享,无法真正聚焦生态阅读等主题进行深度合作探究,那么这种浅层互动既无法满足教师专业发展需求,也难以形成真正的教研合力,难以形成“实践共同体”应有的文化认同与责任担当,这将导致联动实效低下、有名无实。

2.资源孤岛,校际壁垒与资源流动共享不畅

共同体协作空心化的首要症结在于资源孤岛林立与校际壁垒高筑,致使资源流动共享陷入困境。区域内优质教育资源如生态阅读名师精品课例、校本特色课程、教研创新成果等,多被固化锁定于个别基础优质校,校际存在认知、制度与利益层面的无形壁垒,既让优质资源难以辐射下沉,无法实现普遍性分享,也让资源价值难以转化为共同体生态阅读育人效益,违背协作共建的初衷。如某校深耕语文阅读素养培育,自主研发“古诗吟唱”特色课程,将诗词文本与韵律传唱深度融合,成效显著且深受师生认可,但该校因课程研发的版权顾虑、成果专属的固有认知等原因,始终未对外开放课程资源,致使相邻其他学校面对学生古诗文阅读兴趣不足的困境,虽有引入同类课程的迫切需求,却只能另起炉灶自行摸索,既延误教学提质进度,也让优质资源难以实现共享,这种情况成为共同体协作空心化的鲜活缩影。

3.激励不力,教师参与共同体内生动力不足

名师共同体协作陷入空心化的核心障碍之一,便是激励机制不到位引致教师缺少主动参与的内生动力。其本质是未能构建物质与精神协同赋能的激励体系,教师将生态阅读共同体教研、共建等活动视作挤占教学主业的额外负担,而非助力专业成长的进阶机遇,参与

主动性持续消退,最终陷入“被动参与、流于形式”的困境。当前共同体激励机制多聚焦薪酬补贴等保障因素,且标准模糊、落实滞后,难以消解教师参与顾虑;更忽视成就感、价值认同等核心激励因素,让教师丧失参与获得感。激励机制缺位是制约共同体实效落地的关键症结。

(三)现实阻力:评价体系滞后与资源分布不均

系统构建面临多重外部阻力,外部支持系统的缺位构成深层阻碍,评价的单一化与资源的不均衡,如同“紧箍咒”般制约着生态阅读的健康发展,需要多元破解。

1.评价滞后,标准化测验与过程性评价矛盾

从本质内涵来看,以纸笔测验为核心的终结性评价范式,难以全面锚定学生在阅读兴趣培育、高阶思维锻造、审美素养积淀等过程性维度的成长轨迹,与生态阅读所倡导的动态化、发展性育人目标形成根本性悖逆。研究表明,CIPP模型的“背景—输入—过程—成果”框架可破解评价滞后与标准化测验的局限,其核心价值在于将评价贯穿育人全链条,将过程评价与结果评价相统一,既关注结果的达成,又能在过程中发现问题,使二者相辅相成,实现评价的反馈作用^[10],而当前语文阅读评价体系陷入了“重结果、轻过程”的认知窠臼,将评价重心片面压缩至卷面分数这一单一维度,割裂了评价与教学实践的内在关联,难以适应生态阅读要求。如:部分学生在“阅读剧场”实践活动中,展现出卓越的文本解构能力、团队协作素养与艺术创新思维,但这些超越卷面考查范畴的素养表现,无法在标准化测试中得到量化呈现与价值认可,最终导致学生的个性化成长与创造性付出陷入“评价失语”的困境。

2.数字鸿沟,技术赋能下的城乡校际新差距

这里的数字鸿沟并非单纯的技术接入差异,而是在教育数字化转型进程中,技术赋能的不均衡覆盖拉大了城乡校际的阅读资源鸿

沟,使乡村学校与城区学校在数字化阅读环境搭建、优质阅读资源获取机会上形成鲜明落差,直接阻碍了生态阅读的公平性推进。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理论深刻揭示,信息技术兼具“连接”与“分割”的双重属性^[11]³。当数字化工具成为生态阅读开展的核心载体,技术接入权与使用权的差异,便会从工具层面的差距转化为教育机会的实质性不平等,打破了教育资源均衡配置的理想图景。如:城区学校已广泛配备VR沉浸式阅读设备、搭建云端共读平台等,学生可借助多元技术载体深化阅读体验;而部分乡村学校仍面临网络信号不稳定、数字化设备匮乏的困境,学生无法参与跨区域线上共读项目,技术赋能的初衷未能实现,反而可能进一步拉大城乡阅读教育的差距。

3.支持不力,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合力未形成

家庭、学校与社会三方缺乏常态化联动机制与资源整合通路,直接降低了生态阅读育人体系的整体效能,使得阅读实践多被局限于校园场域之内,难以构建起全社会共同参与、协同推进的立体化育人场域。科尔曼的“社会资本”理论指明,家庭亲缘网络与社区公共关系所凝聚的社会资本,是撬动学生学业成就提升的关键变量^[12]³⁰²⁻³¹⁰。当家校社三方协同链条断裂,学生所能获取的阅读引导、资源供给与氛围熏陶等社会资本便会出现结构性短缺,进而束缚其阅读潜能的充分释放。如,部分学校积极推行亲子共读计划,试图打通家校阅读教育的衔接通道,但多数家长或因职场压力挤占精力,或因缺乏科学的共读引导方法,难以有效配合学校开展相关活动,最终造成家庭阅读环境建设滞后,家校协同育人的目标很难达成。

三、创新路径:名师共同体赋能生态阅读的实践进路与模式创生

针对前述困境,尝试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通过构建“责任—利益—发展”共生的实体化共同体、研发“轻量化—模块化”的阅读任务群,以及创立“三色成长码”数字画像评价体系,形成集机制、课程、评价于一体的创新

实践模式。

(一)机制创新:构建“责任—利益—发展”共生的共同体新样态

突破协作“空心化”,需从组织形态、贡献计量与角色轮换入手,重塑名师共同体的内在动力机制,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生态阅读责任共担实体。

1.实体化运作:从松散联盟到责任共担实体

名师共同体的实体化运作,关键在于突破传统组织临时性、松散化的固有局限,通过制订刚性章程、划拨专项经费、配备专职人员,将其重塑为权责边界清晰、运行流程规范的生态阅读推进实体。这一转型不仅清晰界定了各方在资源整合、活动统筹、成效评估等环节的核心职责,更以制度化架构保障了共同体的长效运转。组织有效性理论强调,规范化的组织架构与完善的运行机制,是保障组织持续发挥效能的核心前提。健全的保障体系与明晰的权责划分是教师共同体建设的核心支撑,国家政策文件中已明确提出构建事权人权财权相统一的教师管理体制,强化教师工作保障体系建设^[13],为破解教师共同体运行瓶颈提供了制度依据。通过赋予名师共同体专业引领的主导地位与跨校资源调配权限,推动生态阅读实践从零散化活动升级为系统工程。如:某区域挂牌成立“生态阅读研究院”,由区域内特级语文教师担任领衔人,配备专职研究员负责日常运营。该实体机构聚焦区域生态阅读发展需求,系统开展校本课程研发、教师分层递进式培训、阅读项目动态评估等工作,短时间内便开发出多套契合地方学情的阅读教材,组织数十场专题培训,覆盖区域内所有中小学,推动生态阅读从个别学校的零散实践,走向全域覆盖、协同共进的新样态。

2.积分银行制:量化贡献激发参与内生动力

积分银行制的核心是构建名师共同体专属的“教研贡献量化体系”,为每位成员设立动态积分账户,将教师贡献生态阅读优质课例、主持专题研讨、指导青年教师成长、研发阅

读资源等隐性教研行为,转化为可累计、可兑换的显性积分,积分可对等兑换专业培训名额、荣誉认证或实践物资,形成“贡献有记录、付出有回报”的激励闭环。精准的奖励反馈能有效提升目标行为的发生频率。教师教研投入若长期处于“隐形”状态,易导致价值感消解与职业倦怠。构建“过程可见、成果可评、贡献可量”的显性化激励机制,使教师的专业付出被制度性“看见”与认可,是激活其专业发展内生动力的关键。通过将模糊的教研贡献转化为可计量的“学术货币”,构建起“付出—积累—回报”的良性循环,外在激励将逐步转化为教师自我提升的内在需求。如:某区域生态阅读名师共同体推行积分银行制,明确赋分标准:上传一节完整生态阅读优质课录像积10分,主持一次跨校教研研讨积15分,指导青年教师完成教学实践积20分。积分累计达50分可优先获得国家级阅读教学培训资格,达80分可参与市级教学成果评选。该机制实施后,共同体教师资源分享积极性显著提升,彰显了积分激励的实践价值。

3.轮值主席制:激活主体意识促进智慧流动

轮值主席制的关键要义在于打破名师共同体中固定化的权力结构与权威壁垒,通过领导岗位的动态轮换,让不同层级、不同研究专长的成员轮流担任活动策划者、资源协调者与进程推动者。它既赋予每位成员平等的主导权与话语权,又能激活其主体意识与责任担当,推动多元阅读智慧在共同体内部高效流动、深度整合,从而增强组织的内生活力与创新潜能。该机制契合分布式领导理论的核心主张。让普通教师轮流执掌共同体事务,是将个体智慧转化为集体动能的关键路径,能够有效消解科层制结构对教师主动性的压制。轮值主席制正是通过赋予每位成员“临时领导者”的角色身份,倒逼其主动统筹资源、规划活动,在提升主人翁意识的同时,促进不同阅读教学理念与实践经验的碰撞交融。如:有学校通过推行年度轮值主席制,明确要求生态阅读名师工作室每年推选一位教师担任轮值主

席,全权负责策划、组织一场覆盖区域内所有成员的大型主题教研活动。该校先后推出“跨校共读课堂展示”“阅读课程资源众筹”等创新活动,此举不仅培育出兼具策划力与协调力的复合型教师,更形成“经验传承—问题攻坚—成果转化”的教师成长轨迹,验证了机制对人才培育与共同体能级提升的双重赋能价值。

(二)课程重构:研发“轻量化—模块化—个性化”的阅读任务群

名师共同体为降低生态阅读实践门槛,课程设计追求“轻”而“精”,通过模块化组合保障灵活性、跨学科整合打破传统隔阂,三者共同构建适应性强、可推广的课程体系,使生态阅读真正融入日常教学,为不同学校与学生提供灵活、可定制的阅读学习方案。

1.轻量化课程包以降低实践门槛助力普惠推广

轻量化课程包是以极简设计剥离阅读任务群的冗余要素,通过提炼目标锚点、拆解基础任务、配套易用工具、嵌入简易评价,构建“目标—任务—工具—评价”四位一体的微课程单元。其以内容精炼、操作流程标准化为特质,大幅降低一线教师的实践与认知负担,为生态阅读理念的落地推广扫清操作障碍。杜威“经验连续性”原则强调个体经验需遵循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的渐进发展规律。轻量化课程包正是降低实践门槛的关键。“课程实施是教师怎样将规划好的课程方案付诸实际的教学过程。”^[14]提供清晰的操作路径和支架,降低教师的理解与操作难度,才能实现从“理想的课程”到“实践的课程”的转化。轻量化课程包将复杂的阅读教学理念分解为清晰可操作的步骤,契合教师的认知负荷规律,显著提升教师对新型阅读课程的采纳率。如:某地区中小学推行的15分钟晨读轻量化课程包,明确每日晨读的核心目标、3个阶梯式微任务、配套诵读工具卡及1分钟课堂评价量表,全程无需教师额外备课,其简单易行的操作特性,充分彰显了轻量化课程包在降低实践门槛、推动生态阅读课程方面的独特

优势。

2.模块化任务群以标准化与个性化灵活组合内容

模块化任务群将阅读课程内容拆解为功能明确的独立单元,如“文本解读、创意表达、社会调查”等,每个模块聚焦特定能力目标,具备可替换、可重组的特性。这种设计既满足国家课程的标准化要求,又支持学校依据学情、资源与文化特色进行个性化组合,实现了“核心目标统一、实施路径多元”的适应性教学,推动生态阅读课程从“统一供给”向“大规模定制”转型。模块化设计源于系统工程学中的“高内聚、低耦合”原则,让各模块内部知识与能力体系高度整合,模块间保持适度独立性与衔接性。这一设计思维迁移至阅读教学中,使教师可通过“搭积木”式的模块组合构建课程。学习任务群通过模块化设计,“动态建立能够促进学生阅读经验建构的开放的知识体系”^[15],既保持了课程的整体性,又为不同学校、不同教师提供了灵活实施的空间,使课程在统一要求下实现个性化表达。如:某校在“传统文化月”阅读项目中,打破教材单元界限,自主构建“节日习俗”“民间故事”“非遗技艺”三大模块。结合本地“剪纸艺术”“庙会文化”等资源,学生在“节日习俗”模块中开展社区访谈,在“非遗技艺”模块中邀请传承人进课堂,最终形成“我身边的文化记忆”主题成果集。该设计体现主题性与生活性融合、价值性与实践性并重,让标准化模块在个性化重组中释放出适配性教学的实践价值。

3.跨学科融合以打破学科壁垒促进主题阅读整合

跨学科主题阅读以“人与自然”“科技与伦理”等宏大议题为锚点,超越单一学科的知识边界,将语文的文本解读、科学的事实探究、艺术的审美表达有机融合。其核心在于通过真实、复杂、有意义的主题,引导学生在多维语境中开展综合性阅读与深度探究,实现从“碎片化信息获取”向“结构化意义建构”的升级,培育整体性思维与人文科技交融的素养。杜威“做中学”强调学习源于真实经验,“经验连

续性”则指出教育应使新旧经验不断交互生长。跨学科阅读恰是这一理念的实践载体——现实问题本无学科之分,唯有整合方能理解其全貌,并引导学生跨越学科壁垒建立知识整体观。正如新课标指出,跨学科主题学习的核心价值在于超越单一学科的知识边界,以真实问题或主题为纽带,引导学生在探究中主动整合多学科概念、方法与经验,实现知识的迁移、转化与创造性应用,最终培育适应未来发展的综合素养^{[16]61-63}。如,以“水”为主题,可以构建跨学科生态阅读任务群:语文课引导学生品读《小石潭记》,体悟文字中水体的意境美与语言表达的精妙;科学课开展本地河流水质检测,分析 pH 值与生态关系;美术课运用水彩技法表现“水之形态”;音乐课组织学生聆听《黄河大合唱》,感受民族精神中的“水之力量”。多学科围绕同一主题协同发力,让学生在阅读与探究中实现语言素养、科学探究、艺术审美能力的多维提升,彰显阅读任务群的综合育人价值。

(三)评价破壁:创立数字画像、“三色成长码”与增值评价体系

评价是生态阅读系统方向的导航器。突破评价瓶颈,需数字画像实现全景评估,三色成长码提供动态指引,增值评价则关注个体进步,三者共同构建促进学生发展的评价生态系统,引领生态阅读教学回归育人本质,让素养发展可见、可溯、可促。

1.数字画像:全景式描绘学生阅读素养发展

数字画像是全景式刻画学生阅读素养的关键载体。其本质内涵体现为:以大数据技术持续采集阅读时长、文本偏好、互动表现、读写产出等多维度过程数据,经清洗整合后构建可视化发展图谱,并非单一数据叠加,而是对学生阅读行为、思维特征与能力进阶的全景记录,精准捕捉个性发展规律,为精准教学提供科学依据。维果茨基“动态评估”理论强调过程性价值,学习分析技术则实现隐性生态阅读过程的显性化转化。数字画像突破传统分数局限,输出多维度诊断信息,助力教师精准识

别素养优势与短板。基于过程数据的数字画像,是阅读评价从“结果判断”向“过程赋能”转型的核心载体。在具体实践中,某实验中学的应用印证了其价值:初二年级学生数字画像显示,阅读关注点从“情节梳理”逐步转向“主题解读与创作意图分析”,直观呈现素养进阶;某学生的“阅读力雷达图”显示其“批判性思维”短板,教师则针对性引入议论文阅读与辩论活动,经具体指导实现该能力显著提升,充分彰显数字画像在阅读素养增值评价中的实践效能,为差异化阅读教学与精准干预提供科学依据。

2.“三色成长码”:实现动态分层与可视化进阶

“三色成长码”以生态阅读素养为核心,构建绿码(基础达标)、黄码(发展进阶)、红码(卓越创新)三级动态标识体系。该编码并非静态标签,而是依据学生阅读批注、文本思辨、成果输出等实时表现动态更新码色,将抽象的素养发展转化为可视化的成长路径图,以此明晰进阶方向、激活内生动力,驱动学生在阅读实践中完成自我超越。维果茨基“最近发展区”理论强调,有效教学应立足学生现有水平并指向潜在发展可能。“三色成长码”正是这一理念的数字化实践,它将抽象的发展区间转化为具象、可感的色阶目标,融合素养导向、过程追踪、生态情境与智能反馈,构成一种生态阅读发展性评价新范式。动态分层评价依托即时性学习反馈与阶梯化目标建构,让评价从学习结果的“终局裁判”,转变为全程护航学习进阶的“精准导航”。如:五年级学生夏某初始阅读思辨能力薄弱,被系统判定为“黄码”。教师引导其参与“家乡河流变迁”主题阅读项目,完成撰写调查报告、对比古今诗文、设计环保倡议书等挑战任务,在“信息整合”与“价值判断”维度显著提升,自动升级为“绿码”。其进阶轨迹同步投射于班级“阅读成长墙”,同伴点赞、教师寄语随之生成。这一过程不仅强化了个体成就感,更带动班级形成素养进阶的阅读生态,彰显“三色成长码”评价的实践价值。

3.增值评价:关注成长增量弱化横向比较

增值评价摒弃以统一标准衡量所有学生的传统做法,转而聚焦每个学生在阅读素养上的个体进步幅度。它不关注学生在阅读中的排名位置,而重视其在阅读理解力、思辨力、审美表达等维度上相较于自身原有水平的提升程度。这种以“自我为参照”的生态阅读评价,有效弱化横向竞争压力,强化内在成长激励,使不同起点的学生都能因真实进步获得认可,并激发其持续阅读的兴趣与信心。生态阅读观强调阅读是主体与文本、环境、技术多维互动的动态过程。增值评价正契合这一理念:它承认学生文化资本、阅读经验的初始差异,将评价嵌入“输入—内化—外化”的完整生态链中,追踪认知结构与精神世界的渐进变化。真正的教育公平并非结果均等,而是让每个学生从自身起点实现最大发展。增值评价凭借多维指标与纵向追踪,科学识别学生努力、进步和潜力的价值,推动评价从筛选甄别转向育人赋能。

名师共同体赋能构建中小学语文生态阅读系统要求我们超越简单的“名师带教”或“阅读推广”,从系统论、生态学与教学学术的高度,重新定义名师的价值、阅读的本质与语文教育的未来。通过深刻把握其内涵价值,精准诊断其动力困境,并创新性地构建“双线四维”的赋能路径,我们方能真正实现从“名师引领”到“生态赋能”的华丽转身,为培养具有文化自信、创新精神与终身学习能力的时代新人,奠定坚实的“阅读之基”。

[参 考 文 献]

- [1] 朱永新.朱永新:共读中静候花开的日子[J].班主任之友(下半月刊),2017(5):56-57.
- [2] 朱家珑.教师阅读指导力:学生语文阅读导支持的核心力量[J].小学语文教学,2019

(34):4-7.

- [3] 尤里·布朗芬布伦纳.人类发展的生态学:自然实验与设计[M].曾淑贤,刘凯,陈淑芳,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
- [4] 杜威.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M].姜京闵,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
- [5] 詹姆斯·P.斯皮兰.分布式领导[M].张弛,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
- [6] 维果茨基.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M]//维果茨基全集:第2卷.龚浩然,王永,黄秀兰,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6.
- [7]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贻,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 [8] 朱家珑.名师共同体:创构中小学语文生态阅读系统的新样态[J].江苏教育研究,2026(6):47-51.
- [9] 尤金·P.奥德姆,加里·W.巴雷特.生态学基础[M].陆健健,王伟,王天慧,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 [10] 许瑞芳,张岩.基于CIPP模型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评价研究[J].思想政治课研究,2023(3):132-141.
- [11] 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M].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 [12] 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 [1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Z].2018.
- [14] 崔允漷.课程实施的新取向:基于课程标准的教学[J].教育研究,2009(1):74-79+110.
- [15] 吴欣歆.学习任务群视角下的阅读教学内容建构[J].中学语文教学,2022(8):10-13.
- [16] 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解读[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责任编辑 陈晓姿)

生成与写意

——AIGC 作为中国画教学创新工具的可行性及边界探赜

李楚洋^{1,2}

(1.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 上海 200092;
2.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美术学院, 江苏南京 210013)

[摘要] AIGC 在中国画教学中的应用必须坚守“工具化”而非“本体化”的核心原则, 将其精准定位成“辅助性创新工具”。从活化传统程式、拓展形式语言、催化当代转化三个维度, 论证了 AIGC 应用于中国画教学的可行性, 并结合具体教学案例阐述其实践价值; 同时, 深入剖析 AIGC 不可逾越的边界, 强调要守护中国画“写意精神”内核, 防范技术对“心手合一”身体实践与“技进乎道”价值追求的消解。

[关键词] AIGC; 中国画教学; 写意精神; 活化传承

[中图分类号] J23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4-0094-07

一、“生成”与“写意”之间

“生成”与“写意”, 乍看之下分属两个完全不同的认知维度。前者依赖算法算力与数据积累, 通过学习海量视觉样本, 以概率统计的方式完成图像输出, 核心是技术逻辑的自动化运行; 后者则依靠创作者的胸次修养与生命体验, 借助笔墨与纸绢的物理互动传递情感意趣, 核心是人文精神的个性化表达。不过仔细探究二者本质, 会发现它们共享一个“成”字, 都以“成象”作为外在表现, 差别仅在于“生成”之象源自算法的数据拼接, 而“写意”之象源自主体的心性投射。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是否成象, 而在于谁成谁之象。要是算法代替人完成“立象”过程, 其生成的图像必然摆脱不了平均值的平庸, 毕竟算法的核心逻辑是对现有样本进行归纳与复刻, 很难突破已有风格的边界, 更没办法传递创作者独有的生命体验; 而借助算法做好

“立象”准备, 就有可能在技术提供的意外之象中拓展创作思路。算法可以充当灵感触发器, 为创作者提供超出个人经验的视觉参考, 不过最终还是要由人完成意象筛选与笔墨转化, 从而实现“写意”所追求的个性化表达。蔡新元在《人工智能艺术创作的范式与边界》一文中指出, 随着生成式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 人工智能正从传统的“工具辅助”角色, 逐渐向与人类共同参与创作的“共创主体”转变^[1]。这一判断在宏观艺术创作领域无疑具有精准的洞察力, 尤其是在新媒体艺术、数字艺术等新兴门类里, AI 已经成为不可或缺的创作参与者。但将这一判断应用到中国画教学领域, 就需要补充一个关键的限定条件。即便认可 AI 的共创角色, 也必须以人为主导为前提, 否则共创很容易变成被创。

基于这样的思考, 本文将讨论焦点从宏观的艺术创作缩小到微观的中国画课堂这一场

[收稿日期] 2025-12-14

[作者简介] 李楚洋, 男, 江苏盐城人,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在站博士后,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副教授。

域。在本科中国画教学中,课时分配、学分要求、评价标准都已经形成相对固定的体系,技术介入如果不能契合现有教学框架,就会变成悬浮式的理论空谈。然而,目前的研究大多聚焦于技术应用的“可能性”,却很少关注教学场景中的可行性与边界性,尤其缺乏与中国画写意精神这一核心概念的深度关联。因此,本文围绕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论述。其一,AIGC怎样才能成为教师的高级粉笔,而不是打乱教学节奏的外来者。其二,如果依赖技术会导致写意精神的核心内涵被消解,那么技术应用的边界又在哪里。

二、可行性的三重向度:AIGC对教学程式的活化与拓展

在中国画教学中,“程式”“造化”“意境”是三个核心教学维度。“程式”是入门基础,解决怎么画的技法问题;“造化”是创作源泉,解决画什么的素材问题;“意境”是审美追求,解决为何画的精神问题。合理应用AIGC,恰好能在这三个维度形成互补。它既不会替代传统教学的核心环节,又能有针对性地破解各维度的教学瓶颈,通过技术赋能解决传统教学中的具体难题。

(一) 程式新解:传统画谱的智能化重构

在传统中国画教学中,《芥子园画谱》是经典的入门教材,它以“图谱”形式固定了山石、树木、人物、花鸟的基本画法,像“披麻皴”“斧劈皴”“折枝法”等都收录其中。但静态的图谱很难呈现程式的动态演变与变体逻辑,初学者常常陷入机械临摹的困境,只掌握表面技法,却无法理解程式背后的自然规律与审美意涵。比如,在教授山石皴法时,学生只能通过图谱看到“披麻皴”的最终形态,却难以明白它为何适合表现松软的土山,以及如何随着山石纹理变化调整笔触,这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情况,是传统程式教学面临的核心瓶颈。

AIGC能够把静态画谱转化为可交互、可演绎的活态资源,通过算法提炼与重构程式规律,帮助学生实现从临摹到理解的跨越。在具体教学实践中,可以依托MidJourney、Stable

Diffusion等工具,构建中国画程式智能演绎系统。首先,把《芥子园画谱》中山石皴法的线条、结构、墨色进行数据化处理,输入AIGC模型开展专项训练,让模型掌握不同皴法的核心特征;随后,引导学生根据教学目标调整参数,以“披麻皴”教学为例,学生可以输入“土山”“雨中山石”“秋景山石”等关键词,AIGC会实时生成不同环境、不同视角下的“披麻皴”变体图像。

笔者在山水画基础课程的改良就有这样的实践案例,在讲解“斧劈皴”时,先通过传统方法示范斧劈皴的落笔、运笔、收笔技巧,接着引导学生使用AIGC工具。学生输入“北方石山”“晴天光影”“近景斧劈皴”等指令后,AIGC生成了十余幅不同形态的斧劈皴山石图像;随后,学生把指令调整为“北方石山”“雨后湿润”“远景斧劈皴”,AIGC又生成了墨色更浓、笔触更简练的变体。通过对比这两组图像,学生直观地发现。斧劈皴的笔触力度需要根据“干湿”“远近”来调整,晴天近景要笔触锐利、留白较多,雨后远景则要墨色厚重、笔触融合。这种参数调整-图像生成-规律总结的过程,让学生从被动临摹转变为主动探究,深刻理解了程式与自然情境的关联,实现了对传统画谱的智能化重构。

除此之外,AIGC还能助力跨程式融合的教学探索。例如,在花鸟与山水结合教学中,学生可以输入《芥子园画谱》折枝梅花+披麻皴山石的指令,AIGC会生成梅花与山石的组合图像,并且自动调整二者的笔墨风格、色彩调性,让它们和谐统一。这种方式打破了传统画谱中“花鸟”“山水”分类独立的局限,帮助学生建立整体构图思维,为后续创作打下基础。

(二) 从“外师造化”到“心源生成”的桥梁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中国画创作的核心理念,“师造化”指的是对自然物象的观察与写生,“得心源”则是对自然意象的提炼与艺术转化。在传统教学中,“师造化”面临两大难题。一是受时间、空间限制,学生很难

观察到不同季节、不同地域的自然物象,比如南方学生难以实地写生北方的雾凇,北方学生也难以观察南方的梅雨荷塘;二是在写生过程中,学生需要同时兼顾观察、记录、提炼,容易陷入重形似轻意韵的误区,难以实现“得心源”的转化。

研究员苏也指出,AI技术构建的虚拟造化并非虚假的自然,而是数字层的再符号化。通过对自然物象进行数字化建模,既能保留其核心视觉特征与文化意涵,又能突破时空限制,为学生提供更丰富的观察样本^[2]。这一观点为解决“师造化”的困境提供了新思路,AIGC能够成为“师造化”与“得心源”之间的桥梁,通过素材拓展-变体生成-意象提炼的路径,辅助学生完成对自然意象的艺术转化。一方面,AIGC可以突破时空限制,为学生提供丰富的虚拟写生素材;另一方面,它能快速生成同一物象的不同变体,帮助学生摆脱“形似”的束缚,专注于“意韵”的提炼。以荷花意象教学为例,在传统教学中,教师通常会带领学生在校园荷塘写生,学生只能观察到夏季荷花的形态,而且写生时需要专注于花瓣、荷叶的结构比例,难以深入思考荷花意象的审美内涵。而借助AIGC工具,教学过程可以重构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造化拓展,学生通过网络收集不同季节、不同环境的荷花照片,输入AIGC模型,生成对应的写实风格荷花图像,弥补实地写生的时空局限;第二阶段是变体生成,学生基于写实图像,输入“水墨风格”“工笔风格”“写意风格”等指令,AIGC会生成不同技法表现的荷花图像,同时还能输入“荷花+烟雨”“荷花+月色”“荷花+秋风”等情境指令,生成带有情感氛围的变体;第三阶段是意象提炼,教师引导学生对比不同变体,比如水墨残荷的干枯笔触与工笔夏荷的细腻线条,分析二者如何传递萧瑟与繁盛的情感,进而让学生自主选择一种情境,提炼出具有个人风格的荷花意象。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会组织学生实地观察夏季荷花,完成初步写生;而后,引导学生使用AIGC生成残荷覆雪、荷风送香等变体图像;最

后,要求学生结合写生稿与AIGC变体,创作一幅“有情感的荷花图”。结果显示,80%的学生不再局限于写实描绘,而是通过简化花瓣形态、强化墨色对比等方式,传递出“宁静”“孤寂”“生机”等情感,比如有一名学生以残荷听雨为主题,借鉴AIGC变体中水墨晕染的效果,用淡墨表现雨雾,用浓墨勾勒残荷枝干,画面意境远超传统写生作业。这一结果表明,AIGC通过拓展“师造化”的广度、降低意象转化的难度,有效帮助学生实现了从观察自然到表达心性的跨越。

(三) 意境催化:创作思维的数字激发

意境是中国画的最高审美追求,它是情与景的交融、意与象的统一,需要创作者具备丰富的想象力与创造性思维。在传统教学的高级创作阶段,学生常常面临思维固化的问题。受自身经验与视野的限制,很难突破惯常的构图、笔墨与题材,无法创作出具有新意的意境。例如,在“山水意境”创作中,学生大多习惯采用“近景树木-中景山石-远景云雾”的固定构图,难以将“荒寒”“氤氲”“雄浑”等抽象美学概念转化为具体的视觉语言。

AIGC能够成为意境创作的数字激发器,凭借文本到图像的转化能力,把抽象的美学概念、诗词意境转化为视觉草图,打破学生的思维定式,激发创造性想象。它的核心价值在于不直接提供标准答案,而是通过生成超乎预期的视觉方案,引导学生思考意境的多元表达,进而形成具有个人特色的创作思路。

这种作用在诗词意境转化教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国画历来有“诗画同源”的传统,将诗词中的意境转化为画面,是培养学生意境创作能力的重要方式。在传统教学中,教师通常先讲解诗词内涵,再示范如何通过构图、笔墨表现意境,但这种“示范-模仿”模式很容易限制学生的想象力。而AIGC可以把教学过程转变为“概念-生成-反思-创作”的互动过程。首先,教师选取经典诗词。如王维《山居秋暝》中的“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引导学生分析诗词中的“意象元素”,即空山、新雨、明月、松、

清泉等与“情感基调”的宁静、清幽等;随后,学生将诗词文本输入 AIGC,生成多幅意境草图;接着,教师组织学生讨论草图,哪些元素符合诗词意境?哪些表达存在偏差?如何通过笔墨调整强化“清幽”感?最后,学生结合讨论结果,自主创作一幅“山居秋暝”主题作品。

在中国画创作课程的教学,笔者就曾尝试以“荒寒意境”为主题,先通过赏析倪瓒的《容膝斋图》,讲解“荒寒”意境的核心特征,简淡构图、冷寂色调、疏落笔触;随后,学生输入“荒寒山水”“枯木寒江”“远山积雪”等关键词,AIGC 生成了十余幅草图,其中有一幅草图打破了“近中远”构图,用“大面积留白表现江面,左侧一株枯木倾斜,远处仅用淡墨勾勒远山轮廓”,这种极简的构图让学生眼前一亮;在讨论中,学生发现这幅草图通过“留白”与“枯木”的对比,强化了空旷、孤寂的氛围,比传统构图更贴合“荒寒”内涵。最终,一名学生借鉴该草图的构图思路,用焦墨画枯木,用淡墨染远山,用留白表现江面与天空,创作的《寒江独钓图》不仅符合“荒寒”意境,还通过加入“孤舟”元素,增添了人文情怀,获得了课程最高分。

此外,AIGC 还能辅助“当代意境”的探索。学生在创作时可以输入“传统水墨+现代高楼”“毛笔笔触+城市霓虹”等指令,AIGC 会生成“传统笔墨与现代城市融合”的意境草图,帮助学生思考如何用中国画语言表达当代生活,推动传统意境的当代转化。

三、边界的确立:守护“写意”的本体价值

虽然 AIGC 为中国画教学提供了不少创新可能,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AIGC 始终只是工具,而不是本体。中国画的核心价值在于写意精神,它涵盖“笔墨的身体性”“心源的主体性”“文脉的历史性”三个维度,这既是中国画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的本质特征,也是 AIGC 无法替代的本体边界。要是忽视这一边界,过度依赖 AIGC,会导致中国画教学失真,消解其文化基因与审美内核。因此,在教学实践中,必须明确 AIGC 的应用边界,坚守写意

精神的本体价值。

(一)对“笔墨”体验的守护

“笔墨”是中国画的核心语言,它不只是视觉层面的线条与墨色,更是创作者身体在场的体验与心性修炼的载体。在传统教学中,笔墨训练强调心手合一,创作者通过手腕的提按、顿挫、转折,把内心的情感与意趣传递到笔尖,再通过笔尖与纸绢的摩擦,形成具有生命力的笔触。例如,画兰草时,手腕要“轻灵”,笔触要“飘逸”,以此表现兰草的高洁之气;画松柏时,手腕要“沉稳”,笔触要“刚劲”,以此传递松柏的坚韧之姿。这种身体与笔墨的深度交融,是写意精神的基础,也是中国画教学的核心环节。

但 AIGC 生成的水墨图像本质上是像素的组合,它缺乏身体在场的体验,算法无法模拟手腕运笔的力度变化,无法复刻墨色在纸上“晕染、渗透”的物理过程,更无法传递创作者在创作中的情感波动。我们常说技术美是人类在物质生产和产品设计过程中,通过艺术手段对客体进行加工而形成的美感形态,它既区别于自然美的天然性,也不同于纯艺术美的精神性,是科技手段与审美创造的有机统一^{[3]251}。如果在教学中过度依赖 AIGC,用“输入指令-生成图像”替代“手工笔墨训练”,会导致笔墨体验的消解,让学生变成技术的操作者,而不是笔墨的创造者。如果过分的追求教学效率,让学生直接使用 AIGC 生成水墨图像,再把图像打印出来进行填色临摹。学生虽然能快速完成一幅看似精美的作品,但在后续的手工创作中,或许连最基本的运笔技能都无法掌握,与之带来的是笔触僵硬、墨色单调,不能通过笔墨传递情感,从而导致作品缺乏生命力。由此也可以看出,AIGC 生成的笔墨效果是虚假的模仿,它无法替代身体在场的笔墨体验。

所以,在教学中,必须坚守笔墨训练的核心地位,把 AIGC 的应用限定在辅助观察而非替代实践的范围内。具体来说,在笔墨基础阶段,应完全不用 AIGC,让学生通过反复的手工练习,掌握“中锋、侧锋”“浓墨、淡墨、焦墨、宿

墨、破墨”的基本技法,体验身体与笔墨的关联;在笔墨进阶阶段,可以适度使用 AIGC,例如,在讲解“破墨法”时,教师先示范“浓墨破淡墨”“淡墨破浓墨”的手工技法,再用 AIGC 生成不同破墨效果的图像,帮助学生更直观地观察墨色交融、渗透的规律,但最终仍需学生通过手工实践,将观察到的规律转化为自身可掌控的笔墨能力。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守护“笔墨”的本体价值,让学生切实理解笔墨即心性的深层内涵。

(二)对“心源”主体的捍卫

“心源”是中国画创作的主体内核,核心在于强调创作者的个人感受、审美判断、与情感表达,“写意”的本质是以心写物,而非单纯的以物写物。在传统教学中,教师始终将创作者的主体性放在重要位置。引导学生观察自然时,不仅要求看其形,更强调悟其神;开展创作时,需引导学生“以我之眼观物,以我之心化物”,将个人的情感、意趣融入作品之中。例如,同样是画竹子,郑板桥笔下的竹瘦硬挺拔,传递出孤傲不屈的人格特质;吴昌硕笔下的竹厚重雄浑,则体现出苍劲豪迈的气度,这种因人而异的创作差异,正是“心源”主体性的鲜明体现。

AIGC 的生成逻辑与“心源”主体性存在根本层面的冲突。AIGC 基于对海量图像数据的学习,其生成逻辑本质上是数据统计的平均值,它通过分析现有中国画作品的风格、构图、笔墨特征,提炼出所谓的最优解并生成新图像。这种逻辑缺乏个人感受与独特判断,若在教学中过度依赖 AIGC,很容易导致算法意志僭越主体意志,使学生的创作沦为算法的复制品,进而消解其作为创作者的主体性。诚如学者潘公凯所言:“真正的创新需立足橄榄形文化结构:一端深耕传统根基,坚守写意精神与笔墨内核;一端理性吸纳外来艺术养分,而中间的混融区域正是长远发展的希望所在。唯有以传统研究为主体的两端深入,才能提升融合质量,开拓新境地。”^{[4]7} 具体而言,这种“僭越”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审美判断的钝化。当学生习惯通过 AIGC 生成符合大众

审美的图像后,会逐渐丧失对“美”的独立判断能力,他们不再主动思考我为何喜欢这种风格、如何通过笔墨表达我的感受,而是被动接受算法给出的标准答案。比如在花鸟设色的教学中,若学生直接使用 AIGC 生成“荷花配色方案”,算法会基于过往数据生成“粉色花瓣+绿色荷叶”的经典搭配,学生便不会主动尝试“淡紫色花瓣+墨色荷叶”等更具个人特色的配色,最终导致作品呈现出千篇一律的面貌。二是“情感表达的缺失”。AIGC 无法真正理解人类的情感,其生成的图像仅能模拟“情感的外在符号”,却无法传递“情感的深度与复杂性”。若学生依赖 AIGC 创作“思乡主题”的作品,算法可能会生成“月亮+远山+孤舟”的固定组合,但学生自身独特的思乡之情,是对故乡亲人的牵挂,还是对童年时光的怀念,却无法通过算法传递,作品最终沦为情感符号的堆砌,缺乏真实的情感温度。在某高校中国画创作课程的对比实验,就印证了这一潜在风险。将学生分为两组,A 组使用 AIGC 辅助创作,B 组完全依靠手工创作,两组创作主题均为“我的校园”。结果显示,A 组作品的“视觉完成度”更高,构图均衡、笔墨规范,但作品中几乎看不到个人视角,大多是 AIGC 生成的标准化校园场景;而 B 组作品虽在视觉精度上稍显逊色,却充满了个人情感与独特观察,有的学生将焦点放在校园角落的老槐树,用厚重的笔墨表现其沧桑感;有的学生描绘雨后的校园小径,用淡墨晕染表现湿润的氛围。当被问及创作思路时,A 组学生大多回答“我参考了 AIGC 生成的图像”,而 B 组学生则能清晰阐述“我为何选择这个场景”“它让我想起了什么”。这一实验结果表明,过度依赖 AIGC 会导致“心源”主体的丧失,使创作脱离以心写物的本质。

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坚定捍卫“心源”的主体性,明确 AIGC 的辅助定位。教师应引导学生将 AIGC 视为灵感的触发器,而非创作的替代品,在创作初期,可借助 AIGC 生成草图以激发思路,但后续必须通过自我反思与手工调整,将算法的灵感转化为个人的表

达。例如,在思乡主题创作中,教师可引导学生。先用 AIGC 生成“思乡场景”草图,再主动思考“草图中哪些元素符合我的思乡感受”“我需要添加哪些个人记忆中的元素”(如故乡的老房子、母亲种的月季花),最后通过手工笔墨将这些思考融入作品。唯有如此,才能有效避免算法意志的僭越,确保学生始终是创作的“主体”。

(三)历史语境的抽离:对“文脉”传承的持守

中国画的写意精神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深深植根于千年的文化文脉之中,它与中国哲学、文学、历史存在深度交融。在传统教学中,文脉传承是核心环节。教师通过讲解倪瓒的逸笔草草与元代文人画的避世心态,帮助学生理解其作品的简淡意境;通过分析徐渭的泼墨大写意与明代文人的狂放精神,让学生体会其笔墨的情感张力。这种结合历史语境理解作品的教学方式,能让学生不仅掌握技法,更能传承文化精神,最终实现技进乎道的价值追求。

AIGC 对中国画风格的模仿,本质上是历史语境的抽离,它仅能学习作品的“视觉特征”,却无法理解这些特征背后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内涵。例如,AIGC 能够生成类似八大山人的花鸟图像,寥寥数笔、墨色简淡、鸟眼圆睁,但它无法理解八大山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亡国之痛与孤傲人格,也无法解释这种风格与明末清初文人画转型的历史关联。若在教学中用 AIGC 替代文脉教学,让学生仅通过模仿 AIGC 生成的“风格图像”学习中国画,会导致文脉传承的断裂,学生仅能掌握“表面的风格技巧”,却无法理解写意精神的文化根源,最终陷入为风格而风格的空洞创作。尤其是在教学中的赏析环节这一问题就极易暴露。如果直接用 AIGC 生成不同朝代的山水画,让学生对比风格差异,却未讲解背后的历史语境。当被问及“为何宋代山水画多‘全景式构图’,而元代山水画多‘边角式构图’”时,学生无法给出合理回答,他们仅能观察到“宋代画得满,元代画得空”,却不知道宋代“重写实、

尚雄浑”的审美取向与“中央集权的强盛”密切相关,元代“重写意、尚简淡”的风格则与“文人避世心态”紧密相连。这种“无文脉的风格学习”,使学生对传统的理解停留在视觉表面,无法真正传承中国画的文化精神。更严重的是,AIGC 的“风格拼贴”功能可能导致“文脉的混乱”。例如,学生使用 AIGC 生成“唐代人物+元代山水+清代花鸟”的组合图像时,算法会将不同朝代的视觉元素强行拼接,生成看似创新实则混乱的作品。这种创作忽视了不同朝代风格与历史语境的关联性,是对传统文脉的碎片化消费,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创造性传承。

因此,在教学中,必须坚守“文脉传承”的底线,将 AIGC 的应用与“历史语境教学”深度结合。新文科视阈下的美术教育应在传习与创造中返本开新、应开辟出新的知识范式、通达人文、艺术、科学、技术的跨界融合等层面,最终面向未来构建“人文与科技双向互通”的新文科建设范式^[5]。具体而言,在传统作品赏析阶段,应先通过传统教学方式,讲解历史背景、分析文化内涵,让学生理解作品的文脉根源,再适度使用 AIGC 辅助教学。例如,在讲解宋代院体画时,教师先介绍宋代“画院制度”与“写实风尚”,再用 AIGC 生成“宋代院体画风格的变体”,引导学生分析“变体是否符合宋代的审美语境”;在“传统风格创作”阶段,要求学生先撰写创作思路说明书,明确阐述“我选择的风格源于哪个朝代”“它的历史文化内涵是什么”“我如何在创作中传承这种内涵”,再适度使用 AIGC 辅助实现创作思路。通过这种方式,确保 AIGC 的应用始终植根于文脉,而非脱离文脉的风格游戏,最终实现“技法传承”与“文化传承”的统一。

当 AIGC 技术与中国画教学相遇,我们既不能陷入技术万能的狂欢,也不能走向技术隔绝的保守,二者之间应是“以人文为引领,以技术为赋能”的辩证统一关系。一方面,AIGC 作为辅助性创新工具,为中国画教学的“活化传承”提供了新的路径。在“程式新解”层面,它将静态画谱转化为可交互的活态资源,帮助

学生从机械临摹转向规律探究;在“意象重塑”层面,它突破时空限制,搭建起“师造化”与“得心源”之间的桥梁,辅助学生完成自然意象的艺术转化;在“意境催化”层面,它将抽象美学概念转化为视觉草图,有效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推动传统意境的当代表达。不过,这些可行性的实现,有一个重要前提,必须将 AIGC 严格限定在“工具”范畴,使其服务于教学目标,而非主导整个教学过程。另一方面,AIGC 的应用必须坚守“写意精神”的本体边界,防范技术对教学本质的消解。“笔墨的身体性”要求我们守护“手工笔墨训练”,拒绝用算法生成替代身体体验;“心源的主体性”要求我们捍卫“创作者的中心地位”,避免“算法意志”僭越“主体意志”;“文脉的历史性”要求我们持守“文化遗产”,防止“风格模仿”脱离“历史语境”。这三个边界,是中国画教学的生命线,一旦突破,中国画教学将丧失其独特的文化基因与审美内核,沦为技术驱动下的“图像生产”。应构建“人文引领型技术融合”的新范式。在这一范式中,“人文价值”是核心,教学的目标始终是培养“懂传统、有个性、传文脉”的中国画创作者,而非精通 AIGC 的技术操作者;“技术工具”是支撑,AIGC 仅作为解决教学难题、激发创新思维的手段,其应用需服从于“写意精神”的传承与表达。与此同时,教师的角色也需随之转变。从传统的技

法传授者变为人文引领者与技术管理者,既要引导学生深入理解中国画的文化内涵与审美精神,也要教会学生“理性使用 AIGC”,懂得何时使用技术、如何用技术服务于创作,而非被技术所奴役。

未来的中国画教学,不应是传统与现代的对立,而应是传统精神与现代技术的融合。当学生既能用手工笔墨传递“心手合一”的意趣,又能借助 AIGC 拓展“写意”的当代表达;既能理解倪瓒“逸笔草草”的文脉根源,又能通过技术创新赋予传统意境新的生命力,此时,AIGC 才算真正实现了赋能价值,中国画教学也才能在技术浪潮中实现活化传承,走向更广阔的未来。

[参 考 文 献]

- [1] 蔡新元:AI 时代艺术创新教育再出发[J].高教探索,2025(5):29-33.
- [2] 苏也.“智能数字人文”对艺术教育的影响[J].新媒体与社会,2024(3):89-100.
- [3] 叶朗.美学原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 [4] 潘公凯.中国绘画史[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3.
- [5] 高世名.人文与科技的双向会通——作为新文科的美术教育[J].美术,2022(4):6-11.

(责任编辑 南山)

从“缺位”到“归位”：教育家精神引领下学前融合教育教师内隐专业信念重塑的质性研究*

欧阳叶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学院, 湖南长沙 410000)

[摘要] 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探究教育家精神引领下教师内隐专业信念重塑的动态过程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学前融合教育教师的内隐专业信念重塑经历了“悬置—摇摆—唤醒—重构—归位”五个阶段。这一转变受制度、文化、主体三重结构性因素的交互作用影响。制度层面,安全问责与单一评价体系的规训使教师产生防御性心理,导致信念处于“悬置”的缺位状态;文化层面,排斥性惯习与全纳教育理念的冲突引发伦理焦虑,致使信念在现实与理想间“摇摆”;主体层面,教师在职业生存理性与生命意义追求的博弈中,受仁爱之心唤醒与育人智慧驱动,逐步实现信念“重构”,最终在弘道追求中完成“归位”。基于此,建议构建发展性评价体系,营造全纳职业文化,打造反思性实践共同体,推动学前融合师资队伍从“被动执行”向“精神自觉”转型,为高质量融合教育提供坚实的精神支撑。

[关键词] 教育家精神; 学前融合教育; 内隐专业信念; 质性研究

[中图分类号] G6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4-0101-09

一、问题提出

当前,我国学前教育正处于从“幼有所育”向“幼有优育”迈进的关键时期,融合教育作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水平直接关乎教育公平的底线与高度。《“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明确指出要坚持公益普惠,完善普惠性学前教育保障机制,保障包括特殊儿童在内所有适龄幼儿平等享有学前教育的机会^[1]。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致信全国优秀教师代表,深刻阐释了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2]。在这一宏观背景下,学前融合教育教师作为特殊儿童在普通教育环境中的直接支持者,其专业信念的坚定与否,

直接决定了融合教育的实质质量与人文温度。然而,在“效率优先”与“整齐划一”的传统班级管理惯习下,学前融合教育教师常常陷入一种“身在曹营心在汉”的“缺位”状态。这种“缺位”并非指物理空间的缺席,而是指心理与专业角色的隐性游离。许多教师深受绩效评价与安全责任的双重压力影响,将融合教育视为额外的负担而非教育的本真回归。面对特殊幼儿,部分教师往往采取“只养不教”或“边缘化安置”的策略,将专业信念窄化为单纯的“看护责任”或“不出事故”,从而忽视了特殊幼儿在社会互动、潜能开发及生命尊严等方面的深层需求^[3]。这种内隐信念的偏离,不仅导致特殊幼儿在融合环境中面临“二重隔

*[基金项目] 湖南省教育科学“十四五”规划2024年度立项课题“教育家精神视域下学前融合教育教师内隐胜任力与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XJK24BJC008)。

[收稿日期] 2025-12-25

[作者简介] 欧阳叶,女,湖南湘阴人,长沙职业技术学院学前教育学院教授。

离”,更使教师自身陷入职业倦怠与价值虚无的困境。当教育被简化为“维持秩序”的工具时,教师作为“大先生”的育人智慧与仁爱之心便容易被制度化的标准所隐匿。

针对这一职业困境,现有研究多从外部支持系统与显性专业能力两个维度进行归因。外部支持视角认为,资源配置的匮乏、班额过大及专业支持体系的断裂,迫使教师在“精力有限”与“需求无限”的博弈中产生防御性心理,从而导致专业信念的消极防御^[4];显性能力视角则指出,特殊教育专业知识与技能的缺失,使得教师在面对特殊幼儿的行为挑战时产生习得性无助,进而动摇了其从教的信心与信念^[5]。这两种解释路径共同指向了融合教育教师在转型期面临的文化冲突:一方面,教育家精神要求教师具备“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与“启智润心、因材施教”的育人智慧;另一方面,现实场域的复杂性使得教师倾向于退守职业安全底线,形成“信念悬置”的妥协状态。这种“价值理想”与“现实压力”的持续张力,构成了教师内隐专业信念重塑的核心矛盾。

专业信念是教师内化了的的教育价值观与行动指南,其中“内隐专业信念”更是深藏于潜意识层面、在关键教育情境中自动化指引行为的心理图式^[6]。相较于显性的教育态度,内隐信念更具稳定性与隐蔽性,也更难被传统的培训模式所改变。质性研究作为一种深入意义世界的探究方式,能够穿透表层的行为现象,捕捉教师内心深处的挣扎、反思与觉醒过程。教师从职业角色的“缺位”到教育家精神引领下的“归位”,本质上是一个生命意义重构与专业身份认同的动态演变过程。许多教师在初期可能表现为排斥或无助,但在教育家精神的感召、融合实践的磨砺及师幼互动的反哺中,其信念体系逐渐向“全纳接纳”与“生命在场”转变^[7]。

遗憾的是,当前学界关于学前融合教育教师的研究多聚焦于外部政策执行、技能培训或通过量表测量的显性态度,尚未深入系统地阐释教师内隐专业信念重塑的内在机制与微观

心理历程^[8-9]。现有研究往往忽视了教师作为生命主体,在面对特殊儿童时如何通过自我对话与情境互动实现精神成长的动态过程^[10]。因此,有必要引入质性研究范式,在教育家精神的视域下,对学前融合教育教师的信念重塑过程进行深描,以揭示其从“旁观者”转变为“引路人”的深层逻辑。

据此,本研究立足教育家精神的理论高度,选取若干位经历过深刻信念转变的学前融合教育教师为研究对象,运用叙事探究与解释现象学分析方法,旨在系统回答以下问题:学前融合教育教师内隐专业信念的“缺位”表征及其形成根源是什么?在从“缺位”走向“归位”的过程中,教师经历了哪些关键的心理转折阶段?教育家精神(如道德情操、育人智慧、仁爱之心)是如何在具体的融合教育情境中被唤醒并引领教师实现信念重塑的?通过回答上述问题,旨在探索提升学前融合师资队伍质量的内源性路径,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融合教育支持体系提供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解释现象学分析作为核心研究方法。解释现象学(IPA)由J. A.史密斯(J. A. Smith)等人于2009年提出,植根于现象学、解释学和个案研究的理论土壤,特别适用于探索个体如何感知和理解其个人世界中的重大生活体验^{[11]52}。基于教师心理学与教师发展视角,学前融合教育教师从职业角色的“缺位”走向教育家精神引领下的“归位”,本质上是一个深层的心理重构与意义生成过程。内隐专业信念并非显性的知识条目,而是潜藏于教师意识深处、在复杂教育情境中被触发的心理图式。这一重塑过程往往伴随着职业困惑、情感挣扎、价值冲突以及最终的顿悟与升华,具有高度的情境性与个体差异性。IPA方法不仅关注教师“经历了什么”(现象学描述),更致力于揭示教师“如何理解这些经历”(解释性建构),能够有效穿透表层的教育行为,深入挖掘教师在教育家精神感召下,如何在与

特殊幼儿的互动中重塑职业信仰的微观心理机制。因此,采用 IPA 方法能够最大限度地还原教师信念转变的“第一人称视角”,契合本研究对深层心理历程的探究需求。

(二) 研究对象

依据解释现象学的取样原则,本研究采用目的性取样策略,结合关键个案取样与滚雪球取样法,最终选定 8 位学前融合教育教师为研究对象^[12]。选择该群体作为研究对象的核心原因在于:学前阶段是特殊儿童早期干预的关键期,也是融合教育挑战最为集中的阶段。教师不仅面临繁重的保育教育任务,还需应对特殊幼儿突发的行为问题及家长的焦虑情绪。这种高压环境极易导致教师产生职业倦怠或信念游离(即“缺位”)。那些能够在困境中重拾初心、将教育家精神内化为行动自觉(即“归位”)的教师,其心路历程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与典型性,能够为理解教师专业成长提供独特的“内部视界”^[13]。

为确保研究的聚焦性与深度,样本选择遵循同质性与异质性结合标准。其一,岗位同质性。所有受访者均为普通幼儿园的主班教师或配班教师,且所在班级目前或曾持续安置过

至少一名经过专业诊断的心智障碍幼儿(如孤独症谱系障碍、发育迟缓等),确保其拥有真实的融合教育“在场”体验。其二,经历特质性。受访教师必须经历过明显的“信念转变”过程,即在融合教育实践初期曾产生过迷茫、排斥或无助感(缺位表现),但通过关键事件、自我反思或外部支持,成功实现了心态的积极转变,并表现出较高的职业认同感与教育情怀(归位表现)。其三,背景多样性。在满足上述条件的基础上,兼顾不同教龄(职初、骨干、资深)、学历及幼儿园性质(公办、民办),涵盖不同职业发展阶段的信念重塑特征。

在研究效度保障方面,建立了严谨的筛选与验证机制:首先,通过幼儿园园长推荐与研究者预访谈,筛选出能够清晰表达自身心路历程、且符合“从消极/迷茫到积极/坚定”转变特征的教师;其次,在正式访谈中注重叙事的连贯性,验证其信念转变的真实动因;最后,采用成员检验法^[14],将初步分析出的主题(如“仁爱之心的唤醒”)反馈给受访教师,确认研究者的解释是否契合其真实体验。研究对象具体信息如表 1 所示。

表 1 访谈对象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号	性别	教龄	融合教育 经历时长	学历	所在幼儿 园性质	接触的主要特殊 幼儿类型	信念转变的关键契机 (预访谈概括)
T1	女	5 年	3 年	本科	公办示范园	孤独症谱系障碍	从被特殊幼儿攻击后的恐惧,到发现其独特闪光点后的接纳
T2	女	12 年	6 年	大专	民办普惠园	发育迟缓、多动症	从将特殊教育视为“额外负担”,到因幼儿毕业时的依恋而产生职业成就感
T3	女	8 年	4 年	本科	公办一级园	智力障碍 (唐氏综合征)	参加“特教名师工作室”后,被教育家精神感召,重塑育人观
T4	女	15 年	8 年	本科	民办国际园	孤独症 (高功能)	面对家长的不信任,通过专业学习赢得尊重,从“无奈应付”转为“主动作为”
T5	男	4 年	2 年	硕士	公办示范园	注意力缺陷多 动障碍(ADHD)	克服男性幼儿教师的职业认同危机,在帮助特殊幼儿行为矫正中找到价值
T6	女	22 年	10 年	大专	公办一级园	听力障碍 (佩戴助听器)	随着自身育儿经验的丰富,将“母性之爱”升华为“师者大爱”
T7	女	6 年	3 年	本科	民办普惠园	孤独症谱系障碍	在一次融合教育公开课的挑战中,深刻体会到“因材施教”的教育家智慧
T8	女	10 年	5 年	本科	公办示范园	脑瘫(轻度)	从关注“整齐划一”的常规管理,转向尊重生命的“个别化差异”

三、研究结果

总的来看,学前融合教育教师内隐专业信念从“缺位”到“归位”的重塑,并非简单的线性上升,而是教师个体在复杂的融合教育场域中,通过与特殊幼儿的深度互动、对职业伦理的反复省思以及对教育家精神的内化实践,逐

步克服职业倦怠与能力恐慌的过程。综合分析访谈文本发现,8 位教师的信念转变呈现出从“他者化的旁观”到“主体性的担当”的演进历程,揭示了教育家精神如何唤醒沉睡的职业自觉。表 2 总结了这一过程中的核心主题及对应的典型话语。

表 2 主题和典型话语一览表

核心主题	子维度	典型话语示例
信念“悬置”	责任边界模糊;安全至上的避责心理	“只要他在班里不磕着碰着、不打扰别的孩子,我就谢天谢地了。”“我是幼儿教师,不是特教老师,这超出了我的职责范围。”
信念“摇摆”	普特冲突下的焦虑;有心无力的习得性无助	“我想帮他,但班里还有 30 多个孩子,我真的顾不过来。”“每天像打仗一样,我也想因材施教,但找不到方法,只有深深的挫败感。”
信念“唤醒”	仁爱之心的触动;看见生命独特性的惊喜	“那天他突然把积木递给我笑了一下,我突然意识到他也是个渴望被爱的孩子。”“原来他不听话不是因为‘坏’,而是因为听觉敏感,我开始心疼他了。”
信念“重构”	育人智慧的生成;优势视角的专业自觉	“不是孩子不适应我的课,是我的课没适应他。我开始尝试调整教学节奏。”“发现他对音乐敏感后,我让他做‘小指挥’,全班小朋友都对他刮目相看。”
信念“归位”	弘道追求的升华;师幼互构的生命成全	“特殊孩子是上天派来考验我、成就我的‘天使’,是他教会了我什么是真正的耐心。”“融合教育不只是接纳他,更是让孩子学会包容,这才是大教育。”

(一) 信念“悬置”:职业角色的防御性异化

在融合实践的初期,教师的内隐信念往往处于“缺位”状态,表现为将特殊幼儿视为班级管理的“异质因素”或“潜在风险”,从而采取防御性的职业姿态。这种信念悬置源于两重逻辑的制约:“安全至上”的制度化规训。这使教师面对考核压力与家长问责风险时,倾向于将教育目标降为“看护”。“只要不出安全事故就是胜利”(T2),这种底线思维导致教师在心理上与特殊幼儿划清界限,将幼儿障碍带来的行为挑战简单定义为“麻烦”。例如,“他一尖叫我就紧张,生怕家长投诉,那时候真希望他别来上学”(T7)。专业边界的固化认知使受传统师范教育分科体系影响的教师潜意识里认为“普教”与“特教”是割裂的,认为接纳特殊幼儿是对自身专业领域的“入

侵”。“我学的专业是如何组织集体教学,不是康复训练,这对我来说是不公平的负担”(T5)。这种认知的错位使得教师在面对特殊幼儿时,自动关闭了“教育者”的通道,仅保留了“管理者”的角色,导致教育家精神中“有教无类”的信念在现实面前暂时失效。这种防御性姿态的核心在于,教师将融合教育的挑战视为一种个人职业生涯的“额外损耗”而非专业成长的契机,其深层心理是面对不确定性时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的过度激活。

(二) 信念“摇摆”:现实困境中的伦理焦虑

随着与特殊幼儿接触的深入,教师开始陷入“想做而做不到”的伦理焦虑中。这一阶段的内隐信念呈现出剧烈的摇摆特征:既有作为教师的道德本能,又有现实压力下的无奈妥协。“效率优先”与“公平关怀”的冲突,在大

班额背景下,教师深陷集体教学进度与个别化支持的零和博弈中。“每次我想停下来教他,其他孩子就乱了。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我只能选择忽略他”(T4)。这种“不得不”的选择让教师产生了深刻的道德负疚感,质疑自己是否背离了教育初心。专业效能感的缺失所引发的“习得性无助”使缺乏特教技能支持的教师在多次尝试干预失败后,容易产生自我怀疑。“我试过夸奖他,也试过冷处理,都没用。我觉得自己很无能,根本不配谈教育”(T1)。这种无力感并非源于爱心的匮乏,而是源于“育人智慧”在复杂情境下的暂时短路。教师在这一阶段虽然身在场,心却在“坚持”与“放弃”之间反复拉锯,信念处于极其脆弱的临界点。这种摇摆不定实际上是教师旧的、稳定的职业认同感被打破,而新的、适应融合教育需求的职业身份尚未建立时的“阈限状态”,充满了痛苦的身份撕裂感。

(三)信念“唤醒”:仁爱之心的情境性触发

转折往往发生于微观的师幼互动瞬间。当教师放下刻板的评价标准,真正以“仁爱之心”去凝视特殊幼儿时,内隐信念开始发生质的转变。这一唤醒过程主要通过情感连接实现,从“凝视缺陷”转向“看见需求”。意味着教师不再将幼儿的怪异行为视为对权威的挑战,而是解读为一种特殊的表达,同理心由此被激活。“有一次他尿裤子后躲在角落发抖,那一刻我忘了他是个‘麻烦’,只看到一个无助的孩子需要妈妈般的拥抱”(T6)。这种基于人性的情感共鸣,是教育家精神中“乐教爱生”的具象化体现,它打破了防御性的心理壁垒。微小进步带来的价值反馈同样关键,特殊幼儿在长时间停滞后的某次微小闪光,往往能给教师带来巨大的心理震撼。“教了一学期,他终于开口喊了我一声‘老师’,那一刻我眼泪都下来了,觉得一切辛苦都值了”(T3)。这种情感回馈机制修复了教师受损的效能感,使其意识到教育的力量真实存在,从而激发了内在的职业动力。这一唤醒过程的关键在于教师的认知框架发生了根本性位移:他们不再将

特殊儿童视为需要被“矫正”的对象,而是开始进入儿童的生活世界,从儿童的角度理解其行为逻辑。这种“视角转换”是仁爱之心的认知基础,它使教师能够穿透行为表面,触及儿童内在的脆弱与渴望。

(四)信念“重构”:育人智慧的实践性生成

在情感唤醒的基础上,教师开始主动寻求专业成长,将内隐信念从单纯的感性关怀上升为理性的“育人智慧”。这一阶段标志着教师从被动应对转向主动作为。一方面,教学范式的生态化转型。教师开始意识到“削足适履”式要求特殊幼儿适应集体这一做法是行不通的,必须调整环境与策略。“我开始把教学目标分层,允许他用画画代替说话。因材施教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每天都在做的事”(T8)。这种转变体现了教师对“启智润心”教育家精神的深刻践行,即尊重生命的多样性与独特节奏。另一方面,优势视角的专业自觉。教师不再执着于“修复”缺陷,而是致力于挖掘亮点,重塑幼儿的自尊。“既然他坐不住、喜欢跑,我就让他当‘物资快递员’。他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找到了自信,小朋友也开始接纳他”(T2)。这种信念重构不仅改变了特殊幼儿的生存处境,也让教师在解决复杂问题中体验到了专业创造的乐趣,实现了从“教书匠”向“大先生”的跨越。这一过程体现了教师专业自主性的真正回归,他们从被动等待外部支持转变为主动的、具有创造性的问题解决者,开始在每日的教学实践中进行“微革命”,将抽象的融合教育理念转化为具体、有效的教学行动。

(五)信念“归位”:弘道追求的生命化共生

在经历冲突、觉醒与实践重构后,教师的内隐专业信念最终回归到教育的本体价值,形成了“师幼共生”的终极认同。这一“归位”体现了教育家精神的最高境界。其一是职业认同的超越性升华。教师不再将融合教育视为负担,而是将其视为自我修炼与精神成长的契机。“是这些特殊孩子拓宽了我生命的宽度,

让我明白了什么是无条件的爱与接纳。他们是我的老师”(T5)。这种反哺式的认知,标志着教师已将职业责任内化为一种生命信仰。其二是社会责任的自觉担当。教师的视野从班级延伸至社会,致力于构建更包容的文化生态。“通过引导普通孩子接纳特殊同伴,我是在为未来培养更具文明素养的公民。这就是我在做的事情的意义”(T7)。此时,教师已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社会文明的引路人。内隐信念的最终归位,实现了教育家精神中

“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宏大追求,教师与幼儿在相互成全中共同抵达了教育的美好彼岸。这种共生关系超越了传统的“教”与“学”的主客二元对立,教师与特殊幼儿互为镜子,彼此映照出生命最本真的样态——脆弱与坚韧、依赖与成长。正是在这种深度的生命交织中,教育不再是单向的塑造,而成为双向的滋养。

四、讨论与分析

(一)从信念“悬置”到信念“归位”:内隐专业信念重塑的阶段与路径

表 3 学前融合教育教师内隐专业信念重塑的阶段与路径一览表

阶段特征	教育家精神唤醒维度	职业角色认知转向	关键转变路径	信念重塑机制
隐匿与悬置 （“缺位”）	道德情操被制度化隐匿 （安全至上、责任边界固化）	教育异化为看护管理 “我是管理者/看护者”	从危机防御走向心理隔离 （将特殊需求视为麻烦,采取回避策略）	“防御性异化” 职业安全感压倒教育使命感
震荡与摇摆 （“焦虑”）	仁爱之心遭遇现实阻滞 （有心无力、公平困境）	教育效能陷入伦理冲突 “我想做个好老师,但做不到”	从伦理觉醒陷入习得性无助 （在普特冲突中挣扎,自我怀疑加剧）	“认知失调” 理想信念与现实行为的张力博弈
觉醒与重构 （“觉醒”）	育人智慧的情境性生成 （因材施教、优势视角）	教育目标转向个别化支持 “我是支持者/发现者”	由情感触发启动专业求索 （被微小进步触动,主动寻求策略调整）	“情感赋能” 师幼互动反馈修复专业效能感
升华与归位 （“共生”）	弘道追求的生命化内化 （乐教爱生、胸怀天下）	教育升华为生命共生 “我是引路人/共生者”	由意义重构达成价值认同 （视挑战为成长契机,构建全纳生态）	“精神内化” 将教育家精神从外部规范转为内在信仰

表 3 呈现了学前融合教育教师内隐专业信念重塑的动态演进过程。这不仅是一个职业心理从防御走向接纳的适应过程,更是教育家精神在个体生命经验中从“符号化认知”转化为“具身化实践”的精神觉醒历程。在制度规训与文化冲突的初期,教师往往因为安全责任与能力恐慌,将特殊幼儿视为教育的“例外”,信念处于悬置状态(隐匿阶段)。随着融合实践的深入,普特冲突引发的伦理焦虑迫使教师在“育人理想”与“现实困境”中反复拉锯,信念呈现剧烈的摇摆(震荡阶段)。当仁爱之心被具体的师幼互动情境唤醒,教师开始尝试突破防御心理,主动寻求专业支持,育人智慧得以萌发(觉醒阶段)。最终,通过持续的反思与实践,教师将特殊教育视为成就自我

与成全生命的共同体,实现了弘道追求与职业认同的深度融合,信念回归教育本真(升华阶段)。这一路径表明,教师信念的重塑核心在于通过“情境—反思—行动”的循环机制,将外部的制度压力转化为内在的专业成长动力。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演进并非单向、线性的必然进程,许多教师可能在“摇摆”与“觉醒”阶段反复徘徊。每一次真实的师幼互动、每一次成功的专业介入或失败的挫折,都可能成为推动教师向下一阶段转化的关键事件。因此,该模型是一个动态的、具有反馈回路的螺旋式上升结构。

(二)制度—文化—主体:内隐专业信念重塑机制的三维动因分析

学前融合教育教师内隐专业信念的演变,

本质上是教师主体在制度压力、文化冲突与自我实现需求之间进行的意义协商与身份重构。其深层动因在于,教育家精神并非抽象的道德说教,而是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与文化土壤中,通过教师主体的能动实践被重新定义与激活的。在传统的学前教育话语体系中,“效率优先”与“整齐划一”的集体教育逻辑长期占据主导地位,其构建的评价规则与管理标准(如一日生活流程的标准化、班级常规的秩序化、安全事故的一票否决制),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教师的行动逻辑,将融合教育简化为“看护—管理—维持”的技术流程^[15]。而教师作为融合教育的关键执行者,其基于教育家精神的育人追求往往被淹没在制度化的琐碎事务中。这种职业理想与现实困境的张力,通过制度、文化、主体三重机制的复杂互动,深刻地塑造着教师内隐信念的重塑轨迹。

1. 制度性根源:评价体系的规训与专业自主权的博弈

制度环境是塑造教师内隐信念的“硬约束”。当前的学前教育评价体系往往存在“效率导向”与“安全问责”的双重压力,这构成了教师信念“缺位”的初始动因,同时也成为触发其反思与重塑的关键变量。在传统的绩效评价中,班级秩序、教学进度与安全事故率是衡量教师工作的核心指标^[16]。这种量化考核机制迫使教师在面对不可控的特殊幼儿时,本能地启动“避责机制”。由于缺乏针对融合教育的专项评价与激励制度,教师付出的额外情感劳动往往被视为“无效劳动”,从而导致职业倦怠与信念的工具化异化^[17]。然而,制度并非铁板一块。部分教师通过对诸如《“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等政策文本的深入解读,开始意识到融合教育是不可逆转的时代趋势。他们不再被动等待制度的完善,而是利用园本教研、名师工作室等微观制度空间,争取更多的专业自主权。例如,通过开展“个别化教育计划(IEP)”,将特殊幼儿的进步纳入班级整体评价体系。这种主体性的博弈过程,促使教师从“制度的执行者”转变

为“制度的调适者”,在有限的空间内为教育家精神的落地寻找制度缝隙,从而推动信念从“被动应付”向“主动担当”转变。

2. 文化认知根源:排斥性惯习与全纳文化的冲突与融合

内隐信念深植于更为隐秘的文化土壤中。社会长期存在的对残障群体的“刻板印象”与主流教育崇尚的“整齐划一”文化惯习,构成了教师信念重塑的深层阻力与张力场。布迪厄的“惯习”概念解释了教师为何会下意识地排斥特殊幼儿^[18]。长期的普教经验让教师内化了一套关于“好孩子”(听话、聪明、守纪律)的标准图式。当特殊幼儿打破这套图式时,教师感受到的不仅是管理上的混乱,更是文化上的冒犯^[19]。这种潜意识里的排斥文化,是导致仁爱之心难以被唤醒的认知根源。教育家精神的介入,为打破这一文化惯习提供了强大的精神资源。通过引入“有教无类”的传统师道文化与现代“全纳教育”理念,教师开始对原有的认知框架进行解构。他们不再将“差异”视为对“正常”的威胁,而是将其重新定义为教育资源的丰富性。例如,将特殊幼儿的单纯视为班级道德教育的契机,引导普通幼儿学习包容与助人。这一过程标志着教师从“排斥性文化”的无意识传承者转变为“全纳文化”的积极建构者,其内隐信念也随之完成了从“唯智主义”向“生命主义”的价值跃迁。

3. 主体性根源:职业生存焦虑与生命意义实现的辩证统一

如果说制度是骨架,文化是土壤,那么教师的主体性觉醒则是信念重塑的灵魂。这一过程本质上是职业生存理性与生命意义追求之间的辩证运动。在融合教育初期,教师面临着巨大的职业生存压力——如何平衡繁重的保育任务与特殊支持需求?如何在家长的不信任中维持职业尊严?这种生存焦虑往往导致教师产生“技术理性”倾向,即试图寻找一种快速解决问题的“技术”来摆脱困境,而非深入探究教育的本质^[20]。然而,教育独特的生命属性决定了纯粹的技术理性无法解决心

灵的问题。当教师在与特殊幼儿的深度互动中体验到一种超越功利的生命感动(如被信任、被依赖、见证成长)时,教育家精神中的“弘道追求”便被激活了。教师开始意识到,帮助特殊幼儿不仅仅是完成工作任务,更是在成全一个独特的生命,同时也在升华自己的人生境界。这种“利他”与“利己”的辩证统一,消解了职业倦怠感,使教师在精神层面实现了“归位”。最终,内隐专业信念不再是外在强加的道德律令,而成为教师自我生命完整性的内在需求,实现了“经师”与“人师”的统一。

五、建议和对策

从本研究结果来看,学前融合教育教师内隐专业信念从“缺位”到“归位”的重塑,并非教师个体的孤立心理调适,本质上是“制度保障—文化滋养—专业赋能”协同作用下的生命自觉过程。这一过程不仅需要唤醒教师个体的教育家精神潜质,更依赖幼儿园、教育行政部门及社会支持系统的持续联动。当教师的每一次情感付出都能得到制度的承认,当融合教育的育人价值被职业文化充分尊重,当专业困惑能在实践共同体中得到化解,教师的内隐信念才能完成从防御性的“职业生存”向创造性的“弘道追求”的根本性转变。未来,为进一步推动教育家精神在学前融合教育领域的落地生根,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做出努力:

一是在制度层面,构建发展性评价体系,破解“安全避责”的制度性枷锁

内隐信念的“缺位”很大程度上源于现行评价制度对融合教育复杂性的忽视。因此,必须改革单一的绩效考核模式。例如,在考核指标上,将“融合教育素养”与“个别化支持质量”纳入教师专业发展评价标准,降低对融合班级或者是特殊幼儿所在班级幼儿班级常规秩序与统一教学进度的刚性要求,为教师践行“因材施教”提供制度安全感;在支持保障上,建立“融合教育资源教师”巡回指导制度或适当降低融合班级师幼比,通过行政减负与人力支持,让教师从繁杂的事务性工作中解脱出

来,使其有余力去体悟与践行“乐教爱生”的教育家精神。

二是在文化层面,营造全纳性职业生态,重塑“育人智慧”的价值认同

要扭转教师对特殊教育的畏难情绪与边缘化认知,必须在职业文化深处进行价值祛魅与意义重构。例如,在精神引领上,挖掘并宣传学前融合教育领域的“教育家型教师”典型案例,通过叙事分享会等形式,讲好“看见生命、成全生命”的融合故事,将抽象的教育家精神具象化为可感可学的职业范式;在团队建设上,倡导“接纳差异”的园所文化,将特殊幼儿的进步视为教师团队共同的荣耀而非负担,消除教师在面对挑战时的孤岛感,让“启智润心”成为集体无意识的职业追求。

三是在实践层面,打造反思性实践共同体,构建“医—教—康”协同支持模式

内隐信念的坚定离不开专业能力的支撑。单纯的理念灌输难以解决“本领恐慌”,必须回归实践场域。所谓“医—教—康”协同,是指打破医学康复、教育教学与家庭康复之间的专业壁垒,由儿科医生或康复治疗师提供医学评估与康复建议,教师负责将康复目标融入一日活动与课程教学,家长则在家庭场景中延续干预策略,三方形成“评估—教学—康复”的闭环协作,使特殊幼儿获得跨场域的一致性支持。在专业成长上,推行“嵌入式”教研模式,组建由特教专家、资深幼教与医生组成的跨学科支持团队,深入班级现场协助教师解决棘手行为问题,让教师在一次次成功的干预体验中强化职业效能感。在内化机制上,鼓励教师撰写“融合教育反思日记”或开展叙事探究,引导教师在记录与复盘中与自我对话,将外部的技能经验内化为深层的育人智慧与仁爱信念,最终实现教育家精神从“他律”向“自律”的升华。这种实践共同体的核心在于,将个体独自面对的困境转化为一个专业社群共同研讨、共同分担的议题,从而为教师提供持续的情感支持与智力支撑,使信念重塑过程不再是一场孤独的内心挣扎,而成为一段有同伴、有导师、有

资源的专业成长旅程。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印发《“十四五”学前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和《“十四五”县域普通高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的通知[EB/OL]. (2021-12-09) [2025-12-03].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2/16/content_5661144.htm.
- [2] 习近平. 习近平致全国优秀教师代表的信[EB/OL]. (2023-09-09) [2025-12-03].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9/content_6903084.htm.
- [3] 刘佰桥, 贾天龙, 王敏, 等. 黑龙江省学龄特殊儿童教育现状调查分析[J]. 绥化学院学报, 2024(4): 109-112.
- [4] 张雪儿, 傅明忱. 学前融合教育教师领悟社会支持与工作投入的关系: 融合教育自我效能感和融合教育态度的链式中介作用[J]. 现代特殊教育, 2025(20): 19-28.
- [5] 曹莉, 韩燕, 胡雪芬. 基于校园双向赋能, 提升学前教育专业学生融合教育实践能力[J].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21(3): 38-44.
- [6] 王邦权, 贾亚丹. 教师教学能力的内隐信念对幸福感的影响——基于四川省高职院校教师的实证研究[J]. 职业技术教育, 2022(29): 57-62.
- [7] 曾彬, 唐力莎. 师幼互动对幼儿主体性建构的价值审视与践行路向[J]. 黑龙江教师发展学院学报, 2025(3): 134-138.
- [8] 李亚青, 罗静. 学前融合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现状及策略研究[J].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3): 48-55.
- [9] 王凤. 学前融合教育师资培训现状及策略研究[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23(12): 163-165.
- [10] 杨素萍, 李志芳. 自我认同理论视角下学前融合教育教师自我认同的挑战与突破[J].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 2025(3): 70-76.
- [11] SMITH J A, FLOWERS P, LARKIN M. Interpretative phenomenological analysis: Theory, method and research[M]. London: Sage, 2009.
- [12] 于冬青, 张希. 幼儿园教师家园合作能力的质性研究[J]. 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2024(3): 7-14.
- [13] 孙刚成, 刘玲. 教育家精神的发展脉络、时代价值与实践路径[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5): 199-210.
- [14] BIRT L, SCOTT S, CAVERS D, et al. Member checking: A tool to enhance trustworthiness or merely a nod to validation? [J]. Qualitative health research, 2016(13): 1802-1811.
- [15] 张银花, 吴晓蕾, 宁亚飞. 普通幼儿园特殊幼儿的在园生存现状——基于A市39所普通幼儿园的调查数据分析[J]. 宁波教育学院学报, 2024(1): 20-24.
- [16] 李丽娥, 刘书辉. “三教制”模式下幼儿教师绩效考核体系的建构[J].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18(11): 75-79.
- [17] 熊琪, 李拉, 李晓娟. 融合教育教师付出—回报失衡对职业倦怠的影响: 未来时间洞察力的中介作用[J]. 中国特殊教育, 2024(10): 26-33.
- [18] 柳镁琴, 甘露, 廖益. 学前教育专业师范生的融合教育素养培育——场域转变与惯习—资本重构的视角[J]. 现代特殊教育, 2025(12): 59-65.
- [19] 李春影, 石中英. 布迪厄社会学思想对中国教育研究的影响: 回顾与评论[J]. 比较教育研究, 2018(8): 38-47.
- [20] 何顺超, 刘将. “互联网+教育”浪潮中教师教育理性的偏向与复归[J]. 中国教育学刊, 2019(4): 73-77.

(责任编辑 师 语)

从物件到课程资源:幼儿园教育的物化与超越^{*}

石建伟

(扬州大学教育学院, 江苏扬州 225002)

[摘要] 物件是幼儿园实现儿童发展的基本保障,但幼儿园存在物件主导教育实践,过度追求物件的符号价值,物件固化教师的专业认知与自我认同等教育物化现象。幼儿园教育的物化可能会导致儿童被物件牵绊,教师育人素养弱化,课程目的性缺失等问题。需要从儿童活动需求、教师课程能力、幼儿园课程文化三方面着手将物件转化为课程资源,以更好实现物件的育人价值。

[关键词] 幼儿园物件; 课程资源; 教育物化; 教育装备

[中图分类号] G61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4-0110-07

幼儿园不是物件堆砌的空间,而是以育人目标促进物件转化为有意义课程资源的育人场所。《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以下简称“《评估指南》”)针对幼儿园环境创设提出了“避免奢华浪费和形式主义”。这一提法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幼儿园教育实践中“见物不见人”“物质材料闲置”等盲目的物化现象。这种现象不顾幼儿园育人目标与实际需求,以物件的符号意义点缀教育形象,期待物件及其负载的技术能够解决教育问题,存在着技术性压倒人文性的危险。在卢卡奇的定义中,物化不仅仅指人对有形物的追求,更是指物对人的支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性质,从而获得一种“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1]147}。幼儿园将物与教育质量等量齐观的错误之举不仅有悖《评估指南》的精神,也造成儿童在教育中主体自由的丧失和

作为人的价值的贬低^[2]。

教育作用的发生离不开物件的支持,它们以各自的物质形态及其功能为践行教育理念提供物质基础。同时,物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幼儿园教育文化的体现,具有洞悉“人—物”互动关系的教育学意义^[3]。但物化的教育遗忘了人与物的恰切关系。物件的喧宾夺主使人们失去了关于教育目的与理念的思考。在承认物件教育价值的基础上,本文讨论的最终目的不是要排斥物件的使用,而是反思幼儿园过度硬件投入和教育教学中的技术依赖现象,以期让幼儿园中的物件具有育人价值,让物件成为教育理念与课程的物化,以课程引导物件使用。

一、幼儿园教育物化的多维表征

幼儿园教育物化是指幼儿园过分强调教育中的物质资源和硬件设施的价值,忽视了从课程设计的角度对物件的规划和使用,不注重师幼互动、教师指导在幼儿发展中的作用,过

^{*} [基金项目]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项目“数字媒介时代的儿童文化危机与教育应对研究”(项目编号:DHA230420)。

[收稿日期] 2025-11-19

[作者简介] 石建伟,男,江苏宿迁人,扬州大学教育学院讲师,博士。

分追求物件的数量种类和符号价值,甚至形成了由物件塑造的教师专业认知。

(一)物件主导幼儿园的教育实践

《幼儿园玩教具配备指南》只是提出了一所幼儿园的硬件配备要求,但具体如何使用硬件则需要幼儿园结合课程进行规划。实际上,幼儿园的硬件配备以及教室空间的规划都带有一定的教育意图,然而,作为课程实施者的教师时常忽略在育人目标指引下对物件的合理使用,反倒是在习惯中形成了以物件为准则开展一日活动的现象。似乎以物件的摆放将教室设置成一架机器,幼儿的学习就是进入不同的物理空间启动机器的不同部分。

其一,为了使用某种技术而使用物件,将使用物件作为一种习惯。对物件的使用替代了关于育人目标和课程设计意图的思考。教室里的教学一体机就是教师开展教学、圈谈、游戏分享等集体活动时必不可少的工具。笔者在幼儿园观察到一种现象:在科学教学中,教师为了展示幼儿的操作记录单,便用手机一张张地拍摄幼儿的记录单,然后通过微信上传至教学一体机上展示。实际上,教师完全可以直接将幼儿的记录单张贴在小黑板上展示。相比较而言,小黑板能够将记录单同时呈现在同一平面内供幼儿直观比较,教学一体机则是一张张地呈现,通过屏幕的展示效果未必优于小黑板的展示效果。活动结束后,笔者与教师交流这一现象,教师表示这样做只是一种习惯,没有太多思考,因为现在的游戏分享都是这么做的。

其二,将课程活动的开展等同于幼儿与不同物件的互动。这类教师按部就班地按照时间表安排幼儿进入不同的活动空间,而不去过多思考活动开展的目的以及如何观察指导幼儿的学习。他们认为自主游戏就是幼儿在区域游戏中自由玩耍,不需要教师的设计与指导,幼儿与充足的玩具材料互动即可获得发展;教师的作用在于不断投放玩具材料,而很少从课程设计角度关注如何使用玩具材料,甚至未对玩具材料的适宜性做出判断。比如,有的幼儿园投放在科学区的放大镜根本起不

到清晰地放大物体的效果。

其三,教室成为一个由物件组成的联动装置,置身其中的人反倒被物件控制。在物件堆积的空间里,师幼关系变得机械化、标准化,逐渐脱离了课程的育人需求,演变成了教师以僵硬的规则约束儿童。教室中物件的设计与摆放本应服务于教育目的,现实中却成为控制儿童的工具,限制了儿童的自由探索和学习行为。教师并未因为儿童的学习需求而重塑空间,相反是为了物品摆放而管理儿童的学习行为,最终发展出了阻碍儿童探究学习的控制技术。由于过多的物件介入,教育空间被既定化、独立化和技术化,浓厚的工具性色彩导致儿童的成长出现异化^[4]。物件不仅未能激活儿童的能力,反而限制他们的自由探究,从而影响学习质量。

(二)物件的符号价值赋予教育以意义

用来实现人类意图的技术物件并非纯粹中立的发明物,而是“一个由对象、活动、知识和意义构成的网络”^{[5]导言7}。也就是说,人类发明技术物件的意图、所使用的材料、付出的劳动等决定了物件的符号价值。教师假设技术物件的本体功能可以提高教育效率,其象征功能可以提升教育的形象。

其一,借助物件的文化意义彰显教育品位。幼儿园里不乏价格昂贵、文化形象良好的物件。它们拥有人们共同认可的符号意义,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价值已经让位于符号价值,常被用于表现教育的质量与品位,为幼儿园购置价格昂贵的教育装备就是如此。比如,我国许多省份在学前教育机构装备规范中都要求幼儿园配备钢琴,或者61键电子琴、风琴。钢琴的符号意义让一些教师认为,钢琴有着其他物件替代不了的活动组织价值,从而积极探索将其融入教育活动中的方式,包括音乐教学、其他艺术类活动、班级常规管理等。有的用琴声作为一日活动过渡的提示音,发挥上下课铃声的效果,虽然通过语言提示、拍铃鼓、放音乐都能实现同样的效果,但一些教师坚信,琴声的美感要优于其他声音,而且有助于提升儿童的音乐素养和审美情操。再比如,有的幼儿园

开展行动研究,探索钢琴在幼儿园一日活动中的应用,并证明琴声会让儿童集中注意力,有助于活动的开展。同样,玩教具的实际教育效果也不在于其价格和社会文化意义,而取决于教师如何将其应用于儿童的课程学习。然而有的幼儿园购置成套的茶桌、茶具用于开展茶艺课程,却连课程的价值与目的都没有想清楚,仅仅是借用经典文化物件让活动看起来很精彩、很高端。这种脱离课程计划的物件摆设,仅仅是以物件打造了教育个性化的表象。

其二,用新技术物件代表教育现代化,寄希望于技术改进教育问题。拥有先进的技术装备被看作是教育现代化的体现与教育质量的保证。一种最快捷的提升幼儿园教育形象的方式就是优质的硬件配备。除了符合标准的园舍之外,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新技术物件的投入变成了一种紧跟时代步伐的方式,以新技术物件使用为代表所形成的学校物体系,逐渐演化为教育现代化的符号表征。比如,有的幼儿园专门建立平板电脑活动室,或者声称使用人工智能进行儿童评价,通过这些技术向家长承诺教育质量。新技术的不断发展与制造商的承诺让人们甚至相信通过技术的应用可以解决幼儿园教育实践中的问题。比如,有人认为利用网络可以丰富幼儿园的课程资源,为教师提供课程实施的便利。但现实中,我们往往看到的是教师不假思索地照抄网上的环境创设。这种对技术的盲目乐观背后有着关于技术的神话:技术即标准、技术即进步、技术即现代化、技术即效率。技术应用于教育的神话既背叛了教育规律,又是教育焦虑与“唯科学主义”态度重合的产物,将技术凌驾于主体之上^[6]。教师需要将这些技术置于幼儿园课程实施之中,以实现其育人价值。若没有正确的课程理念引导,新技术物件的投入只是在虚构一种优质教育的假象。

(三)物件固化了教师的专业认知与自我认同

职前教育与职后工作都强调对物件技术的学习与使用,这共同塑造了幼儿教师基于物

件的专业认知。这种认知一旦固化,便会泛化成为一种僵化的思维,构成教师专业认同和幼儿园管理上的认识论障碍。由于对技术物件的过度依赖使幼儿教师关于教育的理解是在物件的引导下展开的,是基于个人经历的未经反思的经验。学前师范生对钢琴的学习、幼儿园对教师钢琴弹奏的考核导致教师认为钢琴技能(而非艺术素养)是其专业素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钢琴的社会文化意义也加剧了教师在专业技能上对钢琴的依赖。正如19世纪钢琴繁盛之时,人们把钢琴作为“显示教养,卖弄身份,摆社交排场”的标志^{[7]27}。如今会弹钢琴依旧是一种才艺,赋予幼儿教师良好的社会形象。反过来,以操作物件为导向的教育行动,也同样将教师置于其规训体系中。进入幼儿园的物件成为检核教师技能的标准,良好的弹奏能力可以突出合格幼儿教师的身份。有些幼儿园定期考核教师的钢琴技能,有些地方甚至指定了幼儿教师的必弹曲目。弹唱说跳画的基本技能被过分抬高,甚至成为衡量幼儿教师专业素养的重要标准。例如,有的幼儿园会对学期内没有进行公开课展示的教师进行技能考核,而且技能考核直接与教师奖金挂钩。这些做法与新时代对幼儿教师的要求背道而驰。

二、幼儿园教育物化的风险洞察

尼尔·波斯曼在《技术垄断》中提出的“技术垄断文化”,即一切形式的文化生活都臣服于技艺和技术的统治,技术将替代人类思考^{[8]58}。物化的幼儿园教育也可能诱发“技术垄断教育”的现象,也就是人与物件、教育与物件之间的关系异化了,物件的技术力量和符号价值遮蔽了人的主观性和能动力量,物件成为教育活动质量的决定性力量。在盲目追求引进新物件和开发新课程资源的过程中,关于物件的目的性思考退居其次,从而导致技术物件越丰富,幼儿教育的思想性就越匮乏,就越远离教育的真谛。

(一)儿童被物件牵绊

缺乏课程设计的物件堆积,使教室成为物的空间,限制了幼儿的身体活动。与其他学段

相比,幼儿教育对物质材料的使用更为突出。源于儿童的学习特点,幼儿园教室里摆放各种物质材料,这本身并不存在什么问题。但过多的物件堆积以及它们之间的功能差异需要教师做出区域规划,这些区域本应服务于儿童五大领域的学习。然而在物质材料作为儿童学习资源的路上,幼儿园进入一个极端,即害怕教室呈现出空旷的一面,也担心教室环境过于单调而不符合儿童的特点。当教室空间被大量物件侵占,幼儿的学习与生活功能便完全受制于物件与管理制度的规划。这种物化的空间关系不仅将儿童置于被防范的客体地位,更剥夺了他们通过身体参与进行学习的根本权利。在物件的堆积中,椅子便与儿童的身体绑定了,分割了他们的身体行动也限制了活动范围^[9]。过多的物件与不恰当的教育理念,使教室空间成了教师主导的规训空间、缺乏意义的物性空间以及排斥儿童的封闭性空间。儿童仿佛成了教室里的客人,不但在身体行动上显得小心翼翼,而且在精神上缺乏归属感。儿童被抛入由各种身体技术组成的正式社会化场所。身体的技术在儿童社会化过程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教室环境的开放程度也决定了儿童的身体活动自由度。理想的教室环境是允许儿童在使用身体的过程中学会控制身体,而非在身体的限制中用意识控制身体。因此,封闭的教室空间是对儿童身体的拒绝,是一种离身的环境。

丰富的物质材料给人们制造了幸福童年的景观,但优越的物质条件并不等同于儿童的实际体验与发展情况。当前幼儿园招生宣传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硬件秀”,极力渲染设施的完备与环境的精美,却对核心的课程质量避而不谈。教育装备一定是为了能够向教育主体更好地呈现出教育内容的意义而被设计制造出来的^[10]。同样,在教室里选择投入配套设施时也应反思是学习者基于需求使用物件,还是以物件为依据约束学习者的学习行动。所以,幼儿园的硬件配备与玩具材料投放也应配合课程实施彰显育人价值,否则只能沦为—堆价值不大的摆设。

(二) 教师育人素养弱化

幼儿园教育的物化窄化了幼儿教师的专业素养。在技术不断更新的背景下,教师对物件的操作技术成了衡量他们专业素养的重要参照。似乎教育不再重视教师的职业信仰与理念,具备娴熟技术的人就可以教书育人。这一点在幼儿教师的资格证书面试和求职面试方面均有所体现:弹不好钢琴可能抵消面试者的其他优势。使用好以钢琴为代表的物件占据了幼儿教师职前学习的大部分时间。幼儿教师在职前阶段特别看重技艺而非审美素养,音乐与美术课程繁多,练习时间长。这种培养模式不但导致教师的技能缺乏教育性,而且压缩了他们的教育理念与课程能力的学习时间。在物化的教育中,教师自身也不能明确其专业性何在,往往以是否拥有良好的物件操作技术为标准来发展技能。

物件与教师专业素养的绑定抽空了育人素养这一内涵。教师专业素养的全部指向是为儿童的成长铺设合适的轨道。所以,处理好儿童发展的问题应该是教师要具备的关键能力。其中除了课程能力之外,还包括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然而物化的教育不仅减少了教师学习这种能力的时间,还形成了师幼互动、家园互动之间的屏障,使人的真正需求隐退于技术之后。正像教学一体机等多媒体设备横亘在师幼之间一样,这种物件的智能性与多功能性可以帮助教师管理儿童,或者提供便利的教学资源,然而新技术设备并没有提高教师的劳动效率,反而使教师产生了一种依赖物件的教育习惯。当教师的教育行为过度依赖技术物件时,其育人素养便会悄然退化。

(三) 物件为课程代言

幼儿园对物件依赖使得课程攀上了新技术符号的高枝,以物件的符号价值提升课程形象。在物件的显性形象掩盖下,课程中的软实力这一难以凸显的要素变得更加模糊。物件及其符号成了课程质量的代言人。比如,人们口中的“贵族”学校通过对现代科技产品的拥有,使师生置身于由消费科技产品而带来的身份、品位、个性化等标签与符号的自豪感^[11]。

这种通过物件制造的差异性给学校课程冠上了“优质”的名号。然而,影响课程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课程文本、课程理念与文化、师资水平、师幼互动等因素在物化的教育中反而不被关注。

技术对教育的垄断使其他教育方法与价值观隐匿得无影无形。幼儿园的物件更新在一定程度上仅仅是由市场推动的,或者是技术本身迭代升级推动的,而非教育变革本身的需求。这就造成一种后果,物件形态变化了,或者技术先进了,但教师可能依旧停留在陈旧的教育观念中,抑或物件的新特性根本进入不了教育过程。教育上对硬件的投入可能只是制造了虚假的进步印象,而且技术物件本身的更新未必是真有必要。消费社会中的物件更新,往往是在经济推动之下故意制造的边缘化差异,而非技术的真正必要的进步。正如智能手机的更新换代一样,很多功能的改变纯属技术开发者的自娱自乐。“这样的社会,把自己投入技术进步之中,完成了所有可能的革命,但那只是在它自己之中的革命。它的生产力增加了,却不能带来任何结构性改变。”^{[12]170}而且这种边缘化差异可能就成为学校谋求特殊身份的一种符号。比如,标榜自身的教育技术硬件进入了新阶段。教育对技术物件的依赖也给课程制造了新问题,同时老问题依旧存在,只是被新问题夺去了风头而不被人们注意。面对课程活动,教师们所思考的不是如何钻研教学方法、研究儿童的学习特点,而是如何在物件之间做选择。开展课程活动就成了儿童对玩具材料的操作,甚至今天的备课就等同于数字资源(教学图片、视频、音频)的准备,而这些准备都不再关乎育人目的、儿童学习规律、活动流程优化等问题的思考。所以,教学物件尽管从黑板演变到了投影,再到今天的教学一体机,教学方法却并未发生太大变化。物件的介入只是在人们心理能量的投射下形成了一种压倒人文性的技术导向的课程文化。

三、物件迈向课程资源的实现路径

幼儿园教育的物化从深层反映了幼儿园

的课程观问题。幼儿园追求教师计划性较弱、儿童主动性强的课程实施,也就是以游戏精神为内核组织课程活动。其中玩具材料被视作重要的物质基础。教师期待丰富的物质材料给儿童的学习提供支持,儿童主动与材料互动可以获得发展,却忽视了课程设计的作用,把游戏中的物质材料排除在课程之外。物件只有被有目的地整合进儿童的学习过程,才能成为课程资源,激活其育人特性。幼儿教育要通过对物件与儿童、教师、课程关系的思考,以人本位的教育理念与现实需求使用物件。

(一)以儿童活动为导向选用物件

幼儿园里的物件为儿童的学习提供了物质基础,也形塑了儿童活动的空间环境。在教室空间里,儿童的身体活动是首要的,物件则是铺垫性的。幼儿教育不能在追求环境丰富中走向极端,而是要尽可能地形成儿童与物件之间的使用与被使用关系。

首先,物件为身体活动营造空间。儿童的学习主要体现为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等方式。在这种学习方式中,身体活动占据非常重要的位置,身体在教室空间内的行动构成了儿童对空间的直接体验。所以,教室里物件的设置应服务于儿童的身体与学习。幼儿教育实践却围绕物件的管理,生成一套空间权力技术。教师通过桌椅对幼儿身体的规训,就是基于物件布局,通过对身体的定位与管控,排除了身体参与学习的正当性。为了支持儿童学习,教室里物件的选用与摆放需要尊重儿童的身体活动自由。一是应优化教室空间布局。尽量减少大型、固定物件的摆放,采用可移动床铺与玩具柜,确保空间的使用率最大化。二是应重塑空间的心理意义。弱化物件造成的空间分割,使整个教室空间融通一体,将教室整体打造为游戏场,鼓励儿童之间的跨区域互动。

其次,以儿童学习需求为准则选用物件。以儿童的兴趣为依据,对游戏材料进行调整并不是很好的策略。因为教师往往缺少对儿童兴趣的价值判断,只顾着为满足儿童兴趣而大量投入玩具材料,或者只要儿童感兴趣就提供

材料。这种即时的满足可能导致儿童陷入对材料的数量与新奇性的追求之中。作为学习辅助物,玩具材料的价值是在实现教育目标的过程中得以体现的。因此,玩具材料的投放要有目的性和计划性。也就是说,教师不能凭感性直观提供玩教具,而是必须在课程目标的引导下,预设儿童达到目标的可能问题,有步骤地提供支持。即便在儿童的自由游戏中,也不能一次性地将玩具材料全部呈现。同时,我们还要鼓励儿童积极探索材料的多重功能,尽可能做到物尽其用。

(二)超越技术定向的教师技能,重视课程能力培养

物化的教育将幼儿教师的专业性窄化为对物件的操作技术,忽略了教师的儿童研究能力和课程能力。恰恰是这两种能力决定了在教育中如何使用物件。对培养新时代教育家型教师而言,课程能力的重要性远在物件操作技术之上。

首先,解除教师专业性与物件技术的绑定。以物件的符号价值标榜教师的专业素养必然弱化了教师的育人素养。这在幼儿教师身上体现得很明显。当前的幼儿教师培养亟须在这些方面做出改进。第一,调整学前师范生培养的课程设置,减少艺术技能课程的比例。淡化技艺学习,整合艺术类课程指向学前师范生审美素养的培养。第二,取消幼儿教师资格证面试中的技艺考核,突出儿童研究能力、课程设计与教学能力。第三,禁止各级教育部门对所有教师进行艺术技能或信息能力考核。幼儿园可以聘任专业的艺术教师和信息技术教师,这样不仅可以提升幼儿园艺术教育的质量,还能让其他教师摆脱技艺的纠缠。

其次,提升教师的课程能力。幼儿教育的物化带有一定的技术乐观主义倾向,表现为相信技术的使用可以解决课程实践中的问题,可以更好地促进儿童发展。但无论技术如何发展,课程与教学都应该回归目的理性,回到教育活动本身,意识到人的思想、经验、意志、道德等是决定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13]。课程能力的培养能够帮助教师根据儿童的现实需求

制定合理的成长路径,在课程实施过程中以正确的理念处理物件的用途。第一,推动学前师范生能力从技能训练向课程建构转变。建议以《幼儿园课程》为核心构建课程群,关键是将技术能力的培养置于完整的课程图景中,让学习者清晰认识到每一项技能在实现课程目标中的具体作用。第二,培养教师的课程意识,使其能协调物件的使用。具体而言,教师首先要洞悉物件作为技术系统所承载的哲学理念与设计意图;进而在实践中,以课程目标为根本准绳,审慎抉择使用何种物件及如何使用,确保其始终是服务于课程的辅助性资源,而非教学的主导。第三,提升教师的儿童研究与支持能力。对儿童的理解与研究是开展课程的重要一步。但研究儿童不能仅限于对心理学中儿童发展规律的机械应用,更重要的是关注现实中的儿童,加强对儿童行为的解读与支持,以满足儿童的真需求为目的准备游戏材料。

(三)重塑“物件使用”的课程文化

“物件使用”的课程文化始终围绕育人目标与儿童发展实际建设课程,以儿童的学习需求作为物件选用的根本准则,从而使物件与课程之间相得益彰。它的主要特征就是把人置于课程的核心,重视课程软实力建设,以质量取向的课程文化统摄物件。课程自信是维系这种关系的重要因素。

首先,核心在于对技术物件进行祛魅。教师需凭借技术批判意识与理性观念,看透物件的技术表象,破除其对课程实质的遮蔽,使课程回归育人本质。当幼儿园的课程实施过于依赖物件时,教师关于课程的思考与认知将会发生改变。这就需要教师具备对物件的批判意识,不能盲目乐观地相信技术的力量,或者沉溺于物件的符号幻象中自欺欺人。教育装备与物件的选用必须服务课程,通过一套筛选机制使其从技术工具真正成为课程资源。这意味着我们必须超越制造商的话语,对其功能价值进行祛魅;必须衡量其对课程目标、方法与过程的实质贡献;最终必须回归教育的本体论,审视其是否尊重儿童的需要,并警惕其以

便利为名,给教师专业判断力带来风险。

其次,注重课程内涵建设,树立课程质量自信。物质的丰富与高端科技不能代表课程质量。教育是良心事业,我们需要以务实的态度破除物件的符号幻觉,以高质量的课程体系应对物件的诱惑。第一,找准幼儿园课程理念定位,用育人理念驾驭物件技术。由幼儿园教育实践生发的课程理念具有十足的适切性与包容性,在应对物件的干扰时,能以自信的姿态将其整合进课程之中,做到物为课程所用。第二,明确幼儿园育人目标,制定课程目标体系。清晰的课程目标能够引导整个课程有序进行,使教师走出实践的迷雾丛林,建立物件与课程任务之间的关联。第三,开发配套的课程资源包。配套的课程资源丰富了教师课程实施的方式,这也是课程质量的一种保障。但使用何种课程资源并不是强制的,它只能发挥参考价值。第四,严格把关课程实施的每个环节。游戏、生活、教学、环境等都是为实现课程目标服务的,这些活动应相互支撑,共同深化儿童的经验。另外,课程实施还要真正关注儿童的实际需求,以便对课程进行调整。第五,开展丰富多样的课程评价。幼儿园不必追求课程花样繁多,也不必盲目制造特色。重要的是脚踏实地地开展育人工作,以自己的课程目标开发评价工具,用儿童的发展情况来证明课程质量。

[参考文献]

[1] 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M].杜章智,任立,

燕宏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 [2] 张更立,张艳丽.教育物化:儿童生活异化的批判教育学归因[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21(3):9-15.
- [3] 熊和平.论教育文化研究视域下的学校物件[J].教育科学,2022(1):18-26.
- [4] 刘旭东,王稳东.儿童美好生活与教育空间的重构[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95-102.
- [5] 白馥兰.技术、性别、历史:重新审视帝制中国的大转型[M].吴秀杰,白岚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7.
- [6] 李芒,石君齐.靠不住的诺言:技术之于学习的神话[J].开放教育研究,2020(1):14-20.
- [7] 辛丰年.钢琴文化 300 年[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
- [8] 尼尔·波兹曼.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M].何道宽,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19.
- [9] 石建伟,王萍.回归身体:幼儿园“椅子管理术”审思与价值转向[J].中国教育学刊,2020(7):84-88.
- [10] 艾伦.教育装备目的论[J].中国现代教育装备,2020(24):15-19.
- [11] 王蕾.学校神话视角下教育消费空间的生产——以浙江 Z 民办学校为例[J].教育研究与实验,2020(6):32-36.
- [12] 让·鲍德里亚.物体系[M].林志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 [13] 李芒.对教育技术“工具理性”的批判[J].教育研究,2008(5):56-61.

(责任编辑 师 语)

从迷茫区隔到协同共生:支持性中间系统赋能 家园共育的路径探索*

方 芳

(安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安徽安庆 246133)

[摘 要] 家园共育质量是直接影响幼儿发展的关键因素。基于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家庭与幼儿园作为幼儿成长的微观系统,其互动构成的核心“中间系统”是支持幼儿发展的关键之一。当前家园共育实践中存在角色定位模糊、主体参与失衡、目标错位以及情境间联结不畅等困境。为破解困境,家园双方亟须深化互动,明确角色责任与行动边界;强化情境间联结,建设彼此间双向信任关系,完善协作制度体系,构建更具生态化的协同育人环境。

[关键词] 支持性中间系统; 家园共育; 有效路径

[中图分类号] G61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1696(2026)04-0117-07

家园共育是幼儿园和家庭联合起来,共同构建教育环境,形成系统合力,助力幼儿全面、和谐发展的重要路径。家园沟通和合作的质量是影响幼儿发展的重要因素^[1]。家园之间只有密切合作、彼此协同,才能为幼儿共创更优质的教育环境。2025年6月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前教育法》(以下简称“《学前教育法》”)第五十八条明确了家园双方的共育责任,这也标志着家园共育作为法律条款的正式落地。

随着时代变迁,家庭参与幼儿园教育日益增加,但家园共育质量不容乐观。共育活动流于表面、家长角色模糊、幼儿园与家庭职责不清等现象较为常见,共育机制不健全,家园互动随意性较大^[2]。此外,共育主体的教育目的存在明显分歧^[3]。由于当前共育实践主要以

幼儿园为主导,导致家长的合作意识与行为大多受教师影响。从更深层次来看,家园共育在具体操作时家庭通常被视为附属于幼儿园的,而家长在共育中处于从属地位,甚至处于失语状态。然而,从本质上看,“共育”是家园共同创设幼儿成长的社会关系系统,而非一方主导另一方。实践中若忽略了这一点,家园共育极易滑向幼儿园单向主导的关系,丧失真实交互的内在动力。

幼儿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不是家庭可以单独胜任的,也不是幼儿园可以单独胜任的,必须两方面结合才能取得充分的成效^{[4]273}。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为此提供了理论视角。该理论认为个体的发展与其生长其中的环境之间是双向的、渐进的、互动的关系。幼儿生活在家庭、幼

* [基金项目] 2023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意义世界视域的新时代儿童美好心灵培育研究”(项目编号:CEA230294),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人工智能融入学校德育课堂教学的风险发生机制及应对策略研究”(项目编号:2025AHGXSK40252),安庆师范大学横向科研项目“助力幼小衔接的儿童阅读课程研究”(项目编号:H20230010)。

[收稿日期] 2026-04-07

[作者简介] 方 芳,女,安徽铜陵人,安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讲师,博士。

儿园、社区等多个情境之中,家庭与幼儿园是他们直接参与并获得直接经验的两种核心环境系统。当幼儿活动跨越家庭与幼儿园的情境界限时,两者就形成互动关系,即构成布朗芬·布伦纳所说的“中间系统”。从中间系统角度探讨如何优化家园关系,对提升共育质量具有重要价值。

一、何为“支持性中间系统”

(一) 中间系统

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主要围绕个体、环境及相互关系展开讨论。他根据个体与不同环境系统的交互程度不同,按照从内到外、从小到大的次序,将成长“环境”由近到远划分为微观系统(Micro-system)、中间系统(Meso-system)、外部系统(Exo-system)和宏观系统(Macro-system)。这四个系统共同构成“俄罗斯套娃”般的层叠结构。这一层叠系统最内层是与个体发展最直接相关的部分,被称为“微观系统”。微观系统是个体能够亲身参与和切身体验到的环境,具有交互性特点,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最直接。对幼儿而言,家庭和幼儿园是其成长的微观系统中最重要的两个情境。

中间系统则是个体积极地参与两个及以上的环境之间所构成的关系联结^{[5]27}。它并不是一个客观现实存在的社会组织或环境,而是指两个或多个情境之间的关系联结。幼儿所处的微观系统主要由幼儿园、家庭等环境组成,幼儿园和家庭之间的互动,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关系构成了幼儿所在的中间系统。意大利瑞吉欧的教育理念正体现了这一观点,幼儿教育应是幼儿、教师和家长共同参与的,应该从过去的单极个体中心走向团体中心,从发展单一实体走向关系网络建设^{[6]61}。家园共育正是试图在幼儿直接参与的两个活动情境之间形成平等、对话、合作的互动关系,并建构有利于幼儿发展的良好生态的教育实践。

(二) 支持性的中间系统

只有当个体参加不止一个情境的活动,中间系统才能形成,因为中间系统需要个体跨越

情境的界限,引发情境间的互动。但情境间的联结对个体成长的影响可能是正向,也可能是负向的。布朗芬·布伦纳强调,如果不同环境对个体的角色要求一致,且个体参与的活动及人际关系等有利于环境间形成积极正向的关系,当这种关系表现出相互信任、积极正向、目标一致等特点时,就表明已经形成“支持性”的关系联结^{[5]247}。当情境间联结效果是支持性的,情境的发展潜力会提高,更有利于个体发展。布氏认为当个体积极参与两个情境时,他就成了两个情境之间的主要联结。此外,布氏重视补充联结,即个体之外的人参与两个情境形成的联结,如父母、教师等参与两个情境。当幼儿的母亲积极参与幼儿园各项活动,并与班级教师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时,幼儿就会感觉到自己不是在单独活动,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以及心理安全感得以提高。所以,即使当幼儿父母并非其主要日常教养人的时候,幼儿祖辈或其他重要他人都可以成为幼儿的补充联结。当主要联结与补充联结并存,形成“多重联结”时,情境的发展潜力会增大^{[5]244}。反之,若情境间沟通、互动很少,联结微弱,则难以产生支持性的作用。

据上文所述,可以将幼儿发展的“支持性中间系统”界定为幼儿园与家庭建立相互信任且目标一致的关系,且生活在两个情境中的人能够积极参与活动,发生良好的交互作用,并最终促进幼儿和谐发展的环境。可以看出,构建支持性的中间系统,核心关键在于家庭与幼儿园之间形成相互信任且目标一致的关系。

二、迷茫与区隔:家园共育的困境

家园共育的目标是建构良性、具有支持作用的中间系统,形成有利于幼儿发展的良好生态环境。纵观当前家园共育的实践现状,仍存在不少观念及实践方面的问题,阻碍了支持性中间系统的形成。

(一) 角色“移位”,共育主体参与失衡

“角色”不仅是人类发展生态学的重要概念,也是组成环境系统的核心要素。在相同的环境里,个体承担或被赋予的角色不同,其行

为、活动、人际关系等也会随之改变。在具体活动或情境中,角色不仅指他人对个体的行为期待,更是代表了整体宏观文化层面上的期待。所以,尽管看起来个体在微观情境中具体地扮演某种角色,但其角色承担仍受到宏观系统中社会主流文化、约定俗成的传统观念等的影响。因此,“角色”才有了某种特殊的力量去影响个体的行为与社会关系。从理论上讲,家长被赋予了参与管理、评价以及配合支持幼儿园保教工作、家庭教育四重角色^[7]。但宏观系统中的社会文化、微观系统中的组织目标、个人家庭境遇等导致家园双方角色移位。

一部分家长的“教育外包”心态使得他们让渡自身的角色,导致幼儿园教育中的家长参与出现缺位、越位与不到位^[8]的情形。部分家长让渡自身作为子女教育者的身份,认为将幼儿送入园,就可以向幼儿园转移全部教育责任,自身则退居为生活照料者角色。另外,亦有部分家长虽有参与意愿,尤其是处境不利地位的家庭^[9],受限于工作压力、育儿能力不足等原因,对自身的具体责任和教育参与感到迷茫。持教育外包心态的家长,往往容易成为教师眼中“难以合作的家长”。

教师的专业权威固化,容易导致家园共生生态失衡。在实践中,幼儿教师容易形成上位者心态,主导家园互动的频次、内容与形式。家长常被“资源化”,处于被动配合状态,容易产生疲于应付的心态。教师的家庭教育指导者角色也日益滑向任务分配者。同时,在相关政策文件中,家长常被定位为“需指导的非专业人员”或配合者,家园双方平等的合作地位尚未真正确立,导致家长“隐性失语”。家长难以真正深入参与幼儿园课程与管理,家长参与演变成有限、单向化的参与,导致家长的“参与幼儿园管理”角色实质性落空。最终,家庭作为教育主体的地位被弱化,家园共生呈现幼儿园单边化导向。

(二) 目标错位,合作共识有待提升

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学校和家庭要保持一致的教育信念,无论在教育的目的上、过程上还是手段上,都不要发生分歧,始终秉持同样

的原则。作为两个不同的情境系统,家庭与幼儿园的角色与运行组织方式有很大区别,目标并不会完全相同。系统目标只有明确且协同一致,两个系统之间的互补性、连贯性与一致性良好,才能更好地引导参与者朝共同目标努力。因此,家园只有尽可能地保持同频与一致,才有可能为幼儿共创良好的成长环境,最终提升教育成效。

从当前现实看,家长对共育目标的认知窄化,且功利化倾向明显。由于深受社会竞争氛围影响,且大部分家长并未系统学习儿童发展与教育等方面的知识,他们对儿童发展的理解往往短期化、功利化。他们的目标和期待主要聚焦于幼儿的知识学习及显性能力的提高,尤其注重幼儿识字、算术等学业准备方面。家长通常对非知识性的德体美劳、隐性学习品质等成长维度,如同情心、规则意识、冒险精神、社会适应力等方面关注不足或直接忽视。家长对幼儿园的游戏化、过程化、体验式的教学往往持质疑态度,认为这种教学效率不高,孩子“学不到什么”。这种教学既不能很好地实现幼小衔接,更不能帮助幼儿在小学初期形成领先优势。部分家长的教育观念严重偏离教育规律,在家庭中实施的很多教育方式、教育内容严重不符合幼儿所处的年龄阶段与身心发展规律。

另外,幼儿园对共育目标的定位具有一定张力。受政策、法规约束,幼儿园在办园过程中主张以游戏为基本活动,坚决杜绝小学化,关注幼儿整体发展,重视幼儿学习中的过程体验。但作为社会组织,其行为难以避免受办园影响力、生源压力等隐性目标影响,可能导致活动偏离纯粹的幼儿发展导向,附带其他功利目标,有时呈现出“重展示轻探究、重广度轻深度”等情形,并不能真正体现“一切为了孩子”的根本目标。家园共育的目标是“为了幼儿的发展”,但在具体实践层面因受角色定位、经验背景、社会压力及文化环境影响,被家长与教师赋予了不同的内涵,直接导致家园在育人目标上产生分野,合作难以真正持续深入。

(三) 家园关系疏离, 情境间联结不畅

现实中的家园之间关系疏离、联结受损, 难以形成互助合作、协同育人的良好关系, 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互动机制缺乏互惠性, 协作效率不高。理想的合作依赖持续的来回互动与相互反馈。所谓“来回互动”是指在合作或活动过程中, 一方影响另一方, 而另一方也会配合及参与活动, 突出的是相互反馈与互惠互补。但当前的家园互动经常异化为幼儿园对家庭的单向资源索取与指令要求, 如频繁地布置亲子任务、要求家长收集材料等。家长多视此为额外负担, 容易生发敷衍或抗拒心理。同时, 家长的合理关切或建议常被简化处理或缺乏实质回应, 积极性被挫伤。

共育权力难以维持平衡, 园方单边主导明显。在家园共育过程中, 幼儿园显然更具有影响力。通过管理策略, 幼儿园常转嫁本应承担的责任, 将各种任务层层加码, 转移给家庭。在班级工作中, 教师主导, 决定了互动的内容, 如单向下发通知、布置亲子活动任务; 规定互动形式, 如“家长园地”展示多以事务性传达为主, 呈现的内容主要为活动计划、保育要求、资源征集等, 缺乏深度协商与共建, 也没有形成家长深度参与决策、共建的渠道与空间。

共育关系网络没有实现全覆盖, 联结关系碎片化。健康的生态要求建设覆盖全体幼儿及其家长的联系网络。然而, 现实中教师通常仅与少数固定“积极分子”家长保持联系。虽有便捷的通信技术辅助, 但高效、日常化的、深度互动的家园沟通网络远未构建形成。家长会、开放日等活动中家长常常处于被动旁观者的位置, 没有形成持续有效的日常联动, 整体联结呈现零散状态。

信任基础受到侵蚀, 情感联结断裂。家园合作中彼此的感受、互信程度深刻影响家园关系的质量与发展潜能。彼此敌对、消极的情绪会破坏关系的发展潜力^{[5]85}。近年频繁发生的幼儿园安全事件大大动摇了家庭对园方的基础信任, 导致家长对安全监管、卫生条件、教学专业性及公平性等产生担忧。甚至部分家长受网络信息影响, 质疑课程设计或挑战科学

的教育理念。这种信任危机不仅削弱情境间最关键的积极情感联结, 更导致家园关系疏离, 阻碍了优质生态环境的形成。

三、建设支持性中间系统的家园共育有效路径

基于上述分析以及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 不难发现家园共育的核心是在家庭与幼儿园之间建设有效联结, 建构支持性的中间系统。所以, 家园双方应尽可能从增加和深化互动的角度出发, 进一步明晰各自的角色, 深化情境之间的联结, 健全联结制度, 力图朝向生态化的协同育人方向努力。

(一) 明晰角色责任, 确立主体行动边界

1. 承认角色差异性与互补性, 避免角色替代。家庭与幼儿园在幼儿成长过程中承担的角色与发挥的功能存在本质的差异。家庭是一个持久的爱的共同体, 具有时间、空间上的优势, 对幼儿成长影响是久远且深刻的^[10]。父母与教师的角色的本质差异, 表现在功能范围、关爱程度、依恋程度、理性、自发性、偏爱性、责任范围等七个方面^{[11]166}。家庭与子女之间有强烈的情感联结, 承载着基于血缘的、全方位且无时限的养育责任。而幼儿园是在特定的时空与专业组织结构内履行教育功能。这种本然的差异并非对立或排斥, 而是彼此互补共生的前提。家园共育并非追求角色同化或替代, 抹平双方的独特价值; 相反, 双方唯有充分尊重并理解各自角色的特点及责任, 才能避免因差异导致的潜在对立与消极互动。两个情境的参与者都应明白, 尽管活动需要跨越情境的界限才能建立联结, 但同时对各领域都应保留控制感。双方只有在保持“和而不同”的立场上, 才能在差异中确立清晰的角色与边界, 为有效的家园合作奠定基础。

2. 塑造积极角色期望, 唤醒主体的教育自觉与行为。角色包含了对处于特定社会位置的个体行为与关系的期望集合^{[5]95}, 显著影响个体在具体情境下的社会互动与人际关系建构。角色期望可以引导个体扮演与之相应的社会角色, 社会成员间彼此期待, 则会塑造不

同的个体行为模式。家园双向形成积极、合理的角色期望,是明晰共育责任的核心与关键。整体来看,家长角色可以分为家庭教育者与幼儿园教育的参与者。家长与孩子的互动及其影响要比教师更加广泛、密切,对孩子一生的影响巨大。首先,幼儿园赋权家庭,唤醒家长作为“第一教育者”的身份认同。将一个人安置在特定角色上,更容易唤出与此角色期待一致的感知、活动和人际关系^{[5]104}。幼儿园需积极主动地帮助家长明确其基础性、持久性与全面性的核心角色定位,重拾其作为子女“第一教育者”角色,鼓励其承担相应的教育责任。此外,幼儿园要向家长表达出积极共育期望,赋予家长身为“老师”的荣誉感与责任感,帮助家长明确其教育子女的角色。教师可通过家长会、公众号、班级群、家园公告栏等渠道进行角色赋权与价值肯定。其次,幼儿园应合理定位家园互动中的家长角色,让家长从被动配合的“局外人”转向积极参与的“局内人”。幼儿园应采用多种策略,吸引家长主动成为幼儿园教育的合作者、支持者,甚至幼儿园的评价者、管理者。如从幼儿园层面正式聘请家长作为代表,了解家长群体对课程、管理、教师等方面的期望与需要等。相应地,幼儿园须担负起自身作为家园合作的引导者、支持者与家长教育能力建构者的主导责任。

3.探索动态行动边界,保持家园之间弹性平衡与有序合作。家园作为两个独立运行的情境,亟须探索并维护合理的行动阈限。幼儿园不仅承担统筹管理、促进家园深度合作的角色,还有必要引导家长承担自身的共育责任,并明确其行动边界。首先,幼儿园要积极化解家长的参与“越位”,确立制度性界限,从而解决幼儿园教育境域中家长参与行为的模糊性与可能的“越位”问题。幼儿园要以适宜的方式,向家长普及国家政策中有关家园共育的标准、责任、权利、义务。同时,幼儿园还要根据本园情况细化内容,将充满刚性的政策、制度转化为家园共同认可的共育契约、责任清单等,为合作提供合理的责任框架,帮助双方在共育中明确参与流程、责任范围。只有这样,才能有效避免缺位、越位、推脱或效能抵消等

问题。其次,教师要根据家长特点与情境变化,与其保持弹性互动和合作。教师需敏锐觉察家长角色的动态变化,如家长工作状态等外部系统因素变动,并理解其对家长行为的潜在影响。充满人文关怀的共育合作是实现动态平衡、调适角色期望与行为边界的内核所在。明晰的边界能够为家园共育实践创造稳定的空间,而弹性的行动是形成协同化和谐教育生态的保障。

(二) 丰富情境联结,形成双向信任关系

支持性中间系统的构建并非将幼儿园与家庭两个独立情境简单拼凑为“拼接态”的共育模式,而应努力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叠加态”共育环境。所谓“叠加”即情境互涉,是指不同情境超越原有界限并相互渗透产生影响。情境间的互涉是实现联结并促成支持性中间系统的重要前提。依据布朗芬·布伦纳的观点,有效的联结可促进情境间的深入互动,从而对幼儿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幼儿是两个情境之间的主要联结,但仅有主要联结仍不足以发挥更大的生态效能,需进一步丰富情境间的多重联结以增强互动性。

首先,拓展联结主体,吸引与幼儿有关的重要他人参与跨情境互动,形成家园之间的多重联结网络。教师需要主动将幼儿的父母、主要教养人、祖辈及其他重要他人聚集并动员起来,共同构成情境间的“补充联结”,使单一的联结转化为多重联结,从而提升家园两情境对幼儿发展的潜力^{[5]262}。为此,幼儿园应制定具体的家园共育行动框架以吸引家长主动参与。一方面,教师要清晰说明活动的目的、内容与实施细节,便于家长理解参与的意义;另一方面,教师要关注不同家庭结构的家长或照料人,设计有针对性的课程与项目,吸引拥有不同行业背景与专业技能的家长、拥有丰富生活经验的祖辈等积极参与。在进入幼儿园情境时,家长亦可以有多种角色定位,既可作为孩子的监护人,也可承担志愿者、家长助教^[12]、活动主持人或参与幼儿园管理的角色,并据此不断调整自身行为,从而收到更好的教育成效。

其次,巧妙运用物质元素,促进情境空间互渗。物理空间是情境的实际载体,同时,空间中的物质元素也形塑空间意义和主体行为。社会物质视角理论认为,儿童的行为与物质元素是互相影响的^[13]。一定的物质元素是特定的情境符号,能发挥强化情境联结的效应。尽管家园双方在物理环境上是阻隔的,但可以通过情境设置,使彼此的情境符号相互融入。在幼儿园内,可以设立常设的“家庭角”或“我家故事墙”,展示家庭合影、摆件、玩具或家庭趣事,使家庭情境在幼儿园中拥有一个现实的空间据点。反过来,也可以鼓励家长在家里设立“幼儿园延伸角”,用于陈列孩子的在园绘画、手工作品、好朋友合照、班集体照或幼儿园吉祥物等。这些幼儿可视、可感的具体材料,作为空间符号嵌入家园两个情境之中,可以提醒家园双方是相互交融的两个世界,让情境联结变得直接、具体且日常化。这不仅能为幼儿提供直观的、可随时触及的心理环境,也可拉近幼儿园与家庭的距离。

最后,注意对话方式多样化,提高情境融合程度。一般而言,个性化深度交流采用一对一、面对面沟通为佳。这种形式互动性最强,能传递非语言信息,易于建立信任。同时,幼儿入园、离园时教师与家长的简短交谈、预约面谈或电话沟通都是不错的补充选择。涉及群体性的共性话题,如对课程的建议、育儿经验的分享等,则可通过家长沙龙、主题座谈会、问卷调查等集约化方式高效解决。例如,组织“幼儿社会交往策略”或“家庭电子产品管理”等主题沙龙,能有效激发家长的群体智慧,凝聚共识。对话策略应灵活多样,突出线上与线下相结合,正式与非正式相补充。灵活运用家长会、家访等正式渠道,珍视日常接触中碎片化随机交流的价值。此外,还可以以幼儿为桥梁,在家庭和幼儿园之间传递家园联系簿,使家长和老师能够通过记录了解幼儿在园及在家发生的日常生活事件。这不仅能培养幼儿的责任感,也能让家园对话充满即时性与温情。

(三)健全共育制度,深化生态化协同

从人类发展生态学理论看,家园共育就是

对幼儿所处的环境进行深度整合,从而实现生态化协同。幼儿作为核心主体,其发展不仅依赖支持性“中间系统”家园之间的积极作用,还需要外部系统中的社区组织、家长单位、教育管理部门、教研单位等各方的积极正向支撑,同时还需要“宏观系统”中的社会文化引领与政策法规、制度保障。

首先,优化宏观环境,改进现有家园共育政策、制度及标准,引领科学育儿文化。政策部门仍需要在《学前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基础上,进一步制定精细化、可操作的共育政策,明确具体的共育标准,以明确的文件保障所有家长,特别是处境不利群体的平等话语权、参与管理权、决策权与监督权,确保家园共育的平等与开放。相关教育部门应主导构建国家级的共享平台,实现高品质幼儿教育资源的共享,避免家长受到部分自媒体中伪教育信息的误导与困扰,防止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在有条件的区域,应该由政府主导,联合专业学前教育机构与社区,运用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搭建公益性、权威性数字资源库,进一步满足家长的科学养育需求,有效屏蔽误导性的不良信息,为社会育儿文化树立明确的正确导向。

其次,突出完善中间系统的互动机制,加强家园协同制度建设与情感积累。幼儿园应以开放办园为前提,建设形成专业性与民主性并重的深度互动、协同机制。幼儿园不仅要成立家委会、家长学校等常设组织,还要确保对其进行实质性赋能。第一,家园管理方面要形成科学化、常态化议事程序,以多途径、链条状的互动路径,确保家长参与的深度与广度。互动核心是要保障家长在园所管理、教学、课程、活动策划、膳食、卫生、安全等核心环节获得充分的表达,尤其是要关注弱势群体的诉求。第二,要考虑到家庭结构多样性问题,提高特殊家长群体参与共育的积极性。幼儿园应设计具有针对性的家长共育项目,着力提升低收入、低学历、外来务工等特定家长群体的参与效能感。第三,园方还应以系统化、持续性的培训赋能教师,将家园协同能力纳入专业核心能力评价体系,帮助教师形成深度家园共育的

专业能力与专业自觉。同时,班级教师应善于发现每个家长身上的独特优势,吸引他们参与课程中,营造真正包容、接纳、相互尊重的家园文化氛围。此外,家园共育应突出人文关怀,以情感为先,增强情感联结,在家园之间营造友好氛围。情感关系越融洽,就越能够促进家长与幼儿园在教育理念、价值取向、教育行为方面达成共识。若家庭、幼儿园的观念与行为较为一致,那么就构成了伙伴关系,否则家庭与幼儿园就是相互分离的^[14]。

最后,完善微观系统的内容支撑与资源供给。由教育主管部门牵头,组织学前教育专家与一线实践者,共同设计开发全维度家园共育内容体系。内容设计应注重专业性、实用性和趣味性,提升家长的参与体验与互动黏性。另外,幼儿园应构建体系化、连续化的共育内容框架,提升共育行为的科学性与有效性。例如,以“二十四节气”为主题,幼儿园可以制订全年的亲子大阅读计划,培养阅读习惯,提升亲子阅读力。有条件的幼儿园应积极推动技术赋能,提高共育资源的精准投放水平。加强技术开发与应用,如个体化发展评估 App、精准推送系统等。幼儿园可通过适宜的数字平台与工具,向家庭提供关于幼儿发展的评价报告、活动观察记录与个性化育儿建议等。优化家园数字共育平台的建设,应突出教育导向性,而非只是信息的传递与交流^[15]。幼儿园还可以利用自身的专业优势,在数字资源平台向家长推荐质量有保障的家园共育在线课程、专家讲座库、亲子活动方案库、育儿实用工具等。此外,幼儿园还应有意识地整合社区资源,如常规的文体联合活动,宣传科学的幼儿教育理念,共同识别有特殊需要的幼儿及家庭等,协同建设全方位的共育网络。

[参 考 文 献]

- [1] 席春媛,任丽欣.家园社区协同质量现状、类别及其与幼儿发展的关联[J].学前教育研究,2023(4):57-68.
- [2] 程天宇.疏离与回归:家园共育理念实现的

- 应然路径选择[J].教育探索,2015(9):64-66.
- [3] 张雪,索长清,王秀青.家园合作的困境与突破——基于哈格里夫斯教师情绪地理框架的分析[J].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1(4):88-93.
- [4] 陈鹤琴.家庭教育——怎样教小孩[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
- [5] 布朗芬·布伦纳.人类发展生态学[M].曾淑贤,刘凯,陈淑芳,译.台北:心理出版社股份有限公司,2010.
- [6] 屠美如.向瑞吉欧学什么——《儿童的一百种语言》解读[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 [7] 蔡迎旗,邓和平.我国家园合作中的幼儿家长角色变迁与展望——基于1949-2022学前教育政策文本的分析[J].教育学术月刊,2022(7):60-66.
- [8] 索长清.家庭教育与幼儿园教育的边界[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8(7):5-8.
- [9] 孙丽萍,姬甜甜,康丽颖.学前阶段家长参与及其特点研究——基于群体差异的分析视角[J].教育学术月刊,2021(10):33-39+48.
- [10] 华伟.家庭: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培养的重要场域[J].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0(4):31-33.
- [11] 丽莲·凯兹.与幼儿教师对话:迈向专业成长之路[M].廖凤瑞,译.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 [12] 黄美蓉.幼儿园家长助教的实施与思考[J].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9(10):79-83.
- [13] 蒋美霞.儿童研究的新图景:从社会物质视角理解儿童[J].新儿童研究,2021:201-210.
- [14] 吴重涵,张俊,王梅雾.是什么阻碍了家长对子女教育的参与——阶层差异、学校选择性抑制与家长参与[J].教育研究,2017(1):85-94.
- [15] 李娟,冉微,樊意想.数字平台在家园社共育中的应用——基于近20年国内外期刊论文的系统性分析[J].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24(4):61-73.

(责任编辑 师 语)

Exploration of Xi Jinping's Systematic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LIU Li SHI Tiantian

(College of Marxism,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Anhui, 230026, China)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mbodies a distinct systematic perspective, which not only elaborates on the main content of natural ecosystem theory such as the elements, levels,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 of ecosystem, but also clarifies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systems engineering theory that the governing entities need to optimize the structur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holistic governance. This holds significant methodological implications for advancing th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and improving th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atic perspective; ecological and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Basic Connotation, Challenges and Optimization Pathways of Cultivating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CHEN Lu

(School of Marxism,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is a fundamental quality that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possess in the new era, which encompasses the aspects like the cognition of responsibility, the emotions of responsibility, the will of responsibility, and the behaviors of responsibility. The cultivation of this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faces challenges such as incomplete educational content, a single teaching method, insufficient collaborative efforts, and weak participation willing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se problems primarily stem from the insufficient self-awareness of college students, the absence of scientific family education concepts and methods, the imperfect school education models, and 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negative social ideologies. Cultivating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mong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new era is a complex and extensive systematic endeavor. Only through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and joint efforts of individuals, families, schools, and society, and by establishing a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community, can the pathways for cultivating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mong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be optimized, and the best educational effectiveness be achieved.

Key words: the new era; college students;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the cultivation of the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 Brief Exploration of the Basic Literature Issues of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NING Jiayu

(School of Literatur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e academic community often focuses on understanding the "goodness" and "beauty" of the content and style of the works, but pays insufficient attention to the basic literature issues that reflect the "truth" of the works, which makes it difficult to accurate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works from a deep and profound perspective. Taking the study and reading of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does research on such aspects as the time of its compilati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title, the number of volumes, the evolution of the number of categories, and the comments and annotation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exploring and analyzing the works from the basic literature level and gaining a deep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evant basic information of the works.

Key words: *A New Account of Tales of the World*; basic literature; version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of High-Order Thinking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GUAN Kaibing LI Zhen

(Jiangsu Xinhai Senior High School, Lianyungang, Jiangsu, 222006, China)

Abstract: High-order thinking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has become a frequently discussed term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today, which has a complex system structure, including multiple cognitive structures, emotional elements, and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cognitive structures and emotional elements as well. "Structures", "elements", and "relationships" work together and exert influence on each other to refine and enhance learners' thinking quality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learning. High-order thinking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linguistic expression, and exhibits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the contextual nature of thinking, the transferability, judgmental and creative nature of thinking processes, and the imagery and aesthetic quality of thinking presentation. The core pathways for its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includes constructing authentic situations, forming problem-based thinking pattern, deciphering "codes" of thinking, generating linguistic innovation, and achieving value creation.

Key words: Chinese language curriculum; high-order thinking;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From "Absence" to "Return": A Qualitative Study on Reshaping Implicit Professional Beliefs among Inclusive Preschool Education Teachers Guided by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OUYANG Ye

(School of Preschool Education, Changsha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Changsha, Hunan, 410217, China)

Abstract: This study adopted a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to explore the dynamic process and internal mechanism of reshaping teachers' implicit professional beliefs guided by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reshaping of implicit professional beliefs among inclusive preschool education teachers experienced five stages: "suspension—wondering—awakening—reconstruction—return". This transformation was influenced by the interaction of three structural factors: system, culture and subject. At the system level, the regulation of safety accountability and the single evaluation system induced a defensive mentality among teachers, causing their beliefs to be in a "suspended" state of absence. At the cultural level, the conflict between exclusionary habits and the inclusive education concept triggered ethical anxiety, leading to teachers' beliefs "wondering" between reality and ideals. At the subject level, faced up with the choice between professional survival rationality and the pursuit of life meaning, teachers, awakened by benevolence and driven by educational wisdom, gradually realiz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ir beliefs, and ultimately completed the "return" in the pursuit of spiritual values.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it is suggested to construct a developmental evaluation system, foster an inclusive professional culture, and build a reflective practice community to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inclusive preschool education faculty from "passive compliance" to "self-awareness", thereby providing a solid spiritual support for high-quality inclusive education.

Key words: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inclusive preschool education; implicit professional beliefs; qualitative research